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42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

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

資本主義はなぜ自壊したのか — 「日本」再生への提言

〔日〕中谷 岩/著
郑 萍/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④

国际金融危机跟踪研究·李慎明 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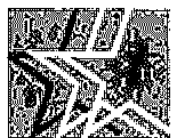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42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

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

資本主義はなぜ自壊したのか — 「日本」再生への提言

〔日〕中谷 岩/著

郑 萍/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 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日)
中谷岩著; 郑萍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7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978-7-5097-1443-0

I. ①资… II. ①中… ②郑… III. 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
研究 IV. ①F091.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393 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42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

——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

著 者 / [日] 中谷 岩
译 者 / 郑 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 站 支 持 / (010) 59367077
责 任 部 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 子 信 箱 / bianyibu@ssap.cn
项 目 负 责 人 / 祝得彬
责 任 编 辑 / 曹义恒 王晓卿
责 任 校 对 / 单远举
责 任 印 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6.75 字数 / 222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443-0
著 作 权 合 同 / 图字 01-2009-7028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版序

拙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的中文版将与中国读者见面，我从内心感到高兴。

或许有读者会认为书名未免显得过于“急切”，因为资本主义尚未“自我崩溃”。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暴露种种矛盾，这是基本事实。

如果投机活动驱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自由移动，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必将加剧。其结果，就是造成我们记忆犹新的“雷曼冲击”。

地球环境问题也还在加剧。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它们想尽量不承担保护环境所需的成本。

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全球化，市场扩大，商业机会明显增多。结果，全球市场中能够充分发挥竞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可以创造多于以往的庞大利益，会增加收入；而其他企业和个人在竞争压力下，则利益受挤压，收入减少，有人或许还会蒙受失业的痛苦。

再有一点就是出现社会冷漠现象。资本主义把人的劳动商品化，使得人们构建人与人相互帮助的和谐温馨的社会动机变得淡薄。人们不再是在温暖的共同体中相互帮携着生活，而是被利己主义纠缠，认为只要自己富裕就好。结果社会变得不再安定，人际关系也变差。

如果资本主义不能解决这些矛盾，今后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想见，那样会有一部分人变得富有，但同时上述“市场动荡加剧”、“地球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冷漠”问题将更加严重，并覆盖整个世界。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世界迟早必将面对这些矛盾。

我相信，中国人民对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作出非常多的贡献。因为，中国如今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扮演着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引擎”的角色。毫不过分地说，中国的想法、中国的行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今后的世界经济动向。

很明显，一味推行这两百年间支配世界的欧美式价值观，已经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如何抑制全球化资本的投机活动？为了保护地球环境必须做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地球整体的贫困，实现“和谐社会”？怎么做才能阻止社会的冷漠，实现人们能够安心生活的富裕社会？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中国提出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世界一定会深表欢迎。这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来说，也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相信，中国人民不久一定会给我们提出极佳的解决方案。在中国人民思考以上问题时，如果这本书能够为大家提供一点参考，我将不胜荣幸。

中谷 岩

2010年2月12日

前 言

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萧条局面。要结束这种混乱，恐怕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来调整。

但是，还有更本质的问题存在。那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必定还会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错误。

全球化资本主义是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王牌，同时也是给人类社会带来“负面效果”的罪魁祸首。它使得世界经济不稳定，贫富差距扩大，地球环境被破坏。全球化资本越是获得“自由”，就越发会助长这种倾向。

21 世纪的世界，应该给全球化资本以更大的自由呢，还是对它的行动给予一定的限制呢？

自然，新自由主义势力会要求更多的“自由”。因为，资本的全球化是它发展自身的最大的营养源。但是，获得更多“自由”的人，也会因那些“自由”而毁灭自己。最终，“自由”无限制的扩大，会造成资本主义的自我崩溃。

曾经一度风靡日本的“没有改革便没有经济增长”的口号，改变了日本财政投资融资制度，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过激发展，也造成了日本社会形势的恶化。比如，这 20 年中“贫困率”的急剧上升，就使日本社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扭曲。或许，需急救的医疗难民和异常犯罪的增加，也可以算作其“负面

效果”吧。

“改革”是必要的，但如果那些改革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便没有意义。使人“孤立”的改革有负于改革之名。

我也曾经充当过“改革”的左膀右臂。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充满自诫之念而写的“忏悔录”。或许我的忏悔还不够，但迫于世界情势的紧迫，我不能再沉默。因此，这次我下定决心，将我未成熟的想法写进这本书敬献给读者，务必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书能够付梓出版，首先我要感谢集英社国际的前董事长岛地胜彦先生。他在就任该出版社董事长后，最先出版的书就是我的《痛快！经济学》（1999）。幸运的是，这本书成了畅销书。与《痛快！经济学》是岛地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相反的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成为岛地社长推出的最后一本书。这或许就是缘分。在此，我要向岛地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总之，在多重意义上，岛地先生是培养了我的恩人。

如果说本书还值得一读的话，多数功劳都仰仗了该出版社的著名编辑佐藤真先生。本书的内容，我与佐藤先生前后反复进行了十几次彻底的讨论。他提出的各种理性建议，他广博的学识和锐利的问题意识，在我看来，多次帮助我增加了本书内容的纵深度。在这个意义上，几乎可以说，本书是我与佐藤先生的合作成果。

当然，为本书的完成而尽力的人还有很多，不胜枚举。我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够对经济学以外的历史、宗教、文化、哲学等“知识的世界”投入巨大的兴趣，其直接的契机是我参与的多摩大学“40岁CEO培养讲座”，我担任“私塾头领”。开设这个讲座的动机是出于我们的一个信念。我们认为，要使未来的企业干部能够作为日本的上层人物活跃在全球化舞台上，在单纯的商务才干之外需要具备对历史和世界的全局意识以及对人性的认识。可以说虽是“私塾”，但实际上通过在那里进行的“智慧博弈”，我获得了无数的切磋成果，尽管还不成熟，但我暗自期待着它凝缩、显现在本书的每一个角落。

从这一点上讲，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来感谢和我一起参与了七年讲座的伙伴：以吹野博志、米仓诚一郎、小川尚登、岐部一诚、龙泽弘和、乾文子、中村真理各位先生为首的众多的有关人员。另外，全面配合我的工作、在各自领域钻研的该讲座的讲师们，特别是野中郁次郎、松冈正刚、山内昌之、中西辉政、安田喜宪、渡边利夫、三枝匡、川胜平太、岩井克人、北川正恭、中川健一、野田智义、河合隼雄（故）、楠木建、小室直树、伊东俊太郎、冈崎久彦、山折哲雄、山崎正和、猪木武德、佐藤优、吉田敦彦、小川和久、藤本隆弘、桥本大三郎、大楠泰治、末吉竹二郎、吴善花各位先生，我要衷心感谢他们。我从诸位先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深刻的洞察力中，受到了莫大的知性启发。我还要感谢一直派遣听课生来的企业赞助者。七年当中，我通过“智慧博弈”，从175名40岁左右的“年轻”听讲生那里也得到了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三菱UFJ调查咨询股份公司以及多摩大学给了我良好的研究环境。三菱UFJ调查咨询股份公司主任研究员塚田裕昭先生，在数据的整理、发掘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该公司秘书山本美津子女士，为了让我能够专心写作本书，花费了很多心思。

包括以各种形式支持我的家人、朋友在内，我想向所有的人表示由衷的谢意。

中谷 岩

2008年11月14日

写于久违的秋高气爽的东京

目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参考系列 42

前言	1
序章 别了，“全球化资本主义”！	1
美国的富裕已经变质	1
颓废的美国经济	2
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怪兽	4
我曾是“结构性改革”的急先锋	5
“中产社会日本”的消失	6
失去了安全感和安心感	7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9
资本主义如何破坏环境	11
日本人对“结构性改革”的幻灭	12
我的忏悔和转向	13

第一章 我为什么“转向”？	15
我的“美国经历”	15
大相径庭的日美学术风气	16
成为“美国迷”	18
富裕的美国是“大压缩”的产物	20
差距扩大、中产阶层消失、医疗福利后退	21
政府介入创造了“富裕的美国”	23
美国的“日本式经营”	24
被成见欺骗	25
凯恩斯主义经济的衰退、新自由主义春天的到来	26
日本学生对市场原理“教义”的疑惑	28
作为改革派的急先锋	30
“结构改革”使日本人幸福了吗？	32
民主这件“隐身衣”	33
民主与近代经济学皆为精英统治的“工具”	34
作为日本人重新探讨“全球化资本主义”	37
第二章 全球化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贫富差距	40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恩惠”	40
讴歌人间盛世的世界经济	41
无暇顾及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副作用	42
果真是“市场失败”吗？	44
收益递增型产业拉动景气	45
被次贷欺骗的人们	46
“杠杆经营”崩溃的历程	47

会发生贷款紧缩吗?	48
美国“金融立国”战略的失败	50
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	51
“生产与消费分离”造成的差距	53
生活不稳定劳动者的登场	54
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是什么?	57
“完全信息”这个假定	58
外行人不可能靠股票赚钱	59
信息的完全性——不可能!	61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	62
经济学假定的“社会公正”之欺骗性	63
全球化资本主义破坏地球环境	65
作为统治工具的新自由主义	66
第三章 作为“撒旦的磨坊”的市场社会	69
资本主义果真使人幸福吗?	69
为什么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感?	70
贫困但人心没有荒芜的社会	71
古巴医疗的成功	73
人是社会性动物	74
家庭医生制度构建的“社会纽带”	76
以医疗立国为目标的古巴	77
不丹的理念——提倡“国民幸福总值”	78
经济学无法保护自然和社会传统的原因	79
选择与仙鹤共存，而不是生活的富裕	81

亚洲最幸福的国家	82
资本主义破坏“人与社会的联系”	84
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	85
为什么市场经济使人不幸？	87
“劳动力商品化”是问题的开端	88
资本主义造成贫困的原因	89
土地是谁的？	91
土地私有化破坏了传统社会和环境	92
愚蠢的金钱游戏	93
不丹和古巴的“幸福感”	95
“一战”给欧洲人造成的冲击	96
“市场经济不能创造和平与自由”	97
波兰尼的警告为什么被遗忘了？	98
第四章 作为宗教国家、理念国家的美国	101
美国社会的变质	101
“托克维尔的美国”消失了	102
4700 万未参保者	103
责任自负社会的悲惨现实	105
潮流的变化	106
美国式资本主义潜在的暴力性	107
多极化的世界	108
排除特殊性的美国逻辑	109
美国人为什么成为市场原理的信徒？	111
欧洲人为什么不相信理性？	112

美国十字军精神的起源	113
宗教国家美国的创建者	114
所谓“美国的成功是上帝的约定”理论	115
美国为什么时而陷入门罗主义?	116
杀戮原住民是《旧约全书》的再现吗?	118
作为圣战的南北战争	119
未开拓地创造出的个人主义	120
宗教信念的西进	121
美国西进运动终于碰壁	122
大转型时期——美国走向何方?	123
奥巴马总统治理下的美国	124
第五章 “一神教思想” 为什么破坏大自然	127
世界最初的“人造国家”——美国	127
美国经济控制世界的理由	128
新自由主义并非“普适原理”	130
美国式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极限	131
为了从“灭亡的深渊”中拯救人类	132
“蛇与十字架”的秘密	133
“杀死美杜莎”的意义	135
一神教认为“自然是征服的对象”	136
为什么日本人能与自然和谐共存?	138
融合了神道与佛教的日本人	140
本地垂迹说与“日本式自然哲学”的确立	142
西行与芭蕉之所以被当做圣人景仰	143

世界史上例外的“独一无二国家”、“独一无二文明”	145
弥生人没有征服绳文人	146
沾满鲜血的希腊神灵	148
日本以独特的“让国”方式实现统一	149
绳文文化与弥生文化融合的原因	151
绳文时代一万年历史的秘密	152
敬畏自然的日本人和征服自然的欧美人	153
日本文化对解决环境问题的贡献	155
第六章 把日本的“安心感和安全感”输送给世界	157
日本人与古罗马人的共同点	157
外国人惊叹幕末和明治时期的“安心感和安全感”	158
缘于岛国的长期互惠战略	159
奠定战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谈合”、“系列”的秘密	160
协商生产思想打造日本汽车王国	161
美国汽车业为什么败给了日本？	163
长期信任关系才是力量	165
“日本人没有战略”是谎言	166
柠檬市场是什么？	167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信任结构	168
信用才是社会资本	169
与武士道抗衡的江户的商人道	171
石门心学中的商业与社会贡献	173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理解日本式雇佣制度？	174
美国式战略与日本式战略	176

不为日本人所知的“阶级社会”的真实	177
孔子讲述的“统治者理论”	178
江户时代的日本果真是等级社会吗?	179
罕见的“均质性”正是日本近代化的关键	181
劳动是“神事”的古代日本	183
阶级思想在当今欧美社会的生命力	184
欧美企业为什么难以培养出“现场主义”	186
日本人的平等意识为什么发达?	187
思考“中空结构”的功与过	188
把日本的价值观输送给世界	188
第七章 对日本振兴的提议	191
沦为“贫困大国”的日本	191
令人震撼的 OECD 报告	192
“二次分配后”的世界第二恶国：日本	194
让人震惊的单亲家庭的贫困率	195
濒临险境的“全民保险制度”	196
从基尼系数看日本的不平等	198
悄然扩大的贫富差距	199
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为什么下降?	201
雇佣改革破坏了日本社会的“安心感和安全感”	203
日本失去了“信用第一”	205
为日本人“量身定做”的经营方式	206
北欧的经济为什么呈现活力?	208
真正的“改革”是什么?	210

税制改革应该怎么做？	211
将基础年金改为税收方式	212
消除消费税“缺点”的策略	213
为什么提出“基本收入”的设想	215
“用现金进行收入二次分配”的局限	216
“大政府”也能搞活经济	218
“国家”救不了社会	220
“被社会支撑着”的真实感受之必要	221
地方分权才是日本经济振兴的关键	222
日本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优秀品质	224
环境立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226
政策范式的大转换不可或缺	227
末章 给“怪兽”套上锁链	229
怪兽造成的“三个创伤”	229
金融危机为什么频繁发生？	230
铸币税的诱惑	231
贫富差距与环境破坏问题的本质	233
禁果	234
资本主义将因“自由”而自我崩溃	235
“相互承认”的思想	237
人的欲望唤醒怪兽	238
译后记	239

序 章

别了，“全球化资本主义”！

美国的富裕已经变质

——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这些年，每当我访问美国时，就会产生这种感觉。30年前我留学时的美国，与现在的美国差别太大了。

我印象中“美好的美国”，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悠闲的中产阶级，清洁、华丽的家居环境，性格豁达、心胸开阔的人们，洗碗机、彩电、家用轿车，还有孩子们毫不吝啬大量使用的餐巾纸！这就是一个穷学生眼中的美国。

毫无疑问，到处都洋溢着无上的富庶感。由于当时日本还比较贫穷，所以看到的美国格外耀眼。

之后30年，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美国本应发展成为更加富裕的社会，但为什么从今天的美国社会感受不到曾经的“富裕”和“宽容”呢？最近，从文化气息浓厚的欧洲进入美国时，感受到的那种“粗糙杂乱”，总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地域之间、个人之间的差别当然存在，但整体上，从美国社会已感受不到“文化”的芳香。总之，我无法不让自己去想：美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

这期间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弄清楚了一点：收入差距惊人地拉大了。一方面，像比尔·盖茨那样的超

富人群层出不穷；而另一方面，曾经支撑美国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又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我想列举一些数字来看。

令人惊讶的是，这几十年间，占全美国人口1%的富裕阶层的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竟然从8%急剧上升到超过17%，增加了一倍以上。随之，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每年也增长2%以上。仅仅从这些数据看，美国的确更加富裕了。

然而，那不过是平均值。如果把收入最多的人与最少的人排列成一行，你会发现，正中央人们的收入即“中等收入”几乎没有上升。

也就是说，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人，或者那些昂首阔步走在华尔街上的金融从业者、大公司的CEO等富裕阶层，他们的收入急剧上升，拉动了美国整体的“平均收入”，而老百姓却没有跟着沾光。

这就是曾经让世界憧憬的“富裕的美国中产家庭”崩溃的真相，是让我近年来去美国时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的原因所在！

颓废的美国经济

那些耀武扬威阔步走在华尔街上的“傲慢的”金融业精英们，在最近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收入减少了很多。但此前，他们得到的薪酬，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根据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2007年的年度报告统计，该公司员工的平均年薪，在金融危机前，竟高达7000万日元。据称，该公司同年支付的工资总额约200亿美元，而员工仅3万余人，因此，人均约为66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约为7000万日元。这着实是让人震惊的高收入。但另一方面，没参加健康保险、生病也不能就医的美国人，有将近5000万人。而因为吃过多的垃圾食品而造成惨不忍睹的肥胖病的美国人也显著增加。

这样下去，美国或许会因为出现道德颓废而崩溃。正当人们刚

刚产生这样的担忧时，2008年9月15日，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了惊人损失的美国证券公司——雷曼兄弟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之后，世界金融市场的股市经历了最大级别的暴跌，世界经济陷入大混乱。

这次被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恐慌，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那完全不容我们预先判断。但过于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本书称之为“全球化资本主义”——要开始它新一轮的起步，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回想一下，实际上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为了处理不良债权，花费了1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无论多么乐观地估计，稳妥的看法是，要结束这次经济混乱，恢复到稳定的轨道上，大概需要4~5年的时间。

日本的不良债权问题还只限于日本国内，而次贷危机却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它已经向全球扩展。在欧洲各国，有相当多的银行投入了政府资金，事实上的国有化也在发展。

受所谓“雷曼冲击”影响的不只是美国和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BRICs——“金砖四国”也都持有与次贷相关的金融商品。因此，无法预测，在整个世界到底产生了多少不良债权，最终将需要投入多少政府资金。如果掌舵错误，不难发生比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更糟糕的恐慌状况。

能准确无误地讲的是，这次泡沫破裂的结果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将被迫大幅度地转换方向。

虽然现阶段还很难预测它将具体转换成什么形式，但由于这次事件，美国的主要证券公司已经转变成金融持股公司，也就意味着已经全部进入金融当局（美联储）的监管之下。

结果，美国证券公司主导的远远超过自己资本的资产膨胀，即所谓“借入资本利用”（“运用杠杆原理”之意）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样一来，“无限制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狂奔”的势头，今后必将很大程度上被削减。

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怪兽

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大变动，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却认为：“这或许是大变动，但终归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律性调整的过程。”他们似乎乐观地认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框架今后将继续存在，资本和物品将继续跨越国境自由移动。

但是，我不抱这种乐观的态度。

因为我认为：全球化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但它内部包含着很多可以认为是本质性的缺陷，如果找不出适当的方法而照这样发展下去，绝不是理想的做法。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缺陷，大致可以列出以下几点：

- (1) 造成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巨大不稳定；
- (2) 内含“差距扩大机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结果造成健全的“中产阶级消失”；
- (3) 加速地球环境污染，成为全球食品污染的远期原因。

或许把现在地球上发生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全球化资本主义有些苛刻，但我不得不说，视经济资源跨越国境自由移动的世界为最理想，这种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基本哲学主张的正确性，正面临被重新检讨的命运。

我认为，这次金融风暴暴露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本质性的缺陷。考虑到当今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食品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全球化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巨大的修正。如果允许我说得更严厉些，“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自我崩溃了”，这是我的看法。

全球化资本主义真可谓是一路讴歌着“世界之春”走来的。它依靠其巨大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使资金能够自由地跨越国境，并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地制造出诱人的金融商品，获得暴利。但是，其怒涛般的行动，也正如大浪撞到岸边一样，待其反弹回来就成为危机。

全球化资本主义在这十几年中，看似随心所欲地操纵市场，自己也一定以为“我们所向无敌”。

但是，正如一句成语所讲的，“骄者必败”。现在，它们正被自己制造出来的超级巨大的全球化市场所玩弄。

如同弗兰肯斯泰因（Frankenstein）的怪物一般，“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怪兽的暴行，也不难毁灭它的造物主人类，这不只局限于眼下的经济危机，每当我目睹地球环境的破坏、有害食品的全球性流行、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扩大这些现实，就不由得流露出这样的感慨。

我曾是“结构改革”的急先锋

1980年前后开始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政策”，产生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它们以“小政府”为目标，认为撤销管制、一切经济活动均遵从市场机制的调整，将会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经济活力。

它们认为，人人都不依靠政府的介入和社会的善意，而根据责任自负进行竞争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这种自由的社会才能使人们幸福，使经济发展。那时，恰好东西方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因此给大多数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这刚好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性。

美国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将这种状态总结为“历史的终结”，称它确立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原本新自由主义者们对这种思想的优越性就抱着坚定的信念，因此开始更起劲地推进“结构改革”。

很自然，新自由主义思想也传入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激化的日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政府以日本闭塞、要更加开放市场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为由，要求日本尽快实施“改革”。

这些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加速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向日本社会的渗透，但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日本获得市民的认可，还要等到所谓的“小泉结构改革”。小泉纯一郎高呼打破“五五年体制”下的既得权利结构，使日本经济体制全球化这样的时髦口号，登上了首相宝座，其政权得到了值得夸耀的支持率。

在这股巨大的历史潮流中，我，也就是本书的作者，正是这个

“结构性改革”的急先锋之一。这件事或许无须现在再向读者讲述。

具体情况我打算留待后文叙说。在细川护熙内阁、小渊惠三内阁中，我积极主张采取放松管制、开放市场等措施，帮助当时的执政党政府制定政策框架。在小渊内阁时，我还参加了首相咨询机构“经济战略会议”。在诸多建议中，有几个建议案被日后的“小泉结构性改革”原封不动地采纳。这件事并不是自我炫耀，而是在小泉政府中枢任经济财政大臣的竹中平藏也屡屡言及的事实。也就是说，虽然是间接形式，但我也所谓“小泉结构性改革”的“帮凶”之一。

“中产社会日本”的消失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过于天真地相信全球化资本主义和市场至上主义的价值。我一度深信不疑：彻底破坏日本的既得权利结构以及政官商相勾结的结构，使日本经济符合欧美式的“全球化标准”，才是搞活日本经济的良方。

当然，对于打破战后^①不断剥夺日本经济活力的既得权利结构等，我至今也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之后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和随之急速普及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飞扬跋扈，加之引入美国式的市场原理，使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日本会如同追赶美国社会一般，出现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和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为自身学习不够、欠缺洞察力而感到惭愧。

和美国一样，日本的贫富差距也明显扩大，出现了所谓的“胜组”和“负组”^②这样的两极分化。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七章具体论述。

① 本书中的“战后”均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译者注

② 胜组、负组：在日本，用“胜”、“负”来衡量一个人时，成功者被归入“胜组”，失败者则被归入“负组”。由于日本社会出现贫富差距极端化，因此那些拥有巨额资产和巨大名声的实业家、投资家等富裕阶层，或是那样的企业、团体等，被看做“胜组”；而“负组”则指那些收入、社会地位低，或是被排除在升官途径之外的人。这种分类，还延伸到对工作、学历、姿色、恋爱等的看法上。——译者注

社会差距的扩大，在日本自然成为大问题。一方面，在东京的银座接连出现欧洲的高级名牌旗舰店以及有许多超高级轿车被卖出；而另一面，也出现了被称做“劳动贫困层”的自由业者和派遣职员，以及没有住处的“网吧难民”。

曾经被视为日本特色的“一亿总中产社会”^①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应该说，曾在美国发生的中产阶级崩溃这个现象的缩小版，正在日本这个地方发生。

日本企业为了在全球化竞争中取胜而进行的“雇佣改革”，使曾经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形同虚设。仅仅10年，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贫困层增加了200万人，已超过1000万人，贫困阶层人数的增加给日本社会和日本企业的精神文化造成的恶劣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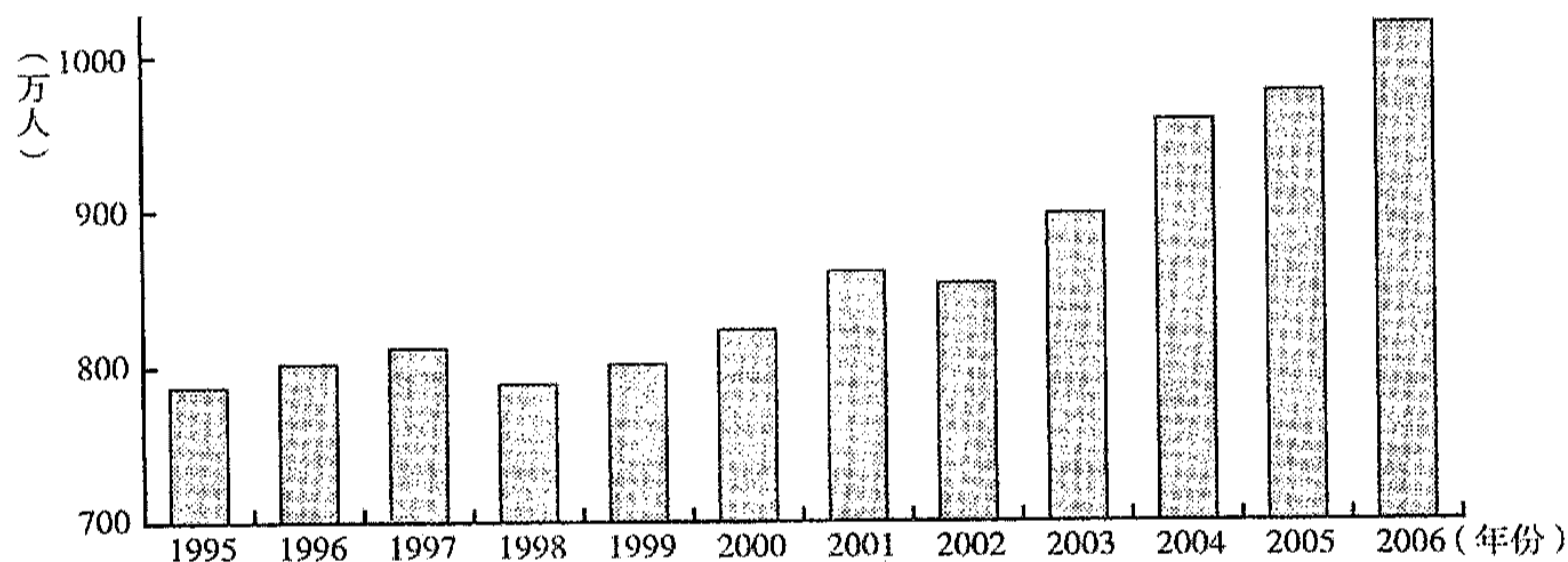


图1 10年间低收入者增加200万人

资料来源：日本国税厅民间工资实态统计。

失去了安全感和安心感

与这项雇佣改革同时进行的医疗改革，也产生了种种问题。的

^① 一亿总中产：在终身雇佣制下，日本约有九成的国民自认为是中产阶级。这是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在20世纪70~80年代尤为凸显。——译者注

确，为了重建国家财政，医疗改革是必要的。然而，其激进且教条主义的改革，造成需急救的医疗难民增加，打破了日本是个让人有安心感和安全感的国家的神话。

医疗改革中，以75岁以上的高龄者为对象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①，难道不是否定那些曾经支撑过日本高度增长的高龄者自尊心的蠢而又蠢的政策吗？

与这项医疗改革相反，我们倒是应该怀着感激之情对他们表示：“长时间以来，你们辛苦了”，“医疗费原则上由国家负担，所以今后请你们安心地生活吧”。真正必要的，难道不应该是这种体贴的改革吗？

当然，或许不可避免地会因此提高消费税，但如果要建立“努力的人应该得到回报的社会”，那的确应该采取上述措施。但是，现实中实行的，难道不是把“责任自负”当做挡箭牌而放弃福利的措施吗？

地方经济惨不忍睹，也是失去了安全感和安心感的其中一个原因。

地方经济的惨状，是由于优先考虑国家的财政建设，没有把税收的来源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削减了地方拨款和公共事业资金造成的。地方政府处于手脚被捆绑的状态，而它们赖以生存的中央拨款和公共事业资金又被削减，自然就会感觉疲惫。

把决定税源措施的裁量权交给地方政府，让它们能够自主地行动，以稳定居民的生活，作为交换条件，缩减中央的财政拨款，这才是应有的顺序。而现在这个顺序却颠倒了。如此一来，地方政府自然要发出悲鸣了。

^①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自2008年4月起，日本对75岁以上（有残疾者是65～74岁）的老年人，采取单独的医疗补贴制度，即“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保险费的缴纳，一律从养老金中先行扣除。在这之前，75岁（有残疾者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或健康保险组合等医疗保险的同时，还接受老年人保险制度等的医疗补贴。——译者注

这些细微的措施几乎没有被考虑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责任自负”等陈腐口号的猖獗，和“只要依靠小政府、放松管制就可以了”这种风气的横行。

再有，全球化的结果是，以十分便宜的价格就可以进口各种食品，但同时，食品的安全性也渐渐减弱了，食品污染事件时有发生。

在本国国内尚不能保证食品的安全，在全球化规模下怎么会成为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厂家伪造产地，或是明知是危险的食材仍提供给消费者，这种事件的增加，显然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副产品。

这样的道德崩溃并不只限于产业界。近年来，时有报道孩子杀死父母或者相反父母杀死子女的事件。仅仅为了排解自己没被满足的欲望和闭塞感，就滥杀无辜，这样的犯罪，在过去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恶性事件。而这种恶性事件近年来却在逐年增加，对这种事态感觉异常的，难道只有我吗？

总而言之，我感觉，美国社会发生了急速的质变；同样，日本社会也在逐渐发生着质变。

“赚钱多的人就是胜利者”，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反过来就等于在说：“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能挣钱的人属于失败者，因此吃不上饭，那是自作自受”。安心感、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之所以从当今日本社会消失，不就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蔓延造成的吗？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当然，刚才我也讲到了，“结构改革”有它一定的正面意义，也有相当的成果。但是，当我看到市场至上主义的风潮遍布世间，传统日本社会好的东西渐渐变质的时候，当我看到差距异常扩大的“贫困大国”美国的实际情况时，开始渐渐发觉，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里面，潜藏着本质性的缺陷和问题。

或许，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对人类来说，没准儿就是潘多拉的盒子——看到当下的情势，我心中就涌起这样苦涩的念头——并且，我还是当初帮助打开盒盖的人之一。

希腊神话里，从打开的盒子中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再回去，也不能再盖上盒盖。因此，想盖上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是极其困难的。不，或许几近不可能。但是，即使这样，也必须给“潘多拉的盒子”盖上盒盖。因为如果不这样，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悲惨。

事实上，已经有从潘多拉的盒子中跳出来的不祥之物，把全球的金融界逼迫到未曾有过的混乱之中。受到发轫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的经济接下来也将被迫持续长期的不景气。

在美国和欧洲出现的激进的信用收缩已经波及日本，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倡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狂奔，也有给日本造成深刻影响的趋势，尽管日本并未过深地介入次贷问题。这是因为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密不可分，不可能只求得一国的安稳。

后文我还会详细叙述，所谓次级抵押贷款，不过是美国证券公司的精英们，将不可能成为住宅贷款对象的贫困层作为牺牲品，为了赚钱而制作的相当“诡异”的金融商品。

简单地讲，所谓次级贷款，就是向原本没有购买不动产经济实力的人们伸出诱惑之手，让他们贷款、然后，贷款的金融机构又将那些债权证券化，在世界的金融市场上销售以增加利润。这是一种形式非常巧妙的“金融商品”。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甚至把这种没有道德的经济活动，也在“自由竞争”的美名下正当化。

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张，不管手段如何，在自由竞争中巧妙地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的正义”。如果在竞争中失败，以至于失去职业和财产，那不过是个人的责任。这当中，只一味地将差距的拉大正当

化，却完全没有试图纠正这种现象，以创造人人幸福的社会、人人内心得到满足的社会。那里有的，充其量是追求个人的幸福，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幸福，不过是其次、再次的目的。

资本主义如何破坏环境

如果让我们的思想驰骋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将深深地体会到：原以为走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简单的“结构改革”路线会带给我们幸福，其实那不过是妄想。

新自由主义思想，是把我们生活的社会细分到以个人为单位，最大限度地尊重这些被“原子化”的个人的自由。因此，它丝毫不重视安心、安全、信任、平等、团结等共同价值。它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追求利益这个“大义”面前解体也是无奈的。

当今世界，蕴藏着这种危险思想的全球化资本，正自由地阔步在地球上！

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并不停止在以社会差距扩大为特征的“社会解体”的阶段。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环境破坏，也是市场优先思想造成的。

在追求利润为第一命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中，为了子孙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思想，归根到底不过是次要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不仅不对地球环境问题负责任，而且是加速环境破坏的一方。

如果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环境破坏是因为企业等经济主体不支付“环境成本”而造成的。

当然，既然人要生存，就必定会发生环境破坏。但是，如果能保持在自然的自净能力范围内，地球环境就不至于恶化，至少可得以保全吧。

但是，全球化资本对那些事情毫不关心，也没有责任感。原本，对全球化资本来说，最大的任务就是把投资家的回报扩大到最大限

度。为此，最合理的选择是，尽可能不支付“环境成本”。

因此，即使在一国范围内强化环境限制，但因为全球化资本厌恶受限制，也会转移到限制更宽松的国家。结果，从地球整体来看，环境破坏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管制和全球化资本的“捉迷藏”，拖延了地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美国等“资源消费大国”，对以限制 CO₂ 排放量为目的的京都议定书表示抵制，其背后隐藏的全球化资本厌恶“环境成本”的考虑若隐若现。因为，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化资本活动的影响。

因此，以京都议定书为基础的环境对策不可能取得太大效果。在这一过程中，世界森林被不断砍伐。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由于迅猛的经济发展，在先进国家不可想象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不断加重。但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原理面前，虽然“保护环境”对人类生存极其重要，却令人遗憾的几乎不具备任何政治力量。

日本人对“结构改革”的幻灭

当然，即使是我，也不打算否定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刚才讲到，比如在日本，细川政权和小泉政权进行的“结构改革”和一系列的“撤销規制”，对于打破政官商互相勾结的体制，阻止国民的税金、邮政储蓄、简易保险金随便流入无意义的公共投资，都发挥了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不过分地讲，日本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革。

但是，如果按照先前的政策路线来继续推进“结构改革”，那么不久的将来，它的“过”就必定会大于“功”。先不论经济学家怎么讲，起码多数国民似乎已经开始这样认为了。

实际上，2008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前首相小泉表

明支持的候选人小池百合子宣称继承“小泉改革路线”，但国民的反应很冷淡，结果没有获得她所期待数量的选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曾经绝对支持小泉改革的地方票，一票也没有投给小池。这正是最好的证据。这表明现在连支持自民党政权的地方党员，对以前的“结构性改革”路线，也持“对不起了”的拒绝态度了（自然，如果地方自民党党员没有投票给小池，是因为保守派基于不愿意被剥夺更多的既得利益而进行的“反弹”，那绝不值得表扬。因为妨碍搞活地方经济的多数原因，可以从顽固地残留在地方上的既得利益结构中找到）。

这次总裁选举后不久，前首相小泉宣告引退，这是不是也缘于他自己体会到了“结构性改革”路线的局限呢？这一点，不问他本人是不知道的，但喊着“打破旧日本”而开始的“结构性改革”，虽然在局部性地破坏“旧日本”的层面上取得了成功，但同时，难道不也正是它破坏了日本社会拥有的美好的一面吗？

我的忏悔和转向

关于这些问题，更详细的分析留待下文，但读者也应该有实际感受：以“结构性改革”和“放松管制”为口号登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由于其市场第一主义带来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大潮流，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世界也引发了各种矛盾和严重的问题。

任何事情都讲究一个“平衡”。

1980年前后开始的撒切尔政策和里根政策，由于重视个人的自由胜过一切，批判国家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和以救济弱者为目的的优厚的福利政策，从而得到了众多支持，精神抖擞地登场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政策，阻止了“大政府”带来的国民负担上升、经济无效率、公共部门扩大，确实对增进经济活力发挥了作用。但是，正如支持“大政府”的凯恩斯经济政策曾经发生过过头的情况一样，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也明显地过头了，

它们陶醉于由此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膨胀。可以说，结果就是现在的差距社会、金融混乱、道德崩溃。

总之，适当地驾驭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怪兽，需要相当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为此能做些什么。当然，“敌人”的影响遍布全世界。新自由主义思想深入广泛地渗透到众多的百姓、政治家、经济人的心中，因此我们必须做好思想准备：斗争的对象极其厉害。

本书不仅仅是我自身的“忏悔录”，我写作的目的还在于阐明全球化资本主义和市场原理的本质，阐明它们是从本质上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社会价值的“恶魔制度”，进而也希望就今后应采取措施的方向提出建议，以纠正主张“小政府”和“责任自负”、重视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这些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缺点。

因此，在下一章我想首先详细讲述，为什么我年轻时曾作为“美国式结构改革的急先锋”进行活动，而最近又开始注意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局限，对破坏安心感、安全感、温暖感、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等“社会价值”的美国式结构改革提出异议。

顺便提一下，在下一章我使用了“转向”这个词，但正如前面谈到的，我并非全面否定“结构改革”。但是，我不能继续赞成放纵和助长差距扩大、破坏日本社会精心培养起来的社会价值的改革。有待改革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但我开始认为，有必要大声反对追随美国、抛弃弱者的“结构改革”。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转向”。为了能够比较详细地论述，我不得不涉及一些个人的私事，而这有益于理解本书的思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的。先请读者谅解。

第一章

我为什么“转向”？

我的“美国经历”

1969年，当我27岁的时候，告别公司职员的生活，去哈佛大学留学，直接进入了研究生院学习博士课程，专攻经济学。尽管大学时代我也曾在经济系就读，但没有正经地进行过像样的学习。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想，那时的决定，真可谓莽撞、冒险。

留学前，我在日产汽车公司工作。形式上是停薪留职，但我内心已经不打算再回公司。我想，如果一直留在公司，作为一个大组织的一员，或许也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实际上，后来日产遇到了被雷诺收购的动荡时期），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情愿做一个工薪族去悄然度过一生。抱着欲罢不能的心情，我决定去美国，从头开始重新学习经济学。

我憋足劲，踏上了留学之路。我感受到的第一印象只需用一句话来形容：“太美妙了！”哈佛大学新英格兰格调的校园实在美！蹦蹦跳跳地奔跑于大学花园里的松鼠，大理石装饰的壮观的威德纳图书馆，学校对外国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照，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叹不已。当时的日本，虽然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日美间的经济差距依然明显可见。在一个来自远东的穷留学生眼中，四处洋溢着富裕气氛的美国，简直就像是乌托邦的现实版。

然而，一开学，我就当头挨了一棒。我的真实想法是：“这可了

不得了！”超强度的学习开始了。我被课程的进度和预先必读教材的数量之多（仅专业性强的文献每天就超过 1000 页）惊得天天目瞪口呆。

当我还是工薪族的时候，周围的同事和前辈们，现在想起来也都是好人，但大家能力不相上下，用一句不礼貌的话讲，没有人让我感觉到某某人“脑子真好”。所以，当我想辞掉公司职务去留学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曾极其傲慢地误认为“我行！”。

当时哈佛的教授阵营十分强大，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个又一个。我的指导老师肯尼斯·阿罗，在日本被称为“经济理论之神”，是位出类拔萃、业绩突出、值得夸耀的天才。我去见他的时候，起码要让自己生锈的大脑快两倍运转，不然，无法跟他进行讨论。去见阿罗老师的时候，真是紧张。不久，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1972 年）。哈佛不仅有这样绝对优秀的教授队伍，从世界各地聚集来的优秀学生头脑之敏锐，也让我咋舌：“世界上原来也有大脑这么好使的家伙啊！”他们让我生平第一次有了这种感受。

大相径庭的日美学术风气

我原本不过做出口业务，每天的工作几乎就是接待客人、吃喝，处在与学术界毫不相干的境地，又没做任何准备，就突然跳入了博士课程。这件事无论怎么想，除了用鲁莽二字来概括，别无他言。所以，我被那里的一切所震撼，是很自然的。

但是，事到如今，当然不能垂头丧气地夹着尾巴打道回府。要是那样，只会被大家笑话：“所以嘛，还有什么话说，不听劝嘛！”有个词叫做“拼命”，我就照着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去做了。尽量砍掉睡眠时间，学习到几乎倒下。

我越是拼命地认真学习，越是被美国现代经济学美妙的逻辑体系和缜密性所折服。不久，我就成了美国经济学的俘虏，特别对（在一定的假定下展开的）市场理论之精妙、理论体系整体的完整性之高怀有深深的敬意。在这一过程中，我渐渐变成了“美国迷”。

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也是不得已的。

美国的大学体制，至今仍以拥有世界第一的竞争力而自豪。我只知道，来自落后的日本大学的我，被它们震慑是自然的。多数情况下，日本大学的经济系，学生们都被限制在以教授为中心的“章鱼屋”^①式的领域之中。他们在老师狭隘的专业领域之内，只学习老师提供的课程。人事上也不透明。学生多少学过些东西，只要教授喜欢，不管他的研究能力是否在国际上有影响，都可以成为教授的接班人。现在，日本大学的情况稍有转好，但当时的确就处在那样的封闭状况中。

相对来说，美国的大学对自由竞争和公正、公开性的重视，远远高于日本。

我举一个例子。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不管多么优秀，原则上不能立即在哈佛获得职位。如果不在其他某个大学进行“武士修行”，取得优秀成绩，是不能回哈佛任教的。这与日本的大学大不相同。在日本，只要被指导老师看中，说得极端些，即使一篇论文不写，也能成为接班人。

回过话题来再讲我的学习。研究生院所要求的学习量超出了我的想象，但教育课程本身，安排得十分系统且合理。即便像我这样在大学本科没有好好学习过的人，只要按照周密的课程安排踏实地学习，就能顺利地学到从基础到高级的课程。它的教育体制的确制定得切实、严密。

要跟上高强度的课程进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只要坚持下来，两年的时间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计量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体系都可以学进自己的大脑。这与日本那种只教授指导教师专业研究领域的知识、象牙塔式的“章鱼屋”教育是多么不同啊！

^① “章鱼屋”原指一个个监禁矿工的小工棚，矿工劳动时被关在里面。比喻范围狭窄，没有自由。——译者注

成为“美国迷”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一头扎进美国市场主义的世界观中。不用“一头扎进”来表述还不够准确，是成了“美国迷”！

“痴迷”，意味着失去客观的眼光和批判的能力，无疑是轻率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因为相信“这个绝对好”，所以学习起来效率很高。因为“痴迷”，所以崇拜对方，不持疑义，能无条件地朝着“吸收”迈进。

我之所以痴迷于美国经济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亲身体会到了美国的“富裕”。前面我也写到了，对于来自日本的穷留学生，美国社会物质上的富有和人们精神上的宽厚，让我产生了一种仿佛看到了乌托邦的感觉。不仅美国人，或许大家都一样，当人们感到自己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就会变得宽宏大量。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从这层意义上讲，确实非常宽厚。

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富有的美国社会实际上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当时，围绕着深陷泥潭之中的越南战争以及黑人民权问题，发生了所谓的“年轻人的反叛”。美国的大学也和日本一样，正处于以反对越南战争为中心的校园纷争之中。校园内，嬉皮士打扮的学生阔步而行，鲍勃·迪伦的《在风中飘荡》^①、琼·贝兹^②的反战歌曲都很流行。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骚动的气氛与其说是社会混乱，毋宁把它们看做是美国真挚理性的反映，甚至有一种新鲜感（当然，大学周

① 鲍勃·迪伦（Bob Dylan），美国著名歌手，曾获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歌曲《在风中飘荡》（*Blowing in the Wind*）和《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视为反战运动的圣歌。——译者注

② 琼·贝兹（Joan Baez），美国著名女歌手，20世纪60年代演唱的反战歌曲非常出名。——译者注

边的保守当权派，对这些学生的反叛皱眉)。当然，学生时而也有越轨行为，但从社会整体来看，我并没有感受到美国的“黑暗”面。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美国有生活富裕并持有健全价值观的中产阶级，他们表现出稳重的优越感，坐镇于美国社会的核心。

这个时期美国工薪族的典型生活就像下面所描述的。无论多忙，他们都要在傍晚5点离开公司，照直回到郊外宽敞的家，然后，到晚餐为止把时间花在修剪自家花园的花草上，这时你会看到花园里的洒水器喷着耀眼的水花。女主人则在设有自动洗碗机的崭新的厨房里愉快地准备晚餐。年幼的孩子们围着她打闹玩耍，大型爱犬随意地趴在柔软的地毯上看着他们。晚上则是全家一起看电视，轻松地度过。到周末，一家人驱车去郊外兜风，或吃野外烧烤或参加社区、教会举办的活动——这样的生活方式，让我看到的不单纯是物质的丰富，还看到了人们健全的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珍惜家庭和社区氛围的态度。

目睹这样的美国，年轻的我觉得“还是哈佛学的美国式经济学才是正确的”。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无可非议。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我看到的日本是一个被集团公司、终身雇佣制和政官商的铁三角这些既得权益的大网五花大绑的封闭社会，一个被美国经济学最重视的市场原理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前近代社会”。

于是我天真地认定，如果日本也能像美国那样进行自由经济活动，转变成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社会，就能变得像美国人那样富裕、幸福。于是，一个醉心于市场主义经济学的激进“改革派”，就这样形成了。

这就是我成为美国迷、激进“改革派”的经历。但是，我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富布赖特体制下留美的多数日本学生，其经历应该与我大致相同，他们也都在其他领域成为我这样的“美国迷”。

从美国来讲，它是抱有明确的打算的。美国希望通过给世界上的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提供资金，来增加“美国迷”。从长远的眼光看，这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众多有过留美经历的年轻人都成了亲美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无法阻止的。

富裕的美国是“大压缩”的产物

但实际上，当时在美国经济学中占主流的，并非今天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式的思想，而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教授等为代表所提倡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萨缪尔森教授等人认为：把重视市场功能的“货币主义”与允许政府介入的“凯恩斯经济学”结合起来，就可以取得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这种理论，说得难听些，是一种折中；说得好听些，是保持平衡的稳健的经济学。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市场主义的激进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席卷美国经济学界，全面否定政府介入市场，以所谓的“里根经济”这种形式，大大地改变了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糊涂地忽视了以下两点。

第一，日本与美国的国家背景差别很大，因此任何人也不能保证，把美国式经济学原封不动地搬到日本就能使日本人幸福。这本是再普通不过的想法。

第二，支撑着富裕的美国社会——留学时曾让我震撼——的经济理论，事实上并非市场主义，而是重视政府对总需求管理作用的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其背后建设“伟大的福利国家”的坚强信念。

再进一步讲，当时美国社会中富裕的并有健全价值观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与其说是实行萨缪尔森教授等人主张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结果，不如说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和为实现社会平等的各种政策的功劳，再就是哈佛大学萨缪尔森教授的导师阿尔文·汉森教授关于有效利用公共事业、建设福利社会的强烈信念在“二战”后的美国社会扎下了根的缘故（关于这一点，受教于伊东光晴先生）。

我忽视了这些现实，产生了错觉，以为里根政权之后成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一直就是美国式经济的中心。

再重复一遍前面说过的话。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宣告了“一切遵从市场，经济就会稳定发展”的经济思想的失败。按照古典派经济学的理论，只要遵从市场原理，失业和萧条就会结束，但实际上经济危机却一直没有止息。

为摆脱危机，采纳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罗斯福新政，下决心大胆地建设公共事业。“二战”后，罗斯福新政不是单纯地局限于搞景气对策，也把力量投入到实现收入平均化等福利政策上。这项经济政策的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30多年，所以战后的美国才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富裕的社会。

最近出版的罗伯特·赖希的《超级资本主义》^①（东洋经济新报社）和荣获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②（早川书房）都指出，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开始到石油危机结束不久的1975年为止，是一个“大压缩的时代”（克鲁格曼的命名），这个时期与“二战”前相比，人们的收入差距绝对地缩小了。

差距扩大、中产阶级消失、医疗福利后退

我作为年轻留学生闯进时的美国，正是这样一个由于“大压缩”而诞生的富裕的美国社会，这个社会是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健全的社会。

然而，美国的中产阶级，却因为1981年上台的里根政权而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小政府”、“对高收入者减税”、“责任自负”的呼声中推进的里根政策，某种程度上成功地搞活了停滞的经济，但在其后不足30年的时间里，却致使美国社会收入差距扩大，随之中产阶级消失，医疗和福利出现后退。

① Robert R. Reich, *Super Capitalism*. ——译者注

② Paul Krugma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译者注

根据托马斯·皮克提和伊曼纽尔·赛斯的著名研究成果，2005年的美国，排在前面的1%的富裕阶层的收入，超过国民总收入的17%（参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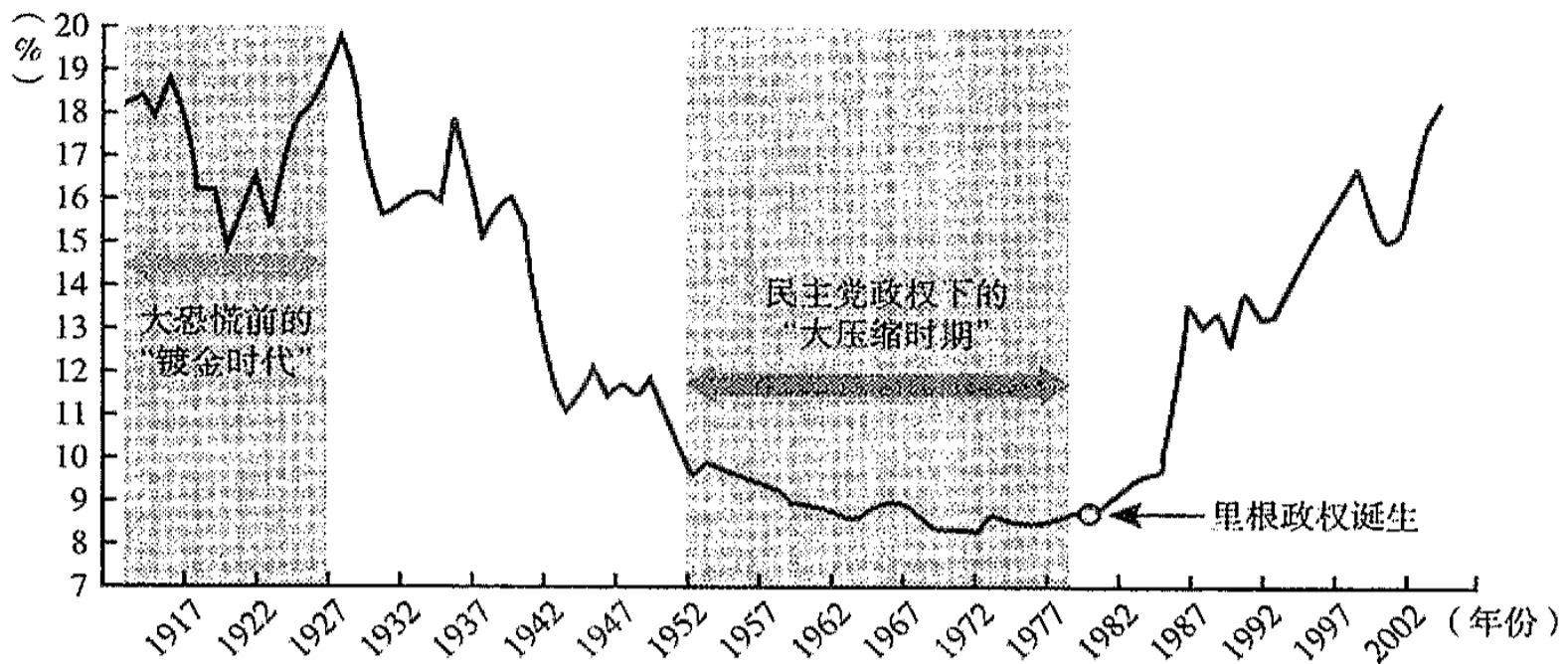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1%高收入家庭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
(资本盈利收入除外)

资料来源：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Vol. 118 (1, Feb), 1-39。

仅此一点，足以让人惊叹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实际上，在这些富裕阶层中又有很大的差距。

从整个美国来看，0.1%处于最富裕地位的超富阶层的收入，居然占到美国国民总收入的7%。而在里根上台之前，1%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占总收入的8%，0.1%的超富阶层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差距扩大之甚，由此可见。

而且，这30年间的差距扩大，也明显地反映在美国大企业高层年薪的变化上。

据克鲁格曼的著作介绍，20世纪70年代，美国具有代表性的102家大企业的经管高层的年薪，“仅”是那些企业员工平均收入的40倍。而到2000年，就已达到367倍（前引克鲁格曼，第102页）。而且，在此期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大大地降低（20世纪50年代末最高税率为91%，而现在是35%），因此，纯收入的差别应该还要大得多。

再看看普通劳动者的所得如何。克鲁格曼说，30年间，美国的

“平均收入”上升了，但“收入中间值”（按收入金额多少的顺序排列，位于正中间的人的收入），“略有上升，或实质性地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由于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富豪的出现，使收入平均值的基数提高了，但收入中间值附近的人们也就是中产阶级，其个人所得在这30年间基本没有变化，搞不好或许还下降了。

我们之所以感觉美国的中产阶级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真正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曾经是富裕生活象征的中产阶级，已经被低收入层吸收进去了。

差距的扩大，完全破坏了美国社会的一体性。我这样说，也不为过吧。

因为，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那样的超富家庭，他们并没有把住房建在普通人能够看到的地方。他们把几十坪的豪宅建在有河、有瀑布、有山丘的宽阔土地上，过着豪华的生活。同在美国，却生活在与普通人隔绝的遥远世界里。

即使达不到这种程度，最近，好像多数有钱人也越来越多地住在用围墙跟一般百姓隔绝起来的高级住宅区内。这种不平常的高级住宅区，有门卫严格地检查人们的出入，他们基本没有与普通百姓接触的机会。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产阶级曾经是美国富有的象征。他们中的极少部分超富人士成功地保持了前后一致的上升，而大部分则被低收入阶层吸收了进去。因此，美国富裕家庭的形象，也就不再出现在我们眼中了。

结果，这种令全世界向往的“富裕的美国社会”的印象也就消失了。

政府介入创造了“富裕的美国”

可以看出，由于里根经济，作为美国社会支柱的中产阶级失去了优越感。实际上，这并不是美国社会头一次产生如此大的落差。

大萧条发生前的 1927 年左右的数据显示，1% 的富裕家庭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竟达到 20%（见图 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比现在更不平等的社会（所谓“镀金时代”的美国）。

然而，这样的差距从 1940 年前后开始急速缩小。其原因，正如刚才谈到的，是美国历届政府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抛弃了古典派主张的一切经济活动遵从市场的思想，自身也介入了市场，实行了总需求管理政策和二次分配政策。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对振兴美国经济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暂且不论（最权威的看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引起军需扩大，拯救了大萧条状态中的美国），但公共部门的确开始对稳定景气和二次分配发挥积极作用，而这种倾向，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加速。结果，20 世纪中期，大约 15% 的美国产业接受了政府的直接管理，对剩余的 85% 的产业，政府也实行了温和的管理（前引赖希，第 32 页）。

由政府进行经济管理，对现有的大企业来讲，意味着将减少在市场竞争中的风险，如果不出现新加入的竞争对手，就可以安心地制定长期的经营战略，因此，这种管理对于美国企业储备垄断力量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即使现在，美国的很多传统行业仍保持着垄断地位，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被痛批为官僚统治下的“护送船队方式”，但实际上，战后美国经济的强势，正在于“护送船队”。

美国的“日本式经营”

再深一步说，“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劳资协调精神，以及终身雇佣制使劳动者地位得到的保障。实际上，这个时期美国的情况也相同。说起战后美国的劳资关系，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图景，就是效率优先的经营者和过激的工会之间的

对立，但据赖希和克鲁格曼的分析，事实并非如此。

诚然，从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初，美国的工会与企业处于对立状态。但自1935年实行将集体交涉合法化的《劳动关系法》以后，工会在美国不断发展壮大。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美国有组织的劳动者的人数达到1400万。工会的成长，对企业来讲，是值得欢迎的。

因为，劳动者由工会组织起来，从企业方面来讲，反倒使劳资交涉的渠道简单化了。也就是说，即使发生劳资纠纷，也增加了通过谈话解决的余地。因此，对经营者来说，劳动者被组织起来，是可庆幸的事。

这样，美国就形成了与日本相同的劳资关系的蜜月期。大危机发生以前，一味追求掠夺的大企业经营者也开始认为：“与其在罢工中蒙受巨大损失，不如赶紧向工会让步，提高工资，才是上策。”因此，美国产业界的劳资对立渐渐弱化乃至消失了。

作为“常识”，我们都知道美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全民保险制度，政府也不发放年金。但实际上，据赖希介绍，1955年，中型规模以上的企业，有45%提供年金，70%提供生命、伤害、医疗等各种保险（前引赖希，第46页）。附带说一句，美国企业的福利保障费总额占美国经济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国家政府为社会保险支出的比例基本相同。

当然，这些企业的年金和各种保险费用，实际上都由劳动者负担。但政府对企业为年金和保险提供的补助，征税没有所得税那么严格。因此，充实福利保障制度，对经营者来说，也是受益的。

也就是说，美国虽然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但通过企业做中介的形式，实质上创造出了一种“间接的社会养老保险”。

被成见欺骗

通过以上考察会发现，我们曾经以为“美国是自由竞争的国家，

是讲究责任自负的国家，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富的国家”，这实际上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如果让经济活动一味地自由竞争，贫富差距将会扩大，社会稳定将会受损，最终，将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富裕的社会。所以，为了创造社会整体的“富裕”，需要政府“适当地”介入。

然而关于这一点，正如不久前我还抱着误解一样，美国人自己也误解了。他们多数人相信一个神话，那就是：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是能够实现“美国梦”的国家。

这个“美国梦”的神话，现在还有许多人相信。因为美国时而有比尔·盖茨、泰格·伍兹那样的大成功者出现。由于出现了他们那样耀眼的成功者，于是人们就梦想：“或许我也能行！”于是人们从世界各地聚集到美国。

但是，这些人绝大多数沦为失败者，以被迫过上悲惨的生活而告终。美国社会的厉害之处，大概就在于它能持续地让人看到：尽管几率极小，但出奇的成功者层出不穷。但是，仅凭着这种万分之一的“美国梦”，不能使美国成为真正富裕的国家。

成见是可怕的。看过实际数据，我们会发现，即使众人都清楚的事情，也会因为“美国是自由国家”这种既有观念，使得即使是专家也误以为“因为美国是自由国家，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于是变得看不见事实。

但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富裕，特别是战后美国的富裕，除了是自由经济活动的成果，也是政府积极参与经济、采取适当的社会福利政策、实行适当的二次分配政策的结果。再有就是，美国也与日本一样形成了劳资协调关系，社会才得以安定。

凯恩斯主义经济的衰退、新自由主义春天的到来

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战后，在凯恩斯经济政策

支持下实行的政府干预，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终于出现了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凯恩斯经济学主张稳定景气是政府的工作，既然是这样，那么在景气好的时候，政府就不应该介入，而应转到观望的立场上去。如果景气变得过热，则必须采取紧缩政策。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虽然景气过热，但为了收买选民，不仅不实行“紧缩”，议员们还要抛出人人都乐意见到的推进公共事业和福利政策的计划。对议员们来说，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他们最方便实用的理论支柱。

这样一来，凯恩斯经济学“控制过热”的功能就失效了。相反，还进一步造成了景气过热以及公共部门的膨胀，产生了许多副作用。实际上，美国经济由于“过热”而染上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巨大、公共部门机构臃肿等一系列“发达国家病”。

1964 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彻底胜利”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凭借着民主党占议会压倒性多数的优势，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立法，以期实现“伟大的社会”。他的举措，被评价为罗斯福新政以来划时代的功绩。

然而，正是在约翰逊执政时期，对外，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战争费用急速增大；对内，高龄者医疗补助制度等福利政策实施范围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越发趋向严重。之后，又落井下石般地发生了石油危机，因此，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结果，进入 70 年代后半叶，指责“大政府”的势头渐渐高涨起来。

随后，70 年代后半叶美国经济学的主流就从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派，转向以“小政府”、“市场原理”、“责任自负”为中心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

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凯恩斯形式的经济政策不仅起不到作用，反而是有害的，它会使公共部门机构臃肿，丧失经济活力。这种思想在美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终于在 1981 年诞生了里根政权。

如此看来，美国历史也是循环着走过来的。先是因为收入差距“大压缩”和扩充社会福利政策，创造了战后美国的富裕；然后又因为它超过了限度，导致标榜“小政府”的里根经济政策登场，使美国再次退回到战前的那种等级社会。

这样，如果从稍长一段时间的视角来观察历史，线条就会非常简单明快，我们就可以知道，并不是追求自由放任政策才使美国社会安定并创造出了“富裕社会”。但如果很近视眼地看待这一切，就不能准确地读懂其中的奥妙。

根据最新的研究，我们能够确认一点：美国的经济政策是30~40年重复一个循环，在一个完整的循环期中，进行了“适当的”政府介入的时期，就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从这种循环论的视角考察，美国的经济政策，迟早会从个人自由优先的新自由主义，过渡到更加关注收入差距、扩充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利益的民主党式政策上来。

实际上，2008年11月，美国就选出了主张对中间层减税、以调整收入差距为中心政策的民主党的奥巴马担任总统。因此，2009年以后的美国，将会从共和党“个人自由”优先的政策，转换成民主党“公共利益”优先的政策。这对美国来说，应该是福音。

日本学生对市场原理“教义”的疑惑

那么，请允许我再回头谈谈个人经历。

1974年回国后，我站到了大学的讲坛上，试图热心地把我在哈佛被灌输的近代经济学特别是“市场机制之完美”传授给学生。同时，我还告诉学生：日本是如何没有灵活有效地利用市场；日本是一个多么严重地被管理和保护主义限制着的“封闭国家”；在政治方面，“政官商”的铁三角如何把社会弄得一团糟糕；等等。因此，我坚持主张：为了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废除管制，开放市场。

然而，我如此满怀激情地讲课，学生们却似乎毫不领会。我很纳闷，“理论上没有比现代经济学更明快极致的学问了，怎么日本学生这么不明白道理呢？”

但是，现在想起来，学生们露出疑惑的表情，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可能是直觉告诉他们，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明快”当中有某种“可疑点”，他们或许感觉到了它与日本人拥有的传统价值观有不相容之处。但是，学生们还不具备指出“可疑点”的语言和理论能力，所以只有做出不释然的表情。

他们对什么地方感觉到了“可疑”呢？第一点应该是，前提过于个人主义。

比如，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中，将人假设为“经济人”，即在近代经济学中出场的人，是以满足自我为最大目的而采取合理行动的存在，“社会”这个概念没有进入的余地。至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学家们仅仅指出：市场将会实现最合适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可以通过投票决定。但是，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正确”的、应该多大程度上供给公共产品、什么样的社会能使人幸福等，这些关系到主观认识的问题，一概不进行价值判断。

个人是独立于社会的原子存在，这些利己的经济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加入市场，于是“看不见的手”开始运作，进行资源的最优分配。这就是近代经济学的基本纲领。

但是，即使常识性地思考也很容易明白，人并非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着。相反，对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到了社会好评。把伙伴们都踢到在一边唯独自己赚钱，和与伙伴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艰苦奋斗最终实现目的，这两种情形比较起来，获得成功时的满足感，恐怕前一种情况绝对不会多于后一种情况（当然，可能存在个体差异）。

看看从前的日本。江户时代的武士并不生活在经济合理性之中。他们认为“武士落魄不失节”，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气概，是武士道。

另外，也不只武士，江户时代的商人也讲究“三方得利”，认为买卖的理想形式是不仅自己赚钱，还要让对方赚钱，并且将利益回馈社会才算好。

这种思想不只限于江户时代。在现代社会，也有许多人在努力这样做。有人以看到客人欢喜的面孔为人生的最大价值，有人千辛万苦地要做出别人无法模仿的优秀工艺品，等等。

但是，这种“利益第二”的思想，在经济学上全部被舍弃掉了。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人是社会性动物”，是群居动物。人是在与家人、朋友等其他人的关系中，寻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的。无论积累多少财富，生活如何安定，很少有人甘愿没有家人和知心朋友，满足于在天涯孤独地度过一生。

然而，在近代经济学理论中，为他人尽力、保持与社会的沟通，这些人类原本具有的“本性”，统统被作为不合理的东西排除掉了。

但是，当时倾心于现代经济学的我，并没有明白这些“当然”的道理。我坚信不疑地认为：近代人应该合理地思考，为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而行动，这种人生观才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理解学生们疑惑的表情。

作为改革派的急先锋

就这样，当我在大学课堂讲授近代经济学的过程中，日本社会的潮流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自民党政权倒台，细川内阁诞生。这是1993年的事情。在这个政权交替的急剧变动当中，我这样的“改革派”受到赏识。不，因为是“改革派”，所以才受到赏识。我受命作为细川首相亲自设立的咨询委员会“经济改革研究会”（通称“平岩委员会”）的委员，就如何推进经济改革提出建议。我如鱼得水般地执行“改革派”的一贯意见，高声主张“应该撤废一切经济管制”，与恪守规制的政府部门及企业界全面对抗。

无论什么时候，人们在讨论“总论”时都会给予一定的好评，

但一谈到“分论”，态度就会骤然改变。平岩委员会也不例外。一旦具体到各个业界的规制改革，反对派的力量就骤然间强大起来。于是，作为改革对象的业界，就与政府部门和政治家联起手来破坏改革。

一天，我去大学上班，秘书对我讲：“我请求辞职。”我吃惊地问他原因，他说：“害怕接电话。”

自从我开始和平岩委员会活动以来，我在大学的研究室，开始频繁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多数电话是抗议，或者是“想说明业界的情况”。多的时候，我记得一天有几十个电话。如果是我上班的日子，我可以直接对话；我不在的时候，秘书就必须接待。“我受不了在电话里被怒骂”，这就是秘书辞职的理由。“铁三角”对于撤废规制的抵抗，竟如此之激烈。

或许由于我一味地主张激进的东西，不久，我开始被业界许多人看做“危险分子”，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后来，细川内阁由于佐川急便1亿日元的政治献金问题，以及引入名为福利税的消费税造成的混乱而瓦解。仅仅上台执政8个月的时间，内阁就全体辞职了。随后，“经济改革研究会”也解散了。

之后，我再次踏入首相官邸是在小渊内阁执政的1998年夏天。小渊内阁成立不久，高中时代的学长堺屋太一给我打来电话。堺屋学长被任命为小渊内阁的经济大臣，他邀请我参加为推进经济改革而设立的“经济战略会议”。

堺屋对我说，中谷岩这个名字，在政府部门选定的政府审议会委员最不合适人选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我不知道是否真有那样的名单，但我坚决推辞道：“您能指名我，我很荣幸，但情况既然是那样，如果任命我，您与官方的关系不就搞糟了吗？”然而，堺屋对我说的却是：“不，正因为你是官方讨厌的人，所以才拜托你。”

于是，我就成为“经济战略会议”的成员，参加到整理“结构性改革”的建议这样的工作中去。我被任命为代理议长。“经济战略会议”的成员中，还有后来小泉内阁中的活跃人物竹中平藏。我们整

理出了由二百几十个项目组成的改革色彩浓厚的建议。

后来，小渊首相突然逝世。经过森喜朗内阁，到了提倡“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小泉内阁。在小泉内阁中，竹中平藏发挥了引领经济改革的作用。借这个机会，我不再涉足首相官邸，开始保持一定的距离来思考日本社会应有的状态。

“结构改革”使日本人幸福了吗？

我在大学里坚持对学生们热心倾诉“市场原理”的重要性，在离政策制定中枢最近的首相官邸也呼吁实行“结构改革”、撤废规制。我那些主张中的一部分，好歹也得以实现了。

这样，“结构改革”一步步地推进；但另一方面，我在眼见着日本经济接受“全球化标准”的过程中，内心却开始萌生出一种疑问。那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情。

这个疑问就是，“通过结构改革和全球化资本主义，日本人变得幸福了吗？”

的确，由于“结构改革”，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放松管制，我们生活的许多地方变得方便了。由于开放市场，出现了所谓的“跌破价格底线”现象，以百元店为象征，能够从世界各地进口超低价消费品。

小泉内阁最大的课题——邮政民营化也勉强得以实现，其最大的成果在于，阻止了把邮政储蓄和简易保险筹集的资金自动转换成财政投资融资，流到不必要、不急需的公共事业中去这种结构。这项功绩，今后也将被传颂下去。但是，在农村，小型、便利、受村民喜爱的邮局被民营化，一些邮局就会因为经营亏损这个理由而一个个地被关闭掉。它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想必一定有很多人，由于这个令人怀念的旧时日本风景的消失，感受到了一丝凄凉吧。

经过小泉改革，日本社会中，无暇顾及他人、一心考虑自己的风气增强了。地方政府更显疲惫，收入差距更加扩大。由于医疗改

革，老人们的内心也不得安宁。由于异常犯罪增加，日本社会失去了“安心感和安全感”。这种人心的荒芜、贫富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一时性、过渡性的现象，而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至上主义内在因素的反映。而在日本推行的“结构改革”，却几乎没有关注这些日本社会的变化。

当然，我无法严密地论证日本社会的质变与“小泉结构改革”之间有多大程度的关系。但是，全球化的进展这个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肯定会对社会的质变起到助力作用。把美国这30年发生的事情，与日本社会现在不断出现的情况结合起来考虑，让我无法消除一种疑虑：在单纯的“结构改革”路线下，社会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异常？

不错，美国式近代经济学具有一流的理论体系，作为学问的完善度或许很高。但是，正如我已经列举过的“经济人”的例子，现代经济学假设的各种前提，不仅远离日本社会现实，而且，其过于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破坏了日本社会的传统价值。以市场原理为信条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潜藏着本质性的缺陷，它无视“社会价值”，使社会丧失安心感和安全感，剥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及和谐关系。

民主这件“隐身衣”

细想起来，人的行为并不只为满足自己，所以，“经济人”假设这个经济学的前提有局限性，这些道理也无须我现在说起，只要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懂得。特别是，即使哈佛大学那些聪明且有能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那些“可疑点”，这不足为怪。然而，在没有进行任何讨论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就宛如人类的普遍真理般被众人接受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恐怕，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不单纯因为它作为学术或理论具有“正确”性才赢得了人们的支持，而因为它对一部分人，明白地讲，

就是对美国和欧洲的精英们是很有利的思想，因此才吸引了如此多的能量。“个人的自由活动优先于公共利益”这种思想有益于搞活经济，即便新自由主义这个主张本身没有错误，但它也可能成为将差距扩大正当化的绝好“工具”。

请原谅我谈些私事。1999年，我被邀请做索尼公司的外聘董事，以此为契机，我辞去一桥大学的工作，开始与实业界发生关系。

这当中，我有机会与欧美国家的企业经营者、政治家亲密地接触。通过交流，我感受到一个事实：欧美与日本不同，是一个阶级社会。无论从好的意义上讲，还是从坏的意义上讲，他们都抱着很强的精英意识讨论问题。我感觉，在他们当中，作为“社会领导人”的责任意识，和“精英不同于一般大众，理所当然应该领取高薪”的意识，交杂在一起。

欧美企业管理层的报酬，由公司外聘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报酬委员会”讨论决定。很多时候，那里决定的报酬金额（特别是在美国）可成为天文数字。我认为，那缘于他们的“阶级意识”。

顺便说一句，决定经营者报酬金额的报酬委员会制度穿上了民主这件“隐身衣”。因为，无论多么高额的收入，都不是经营者自己随心所欲地决定，而是由公司外部的特聘委员经过民主过程决定的，因此可以被正当化。在“公司管理”这个美名下，征求公司外聘专家的客观判断，这种理念虽然很好，但随着公司管理改革的推进，实际上出现的情况是，造成“未曾有过的高额报酬常态化”。

民主与近代经济学皆为精英统治的“工具”

日本社会也并非没有阶级和阶层差别。但它给人的印象是，那些差别是可以靠能力、通过努力去超越的。另外，日本人总觉得，归根到底，“伟人也是人”。每天早上，乘坐满员电车去上班的女性绝不是有钱人，但她们大包小包地买名牌商品的情景，在阶级色彩浓厚的欧美人看来，似乎是异常现象，而这正说明日本是一个阶级

意识多么淡薄的社会。

然而，欧美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精英和一般大众之间，意识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精英创造的社会与一般民众生活的社会绝不重合。看看住宅区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大宅邸排列的郊外富人区，与穷人居住的哈莱姆区，是天壤之别的世界。真可谓“两个世界”。

美国自豪地称：“我们国家才是民主的大本营”，“美国梦”可以为人们提供梦想，“只要拼命努力，不论门第、家庭出身和种族，任何人都能成为亿万富翁。”

的确，美国确实是肤色不同的人都可以当选总统的国家。这样的例子的确有很多。棒球选手铃木一郎也好，松井秀喜也好，松坂大辅也好，他们在美国挣的钱比在日本多出几倍。于是，很多人心中就留下一种印象：只要有实力，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美国社会真是好极了！

但是，美国实际上并非想象中的那种机会平等的国家。因为它时常成功地创造出例外的成功例子，因此，给人们造成了美国有“美国梦”的印象。但除去那些例外的成功者，其他生长在贫困家庭的人们，一生仍然延续着同样的命运。

另外，美国至今仍旧不是什么平等社会。直到大约30年前，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公共厕所都是分开的。即使现在，多数名门高尔夫俱乐部，都是不允许黑人加入的。美国虽然也在从由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新教徒）的精英支配的阶级社会渐渐地转变，但与日本相比，其阶级社会的要素要强得多。或许阶级统治这个词过于苛刻，但聪明人统治、压榨不聪明的人是天经地义，这种思想在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了。

一般人认为，近代以来，在西方发生的市民革命使民主扎下了根。但是，所谓的市民革命赶走王公贵族和教会势力之后，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欧洲的市民革命，就是资产者阶层为了夺取王公贵族的权力而进行的。

对于与市民社会成立同时产生的市场机制思想，应该沿着这条延长线去思考。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如果社会资源配置遵从市场，将会由“看不见的手”实现最佳配置。那时，正是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发动产业革命的时期。如果考虑一下，谁将会从王权、既得权益者开放市场中获得利益，就会清楚其中的“奥秘”。

或许这样表达有些过激：制定出一些制度、规则，组织一些机构，使精英们巧妙地支配、压榨一般大众成为可能且理所应当，这难道不正是阶级社会中精英们心照不宣的默契吗？

实际上，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制度，其外表极其民主。它们主张：在市场上买卖是根据个人的自由决定，没有人强迫，又因为早已不是奴隶制度，所以想干活的人干活，不想干的人可以不干，这些全部遵从个人的自由。这些自由的个人的判断，通过市场调节机能，决定社会整体最恰当的资源分配，因此，市场就是经济活动中的“民主”本身。市场机制拥有了如此体面的民主的外衣，因此，即使结果出现不平等，那也是在民主的规则下发生的，无可厚非。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的根本问题。实际上，马克思指出过，“劳动商品化”与“契约自由化”概念试图隐瞒依靠资本压榨劳动的事实。的确，因为劳动者是根据自由意志缔结的雇佣合同，因此，即使产生分配不公平也不能怨天尤人。市场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发挥着作为完美的“统治工具”的功能。

披上了这种民主外衣的市场机制，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对精英有利的东西。

因为，通常情况下，精英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能更有利地进行交易。如果利用次贷购买住宅，将来会怎样？恐怕很多低收入层的人不明白。但开发了次贷的华尔街的精英们，他们很早就清楚贷款人的命运。然而，他们同样知道从中可以赚大钱，所以对此缄口不言。

也就是说，无论多么民主的社会，信息是不平等的。用经济学

的术语来讲，就是信息存在不对称，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能够取得更大的利益。尽管这个事实公开存在，却一直被说成市场是在平等、民主的规则下运作，因此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后文将详述）。

经过一番考察你会发现：归根结底，所谓市场机制、自由竞争或者全球化资本主义，难道不都是精英们为压榨大众而利用的“工具”或“隐身衣”吗？

假定这个认识基本正确，那么，无论我们如何积极地推进自由竞争、扩大全球化，美国人或日本人中的一般百姓，也不一定能变得幸福。恐怕，只是让世界上有能力的精英们和能自由操纵资本的人们变得更加富裕罢了。

那么，怎么办才好呢？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如何控制全球化资本主义。或者说，我们必须改变“只要改革，世间就会变好”这种天真的想法，去摸索解决国家需对自由主义经济加以何种限制，要重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为了实现那种社会价值需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应如何实行等问题。为实现这些想法而实行的“改革”依然必要。但是，如果是没有目标的改革和只为确保个人更大自由的改革，只会进一步加深世间的混乱。因为那是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怪物的原形。

作为日本人重新探讨“全球化资本主义”

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之后，我开始认为：“有必要以全新的眼光，重新探讨现代经济学，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就是，抛开欧美人的价值观，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更透彻地了解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本质。然后根据探讨的结果，思考如何对全球化资本主义采取扬长避短的措施。因为，幸运的是，日本不同于欧美社会，并不是精英统治的阶级社会。

从历史上看，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日本也是别无旁例的平等主

义的社会。从镰仓时代开始，农民出身的武士就掌握了政权，因此，无所事事、只谙权术的特权贵族阶级的权势受到限制。江户时期日本享受了260年的和平，更增强了日本社会的平等性。町人^①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承担了社会中坚、社会主人翁的作用。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采取“武士落魄不失节”的人生观，因此基本没有发生过类似鱼肉百姓这样的事情。这在世界史上，难道不是少有的例子吗？如果真是那样，我认为这个事实，从世界范围看，都应该是日本引以为豪的巨大历史财富。

在这种平等主义的社会背景下，日本照搬照抄地引进可能成为精英阶级统治工具的市场机制，是会出问题的。当然，利用市场机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要使日本人“幸福”，应该如何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全球化资本主义。

日本的政治家，被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们动听的话语欺骗，就轻率地罗列一些套话：“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改革管理体制才能搞活日本”、“只有更积极地采取全球化资本主义，日本经济才能有活力”等，说他们“没长脑子”也绝不为过。严重的是，照此发展下去，会破坏日本社会。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为了改善社会所必要的改革。至于具体应该做什么，我打算在第七章具体讲述。总之，我认为，我们必须在将手术刀插入残留在日本的既得权益结构的同时，冷静透彻地看清市场机制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具有的“暴力性”，反过来利用它的力量来推进改革，使日本和世界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因此，虽说我宣告自己“转向”，但我丝毫没有为拥护既得权益结构、为维护特定人群利益而反对改革的意思。我反省的是，迄今的改革没有看到新自由主义坏的方面，而实际上它正朝着增加全球化资本主义暴力性的方向发展。我想呼吁：改革不能是这样的！

^① “町人”是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的一个阶层，以商人和工匠为主，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译者注

我开始怀疑美国式的经济学和市场原理，认识到仅靠“结构性改革”并不能使人们幸福，其中的过程和原因，我在上文都作了交代。但实际上，情况要更复杂一些，一言半语说不完。我一提出非市场主义，人们往往就会误解我转变宗旨，转向了马克思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或许还有人认为“中谷岩成了反美右翼”。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不过在提醒大家：要更加注意市场不可把握的部分、隐藏在民主外衣下面的部分，以及由市场导致的人们心理状态（市场心理）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质等，然后，必须转换思维角度，“巧妙地利用市场”。我们应该从不考虑这些问题就轻率地叫喊“改革”的程度毕业了。我不过是在考虑这些问题而已。

最终，我作为一个学者，是想在本书中阐明市场机制，以及由它进化而来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本质性的局限和缺陷。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确成功地捕捉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侧面。但是，一个自明的道理是：那个发现，毕竟是一个侧面，而人类社会并非仅靠它就能全部讲清楚。我们生活的社会，是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形成的，试图抛开那些背景，只依据单纯的经济模式解决社会上的诸多问题，是否过于简单化了？这就是我现阶段坦率的意见。

那么，下一章，我想概括说明一下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本质在哪里，现代经济学的局限在哪里。

第二章

全球化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贫富差距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恩惠”

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被具有实际意义地使用，开始于1991年发生的苏联解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约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地球上的国家分成两个阵营，形成了东西方冷战的局面。随着苏联解体，冷战局面终结，树立在俄罗斯、东欧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市场的墙壁（有“铁幕”这样一个术语）消失了。由于东方国家也开始采用资本主义体制，因此世界经济朝着一体化急剧发展。在这种趋势影响下，中国和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结果，人类闯进了“全球化市场”时代。在这当中起推动作用的，是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实现的信息技术的真正普及。由于能够简单、廉价地建立起覆盖全世界的信息网，因此，西方国家的企业现在也能够进入以前还因为距离远或偏僻而犹豫是否投资的地方。

当然，与此并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想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各国或是撤销贸易壁垒，或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无不在促进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

当全球化资本主义开始现实地运作起来的时候，人类伸出双臂表示欢迎——我这样形容绝不夸张。

比如，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来说，全球化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大减价”的到来。正如百元店和优衣库^①所代表的那样，消费品开始以超乎人们以往常识的低价销售。

在美国，像沃尔玛这样的便宜店也急速增长。在这种低价格战略取得成功的背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能够自由地运用中国、越南或是东欧这些廉价劳动力市场。只需支付相当于发达国家几十分之一的工资，就可以随意招收到一批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将生产据点转移到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

讴歌人间盛世的世界经济

结果，不仅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能用便宜得惊人的价格买到商品，而且投资家也增加了收益机会，获取了高额回报。

且不说因为处理不良债权而棘手的日本，美国和英国更是直到最近为止都受到全球化扩张的恩惠，长期享受了景气上升。美国在里根新政的基础上推进改革。自1993年以来——除2001年互联网泡沫崩溃时的6个月——直到最近的这段时间，实际上维持了连续14年的景气上升。英国则在撒切尔政权大胆的改革中复苏，与美国一样持续了长达14年的景气上升。

英美两国在国际金融界的竞争力都很强，是引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主导性国家，值得我们关注。总之，世界经济在英美两国引领下得以极其顺利地增长，发达国家的多数消费者与投资家都一同讴歌“人间盛世”。特别是美国投资银行利用先进的金融工具进行“杠杆经营”，给金融市场带来飞跃性的扩张，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

而另一方面，对凭借廉价工资而成为“发达国家工厂”的原社

^① 优衣库（UNIQLO）是一家日本服装品牌，主要出售来自中国等国家的便宜服装。——译者注

会主义圈的国家来说，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到来也是福音。

由于来自西方的投资像汹涌的潮水般涌入，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急剧增长。

中国实现了每年 10% 左右的高度增长，以 GDP 来看，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位居世界第 4 位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国家。尽管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但内陆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只是，与沿海地区的富裕阶层相比，问题在于提高的速度过于缓慢。尽管中国共产党也不能预测是否会取得成功，但它开始采取“和谐社会”政策，试图纠正分配所得的不平等。

再看印度。印度的 IT 产业特别是软件开发，开始崭露头角。巴西靠着世界经济的高度增长支撑，趁着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高涨，正在实现高度的工业化。俄罗斯则由于能源价格高涨，流入了大量的原油资金，成功地闯过了财政危机。所谓的 BRICs——“金砖四国”走到了全球化经济的前台。如果没有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些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或许完全不可能期待能够上升到现在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功”的部分，也不能过低评价。

另外，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经营者来说，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简直就是“未开垦地”。那里有几十亿廉价劳动力，同时还有销售西方消费品的未开发的广大市场。对于西方的消费者来说，所谓全球化，不外乎就是“减价”。中国生产的食品和服装，以打破从前常识的价格陈列在超市里；由于国际竞争加剧而使家电产品、汽车、PC 这些商品，也不断降低价格。对于新兴国家的人们来说，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扩大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获得了成功机会。

无暇顾及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副作用

只要人们在自由的市场中竞争，经济就会大规模地增长下去，

通过“看不见的手”完成“最优”资源分配。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不公平和环境破坏必须由政治来纠正，这就是亚当·斯密以来的近代经济学的“基本教义”。

沿着这条思路，提倡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坚持主张：“减少计划、缓和管制，尽可能减少政府干涉，为自由竞争准备好环境很重要。这是把经济总额最大化的最好办法。”在日本，高声主张“结构改革”的人们所依据的，也是同样的理论。

这种新自由主义或近代经济学的主张，多数情况下成功地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和生气。起码，在一部分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后的当今世界，无论全球化资本主义怎样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也不可能再次简单地接受回到苏联类型社会主义体制的主张。但是，问题是，对于自由竞争带来的副作用（经济不稳定、差距扩大、环境破坏）考虑得过于不足。

对于这些议论，新自由主义者提出如下主张：只要搞活经济，经济总额增大，其恩惠不久将渗透到整个世界，然后人们就都能富裕起来；虽然时而也会发生差距扩大和金融危机等现象，但那不过是“过渡性的现象”。也就是说，现在或许很艰辛，但只要挺过这个时期，依靠民主和市场的调节能力，副作用会自然地被纠正，春天将会来临，在地球上生活的人们都能过上幸福生活。

这些主张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讲的是同样的道理。邓小平于1992年视察深圳、珠海、上海、武汉等地，激励大家“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条路线，成为加速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经济的原动力。但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差距扩大、环境破坏这样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中国的差距扩大和环境污染将达到预警程度，必定会让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变化。

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也正走向同样的结局。就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金融恐慌就先来到了。在这之前，先后出现世界性原油价格上升、粮食价格暴涨，这些事件直接冲击了世

界的贫困阶层。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走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中国也不例外。

果真是“市场失败”吗？

在经济学中，把由于政府进行管制等原因使得市场机制不能适当运营、不能实现理想的资源配置的状态，称做“市场失败”。比如，如果一部分大企业结成价格卡特尔，人为地操纵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机制就无法运作；当然，如果政府介入市场价格，又会扭曲市场机制。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相同的情况正在现在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发生。持这种观点的人的代表之一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在《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一书（德见书店，原著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中主张，地球上之所以出现社会差距，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于利己主义的目的而扭曲市场原理的结果。

斯蒂格利茨讲的不外乎就是“市场失败”。他认为，如果发达国家停止发挥政治力量，制定对它们自己有利的规则，而将更适当的规则纳入全球化经济中，最终就能消除现在的贫富差距。

下面我引用该书卷尾的一段话：

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肯定都把迄今为止的全球化的手法，当成是与魔鬼订的契约。受到它的恩惠的，只是一小撮富裕阶层。……这不是全球化应有的面目。我们有可能让全球化正常地发挥作用，让它不是只为拥有金钱与权力的人服务，而是为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的人们服务。（前引斯蒂格利茨，第413~414页）

从这段文字看，斯蒂格利茨似乎真心相信“通过全球化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的最佳配置，应该完全可以实现。”

但是，果真会那样吗？现在的状态不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面目”？如果全球化开始正常地发挥作用，“看不见的手”就会发挥机能？万事就会解决吗？

遗憾的是，斯蒂格利茨的看法存在某些问题。

我的看法是，随着全球化在世界上的急速发展，贫富差距不断地扩大，与其说这是“市场失败”，不如说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的机制造成的。

收益递增型产业拉动景气

引领这长达十几年梦一般的经济发展的，是美国金融资本。更具体地讲，是美国东海岸华尔街的金融界和美国西海岸硅谷的信息通信产业。

无论是金融业还是信息业，对全球化而言都是绝好的产业。这些产业，不像农业那样，被束缚在特定的土地上，而是“身体轻巧的产业”，只要找到商业机会就能够相当轻松地跨越国境活动。

同时，它们也不同于“行动迟缓”的制造业。制造业需要踏实努力、勤勤恳恳地制作好东西；而“收益递增型产业”则是头脑清晰的精英们通过技术革新，开发出以前没有的独特商品，然后一举将世界市场搞到手。所谓“收益递增型产业”，就是市场规模越大赢利就越高的产业。金融业和信息通信业基本上都不需要原材料，所以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只要作为基础的商品设计优秀，就会成为全球标准，旋即就可能将全球市场掌握在手。顺利的话，甚至可以成为创造无限大利益的产业。

特别是结合了金融知识和信息技术的金融工具的发展，产生了无数的新型金融商品。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进行杠杆经营，能够把低利率筹措来的资金膨胀成几倍。

我想，虽然知道次级房屋按揭贷款的读者很多，但为保险起见，我再作一下解说。

所谓次级房贷，就是以信用状况较差、往往没有还贷能力的借方（低薪层）为对象的房贷。因为信用差，自然房贷的利率会比较高。但是，即便利率高，也有巧妙的办法让那些人贷款。具体方法是在开始的2~3年，把本金、利率的返还控制在极低的程度，然后急速地增加还贷金额。当然，从借款方来说，对于将来支付的利率超过10%的高利率贷款，他们也会敬而远之。但即使这样，次级房贷的推销者也有巧妙的手段，让他们产生“试试看”的念头。

被次贷欺骗的人们

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比较典型的的就是美国出现的楼市热。在发生这次“撞车”之前，美国的不动产市场一直处于泡沫状态，楼价不断攀升。于是，业界的人这样说服低薪者：“您一定担心将来的还贷利息会很高吧。没关系。3~4年后，利息涨了，但您买的房子的价格也上升了很多。把升值后的房子拿来作担保，还旧借新就可以了。那样一来，因为房子价格上涨了很多，所以您支付的利息就不再是次贷，而是优贷了。即使考虑到更长远的将来，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也还会继续上升。所以，如果需要，您可以再继续做优贷。那样，就一定可以保障您今后过上更优裕的生活。”

如果顾客仍旧犹豫不决，他们就会继续说：“即使这样，我们假设仍旧有人由于某些原因还不上贷款。比如出现楼市下跌，不能再进行优贷等情况。如果那样，假设还贷计划出现困难，就得舍弃买下的房子。但是到那时，无论房子的价格如何下跌，估计也足以还清贷款（这种贷款被称做无追索权贷款）。所以，即使最坏的情况，也只要把买下的房子卖掉，就不会留下任何债务。所以，您不用担心。相反，您看看以前的发展趋势就知道，今后房价肯定还会继续上涨，所以您的担心真没必要。”

在这种甜美的诱惑下，很多人染指了次贷，买下了房子。而美国的不动产需求也确实因此增加，并事实上抬高了房价。因此，越

来越多的低薪阶层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因为他们的需求不限于住宅，对汽车、家具也表现出很高的需求，这对维持美国的景气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结果来看，次贷推销者对短期形势的判断，是与事实相符的。泡沫就是通过这种“预言的自我实现”现象得以维持，而这次也不例外。

这样，借款的一方为“仲夏夜之梦”陶醉，而不动产贷款方（出借方）则极其现实。他们并不把借出的房贷债权放在手头，而是立即把它们卖给银行和证券公司，进行现金化。即使借出的房贷风险大，但如果立即把它们卖给其他的金融机构，他们就不会发生滞纳风险和呆账风险。当然，结果证明出借方对贷款的风险判断不足。

进而，金融机构把次贷债权从不动产贷款公司买下来后将之证券化。所谓“证券化”，就是把债权分割，变成小型的金融商品（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的做法。

当然，实际上的操作更复杂些。因为次贷是高风险产品，并不因为分割成小型商品，就不存在风险了。如果购买者认为风险大，那么，在市场上就很难卖到好价钱。

于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为了隐瞒次贷债权的风险，就把其他的优良证券商品（比如国债、对超优良公司的贷款债权、普通债券）和次贷混合起来，制作出新的金融商品。

这被称做 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债务担保证券）。CDO 的得意之处，就在于它把次贷债权证券化后的商品与优良证券商品混合，致使次贷风险变得看不见。

“杠杆经营”崩溃的历程

关于 CDO，连评估公司也没有看出来，屡屡给它定级为最高级别的 AAA（3A），所以，对冲基金、机构投资者等，都乐于大量地购买。

购买了 CDO 的投资家，又把它作为担保，用很低的利息从金融

市场筹措资金，再将之用于资产运营（杠杆投资）。通过这种形式，金融市场中的交易额不断地膨胀。因篇幅有限，我不详细展开。但我要指出，深度介入这种复杂的操作并获得巨大利益的，是美国的投资银行。

在市场上升的时候，“杠杆经营”会让人感觉投资几乎完全按照剧本发展。如果注入的金额巨大，市场会受此煽动而更加上扬，于是必定实现自己的预期，获得“预言的自我实现”式的效果。

这种情况持续数年，就变成了一种信念，投资者会认为美国式商业模式是正确的，从而让这种模式的发展更加势不可挡。这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繁荣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这种“自我实现式”繁荣，会渐渐地呈现泡沫状态。据说，近些年，与实体经济的增长相比，金融经济的增长上升了好几倍。那正是“杠杆经营”的结果，但它转变成泡沫也是必然的。

这种杠杆经营一旦开始朝着反方向运作，负的连锁反应就开始出现。巨大的损失将造成经济疲软，继而又产生新的巨大损失。这就是泡沫的崩溃。

有过股票和外汇等信用交易经验的人都知道，假设用10倍的杠杆投资，投资对象只要减价一成，本金部分就化为乌有。像现在这样，CDO的价钱已经下跌到不值钱的程度，伴随着杠杆投资的损失就已经达到天文数字。为了清算由此发生的债务，人们不得不连毫无关系的资产也要舍弃。

另外，一旦陷入那样的状态，就变得无人能够通融资金。结果是，资金无法周转，企业大量出现倒闭。破产的多了，融资银行的不良债权就增多，继而就会发展为金融危机。

会发生贷款紧缩吗？

上述过程，并不是理论或教科书上所讲的内容。

这几年来，与实体经济相比，金融交易的规模急剧膨胀，继而

变成泡沫。但从2007年7月左右，齿轮开始逆转，结果就发生了此次金融恐慌。在甜美的诱惑下购入不动产的人，多数由于房价下跌而无法进行资金再融通，陷入无法偿还贷款的地步。

他们放弃不动产再次回归到无房阶层，但并不只是回到从前的无房状态。

当初，趁着房地产泡沫、担保价格上升的形势，多数人重新进行了房子抵押评估，也就是通过资金再融通增大了借入额度。由于他们利用增加的信用额度，买入了汽车和家具，因此，多数人背上了超负荷的债务。

如果泡沫破裂，他们自然就无法偿还购入这些高额商品的贷款。就这样，一度被短暂的梦幻陶醉的低薪阶层，又被逼迫到比借入次贷之前更悲惨的生活状态中去。

当然，受害的并不只是低薪阶层。由于CDO和相关金融商品一律暴跌，投资家也遭受了巨额损失。为投资公司出资、融资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发生了大量不良债权，形成资本受损状态。大家都疑心生暗鬼地揣测，不知哪家银行会倒闭。所以，市场上银行间的借贷出现冻结状态，许多金融机构的资金筹措出现极度困难。终于，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了。

随后，欧美的中央银行相继发表声明说，为了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弥补资本的亏损而投入了国家资金。我认为，做出这样较快的决断，是参考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处理不良债权的经验，但世界的金融市场是否能因此就稳定下来，仍难以预料。

今后要担心的是，实体经济将会恶化到何种程度？由于金融市场的混乱，造成银行资本过度缩小，况且，伴随着越发严重的不景气，贷款风险加大，因此会发生所谓的贷款紧缩。

在欧美，贷款紧缩已经相当严重，甚至在应该与次贷没有太大关系的日本也开始发生了。这将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多大的影响，目前仍无法预测。

对汽车和家电产品等实行贷款紧缩，自然会影晌这些商品的销

售。企业也会因而出现投资资金周转不灵，因此景气将更加恶化。这样一来，失业增加，景气越发变坏。不还贷的情况增多，银行就会对借出资金变得越发慎重，最终，经济将陷入恐慌状态。如果资金周转不畅的状态持续，破产企业就会不断出现，最坏的情况是导致大恐慌。在本书执笔阶段，我还不能说更多的预测，但能确定的是，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已经相当严重。

美国“金融立国”战略的失败

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它不是出口依赖型，而是依靠国内经济进行自我消费。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产业的中心是制造业，而在国外的发展，也不过是把生产据点转移到海外在当地发展而已。

但是，到1980年左右，构成美国产业中心的汽车业和家电业等主要制造业，被日本和德国等赶上，失去了竞争力。为此，美日之间开始产生贸易摩擦，美国断定日本市场封闭，不进行公平竞争。这是因为，美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担心如果制造业失去了竞争力，美国经济将难以维持。

但是，到1990年左右，美国产业的中心从底特律等中西部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东海岸的金融业和西海岸的信息通信业上。东西方冷战结束后，东方各国也加入到了经济全球化中来。作为美国的战略，产业界在金融业和信息通信业中找到了出路。进入90年代，全球化资本主义开始飞跃发展。它以美国为中心扩展开去的原因在于，美国在适合全球化的金融和信息通信领域成功地确立了竞争优势。

关于信息通信业，不需多言。微软和英特尔创造了事实上的标准，席卷了世界市场。进入21世纪以来，谷歌这样的网络公司更是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成功。而另一方面，通用汽车公司（以下简称“通用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等曾经支撑美国经济的大型制造业公司却陷入了经营危机。但在金融和信息通信领域建立了压倒性优势地位的美国，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去制造贸易摩擦了。因

为美国的产业结构已经从以制造业为中心大幅度地转换到以金融和信息通信业为中心。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新经济论崭露头角。这种学说主张，美国经济通过金融和信息通信业创造出的持续的技术革新，克服了景气循环这个以前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宿命的问题，而将长期持续增长变为可能。支撑起这种新经济理论一角的，是美国的金融业特别是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的“杠杆经营”商业模式。

最终，通过杠杆经营讴歌人间盛世的美国投资银行，创造了巨大的金融商品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它们原本以为自己支配着庞大的市场，结果却被市场玩弄了一把。

美国试图摆脱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转向以金融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金融立国”，但最终还是遭受了挫折。随着泡沫而被吹起的国民消费，债滚债地超出了贷款者本身的承受能力，令其沦为受害者。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终于失败了。

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

我在上一章指出：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发挥着充当收入差距扩大正当化的工具或隐身衣的作用。

实际上，观察现实世界，这 20 年间，贫富差距在世界各地都扩大了。前文我已经讲过，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和沃伦·巴菲特那样的投资家所代表的、极少部分的成功者，获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财富。如我在第一章讲过的那样，在美国，国民收入的总额增加了许多，但中产阶级和下层人们的生活水平丝毫没有提高。在日本也同样，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一味地增多，年收入在 200 万日元以下的人突破了 1000 万人。

这不仅是美国和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事情。众所周知，在中国和俄罗斯等被称做 BRICs 的新兴国家也出现了相似的状况。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沿海地区，比如上海等，出现了拥有

10 辆奔驰车的超富阶层，但这种好景气并没有波及内陆地区。至今，内陆地区还有不少人过着没有通水通电的生活，内陆与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生活差距还在一味地扩大。

如此，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世界各国出现的一小撮“超级富人”和绝对多数的“劳动贫穷者”这样两极分化的结构。另外，由于全世界都在快速地开发，因此，环境破坏、资源争夺战也愈演愈烈。不仅如此，由于人们对欧美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席卷全世界的反感不断高涨，这种反感终于以“9·11”这样的形式，发展成为“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那么，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前提思想是，市场机制解决一切，这种思想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说得简单些，新自由主义的教义就是：只要在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无限制的、自由的市场中进行竞争，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消费者，或者对劳动者，都会自然达成“最适当的解决”。

站在这种思想上看，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失败，错就错在它没有遵从市场机制这个“自然原理”，认为经济可以人为地进行调控；而实现市场的全球化，使物品和金钱可以无限制地超越国境自由移动，这才应该是战胜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终形态”。甚至于弗朗西斯·福山干脆就说：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当今，历史已经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①，三笠书房）。

然而，即使实际上形成了全球化资本主义，而“看不见的手”却没有发挥作用。出现的不是“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主义”适度拼合而成的“新古典综合派”，而是一小撮“超富阶层”与绝大多数“劳动贫困层”的两极分化结构。社会差距之大，以至于你会认为，一旦沦为劳动贫困者，再想从那里爬上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译者注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社会呢？这是因为，从前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虽然同样冠名为“资本主义”，但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本质性区别，而我们忽视了这一点。

战后的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的确也会给穷人进行所得分配，因此生活也会变得好起来。

虽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剥削”，但在区域性资本主义下，资本家不能够单方面地压榨、剥削劳动者。原因在于，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正是那些劳动者，而非别人。如果一味地压榨，使劳动者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市场将不能扩大，企业将会自己勒自己的脖子。

我前面已经讲过，在“二战”后美国的经济界，劳资关系协调路线占据了优势。满足劳动者提高工资的要求，乍看上去是经营者受损失，但提高工资，也就意味着消费者的腰包鼓起来，因此，最终企业自身也会受益。正因为这样，劳资协调才被认为是对经营者也有益的选择。

“生产与消费分离”造成的差距

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是资本主义保障了自由社会体制。但是，这种自由的效果，应产生在区域性资本主义当中，而在全球化资本跋扈的全球化市场中是不通用的。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劳动者与消费者没有必要一定是同一个人。

购买中国和东欧这些劳动力廉价地区生产的商品的人，并不只是当地的劳动者，还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富裕的消费者。正因为“生产和消费分离”成为可能，才形成了沃尔玛、百元店这种即使价格低廉也能获得巨大利益的商业模式。而这样获取的收益，会回馈给中国等国家的劳动者吗？那就不一定了。

由于多数购买者都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因此，不会出现把收益再分配给中国等国的劳动者以提高他们购买力的事情。

相反，因为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会直接表现在成本上，这对企业来说，只会失去竞争力，因此，会出现尽可能控制劳动力价格的倾向。

但是，尽管这么讲，从中国等地的现状来看，随着发达国家资本的积极投入，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发展起来。由于物价上涨，来自劳动者方面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也在增大。劳动者叫苦：拿从前那么少的工资，他们不想干，也没法生活。这种情况增多是自然的。

但企业会答应劳动者提高工资的要求吗？未必。因为，如果中国沿海地区的景气变好，劳动力价格上升，还可以从内陆地区招募廉价劳动力。当内陆地区来的劳动者的薪酬也开始上涨的时候，它们可以断然抛弃中国，把生产地点转移到能够更廉价召集劳动力的地方——如越南等。这种事情，并不只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做。新兴的中国企业当中，也相继出现不把生产地放在本国，而移到越南等地的情况。

生活不稳定劳动者的登场

这样，即使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工资，也上涨得不多，两极分化结构也很难得到及时纠正。而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来说，全球化资本主义也没有成为“福音”。岂止不是福音，对于非熟练劳动者来说，简直是巨大的打击。

在发达国家，消费者与投资家享受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好处，而劳动者和市民却受到了损害。罗伯特·赖希在《超级资本主义》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描写。

我们是消费者，同时也是投资家，是劳动者，也是市民。同一

个人同时在追求四种不同的价值。如前面讲到的那样，全球化资本主义带来了过度激烈的竞争，而企业疯狂竞争的结果是，当我们作为消费者与投资家时或许得到了充分的回报，而身为劳动者和市民时却遭到了悲惨的对待。

东方世界加入竞争的结果是，追求廉价劳动成本的全球化资本，将生产基地大量地转移到了东方。结果，美国和日本不断出现产业“空心化”^①，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不得不削减。这是因为对发达国家劳动者的需求减少了，东方国家的劳动者也可以做同样的工作。在日本，企业削减劳动成本高的正式员工，大量增加了钟点工和派遣工等成本低的雇佣者。不能成为正式员工的人们当中，出现了辗转于网吧之间的“网吧难民”。在日本的劳动者中，3个人中就有1人是非正式员工（见图3）。虽然通过这些雇佣改革，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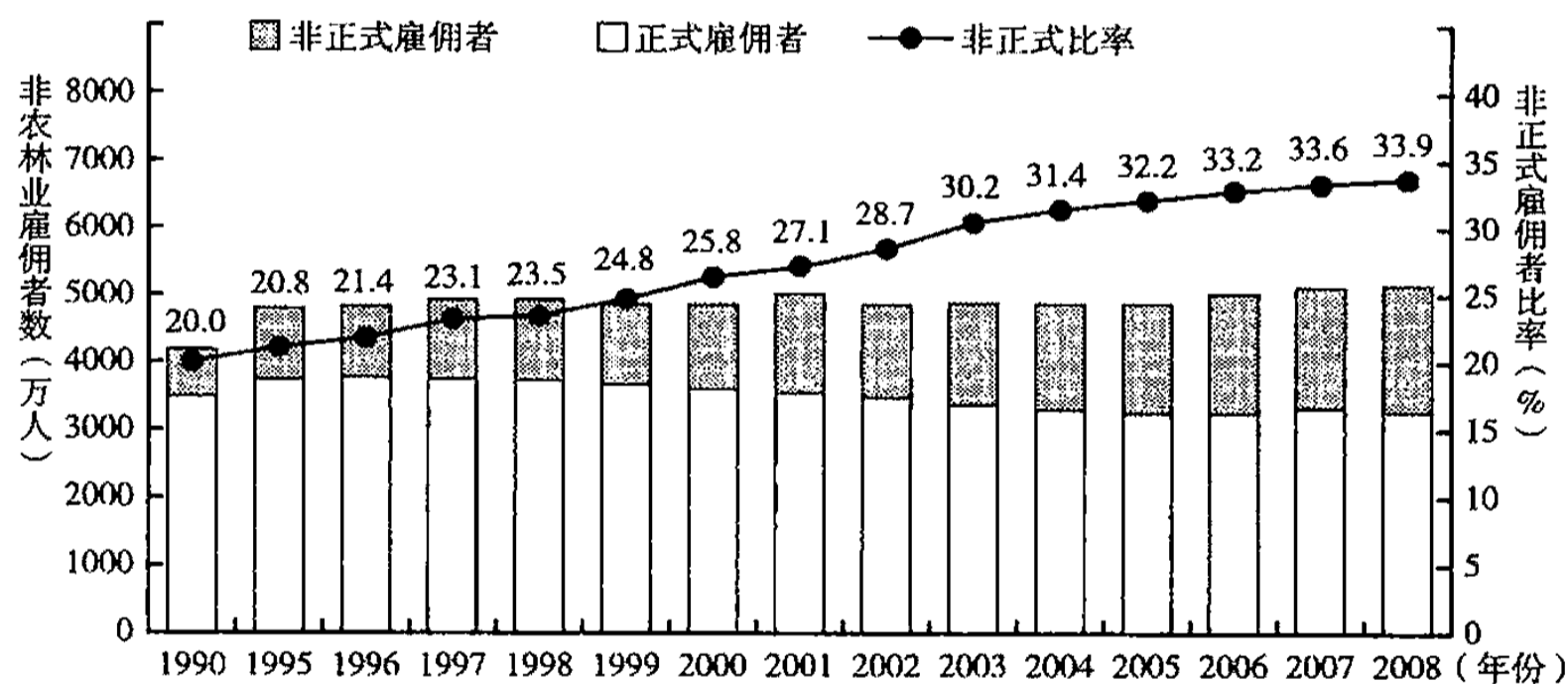


图3 日本正式雇佣劳动者和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分布情况
(3人中就有1人是非正式员工)

注：不包含农林业。2001年以前为2月份的调查，之后为1~3月的平均值。非正式雇佣者包括钟点工、临时工，还有派遣职员、合同工、特聘员工等。正式雇佣中，不包含董事。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劳动力调查。

① 产业空心化：指发达国家和地区，将以制造业为主的物质生产和资本转移到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使得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现象。——译者注

业的劳动成本降低了，但劳动者却因劳动条件恶化而陷入痛苦的状态。又由于企业内部的劳动者之间有了隔阂，使得日本企业的传统发生了质变，原先企业大家庭的温暖气氛逐渐变得凄凉。从整体来看，可以说全球化资本主义给了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过分残酷的报应。

不仅在美国、日本这样，在欧洲也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意大利，甚至出现了 precariato 这个用语。这是由“不稳定”和“无产者”两个词组成的合成词，意思是“被置于不稳定状态的无产阶级”。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廉价的商品像洪水般涌入发达国家，但这股潮流同时也制造出了大量的贫困阶层，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前面的内容。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背景下，资本总是试图寻找廉价劳动力并因之而移动。所以，无论怎样搞活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进行曾经那样的利益再分配。“规模经济”或许可以使企业的 CEO 和大股东那样的富有者获得利益，但劳动者全然沾不到光。借用德川家康的说法，使劳动者停留在“不使之生，不使之死”的状态，这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理论。

顺便说一句，作为“市民”的我们也受到了损害。在全球化中获得利益的全球化资本，对于政治也拥有了超过从前的发言权，开始高声要求“小政府”、缓和规制、给企业减税等。追求“小政府”的结果是：责任自负成为口号，而社会福利则不得不退后；出现了无法接受急救医疗的“难民”，医疗服务质量下降，还坦然地实行了对高龄者极其不利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环境破坏和食品污染范围的扩大等，也可以说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广义上的成本。另外，由于收入差距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造成了人心荒芜并导致恶性犯罪显著增加。

这样，全球化资本主义给消费者和投资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恩惠的同时，也给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和市民带来了巨大损害。

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是什么？

资本主义的力量源泉，原本来自于“高低差”（或者可说是“差异化”）。试想一下，如果想要让水力发电机的涡轮强有力地转动，须得尽量让水从高处往下流。因为高低落差越大，发电的能量就越大。在贸易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中世纪时，东西方国家间的贸易之所以兴隆，就是因为西方没有东方的胡椒等香料之类的东西。

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资本主义的“落差”自然不是指物理上的高度差距。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差”是产生收益的重要因素。当然，有标价的并不只是商品，劳动也有价格，称之为“工资”。对于创造高价值的劳动者，定的价格高；而被认为创造不出太大价值的劳动者，工资则较低。

进一步讲，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金钱也有价格，称之为“利息”。在经济向上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钱具有的价格会相应增大，利率也增高，因此，资本就流向利息高的国家。而在景气不好的国家和地区，利息基本上都偏低，相应的利润也会减少。一旦利息有这种高低差异存在，全球化资本就会从利率低的国家筹集资金，到利率高、景气好的国家去投资。

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除了部分公共财产（如水和空气），所有一切都有标价。全球化资本就在比较了众多的标价后，再决定流向哪里更有利。但是，过去由于政治或技术上的限制，资本、物品或者人不能够自由地跨越国境移动。而且20世纪后半期，由于东西方冷战，资本主义能够活动的区域被限制在了西方世界。

然而，以东西方冷战结束为契机，东方世界也开始进入全球化的市场中来了。从那时开始的IT革命，使得连接世界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如鲜花绽放。结果，市场全球化成为现实，人、钱、物的“价格差”一下子扩大了。这样，资本的收益也提高了。原因正如刚

才讲过的：一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家能够雇用廉价劳动力，创造巨大的收益；二是他们能够把在低利率国家筹措到的资金投入到高利率国家中去。

这样，资本主义这个涡轮通过全球化，开始以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高速全力运转。可以说由于全球化使国境这个“障碍”消失，于是，资本主义就成为无法驾驭的“怪兽”。

当资本主义被关押在狭隘的国境中时，它还不能彻底利用价格差。如前文我已经讲过的，以工资为例，在区域性资本主义当中，如果资本家彻底地压榨劳动者，会招致劳资双方两败俱伤。因为在有限的区域性市场中，生产与消费是一致的。所以，要想扩大消费，不能不提高工资，否则企业的收益也不会增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机制是压榨和剥削劳动者”，但针对全球化经济之前的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对于区域性资本主义来说，过度的压榨和剥削反倒会产生副作用，进行适当的再分配，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了其形态。全球化资本主义总是寻找、制造价格差，并维持之。这样，全球化资本主义就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差距，制造出贫困阶层。

“完全信息”这个假定

正如我讲过的那样，亚当·斯密以来的近代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遵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很好地进行资源再分配，就不会再有失业。以减少市场限制、实行“小政府”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也在其延长线上。

可以说，现代经济学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由许多经济学家谨密地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斯蒂格利茨主张“现代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中‘看不见的手’没有运作，是因为有阻碍市场原理运作

的因素”，这也正表明他从内心相信“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没有错”。

但经济学理论体系果真是正确无疑的吗？前面讲到，我在哈佛大学学经济时，就对它的理论之系统和复杂表示惊叹。但是，随着对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观察，我开始认为：“对这个理论囫圇吞枣是危险的。”更准确地讲，我开始认为有必要对近代经济理论的“前提条件”进行一番怀疑。因为无论逻辑如何正确，如果其前提有勉强之处的话，那么从那里导出的结论也就没有用处了。

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是“完全竞争”。所谓“完全竞争”，指的是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状态：①复数的经济主体；②同质的产品；③完全的信息；④企业自由地参与和退出。

“复数的经济主体”是指“市场上有充足的卖方和买方”；“同质的产品”是指以同样的价格买卖同等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即意味着“一物一价的法则”成立；“完全的信息”是指市场的参与者共同拥有同等的信息；最后一点“企业自由地参与和退出”是指对新参与者没有限制，有随时退出竞争的自由。

当然，这四个条件不过是“理想的形式”，现实中几乎不能满足。这一点经济学是承认的，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认为，越是接近理想状态，市场机制也越会适当地运作。

依据这种论点，主张“由于全球化市场的形成、IT 革命的发展，这四个条件事实上已经成立”的，不是别人，正是新自由主义。

在这里没有篇幅详细介绍新自由主义理论，仅以“完全的信息”为例，检验一下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和 IT 革命的发展，是否使“完全的信息”这个前提得到了满足。

我先讲结论，答案很明确，是“否”。

外行人不可能靠股票赚钱

的确，随着网络的普及，任何人都可以实时得知世界上的信息，

这对市场经济来说是好事。

在网络时代之前的世界，像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最新的股票价格这样的信息，最先接触到的是路透社等通讯社的人，他们有直接信息发送约定，而普通股民则只能在那之后得知。但是，IT革命消除了这些“信息差距”。只要使用互联网，世界资本市场的信息可以即时并且用几近免费的成本获得。

然而，无论信息的获取如何接近平等，但那些信息不过属于言语化的或是可以反映在电脑上（数字化）的“显性知识”。而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也就是那些必须从其他渠道获得的“隐性知识”，则不能公开在网络上。

用另外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在网络上可以搞到手的信息是全世界共享的，因此它的信息价值无限接近于零。相反，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绝对不会在网络上讲，也不可能搞到手。而能否获取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才是获得利益的关键。

我们再来想想下面的例子。

对于一部分人和企业来说，所谓信息并不是单纯用来接收的。对他们来说，信息也是可以“创造的”。有能力创造信息的人们，可以通过那些信息轻而易举地影响市场。但大多数参与市场的人，则没有那样的能力。所以很自然，能创造对自己有利信息的人，将会有更多的获利机会。从这层意义上讲，信息绝不可能具有完全性。

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的投资证券公司雷曼兄弟、高盛集团的商人和经营者们，他们获得的高薪几乎超出了我们用一般常识所能理解的范围。据高盛集团的年度报告统计，2007年，全世界在高盛集团工作的从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竟然达到7000万日元！无论高盛集团网罗了如何一流的人才，这么高的年薪，还是太多了吧？我想，和我有同感的人，不会只是我自己吧？恐怕，能够支付如此高薪的背景之一，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创造信息”的能力。

我们屡屡可以发现，正是由于权威的投资银行向市场传送出了这样的信息：“某某公司股票合适的价位是某某”，于是那家公司就

朝着那个方向修正股价。我见过很多愤怒的经营者，他们的股票受传出的负面信息影响而价格大跌。而且越是权威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提供的信息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样，我们透过日常屡屡看到的现实也能够发现，“信息的完全性”这个假定没有被满足。

我的朋友 A 先生的儿子，在著名的外资投资银行工作。据说有一次，A 先生的儿子对 A 先生说：“爸爸，外行人想要靠股票赚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像喝汤时我们这些内行人先喝了精华，然后剩下的再由普通投资者来分一样。”这难道不是信息“不对称”的有力旁证吗（当然，那些投资银行，现在也被市场摆弄着。因此可以说，即使对专家来讲，全球化市场也变得十分难以掌控）。

信息的完全性——不可能！

但我要申明，我并不是在批评专家们搞了内幕交易之类的非法行为。我想说的是，事实上，即使遵从市场规则，像他们那样的“大玩家”，也总比其他玩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完全竞争模式下，假定进入市场的玩家都平等。在那里，卖方和买方都是对等的，新手、老手都可以用同样的条件进行买卖。但那样的情况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因为，正如前面我指出的那样，对一部分人来说，信息并不只是用来接收的，还是可以创造的。

像曾经作为投资基金的风云人物而名噪天下的乔治·索罗斯那样的名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市场参与者关注的焦点。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索罗斯做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他会投资到哪个国家，使用哪个国家的汇率来制定卖出战略？这种时候，还能说索罗斯与其他玩家是对等的、平等的吗？当然回答是“不”。只要索罗斯自己愿意，他就可以向市场吹进他喜欢的风，因为他是能够创造信息、有特权的玩家。

像乔治·索罗斯那样可以用个人行为操纵市场的例子的确少见。一个人如果过于受关注，同时也很可能会被世人“敲打”。在日本，

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活力门”中堀江贵文那样的“明星”，都被请入了高墙之内。

然而同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大张旗鼓地进行，而是由更多的人更高雅地进行，又会怎么样呢？比如，在仅仅是富豪们聚集的社交场所——可以是大学的同窗会或高尔夫俱乐部，也可以是共济会那样的秘密集会或国际会议后的宴会，一个有影响的人说起新兴国家A国经济的话题道：“现在，我很关注那个国家。我建议大家都密切关注它的股市。”听到这话，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回答道：“实际上我对A国经济的潜力也很感兴趣。”听了这些话，其他富豪们就会在心里想：“他们都说到这个程度了，我也考虑考虑把我的资产分一部分投资到A国市场吧。”

那么，即使由于宴会的参加者全部都投资到A国而使这个国家的股市高涨，那也不触犯内部交易的规定。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过是单纯的闲聊，并没有进行共谋，完全合法。但能够加入这种“内部信息交换”的人，只是一部分特权人物和企业，其他的玩家则只有被那个结果耍弄。在现实的市场中，“信息的完全性”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

新自由主义主张：“在自由竞争下，人、钱、物的适当分配将自动进行”，要减少规制，让市场原理运作。但公平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不会因此得以保障。为了实现“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就必须通过民主化的政治机制，构建适当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新自由主义又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这些想法的具体表现就是“小政府”、“责任自负”、“减税政策”等主张。

经济学的基本主张认为：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利用市场原理，资源和资本就能得到最佳分配，但分配政策不是市场的工

作。再详细一些讲，经济学采取的立场是：首先贯彻自由竞争，然后考虑再分配政策。支持这种主张的根据是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

顺便提一句，所谓福利经济学是分析“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经济学，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简单地讲就是：“只要遵从市场原理，资源就能无浪费地、有效地进行配置。”

像苏联和现在的朝鲜，由国家统筹、控制资源配置，就一定会出现生产过剩（不良囤积）和商品不足（供求不一致）。在苏联时期类似的传闻很多，如辛苦收获的卷心菜装在运送的货车上烂掉了，却没有让人吃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浪费，是没有利用市场原理的缘故。如果进行自由的经济活动，形成合适的价格，卷心菜就不会卖不掉。也就是说，福利经济学教授的第一定理是，有效地利用资源。

资源在所有市场上的分配达到供需一致，这在经济学上被称做“一般均衡”，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有效的资源分配（想更详细地了解相关内容的读者，请参阅标准微观经济学讲义）。

经济学假定的“社会公正”之欺骗性

如果这样进行完全竞争——前面已经讲过，这种假定本身就很奇怪，但我们暂且往下讲——资源的配置或许不会出现浪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福利水平达到了最高程度。也有可能正因为只是有钱人买到了卷心菜，而使贫困阶层买不到卷心菜。

于是产生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理。

第二定理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如果通过税收、补助金、社会保障金等进行人们认可的收入再分配，从社会整体来看，就可以实现人们福利水平的最大化。”

更具体地讲，“政府没有必要为了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卷心菜而

介入市场，特意调整价格和出货。只要制定好所得税等向有钱人征税的制度，然后把征税获得的钱再分配给穷人，穷人也就能够买得起卷心菜了。只要做好了这一条，剩下的就听任市场，自然会顺利进行的。”也就是说，“政府不插手市场机制，尽可能地自由竞争，而收入再分配则可以由政府另行考虑。”

听了这些话，读者会怎么想呢？

福利经济学认为，“要使人们幸福，政府没有必要参与下游——市场。只要认真地做好上游——收入再分配就足够了”。也就是“推行小政府”。但这里存在着“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的欺瞒”，或者说一切都是“虚假”的。

因为，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成立的默认前提是，“政府推行人们认可的政治”这个假定。

提倡新自由主义的人们，比如福山，其理论中也大量谈到“只要有自由民主与自由资本主义，就足够了”，实际上这正是因为他的观念中，首先有福利经济学的这种理论。

他们的意思是，“仅仅依靠市场，或许的确只会让有钱人得益，但我们有令人自豪的民主制度，通过选举，社会公正就可以得以保证，只要实行人人都能信服的收入分配就可以了，所以，社会上的弱者和贫困阶层不需要有任何担心。”

但所谓人人都信服的政治果真存在吗？——回答是“这么提问本身就是愚蠢的”。

实际上，看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就可以明白，操纵着政治家们的，或者是运用巨额资金向华盛顿输送说客的大企业，或者是提供大笔捐款的部分权力阶级。在这种状态下，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或福利经济学主张的定理，事实上不可能成立。

岂止如此，说到收入再分配，以近30年为例，无论美国还是日本，由于对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实行了大幅度减免，因此收入分配不公正现象愈加严重。也可以说，差距由于新自由主义而进一步扩大，这正是其理论所致。

另外，当今世界上还不存在“世界政府”，这也是个问题。

即使世界变得比现在更加不平等、国家间的差距比现在更加明显，也不存在一个执行主体，来进行以国家为单位的收入再分配。如果粮食价格暴涨，那么最贫穷的国家会因为缺乏资金购买粮食而出现大量的饥饿者。现在仅有的不过是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来支援发展中国家，但在纠正国际上的不平等这层意义上，其作用是很有有限的。

即便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那么平等，但与国际的不平等相比较，多数情况是，其程度要远远轻得多。全球化资本主义无疑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恩惠，但国际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因此消除。

全球化资本主义破坏地球环境

上文，我们讨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使世界经济泡沫化、使世界不稳定的机能；而全球化资本主义带来的另一个深刻问题就是，地球环境遭到破坏。

当资本主义还被封锁在一定的地域内时，如果企业活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就会招致周边住民即消费者的反对，对企业的评价会变坏，这反倒会导致企业收益减少。

因此，对企业来说，为了防止公害和保护环境而支付成本是合理的选择，而且这更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另外，对地域性的环境污染进行相应的限制，或检测限制的效果，都比较容易实行。

然而，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状态下，没有必要再进行那种“自制”了。因为，无论如何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也不一定直接对企业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的环境破坏十分严重，这一点近年来广为人知。进行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或许是中国本地的企业，但那些环境问题，无疑也是由于欧美和日本对中国的投资而造成的。同时，也正因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还在购买通过污染环境而生产的商品，因此，向中国等

新兴国家的投资才不会停止。

追求利益是全球化资本的最大使命，因此，它们会尽可能地不支付环境成本。无须多言，地球环境的破坏是由于没有经济主体来负担适当的环境成本而产生的。为了抑制地球环境的破坏，必须将环境破坏控制在地球的自净能力范围内。因为，超出范围的环境破坏，会使地球环境越发恶化。

怎样才能把环境破坏控制在地球的自净能力范围内呢？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对环境污染附加适当的价格。或者，直接制定限制措施，制止破坏环境。

在欧洲等地，热心于环境问题的国家在不断地加强环境限制，但从全球化资本的角度看，如果实行那些限制，就会对收益造成影响，因此，如果存在条件相同而环境限制宽松的地方，企业将会投资到那些地方去。所以，现在的框架下，即使某个国家强化了环境限制，也不可能期待全球范围内有可见的成果。

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听之任之，将会给地球环境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为了保护地球环境，需要考虑给全球化资本的活动罩上一张适当的网，对其加以约束。这个视角很重要。

作为统治工具的新自由主义

可以说，近代经济学理论，首先在假定完全竞争这一点上就比较勉强（信息没有平等地分配）；在收入再分配这点上，过高地评价了通过民主进行再分配的机制；而在对地球环境破坏这样的“外部性”的制约提供有效手段这点上也是失败的。

但如果明白这些窍门，也就可以事先预测谁胜谁负。可以说，占据信息优势的市场玩家，赢了该赢的而已。

人们憧憬着跻身于这样一小撮成功者，想着“自己也能靠股票赚一把”，但他们的结果如何呢？恐怕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亏损了。

即使有人多少赚到了一些钱，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把得到的资产失掉了吧。与这些人相比，高盛集团和雷曼兄弟的 CEO 或许的确失业了，但他们在此之前获得了巨额的工资，所以生活并不困难。

这样，在所谓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中，蕴涵着占据信息优势的精英以及通过内幕交易对政治发挥影响的部分势力能够胜出的“差距扩大机制”。虽然这不过是我的推测，但我认为，恐怕挥舞新自由主义旗帜的美国权力集团，当初就知道，全球化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带来平等；他们也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的言论越是普及，对他们自己也越有利。

我打算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讨论下面这个说法。简单地说，也就是为了在雁过拔毛般的投资世界中保持常胜，投资者必须成为经济学设想的经济人，为了目的而合理地行动。甚至可以说，要将自我利益最大化，即使为此会给他人带来不幸，也不能感觉负有任何道德上的责任，这种“合理精神”才是对自由竞争胜利者素质的要求。

大家或许都会赞同这样的说法：作为共同体历史很短因而个人主义风气浓厚的美国，与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欧洲、日本相比，更适合激烈的自由竞争。

以自由竞争为正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正是美国，以及——从同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这点讲——与美国具有文化、社会亲近感的英国，这绝不是偶然的。

新自由主义如此的有势力，竟实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虽然我不赞同所谓的“阴谋史观”，但我认为，正因为有些势力会因政府干涉减少、对市场实行缓和的限制措施而得利，“自由竞争的神话”才如此这般地普及。对于生活在金融和投资世界中的人们，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确是值得欢迎。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这样说也不过分：所谓美国经济学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不过是精英们的“统治工具”。

当然，市场机制与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指出过了。

温斯顿·丘吉尔讲过的这句话实在有名：“任何人都不能把民主伪装成完美、智慧的。实际上，民主可以说是最坏的政治形式，但除了以前尝试过的其他政治形式。”

关于市场机制也可以适用同样的说法：“任何人都不能把市场机制伪装成完美、智慧的。实际上，市场机制可以说是最坏的经济制度，但除了以前尝试过的其他经济制度。”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民主也好，市场机制也好，它们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我们被赋予的任务是，尽管民主、市场机制（或说全球化资本主义）都极其不完美，但既然人类没有更好的东西，就必须努力寻找方法，让它们能顺利地运作。

东京大学教授岩井克人讲道：“用亚当和夏娃来做一个比喻，那就是，在资本主义中，人们尝到了自由这个禁果的甘甜。而在那种甘甜中，当然包含着不稳定因素这种‘原罪’。但自由不应该被舍弃，也无法舍弃。”（《朝日新闻》2008年10月17日）

作为不愿舍弃自由的我们，必须学会驾驭自由的办法。如果不能适当地驾驭自由，最终就会陷入失去更多自由的境地。

第三章

作为“撒旦的磨坊”的市场社会

资本主义果真使人幸福吗？

我在上一章阐述道：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之所以受到拥戴，与其说是由于其理论的正确性，毋宁说是由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对精英阶层、富裕阶层有利的理论。

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是人类构思出来的美好制度，我们也不能一味自由地放任它，因为它会发挥意想不到的“破坏性”。因此，我们必须掌握巧妙地驾驭它。

“预定协调说”认为，即使每个人都无止境地扩大自己的欲望，市场也会进行适当的调节。然而，这种观点已经行不通。这次金融危机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关于民主和市场机制——现在几乎被地球上所有国家或多或少接受了的政治、经济体制（全球化资本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假使通过前面的论述已经清楚了，那么下面我想从相反的角度讨论一下。

也就是说，我想再讨论一下那些没有被卷入民主和市场机制，没有接受全球化资本主义恩惠，也没有受到它伤害的那些国家所处的状态。

在现在的地球上，要想寻找没有被纳入西方式民主和市场机制

的国家，相当不容易。朝鲜应该可以成为其中的代表，但这个国家存在强烈的意识形态、极度威权的体制等很多过于特殊的因素，因此难以用作讨论的对象。除此之外，还有能够成为我们研究参考对象的国家吗？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不丹和古巴这两个国家。

为什么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感？

资本主义果真是优秀的经济体制吗？人们通过资本主义真的能变得幸福吗？

实际上，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缘于我亲自访问了不丹和古巴这两个“拒绝接受民主和市场机制的国家”。实行立宪君主制的佛教国家不丹和实行独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古巴，尽管社会体制有所区别，但都主动拒绝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体系，走了一条难能可贵的独立自主的道路。

因为没有进入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两个国家很自然地绝对称不上富裕。而且，从日本人的感觉来讲，岂止是不富裕，简直就是贫穷、可怜的国家。

实际上，不丹的人均 GDP 约为 1000 美元，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位居第 123 位（2005 年）。而古巴虽然没有发表正式数据，但据说推算为几百美元到 2000 美元之间。总之，与日本（35000 美元）和美国（42000 美元）简直无法相比，无疑是两个穷国（2005 年）。

然而，访问这两个国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人们的表情十分“开朗”。这不是出于“富国人的怀旧”情绪而产生的想当然的推断，而是通过在这两个国家进行实地采访得出的结论。这两个国家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很满足现在自己的生活。”

不丹和古巴的物资绝不丰富，基础设施贫乏得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但看得出来，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持肯定态度。他们以宽松的心情度过每一天。总之，让我最吃惊的是人心没有

荒芜。

江户时代末期，许多来到日本的欧美人，观察日本百姓的生活状态、待人接物的态度、人们的表情等，按捺不住地惊讶道：日本的百姓生活得多么安稳啊！好奇心多么旺盛啊！对人多么亲切呀！（渡边京二：《逝去时代的风貌》，平凡社）。

当然，那些传统，现在仍然在日本有所保留。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正逐渐受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每当我看到与秋叶原发生的滥杀无辜事件、由于个人原因导致亲子之间相互杀害等类似的报道时，就不得不想到：从前日本社会的优良风气也正在渐渐地遭到破坏。

从开始充满暴戾之气的日本出发，旅行访问了不丹、古巴（2006年不丹，2005年古巴）这两个国家，我似乎也感受到了类似于幕府末期欧美人对当时日本百姓产生的那种惊讶。那里有开朗的百姓，完全没有骗人图谋的社会氛围以及由此体现出的社会安定感；最重要的是国民虽然贫穷，精神却并未受侵蚀，这充分表现出社会的健全。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贫困但人心没有荒芜的社会

我在国外旅行，有过多多次遇到小偷的经历。

大约四年前，在法国里昂车站。我上了火车，就在把箱子往行李架上放的时候，不足30秒钟，放在脚下的手提包就不见了。看看周围，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护照、放着现金和信用卡的钱包、机票、手机等所有东西在一瞬间就消失了。很惨的一次经历。

粗心大意地随便放行李，一眼照看不到，立刻就会被偷——这是世界上的“行情”。从这样的现实来看，不丹和古巴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般的“让人有安心感和安全感的社会”。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纽约贫民街的贫困地区。住在那里的被压榨阶级的精神状态，大体上是相当悲

惨的，让人感觉他们“人心已死”。处于那种状态下的人们走上违法犯罪之路，与其说是咎由自取，不如说是被逼迫。我想这恐怕要从社会经济体制中去找原因。

不丹和古巴同样很贫穷，但不可思议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遇见上面所说的那种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用开朗、亲切的表情向你问候。另外，我也没有遇见乞讨者。这不只是由于国家的限制，还因为社会风气认定做那种事很难为情。我虽然没有彻底弄清楚没有乞丐的原因，但必须说，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没有遇见这样的人是相当稀奇的。

当然，这些国家肯定存在旅行者眼睛看不到的各种问题。

比如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没有什么竞争。结果，资源分配没有效率，物资不足很明显。公民靠国家配给的粮食生活，从精英到农民工资都相同，每月最多只有十几美元的现金收入。

印象很深的是，一个曾经是哈瓦那大学教授的人在日本大使馆做西班牙语、英语的翻译。我明知很失礼，但还是问了他：“您为什么竟然放弃哈瓦那大学教授的要职，来大使馆做翻译呢？”他回答：“做哈瓦那大学教授，月工资是10美元，没法生活。在大使馆做翻译工作，一个月可以拿200美元。”

尽管粮食、医疗、教育全部免费，但用10美元生活好像还是很艰难，这也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各种“副业”很发达的现实。

我和一起访问古巴的伙伴租了辆车到郊外去，走了100公里的路，被警察叫停盘查了3次。我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停下车，结果一问说是超速了。因为事先听说过，要想迅速摆脱盘问，可以使用10美元的贿赂。因此，我们悄悄地把10美元递给走近来的交通警察，于是他也没有责难我们就放行了。这样的事情，按理说是不可以的，但我们急着赶路，不得已而为之了。听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讲，只要看车牌就能知道是租来的车，所以这样的车很容易被瞄上。好像没有当地人开的车被叫停的情况。

还有一件事。据说在古巴，来钱比较容易的是某些饭店的女佣。

因为这些饭店有国际旅行团入住，旅客在枕头边给清扫房间的工人放小费，所以据说一天可以挣 10 美元左右。在月工资 10 美元的国家，一天能挣 10 美元的人，应该是有钱人了。

这样，仔细看，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因为不存在市场机制——所以各种不正之风到处发生，致使国家的生产力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事实上，从 GDP 来看，古巴是贫困国。

但是，另一面，那里的社会着实让人感觉温暖。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我不认为日本也应该搞社会主义，但那些国家给人的印象是：这里是幸福的社会。它们明显不同于充满暴戾之气的日本和美国，不会仅仅因为“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谁也不理睬我”这样的理由就发生杀人事件。

古巴医疗的成功

当然，只讲述我的主观印象，是不能说服读者的。所以，我想用具体数据来简单说明这两个国家的“幸福程度”。

先从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开始讲吧。

已经无须我介绍的是，古巴从建国之初就开始受到美国的经济封锁，能够创汇的产业只有以甘蔗为中心的农业以及烟草业，最多再加上观光业。冷战时期，苏联曾经援助过古巴，但 1991 年苏联解体以后，援助也中断了。如果只看这些历史，或许人们会认为：即使古巴走上一条与朝鲜相同的路，也并非不可思议。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古巴的经济绝不富裕，但国民的平均寿命之高和婴儿死亡率之低，丝毫不逊色于欧美发达国家，古巴国民整体的健康水平很高。

说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的是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医疗水平。但实际看一看我们就会知道：婴儿死亡率

在近年的美国是 7‰，而在古巴是 5.3‰。可见对婴儿而言，与美国相比，古巴更加安全。再有，古巴人的平均寿命是 77.5 岁，这是与美国和加拿大相匹敌的数值。在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医疗费当然全额免收，并且从幼儿园到大学实行免费教育。

这样看来，至少就医疗和教育而言，我们不得不深思：美国与古巴，哪个国家更适于居住？

自然，在美国，“只要掏钱”就能得到在古巴享受不到的超高水平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但是，那毕竟属于富裕阶层的事，与穷人无缘。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接受医疗服务的质量，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收入状况。高等教育也一样。因为美国以私立学校为主，所以学费原本就很高。而近年来，由于导入市场机制的缘故，学费更加高涨，现在，已经达到一年数万美元，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然，在古巴，医疗费、教育费虽然全免，但那些经费是由全体国民来负担的。但是，如果问：“大家都穷”的古巴人就一定比生活在日本和美国的我们不幸吗？那也不能断言说“是”。而这个回答正说明，现在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们生活在竞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淡漠；相比之下，古巴以及我后面将要讲到的不丹，无疑还存在着“人与社会的一体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人是社会性动物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性动物”。人原本比其他动物更脆弱，因此不结成社会就无法在大自然中生存下去。正因为人类结成群体，所以发展了文明，成了所谓的“万物之灵”。

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是一种本能，几乎没有人能够断绝与他人的联系而在孤独中度过一生。人生来就必须在社会中才能感到安心，

才能得到心灵的安宁。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人类难道没有轻视“我们是社会性动物”这个事实吗？

或许人们认为，只要拥有财富和技术即可，与他人的联系已经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应有的东西都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结算；通过电子邮件，就可以非常简单地和远方的人们进行交流。于是，珍惜与他人直接的接触和联系，就被认为是很没有效率、很值得感叹的事情——现在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不正蔓延着这样一种“理性万能主义”的思潮与倾向吗？至少，由于全球化资本主义，我们的社会无疑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社会整体的团结一致精神消失了。

市场机制讲究效率，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假定每个人都是以独立的原子形式存在。而这些独立的人（经济人）不会由于社会的陋习和政官商的勾结而随波逐流。他或她是能够自主地作出决定的理性主体。

但是，现实中人会做一些被认为不合理的事情。

比如，人有时候会发挥“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保护家人、保护同胞而抛弃生命的人，自古以来就不罕见。即使达不到这种程度，对穷人、不幸的人产生同情心而发起行动的人也不少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只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的动物，这个道理无须我再重复。

但是，在主张“全部责任自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看来，对处于贫穷不幸境遇中的人是不需要同情的，相反，那是有害的。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他们贫穷，原本就是因为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够造成的，伸手援助这种人，反倒只会娇惯他们，别无利处。另外，建立优厚的福利制度和安全网，会成为对不努力人的鼓励，降低社会整体的效率。

的确，因为强烈主张“责任自负”，新自由主义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经济上的成功。因为“英国病”而显著停滞的英国经济，由于撒

切尔夫人的改革而实现了长期的景气恢复；由于实行里根政策，美国的金融和 IT 产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

但是，前面我已经反复指出过多次，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从人们身边剥夺了与社会的一体感。“只要自己好就好”，这种个人主义思想蔓延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整个社会呈现出十分疲惫的状态。

家庭医生制度构建的“社会纽带”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古巴。虽然古巴社会很穷，但国民有一种一体感。我认为，古巴人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其背后的原因，与他们通过医疗制度维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有关。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在袭击古巴的经济危机、粮食危机中，摆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面前的课题是，如何依靠极少的国家预算来维持国民福利。

同一时期，在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正在为实现新自由主义提倡的“小政府”路线而削减社会福利，朝着将市场机制引入医疗和护理领域的方向发展。但古巴硬是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当然，对于古巴来说，医疗费力的削减也是重要课题，但它没有通过市场化来解决，而是试图彻底执行初级卫生保健制度来抑制医疗费。

具体地说，就是大约每 100 户配置一个家庭医生，进行日常的健康管理和生活指导，小病就由家庭医生解决；家庭医生解决不了的伤病，则委托地区诊疗所；诊疗所也处理不了，再去更大的医院。古巴就建立了这样的医疗体制。

当然，为了让这项制度发挥作用，需要培养大量的医生和护士，另外还必须控制医疗人员的劳务费。在这一点上，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医生也好，事务工作者或者工厂工人也好，工资基本上都相同，所以执行起来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容易得多，这也是事实。

以医疗立国为目标的古巴

在中南美各国中，古巴已成为具有突出医疗水平的国家。古巴也接收周边国家的疑难病患者，作为补偿，它会从委内瑞拉等产油国接受经济援助，这样古巴成功地与邻国建立了互惠关系。

古巴之所以如此强调“医疗立国”，不单是因为它没有强有力的地方工业，还在于它从根本上希望通过建立草根水平的医疗体制，使古巴社会从整体上更加团结一致，进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即使生病，或是年纪大了，生活不方便了，也不会被社会遗弃，这一点会给人以巨大的安全感，让人安心，从而增加社会的稳定。

近几年公开上映的迈克尔·摩尔导演的纪录片《医疗内幕》，批评了市场原理施威的美国医疗制度中出现的怪异现象。由于古巴实行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医疗制度，所以影片选择古巴作为采访对象。

美国的人均GDP是古巴的几十倍，却没有全民保险制度，因此许多中产阶层的劳动者得不到满意的治疗。中产劳动者靠自费参加医疗保险，但保险公司要求交纳的保险费实在太高（特别是有过病史的人），因此不能参加保险的人很多。即使有了保险，保险公司也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付保险金。结果，很多情况下，人们得不到充分的医疗服务。

电影中，迈克尔·摩尔导演把那些在美国得不到很好治疗的病人带到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医院去。

当然，免费医疗对于古巴来说，可以当做国策宣传。但尽管这些美国人是外国人，他们也全额免费接受了高水平的治疗。作品中介绍了他们感动的场面。

迈克尔·摩尔导演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到底为什么，漂浮在加勒比海上的是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小国，倒比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美国更能够给人们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

务？——这对于近年来因“需急救的医疗难民”等问题开始受到世人瞩目的日本人来说，迈克尔·摩尔导演的提问，着实分量很重。

不丹的理念——提倡“国民幸福总值”

与古巴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立宪君主制国家——不丹。

众所周知，夹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浪潮中急速发展起来的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小国不丹，维持着一种“锁国状态”。

与古巴相同，不丹也是除了农业以外没有像样的产业。说起资源，也只有未开发的森林资源和从喜马拉雅山脉流淌出来的水资源。因此，不丹完全依靠向邻国印度出售电力来获取外汇。如果换成“通常的国家”，它们肯定会积极招引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图实现经济全球化。

然而，不丹是一个坚决拒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独特国家。

由于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所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另外，这里还有很多藏传佛教的寺院，很久以前的信仰一直流传至今。

有很多人希望访问这样的不丹，参观这样的不丹，但不丹政府硬是限制观光客人的数量。因为，尽管游客多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但过度接受观光客人，将会给不丹的社会价值观造成消极影响，西方铺张浪费的习惯有随之进入的嫌疑。因此，不丹政府对旅行者的入境附加了一定的条件。

比如，如果不预订饭店就想突然进入这个国家，是不会被批准入境的。要想作为观光客进入不丹，大体做法是，通过政府指定的旅行代办机构，让其代为预订饭店，住一晚必须先支付200美元。这个国家似乎觉得背包旅行这样的形式，与不丹的传统文化不相容。

一听说有这样的限制，或许有读者会联想到朝鲜那样的国家。但是，不丹并不是对欧美资本主义抱着敌意或反感的威权国家。

确实，这个国家不久前（2008年）才从君主制改为民主制。只听这一点，人们很容易立即就认为因为不丹有反动的王室，所以发生了民主运动。但事实完全不是那样。相反，开明的王室先说服国民，引进了选举制度，然后过渡到了民主体制，这才是事情的经过。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有国王出面说服，但90%的国民仍反对政治民主化。他们说的原因如下：他们敬慕、敬爱着国王，并为国王而劳动，但是，他们不认为通过选举选出的政治家会比国王实行更好的政治，也不会想要为那样的人而努力，所以希望国王一定维持现在这样的君主制。

据说这是多数国民的声音，因此，实在让我吃惊不已。但前文我也写到过，不丹王室顶住多数国民反对的压力，在国王主导下，过渡到了立宪君主制。

前一章也提到，丘吉尔说：“民主可以说是最坏的政治形式，但除了以前尝试过的其他政治形式。”他的意思是，民主最多也就是次善的政治形式。而不丹的君主制，简直让人觉得它是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政治形式。

那么，为什么身处这个全世界都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不丹人却敢于选择与市场主义和西方民主制度保持一定距离的生存方式呢？

那是因为，1972年，当时的国王就认定，“国民的幸福，绝不是靠经济发展能够测量的”。抱着这样的理念，国王提出：在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目标之上，更应该把提高国民幸福总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作为国家理念。这个方针得到了多数国民的支持。

经济学无法保护自然和社会传统的原因

不丹国王在30年前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这个概念，我着

实被他的远见卓识所震惊。但是相对于可以用数值来测定的 GDP，测量 GNH 的尺度又是什么呢？把人的幸福换算成客观数值是很困难的，而“幸福是什么”这个哲学上从未解决的大问题很早就摆在我们面前了。

那么，不丹人认为的“幸福”是什么呢？按我的想法概括一下，那就是：维护具有佛教精神的传统生活，并与丰富的大自然和谐共存。换句话说就是，不丹人不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中生活，而选择了传统社会，与大自然共同生存。

经济学将市场的经济活动带给社会的影响中无法换算成金钱的部分称为“外部性”。

比如，假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消费生活繁荣起来的结果就是，传统的生活习惯消失了。传统消失这件事，对于这个社会来讲，或许是个损失，但这样的损失，如果无法用金钱来表示的话，就不能成为经济学的对象。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外部性”。

可以说，由于经济学本身的局限性，世界上的传统文化和人际关系正在遭到破坏。

又因为文化没有“价格”，所以，即使市场活动破坏了文化价值，也不能作为经济损失来计算。又因为文化损失的成本无法计算，所以即便传统文化不断地被破坏，在经济学中也不是个问题。

本书反复强调，近代经济学设想的“世界”，是由按照合理性、遵照自由意志行动的“经济人”构成的市场。这个市场只买卖有“价格”的商品。

至于没有价格的东西，比如，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等“外部性”的东西，经济学基本上不计算它们，更不用说人们心灵的荒芜等，就更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自我牺牲的精神”同样如此。经济学涉及这类对象时，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进行解释，“因为通过利他行为，那个人将获得一定的利益”。一切都根据利益、成本进行换算，这是近代经济学的根本所在。

选择与仙鹤共存，而不是生活的富裕

关于这一点，可以做如下的诠释：如果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保存文化传统或保护自然环境，那就必须创造出这些活动能生产“利”的机制。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理论。

但是，不丹提倡的 GNH 思想中没有这样的元素。

文化本身就是重要的，因为它与人们的幸福感直接相连，所以很珍贵。这就是不丹人的想法。他们还认为，与大自然和谐共存，这本身就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如果想要通过破坏自然环境来增加收入的话，必须慎重行事。

也就是说，不丹的国家策略是：由于人们不希望为了经济上的富裕，而破坏不丹的社会传统，所以，不丹人认为应该避免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根据人的喜好（即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去破坏自然。

实际上，不丹的宪法规定，森林面积不得低于国土总面积的六成，禁止威胁环境和野生动物生存的商业活动、工业活动。对作为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建设、供电设施建设等，如果会破坏自然，就不进行。这些做法也表明，上述规定不是单纯的“口号”。

在不丹传扬着一件真实的事情。ODA 议案提出将要在一个还没有通电的村子里通电。这是一件好事，一般的国家都会急迫地抓住不放。

但是，这个村子里有点儿特殊情况，那就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有仙鹤飞来做巢。于是，人们展开了讨论：要通电必须架设高压线，这样一来，飞来的仙鹤就会撞上高压线，仙鹤不就无法来这个村子筑巢了吗？最终，村民们认为“那样仙鹤太可怜了”，于是就请求撤销在村子里通电的计划。与有电的文明生活相比，村民们宁可选择与仙鹤一起和谐生活。他们说这样 GNH 更高。

尽管如此，刚才我也讲过，不丹绝不是一个否定近代科学和近代文明的宗教性的反动国家。

不丹建设有水力发电站，那里供应的电力卖到了印度。不丹人也出口高山上生长的贵重药材等其他物品，用收入的外汇“按照需要”建设不丹国内的基础设施。但是，不丹人拥有明确的价值观：对于那些社会性的基础设施，如果有可能破坏他们认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哪怕是发达国家无偿提供的，他们也会拒绝。也就是说，在不丹，保护自然环境优先于经济发展。

因此，在不丹，到处都布满供电线和电话线是不可能的，对于砍伐原始森林建设道路，人们也采取慎重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不丹积极引进太阳能发电，在通信方面也灵活使用卫星通信和移动电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丹先进的东西并不少于外国。

即使在建设社会性基础设施时，不丹也优先维持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和以农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并在建设和工程中极力避免雇用不丹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雇用不丹人，追求现金收入而弃农的人就会增加，而这将会改变社会结构，所以，不丹把那些“3K劳动”^①全部委托给打工的印度劳动者来做。

亚洲最幸福的国家

与市场原理、经济效益相比，不丹实行的政策优先维持社会传统，保护自然环境。对此，不丹人的感受如何呢？

令我吃惊的是，这样的措施并不一定是由国王或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

在不丹，至今还有地区没有通汽车，但这不是因为那些地区被政府抛弃、搁置，而是因为农民担心修了公路会破坏生态环境，致

^① “3K劳动”指危险、脏、累的工作。日语中“危险”、“脏”、“累”均以K开头，故有此说法。——译者注

使无法维持传统农业；或是像前面讲到的，人们担心失去仙鹤生息的宝贵自然，于是主动地不进行建设。据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着实令我吃惊。

另外，作为义务，不丹原则上要求国民白天穿着民族服装。再有，全国禁止吸烟，同时悉心保护佛教。

如果经济发展优先，国家肯定会鼓励国民大量购买新的西式服装。宗教也同样，如果让宗教世俗化将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在不丹这个国家，在追求经济的富裕之前，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它的国策。

只是，无论理念多么美好，如果当时的国民只是不情愿地服从国王的方针，而不能实际感受他们自己的幸福，这一切便没有意义。将幸福程度和满足感数值化相当困难，但这里有一份统计报告应该值得注意。

据英国莱斯特大学发表的报告（Adrian G. Whit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A Global Projective Well-being”, 2006）讲，研究人员使用各种指标调查了世界上人们的“幸福感”（主观上的满足感），结果是：与福利制度发达的北欧各国相并列，不丹位于世界第8位，居然处于亚洲领先地位（附带说明一下，据这份统计，日本人的幸福感处于世界第90位）。

实际上，当我访问不丹在街头采访人们时，令我吃惊的是，回答几乎都是对现在的生活表示满意。虽说不丹重视保护文化传统，但它既有媒体，使用互联网的人也在增加。因此，人们对于发达国家的信息应该是相当了解的。这说明，有众多的人即使明知现在的生活多少有些不便，与其他国家相比本国在物质上并不富裕，但他们也宁愿维持传统的生活，而不去追赶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

当然，要形成这样一致的社会意见，是与国王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他亲自四处向国民游说GNH精神。但是，正如国王主动废除君主制，过渡到立宪制所体现的那样，不丹通过“国民公决”的形式推进了独立自主政策，得到了世界上许多人的支持与好评。

不丹人口刚刚超过 60 万，国土面积为 4.7 万平方公里，并且几乎都是高山地带，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它的优越感远远超过了它的领土和经济实力所能表现出的程度。这一点，它与古巴有相同之处。古巴通过向世界积极宣传本国的医疗制度，特别是为中南美洲的患者免费治疗等，向世界显示了它的优越感。

说得更现实些，不丹和古巴通过显示它们独特的优越感，扩大了国际社会对它们的支持，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软实力的国防建设。侵略这样的国家，很容易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因此，周边大国也必须对它们慎重行事。这样想来，我们不得不对塑造它们“不好惹”形象的国家战略脱帽致意。

资本主义破坏“人与社会的联系”

在直接接触了古巴和不丹人的生活之后，我对于以前那种单纯的改革思想——只要遵循市场机制，世间的事就会变好——产生了很大怀疑。对于小泉内阁“没有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口号也不能简单地点头称是了。

资本主义或许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财富和繁荣。但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传统，以及支撑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这种倾向越发严重。

由于互联网的使用，地球的确变成了“地球村”。但是，这仅仅针对信息交换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难道不是变得更疏远了吗？

随着网络的发达，人们不再需要面对面地交流，社区越来越失去意义。到了无国界时代，人和物都可以自由地跨越国境，国家也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全球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或许确实使人“自由”了。但是，它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联度逐渐消失。

事实上，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已经进入一小撮富人和大

部分贫穷劳动者“住在两个不同世界”的时代。一方面，既有做短工、住宿在网吧或小录像厅的人们，也有随便就买几百万日元手表和珠宝的人。这两者的世界几乎没有交叉的地方。

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实际状况，我们还能轻易地相信“资本主义等于进步”吗？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具有暴力性。如果不能巧妙地驾驭资本主义，它将破坏社会并破坏人类这个社会性动物的居住场所，我们难道没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些事实吗？

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

说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绝大多数人会联想到写《资本论》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的确尖锐地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指出了资本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矛盾。但这里我想介绍的不是卡尔·马克思，而是另一个“卡尔”。

这个卡尔就是经济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波兰尼。

波兰尼 1886 年出生于维也纳，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大学完成学业，1933 年为逃避法西斯的迫害而移居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波兰尼复杂的经历，帮助他在“二战”中完成了备受瞩目的《大转型》一书（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吉泽英成译，东洋经济新报社）。

在这本大作中，波兰尼反复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是让个人孤立、让社会分裂的撒旦的磨坊。

“撒旦的磨坊”这种说法实在耸人听闻，但波兰尼绝不是为了危言耸听才使用这样的比喻。波兰尼指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市场经济或货币经济，原本是人类历史中新近才登场的“特异体制”，它会破坏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一面。

这样的观点，自然立即就有人出来反驳：“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前不是就有货币和交易吗？”确实，这种反驳没有错。波兰尼也承认货币和交易是有史以来就有的。

但是，波兰尼又引证历史事实，指出货币和交易成为必要，乃是不同的经济圈之间交换商品和货物时发生的事，这种交换通常只发生在相邻经济圈交接的地方。比如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农民是不需要使用货币的。这一点，确实如波兰尼指出的那样。

按现代方式讲，波兰尼所指出的是：对于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中世纪的人们来说，难得需要货币。税金和地租都用农产品和劳动力来缴纳，生活资料或靠自己耕种，或通过物物交换互相通融。真正需要货币的场合，是从时而来访的行商手中买点儿来自遥远的中东、近东和亚洲的稀奇物产时而已。因此，“交易”和“货币”都是非日常性的需要。

经济学中常讲：“价格在多数人们参加的日常性市场交易中，由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关系决定。”但因为市场本身在近代以前是特异现象，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我们很容易在想象中认定，古埃及和巴比伦，或者中国的隋朝和唐朝似乎也存在现代版的繁华市场，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现代常识强加给历史而已。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指出了这个事实。

这一点，说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我们可以想想江户时代的农民，他们肯定基本上过着与货币无关的生活。就连现代的日本，在远离人烟的农村，仍旧有些地方基本上不需要现金。近代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的农村，几乎没有必要用现金进行买卖。

江户时代，在大阪等地方，确实有大米交易所，也进行大米的期货买卖。但这样的商业活动，从整体来看，是非常有限的。既有进行商业活动的城市，也有与货币和交易无缘的农村社会，这就是江户时代的日本。至于连地方上的农民也开始使用现金，那要进入明治时代以后，也就是波兰尼所说的近代资本主义形成之后。

日本的情况是，到明治时代进行了地租改革，由以前缴纳实物地租改成课税方式，用货币向国家缴纳，之后在农村也开始需要货币了。而那之前的农村，因为货币几乎不存在，因此也就没有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

为什么市场经济使人不幸？

波兰尼认为：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现代人，似乎把市场机制看做同自然现象一样。但实际上，历史性地看，市场本身是非常特异的新东西。波兰尼的这段话很值得我们倾听，他在《大转型》中对近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

我简单地归纳一下波兰尼的观点。近代以后发生的市场经济，不久就转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给那些原本不能作为交易对象的东西标上价格，开始进行交易。这就是市场经济成为“撒旦的磨坊”，扭曲社会机制，最终破坏人性的决定性原因。这是波兰尼观点中极其重要的部分。

那么，到底为什么市场经济变得不正常了呢？是把什么纳入了交易过程而导致的？波兰尼说，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者原本都不应该作为商品对待，本应是“被禁止的”。但在近代资本主义中，它们却开始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波兰尼认为这就是一切错误的开端。

的确，在现代经济中，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已经被自然地当做交易的对象。

正如经济学用“劳动力市场”来表达的那样，我们提供的劳动被标上了名为工资的价格。再有，大概只要是近代国家，就不存在“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被标上了价格进行买卖。货币也一样。现在，就连普通人都在进行外汇买卖，有价证券等金融商品作为一种“虚拟货币”也在被大规模地买卖着。

因此，即使听到波兰尼说“把劳动力、土地、货币商品化是错误的开端”，很多人也肯定会疑惑道：“到底哪儿不好？”

我们再听听波兰尼的说明吧。他说：什么是商品？商品的本质是什么？这都与是否能够进行再生产相关。

也就是说，商品要在市场中进行买卖，有一个默认的前提，那

就是，当商品被标上价格卖掉时，必须能够再生产出与此相同的东西。如果卖掉时不能够再生产出同样的东西，那就不能称其为“商品”。这是波兰尼的商品定义。的确，只进行一次交易的商品，起码不可能形成市价。波兰尼讲得有道理。

“劳动力商品化”是问题的开端

波兰尼对上述问题进一步展开了讨论，指出现在我们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是很大的错误。

现代人向公司提供劳动，作为代价，用月薪或计时工资的形式获得报酬。工资是劳动的代价，但用这样的形式开始买卖劳动力，只是近代以后的现象。

之前的人们，的确也进行“劳动”，但是他们不是靠出卖劳动来获得生活食粮的。

比如农民是靠自己耕种培育的农作物、渔民是靠自己撒网捕捞的鱼来维持生计。城市铁匠靠生产刀具、商人靠出售自己采购的商品来赚钱。也就是说，近代以前的人是通过出售或制作某种“商品”来获取现金收入的。

相对于此，近代以后的劳动者也依靠制作或出售产品获得的报酬来生活吗？——当然，这样赚钱的人也有，但多数人不是这样。无论是工厂的工人，还是公司的职员，都是一天8小时或10小时、12小时从事被分配的工作，靠挣工资生活。也就是说，现代的劳动者是依靠将一定的时间交给公司或工厂来生活。

于是波兰尼说：我们得到的工资，不过是将自己的人生切开来零售获得的。但时间能够再生产吗？人生能够再生产吗？——当然不能。因为人度过的时间只有一次，人生也只是一回。他激烈地批判道：把这样只有一回的瞬间作为商品进行买卖，难道不是极其非人道的、违背伦理的事情吗？

据波兰尼讲，像这样开始把劳动力本身作为商品对待，是进入

近代，发生了产业革命之后的事情。

众所周知，伴随着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发生，近代资本主义诞生，在伦敦和利物浦等城市，近代工业开始发展起来。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各种工厂一经创办，就有大量的劳动者从农村来到工厂劳动。他们多数是在圈地运动中被剥夺了土地、走投无路的农民，而这样的人为获取现金收入大量涌入城市，成为不熟练工人，开始形成“近代社会”。这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劳动者，既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也没有作为工匠的技术。他们赖以赚钱的手段，除了到工厂去把自己的人生一天天地分割开来零售，别无其他。

这种类型的劳动者大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波兰尼把以它为象征的近代社会的形成称做“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但波兰尼并不像其他知识分子，他绝不把近代社会的出现赞美为“进步”和“发展”。他反而认为，正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才给人类带来了不幸。

那么，这种不幸是什么？——波兰尼认为，这种不幸的代表就是“失业”与“贫穷”。

资本主义造成贫困的原因

当然，在近代社会形成以前，并非没有贫困。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产生的贫困，与过去的贫困性质完全不同。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中世纪的农民也处于不富裕的地位，但是，他们至少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如果碰上饥荒，没有粮食了，还可以去山上采集食物。如果到了更困窘的地步，还有迁移这个办法。

但是，近代英国出现的产业工人，连这样的可能性也没有。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雇主辞掉，一旦失业，生活立即没有着落。如果在农村，即使手头没有现金，或许也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但城市居民如果没有现金，就等于死。

更糟糕的是，近代城市形成之初，基督教会或是行政当局还进

行贫民救济，但是随着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普及和市场万能主义成为“常识”，社会开始普遍认为“贫穷是个人的责任，通过慈善事业进行救助，反倒会娇惯他们”，因此对济贫事业的责难日益增强。

在英国，16世纪以后，根据被称为《济贫法》的法律，一直对贫民进行救济。但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形成，这种行为开始遭到批判。17世纪后半期，英国政府设立了臭名昭著的“贫民习艺所”（Working House）。收容在这里的贫民，被剥夺了自由，从事强制的劳动。他们连外出也不被许可，在如同监狱的环境中不情愿地被迫劳动，而这居然被称做“救济”。

接下去，到了1834年，英国制定了新的《济贫法》。这个法律不仅认为“贫穷是个人道德失败的责任”，还规定，政府虽然也救济失业者，但“必须控制在最低收入线以下”的劳动者。

这样一来，济贫的目的也搞不清了。人民即使接受了新救贫法的帮助，生活也丝毫得不到改善。不仅如此，依照这项法律，一旦成为政府的救济对象，就等于失去人权，一生都要作为贫民度过（附带说一句，这项法律竟然延续到1948年才废止）。

这样，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描写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谴责的伦敦那种悲惨的贫民窟就形成了。在这里，就连不满10岁的孩子，一天也要被迫劳动8小时，不能劳动的人，就只有在被侮辱中死去。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描述了以上的历史事实后指出：从根本上说，这种悲惨的贫困产生的原因在于将劳动力即人的生活也商品化的资本主义制度。

波兰尼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也变成了像商品一样进行交易的东西。在市场机制下，人的尊严终归不过是“外部性”的因素。资本主义具有恶魔般的力量，它破坏社会，剥夺人的自尊心。

因此，“劳动力的商品化”从人那里夺走了工作的喜悦。劳动者不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只是把它当做苦役一味地忍耐。人被劳动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心的荒芜”，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土地是谁的？

这样，随着市场社会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的尊严被剥夺，但其危害并没有就此中止。波兰尼指出：由于土地也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被买卖，因此社会关系开始被破坏。

按照波兰尼的理论，土地并不能因为被卖掉了而再生产，因此它本来就不应该被当做商品对待。土地是有限的，并且人没有了土地是不能生存的。土地是生活的基础、社会的平台。

所以，在近代以前，没有出现土地作为商品被买卖的情况。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和国王拥有的只是对土地的征税权，而不是土地本身。

这一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也相同。正如 50 万石、100 万石这样的说法所表示的那样，幕府^①和各藩拥有的只是对农田收获物的征税权，而没有所有权。因此幕府采取转封方式，就能够自由地改变各个大名^②的统治地区。因为大名不是土地的所有者，所以即使土地被收回也不能抱怨。

城市的土地也一样，连大名的江户府邸也不过是从幕府那里分到了使用权而已。土地是公家的、天下的，这种意识不分东方西方都一样。

然而，这种对土地的观念，随着近代的到来而崩溃。

比如在法国，在拿破仑制定的近代民法（拿破仑法典）中，第一次就土地买卖作了规定。以此为契机，土地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这种思想迅速普及开来。

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明治维新以后，土地由公有变成了私有。

① 幕府：日本历史上由武将执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权力凌驾于天皇之上。这里指的是江户幕府（1603～1867）。——译者注

② 大名：诸侯。江户时代，将军属下拥有 1 万石（1 石相当于 180 公斤）以上粮食产量封地的家臣。——译者注

前面也提到过，成为这种变化出发点的是 1873 年进行的“地租改革”。关于地租改革，通常被解释为对农地的课税从实物缴纳转变成货币缴纳，但实际上，更具革命性的是，通过地租改革，正式确定了全日本的土地“所有制”。

这样的土地私有化是时代的要求。

因为，如果不能自由使用土地，近代资本主义就不能形成。比如，如果认为“土地是祖先传给我们的”，“是上天赐予我们的”，那就不能按照人的意志自由买卖或改变它的用途。另外，农村有作为村庄共有财产的土地和森林，如果这一部分的所有权不明确，就无法进行再开发。因此，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把土地私有化，建立起对土地的使用及处理方式没有任何限制的机制。

土地私有化破坏了传统社会和环境

土地私有化和商品化带来了什么呢？

我已经讲过，在英国，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发生了圈地运动。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要求从以前的小规模农业转向大规模农业，于是，大资本家就不断地收买土地，赶走生活在那里的农民。

结果，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不得不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波兰尼批判道：至此，英国的传统社会被瓦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摧毁。

据波兰尼讲，人类因为开始过上群居生活、定居生活，才使文明和文化得以发展。也就是说，土地与人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地缘关系，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和文化。

但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人开始把作为文化基础的土地当做商品进行买卖。这必然会割断土地与人之间的联系，使得社会性的连带关系丧失，而文化本身也遭到破坏。如此一来，近代的人就变得不幸起来。

波兰尼的这些意见，可以说预见性地提出了核心家庭、社区崩

溃等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我还想强调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开始把土地看做私有财产，最终导致了今天的环境问题。

如我已经讲述过的，近代法中关于私有财产的制度规定，可以根据情况自由使用、处理私有财产。也就是说，所有者如何使用、处理自己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卖给谁、租给谁完全是自由的，国家和权力者不得任意干涉——这是近代民法的大前提。

的确，这种私有财产的思想无疑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这是事实。而这种思想可以直接发展为“只要是自己的东西，做什么都可以”。当土地变成私有财产，当然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了。那么，擅自采伐生长在那里的树木，自然不会受到谴责；向流淌的河水中遗弃点儿什么东西，也就没有关系了。再有，地下的石油和煤炭这些资源，也可以作为“私有物”任意开采、买卖，即使因此破坏了丰富的森林资源也不必在意。而填海造地，也可以因为“这是很好的经济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这个理由而实施。

实际上，在地球各个角落里发生的对大自然猛烈的破坏活动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无非是人的经济活动以及人们对金钱利益的追求造成的。我们可以丝毫也不夸张地说，容许作为“经济人”的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破坏自然，这种思想的产生并付诸实践的原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化！

关于环境问题，我打算在后文中再涉及。波兰尼指出：任由有限的自然资源依据市场原理进行买卖，这种想法表现了“现代人的傲慢”。波兰尼的意见，难道不是很值得我们倾听吗？

愚蠢的金钱游戏

前面简略介绍了波兰尼关于劳动力和土地商品化的论述，我还想再概括一下他围绕着“货币”商品化问题的观点。

对于看到这里的读者来说，这已经是不说自明的道理了。站在波兰尼的思想角度看，把货币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近代资本主义，

从根本上扭曲了原本只在交易中充当交换工具的货币的形态。

货币不过是单纯的符号，是个象征，是交易中的交换工具，然而，现在却把货币当做商品在市场中买卖，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按现代人的说法，这就是“金钱游戏”，是不伴随实体的投机。

尽管如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初期，货币还是由黄金来表示的。也就是说，各个国家能够发行的货币，是与该国保有的黄金总额相对应的，将货币拿到银行去，就可以换取到相当价值的黄金。这被称做金本位制。

当然，即使是黄金，也和土地一样，是自然的产物，是有限的资源，把它拿来做事交易，也伴随着巨大的矛盾。但是，尽管如此，可以说，当金本位制发挥作用的时候，对于货币的独立运转还构成了一定的制约条件。

然而，当资本主义这个“撒旦的磨坊”开始运转以后，这种金本位制就不能完全适应它的要求了。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尽管只是暂时的，但停止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接连出现。因为，要想支付庞大的战争费用，维持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已经不可能了。尽管如此，之后一度又重建了金本位制。可是，由于从美国爆发的大恐慌，金本位制再次被停止实行。

经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把随着大萧条而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定义为：为了重振陷人大萧条的世界经济而进行的战争。而鉴于对战前的反思，战后才决定建立采用金本位制理念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1971年美国停止黄金兑换，开始实行管理货币的制度，各国可以自由发行货币。

这样，货币变成了无须黄金证明的、没有实体的象征，而围绕着这个象征性存在或者说符号，人们展开了金钱游戏。特别是20世纪末，随着金融工具开始实用化，汇率交易、证券交易变得越发复杂离奇。

在利益的驱动下，甚至制造出了“次级房贷”等可疑商品，最

终爆发了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用巧妙的言语把不动产卖给穷人，然后把它小额证券化，这种做法，不折不扣地就是“魔鬼的智慧”。近代人通过把货币商品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不丹和古巴的“幸福感”

前面我们讲到了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商品化”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这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人类劳动的异化”、“自然环境的破坏”、“金钱游戏和投机”。而读者也应该认识到，正如大家在本章开头部分看到的，不丹和古巴的生活之所以能像“田园牧歌”那样的快活、舒心，正是因为那里还没有过多地出现这些弊害。

当然，这些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影响，但是其程度还停留在极其原始的水平，没有蔓延到让人们精神荒芜、使环境严重破坏以及大量产生投机金融交易的程度。

在古巴，目前依然实行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同工同酬。

当然，在规制的后面，存在着各种钻制度空子的行为，也不是没有营私舞弊。但起码可以看出，人们是认可自己行为的意义的。

我看到的不丹，是一个平等得让人害怕的国家。国王乘坐的车子是丰田汽车公司（以下简称“丰田公司”）生产的兰德酷路泽，住的是木屋。所以，国民极少感觉到被国王等统治阶级压榨。

至于土地，在古巴，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私有制应该相当有限。像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随意地使用私有土地，给景观造成很大影响的情况并不存在。而不丹对保护自然环境的态度，我在前文中已经详细讲述过，不丹人不允许擅自处理土地这个公有资产，不允许破坏环境。至于货币，虽然两个国家都实行货币经济，但可以认为，那里基本上没有投机性货币交易行为。

去不丹和古巴访问，让我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感动的是，这两个国家没有社会性的疲惫，没有人心的荒芜，没有环境的

破坏。究其原因，无非在于它们没有被卷入全球化资本主义体制。更准确地讲，因为这两个国家还没有正式引进市场机制和民主这些近代社会的制度，所以还没有经历它们带给人类社会的制度性问题。

因此，虽然这两个国家生产力低下、国民收入微薄、新式房屋和车辆等现代化商品也很少，但是，那里的人们活得开朗愉快，没有欺人瞒世的卑劣品行。

但是，历史不能倒转。尽管我们这些人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充分体会到了它的矛盾，但不能也不会放弃在近代化过程中才获得的“自由”。可是，如果我们放任这些到手的“自由”，它就会变成怪兽威胁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很明确：那就是“驯服”这头怪兽。

“一战”给欧洲人造成的冲击

前文我们已经看到，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列举的丰富的实例，充分说明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市场经济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是极其特异的阶段。他写这本书的时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不用多想，这个事实也说明，波兰尼之所以将资本主义比作“撒旦的磨坊”进行批判，是因为他认识到了问题所在：难道不正是放纵了忽视人、忽视社会的市场经济，才造成了前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吗？

人们通常认为：近代文明的诞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果。现在仍有不少人相信这样的说法。人们走出宗教的妄念，获得了自由，获得了以数学和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力量，由此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也得到了进步。这种观念，到20世纪初叶为止，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因为西欧文明向全世界推广时，白种人所到之处，所向无敌，所以这样的信念自然

地盛行起来。

而且，在欧洲，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以来，再没有发生过大战。在国际关系方面，大家都认为“和平的时代”到来了，任何事情都能够通过理性的外交谈判解决。

然而，欧洲人的那些自信，由于1914年爆发的欧洲大战而遭受沉重打击。

人们原本以为，在已经近代化、文明化的西方，不会再发生大战，然而，仅仅是一粒射向奥地利皇太子的子弹，就成为导火索，像碰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全欧洲爆发了战争。并且，当初人们都说这场战争有半年时间就能见分晓，结果却僵持不下。由于动用了毒气和化学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不用说，这场战争使欧洲的繁荣受到了巨大打击。

面对这种情况，欧洲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自我质疑的倾向：“我们的文明方式果真正确吗？”

“市场经济不能创造和平与自由”

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著作之一，就是“一战”后出版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正如书名所反映的那样，这是一本考察西方文明极限的书，出版不久，它就成了当时的畅销书。斯宾格勒的这本书并不通俗易懂，它的畅销，表明了当时欧洲人的危机感很强烈。正值“一战”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1917年）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共鸣，这无非是对历来的社会制度的强烈反思而导致的感情蔓延。

在20世纪20~30年代，欧洲的自然科学界有两大发现，分别是物理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海森堡，1927年）和逻辑学的“不完全性定理”（哥德尔，1931年）。这是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两大发现对欧洲人的理性主义神话提出了质疑，同时也证明了人的才智无论提高到何种程度，也不可能了解世界的全部真谛。

尽管人们进行了反思，但世界大战还是再次爆发了。

波兰尼出生于维也纳，求学于匈牙利，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躲避法西斯的迫害逃亡到了英国，最后迁居到美国。“为什么这样的惨祸会发生两次？”对他来说，这样的问题意识一定相当强烈。所以，他才在大战期间执笔写下大作《大转型》，目的是要警告人们，发生这种事情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

波兰尼写道：“不管是自由还是和平，都不能在那个经济体系之下得到制度化，因为它的目的是生产利润和福利，而不是自由与和平。”^①（前引波兰尼，第341页）

真可谓真知灼见！

波兰尼的警告为什么被遗忘了？

但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说，波兰尼的警告在那之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直到现在。

现在，世界上严重的金融危机正在扩散，社会分裂也在加剧。这应该就是波兰尼所说的“撒旦的磨坊”的破坏力造成的。由于我们“放养”了市场主义、资本主义，所以不过分地讲，现在是遭报应的时候了。

但是，这里又产生一个“很自然的疑问”。

为什么经历了两次惨祸，人类特别是西方社会还不试图对资本主义原理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呢？

既然已经出现了斯宾格勒和波兰尼这样优秀的思想家，为什么没有能够产生一种共识，认识到“信仰理性是不可靠的”、“资本主义是撒旦的磨坊”？

人们常说“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当读到半个世纪以前就完成的波兰尼的著作时，大概不止我一个人会深思：为什么没能事先阻

^① 中译本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页。——译者注

止今天这样的差距社会和金融危机的产生呢？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我们何止没有听取波兰尼的警告，反而更加天真地相信资本主义，甚至产生错觉，认为市场原理才是唯一的真理。这简直与“一战”前的欧洲人没有两样。

那么，到底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思想断层呢？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假定”。

那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存在。

人类之所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接受教训，是因为经济的中心和国际政治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的缘故。

欧洲人通过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懂得了理性的不可靠，亲身体会了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他们已经懂得了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事情”，也知道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于是他们认为，能做的事，最多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尽力劝说对方而已。

但是，对于自己的国家从未成为战场的美国人而言，欧洲人那些痛苦的经历，毕竟不过是“别人的事情”。波兰尼毕生的大作《大转型》，是在大战期间的美国完成的，但它的意义，美国人是没有亲身体会的。而这样的美国人成了世界的统治者，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进一步扩大了。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是美国人创造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作为强有力的经济哲学，是从那里出发，渗透到全世界去的。

欧洲各国之所以与美国式新自由主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就是这样的原因吧。我几乎没有见过欧洲的知识分子无条件地赞成美国式资本主义。他们试图保留大陆式的资本主义，于是组成了欧盟，进行抵抗。而日本的态度怎么样呢？日本毫无批判地接纳了自由主义的理念，不愧是“美国的崇拜者”。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意识，即我们必须脱离这种“美国崇拜”的状态。为此，我们首先有必要详细思考一下“美国这个国家”。

在考虑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环境破坏以及安心感、安全感、相互信任等社会价值的崩溃这些严重问题时，先考察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乍看起来似乎过于迂回。

但我先把结论摆出来：如果没有这个特殊性质的国家，就不会有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扩张，也不会产生以市场原理为教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首先思考“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就变得至关重要。

第四章

作为宗教国家、理念国家的美国

美国社会的变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作为自己和各方公认的领袖，成为君临世界的霸权国家。美国战胜日本和德国这些“法西斯主义”国家，取代由于战争而成为废墟的欧洲各大国，获得了“和平与自由的守护者”的地位。

当然，尽管与美国对抗的力量，还有苏联这个大国，但全世界都用憧憬的眼光看待当时的美国，它俨然是一个散发着自由与和平光辉的国家。

“二战”后美国的景气高涨。从欧洲大陆和远东战场归还的年轻人，相继在郊外建起新家，美国出现生育高峰。以电视、电影、爵士音乐等大众文化和可口可乐、家用轿车为象征的高消费社会，在战后的美国得以进一步发展。“二战”中，除夏威夷等极少数地区外，美国的本土并没有成为战场，因此，美国到处洋溢着自信和活力。

看到美国这样繁荣的景象，当时世界上的年轻人，特别是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年轻人，对美国抱着无限的憧憬。美国成为自由与繁荣的象征。我于1969年到留学美国时，已经是战后二十多年，对此我有同样的感觉。之后，美国虽然经历了越南战争的失败，但从整体上说，美国社会依然是健全的。

但那个“光辉的美国”，现在已经变质，已然失去了在国际社会中的模范领袖地位。我在这里如此断言，想必没有读者会提不同意见吧。

无道义的向伊拉克派兵、以次级房贷为代表的“金钱游戏”的横行与失败、社会差距的扩大等，这些现代美国社会的矛盾，本书已经列举过了。事实上，对我而言，美国早已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富裕、自由、平等的国家了。

“托克维尔的美国”消失了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经典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的序言中开篇就说：

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我没有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进展发生的重大影响。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特有的习惯。

我看到，在我们的半球，身份平等虽然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极限，但却日益接近它，而且，支配美国社会的民主，好像在欧洲也正在迅速得势。^①

托克维尔是研究美国民主主义的著名学者。当托克维尔踏上美国大陆后，让他感受最深的是，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身份极其平等。

这时的美国摆脱了欧洲王公贵族对它的支配和教会的专横跋扈，正试图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想国家，它既年轻又热情，所以托克维尔说出了这样的话。此时距合众国独立仅仅60年，还没有结束南北战争。

^① 中译本见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页。——译者注

但是，如果访问了现代的美国，人们应该不会再有那种身份平等的感觉了。已经分割成超富阶层和生活困窘的百姓、贫困阶层的美国，已然失去了曾经使托克维尔吃惊的身份平等。美国到底怎么了？

比如，刊登在2005年1月12日《泰晤士报》上的尼克斯·克里斯托弗的文章就写道：

美国婴幼儿的死亡率是0.7%，高于古巴。世界上婴幼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是新加坡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婴幼儿死亡率还不到美国的1/2。

如果美国的婴幼儿死亡率控制在新加坡的水平，那么每年应该可以增加1.89万人。这远远多于每年在伊拉克战死的美军士兵人数（800名）。

（而美国）产妇的死亡率，比欧洲产妇的死亡率要高出70%。

我不是医学专家，但美国在尖端医疗领域的技术水平，现在也应该稳居世界前列。但是，那不过意味着美国有尖端的医疗技术，要享用这种医疗技术必须能够“挥金如土”才可以实现。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是有能力挥金如土的人，在需要做高难手术时，他们往往选择去美国接受手术。美国引以为豪的“高端医疗”，面向的是花得起高额医疗费款的富裕阶层，而不是所有人。

不仅如此，由于积极采用市场机制，现在的美国，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连最低限度的医疗服务也不能享受。

4700 万未参保者

美国没有像日本这样的“全民保险制度”，这已经广为人知。

尽管美国也有两种政府实施的保险，如以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

残疾人为对象的医疗保险，和以低收入者为对象的医疗补助，但能够享受这些保险的人很有限，大多数的国民没有享受像日本那样的国民健康保险。

在本能地厌恶国家介入国民生活的美国，制定像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那样的政府保险制度是不受欢迎的。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试图制定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但遭到朝野双方的激烈反对，计划早早地就夭折了。美国的国策是自助努力，这点在医疗问题上也是相同的（当然，像日本那样的全民保险制度，最近成为有良知的美国人称赞的对象）。

在美国，从前普通人去看医生时，治疗费都百分之百由个人负担。当然，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独立支付高额的医疗费，所以，人们几乎都加入了商业医疗保险，为可能发生的伤病做准备。然而近年来，未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人不断增加，到现在，据说已经有4700万美国人处于“无保险”状态（2007年）。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不参加保险呢？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医疗领域积极采用了市场机制，医院经营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的，结果使医疗费用高涨。

据堤未香的《报告：贫困大国美国》（岩波书店）讲，在纽约做盲肠手术，住院1天的平均费用，可达243万日元。而在东京，即便是个人负担，住4~5天的医院，也花不了30万日元。从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美国的医疗费是何等之高。

说到这里，我想起认识的一位日本医生曾经发牢骚道：“医疗报酬点数^①太低，真没法儿干！”的确，仅从前面的数据看，日本的医疗费跟纽约的相比，便宜得惊人。这也说明日本的医生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工资低，劳动时间长。但从另一方面讲，老百姓获得了

① 点数：日本医疗保险费的计算方法。以点数计算医院和医生对患者实行的各种诊疗服务，由厚生大臣规定。以1点换算10日元计算出医疗费。——译者注

实惠。日本的全民保险制度，在美国没有参加保险的人看来，简直就像在天堂才可能有的好事。

美国的医疗费增加到这种程度，保险公司的审查自然会越来越严，保险费也会随之增高。对于那些有疾病史的人、健康状况不好的人，保险公司将保险费定得极高，所以，支付不起保险费的人才会层出不穷。从保险公司来说，如果允许得病几率高的人参保，相应的就会增加经营的压力，因此，它们的做法也是理所应当的。

另外，即使参加了保险，人们也不能安心。作为保险公司来说，尽量不支付医疗费，才能提高利润。所以，以各种理由不支付医疗费例子才会不断增加。再有，即使患者知道有确切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如果保险公司以“保险范围不包括那一部分”为由拒绝支付，他们也就无法接受治疗。

责任自负社会的悲惨现实

伴随着医疗的民营化，据说由于得病而造成家庭经济破产的人在不断增加。据2005年哈佛大学进行的调查，由于生病、医疗负担加重而经济破产的人，几乎都是中产阶级中的医疗保险参加者（前引堤未香，第67页）。他们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勤勤恳恳地工作，但稍微得点病、受个伤，转眼间就会濒临破产的边缘——这就是美国这个“责任自负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美国医疗界，如此残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日本，为了控制保险支出的赤字，近年来也开始出现需急救的医疗难民和无医村等问题；而在美国，问题就更加严重。

“医疗界也有必要进行结构改革和民营化”，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日本仍然很多。但是，民营化并不能保证提高医疗效率。美国的这些事例，就表明了这一点。

进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时，我们有必要先探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然后再慎重行事，以免只单纯从提高

效率方面推进民营化和股份化，结果却导致了错误的“结构改革”。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曾经就西方各国的医疗保险进行了国际比较，他指出，美国国民负担的医疗保险费，实际上是实行公共保险的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的两倍，甚至更多（前引克鲁格曼，第161页）。以为实行民营化、市场机制，国民负担会相对减少是一种妄想。并且，与这些国家相比，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平均寿命都低。公民不但负担多，而且寿命短——这就是美国“医疗改革”的现实。

潮流的变化

这种矛盾并不只出现在医疗领域。我在序章中也讲到了，由于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优先遵从市场原理的结果是，美国的贫富差距比从前扩大了许多。但是，明明目睹这种现实，美国人却至今仍然死抱着“自助努力”、“自由竞争”的信条。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08年9月底，金融救援方案在美国下议院遭到朝野双方的反对而被否决的“事件”。所谓金融救援方案，就是美国计划由国家买下银行持有的与次贷相关的金融商品，使银行的财务状况健康化。为此，美国需要投入7000亿美元（约70兆日元）。

以次贷问题为开端，雷曼兄弟破产，继而美国金融业各机构相继陷入经营危机。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恐慌随时可能发生，市场为此而战战兢兢。而美国下议院的议员们，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因为担心“如果拿税金来救济民间的金融机构，会失去选民的支持”，所以转向反对的立场。

不料，这件事正反映了自由放任主义思想已经在美国人的内心深处扎根，人们认为“走到这一步，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所以，要破产就让它破产好了”。这好像消防队员看见火灾在眼前发生，火中有人喊着救命，他们却在一旁讨论“不先得到房主的许可，会不会构成侵害私有财产”一样。由于这个意外的发展，纽约股市一天下

跌了 777 点。这些情况，我们仍记忆犹新。

当然，后来议员们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修改后的金融救援方案。金融危机发生了，议员们却否决了救援方案，这种行为虽然令人诧异，也不是不能理解。因为他们不能无视百姓的感受：华尔街的精英们为金钱游戏废寝忘食，挣的工资多得让人不敢相信，到头来却要用国民纳税的钱来救济他们，哪有这样的事儿！

当然，这种美国式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今后将无法逃脱被修正的命运。

实际上，在这本书的执笔阶段，有一点已经明了：美国已经决定，不仅从银行买入不良债权，而且为了补充主要银行的资本，还要投入政府资金。这让人预感到，根据情况，美国政府或许会将资本不足的银行国有化。

恐怕，以这次的金融危机为契机，美国将开始回归实用主义的传统，为此，它不惜采取让新自由主义一度后退而由国家介入经济的政策。

美国式资本主义潜在的暴力性

我在序言中已经讲过，全世界的市场参与者，都曾为次贷问题引发的影响如此之大而震惊。因为，资本无限制地跨越国境移动使全球化资本主义具有的“负面”效应，在这次危机中凸显出来了。

金融交易与通常的财产交易相比，振幅要大得多。由于近年来金融工具的发展，使得有限的资金也开始可以利用杠杆原理。也就是说，人们能够用本金的几倍、几十倍，根据情况可能是几百倍的“赌注”，参加金融交易。在日本，有一种叫 FX 的外汇交易，连家庭主妇和学生也为之着迷，就是因为它能够进行本金上百倍的信用交易。

这种金融交易，当市场景气上涨时，交易商品的市价会不断上升；一旦景气下降，就很恐怖。一旦缺乏实体支撑的“泡沫”崩溃，

最糟糕的时候，就会发展成金融恐慌。即使达不到这种地步，金融市场振幅过大，也会使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影响。换句话说，现在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一种“暴力性”，正因为这样，世界经济就从根本上失去了稳定性。

因此，假使这次金融危机没有爆发，但如果按照原来的模式“放任”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早晚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愿意相信，精明的美国金融当局或是政府不会那么愚蠢。

实际上，在这次危机中，雷曼兄弟倒闭了，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合并了。曾经创造了巨大的收益并位居证券公司前两位的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也被金融股份化了。因此，整个行业正在进行急速的重组。

两大证券公司进入金融股份公司的伞下，这件事意义重大。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这样一来，尽管是间接的，但这些证券公司就不得不接受美联储（FRB）的管制。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它们不能再进行从前那种放任自由的“大幅度地高出本身的资本，让资产膨胀的杠杆经营”。这样一来，一直夸耀权势的美国证券公司，应该彻底变老实了。

多极化的世界

下面，我想就今后的资本主义体制，谈一些我的观点。

先说结论：世界资本主义体制将不得不从单一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形式转向多元化。

后面我们会看到，21世纪，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不得不相对降低。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金砖四国”和伊斯兰势力，将会取代美国，增大影响力。

这些“新兴势力”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没有照搬美国式资本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第一，对这些新兴势力来说，它们没有理由一定要服从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相反，它们的戒备心理更强。

它们担心，如果照着美国的标准去做，本国的权益将会受损。虽然对于资本主义和市场原理能利用的则利用，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并不共有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西化，但最终仍是非西方化的国家。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最根本的部分，并没有被它们接受。

因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将不得不做出巨大改变。日本和欧洲以外的这些新兴势力的力量，今后将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有话语权。

我已经讲过，如果以次贷问题为契机，美国的证券公司开始受到美联储的固有资本的限制，那么，由美国证券公司单边掌控证券业务的体制将会崩溃。而瞄准这个空隙，不附和美国式市场主义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伊斯兰势力，将以政府基金的形式扩大力量。于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实际形态，将很有可能由单一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形式走向多元化。

再有一点不能忘记，那就是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因为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军事预算已经达到约 6000 亿美元（伊拉克战争之前是现在的一半，约 3000 亿美元）。可以想象，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美国今后将给企业注入巨额的政府资金，那么，美国的年度财政赤字闯入 1 万亿美元大关，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如果军费问题与次贷问题一同成为导火索，动摇了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那么，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潮流将受重创。也有可能出现美元被抛售，不能再发挥基础货币作用的情况。事实上，到了那时，世界经济才真正面临危机。因为失去基础货币，就意味着世界上失去了通用的货币，世界经济将被推入绝望的深渊。这将成为历史性的事件。

排除特殊性的美国逻辑

我们无法预测今后世界的动向，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

们应该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特殊性。

我已经屡屡指出，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理念国家”。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独立以来不过 230 余年的历史；从白种人正式开始移居算起，也不足 400 年的历史。美国国民的大多数是移民，是由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聚集而成。

借用波兰尼的话来说，社会和国家建立在土地之上。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构成社会，从而产生文化，形成国家。然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人们对那里不具备自然而然的深厚热爱，也没有统一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联系人们的土地的力量和历史传统的力量极其薄弱。

在 2008 年 11 月总统选举中取胜的奥巴马，每每强调：“这里没有白人，也没有黑人；没有老人，也没有青年人。有的是，统合了全部美国人的美利坚合众国。”这让我们重新确认了一点：维系具有多元化文化背景的人心，才是美国领导人最重要的工作。

要想统合文化背景不同、阶级出身不同的人们聚集而成的人造国家，需要一种普遍的理念。因此，美国成为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这种理念国家中，决定事情时，忌讳的是任意搬出文化传统、民族历史等要素来。拘泥于那些个别的特殊的价值观，美国这个国家就会散架。因此，在美国，在决定政策、进行学术讨论的场合，当讨论特定的问题时，提出历史原因和文化的特殊性，这是犯忌。

我留美期间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把文化的特殊性指出来，说“那些道理不适合日本”时，讨论瞬间就中止。因为“你要是那么说，就没有必要讨论了”。

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美国社会讨论问题，始终应该是逻辑性的讨论。而实际上，贯彻逻辑性，也就是排除文化的特殊性。

也就是说，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运用超越文化因素的普遍性逻辑，成为“交流的规则”。明确地讲，在美国，把文化因素、文化差异当做现象的“变数”来说，是犯忌讳的事。关于这一点，我在

哈佛大学留学时，有过多得让人厌烦的经历。

排除特殊性，始终进行逻辑讨论，这就是美国。“以逻辑取胜者”在美国就是胜利者。情绪、信念、民族感情等，在美国人看来，都是非逻辑性因素、不合理因素，统统应该抛弃，应该忽视。这就是美国式的作风。

但是，现实的人是非理性的存在。虽然在道理上理解了，但不能从心底折服的事情常有。不过，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合理事情的连续。人为什么而生？为什么一定会死？追踪这些问题的本源，我们无法得出合理的回答。其实，有无数的哲学家苦思冥想过这些问题，但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美国人为什么成为市场原理的信徒？

在日本人眼中，美国那种理性的逻辑方式，是人情淡薄的表现。或许会有提出理论在前但根基尚未打牢的感觉。

的确，在美国人的逻辑方式中，那种急性子的因素，或者说过于单纯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正因为如此，美国人的逻辑才具有强大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文化和民族的基础上的。美国人深信：“我们提倡的理念，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和古老的历史的羁绊，具有普遍性、世界性的价值。”

美国为什么一直试图大力推进全球化资本主义呢？当然，最大的原因是，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全球化资本主义给美国这个世界霸权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活力。我再附加一点，那就是，不重视人与社会的联系和历史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正是适合美国人精神的制度。

但是，情况不仅如此。

美国人之所以一贯强力地推进全球化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本身以自由、平等的理念为国策，相信推广由此诞生的市场机制，是符合“正义”的。

在美国人的信念中，所谓市场机制，就是世界通用的、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原理。如果“身份平等”的人们，不受任何人的强制和限制，根据自己的意志，遵从近代的理性精神自由行动，经济整体的资源就会被恰当地分配——这正是近代社会“发现”的伟大的自由放任原理。而要实现这样的自由经济体制，必不可少的是自由民主体制。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自由的言论和经济活动都不可能进行。

欧洲人为什么不相信理性？

同样是西方人，但欧洲人没有这种由理念主导的思想。

在上一章我已经讲过，曾经一个时期，欧洲人也相信理性主义和近代合理主义的力量。但是，“一战”的爆发，彻底摧毁了欧洲人对近代合理主义的“信仰”。

无论如何试图理性地谈判，无论如何希望根据和平条约阻止战争都没有效果。人并不一定只遵从理性和逻辑，这样的事欧洲人经历得太多了。他们懂得，人常常凭感情，情绪化地、不合理地做事情，因此，只靠理性和逻辑，是不能灵活地操纵国际政治的。

进一步讲，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当初也是举着“民主主义”的大旗掌握了政权的。对此，欧洲人有过原始体验，所以，他们知道，就连民主主义，有时也是危险的。欧洲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高度，他们知道“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些情感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不应该再重复用逻辑来扭曲这些感情的愚蠢行为。

因此，无论美国人怎样呼吁“这是全球化的标准”，欧洲人仍然会想：“原来如此。从道理上讲或许是正确的，但没准儿有人类的智慧无法看透的陷阱。”再进一步讲，他们会想：无论多么崇高的理念，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所以，忽视国情、强加于人是幼稚的做法。

对于美国人的强横行为，欧洲人皱着眉头，感觉“美国人没有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欧洲人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他们有过只凭理性不能说清楚的、充满苦涩的历史，而美国人则没有遭受过那样的挫折。

美国人没有注意到欧洲人冷漠的眼光。即使注意到，他们也只会想：“不过是假装老于世故的失败者。”美国人始终牢守自己的理念，并把向这种理念向世界推广看做国家使命。

美国十字军精神的起源

我再重复一遍，在美国人的信念中，市场机制是全世界通用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原理，而自由民主主义是市场机制的保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能进行对等的交易。因为在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国家和权力必定会公然地限制个人的经济活动。

反过来说，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就意味着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于是按照美国人的逻辑，如果哪个国家不喜欢加入全球化市场，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在某些方面存在“落后的地方”和“不民主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日美经济交涉”、“日美经济协商”等名义下，对日本进行了几乎可以说是干涉内政的介入。这些行为，是以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为目的极端自私的考虑，同时也是出于那种普适主义的想法。日本人原本所信奉的独特的“系列”制度，或长期建立起来的互持股份的做法、主银行制度、政府官员为经济护航等，全部被美国人认为是违背市场原则的不光明磊落的東西。美国人相信，排除这些东西，无论对日本人还是对世界，都是伸张正义的行为，所以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这实际上与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为如出一辙。美国不惜动用军事力量，也要试图实现作为普遍性正义的民主主义体制。

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民主主义抱有抵触情绪，这是因为对伊斯

兰教徒来说，《古兰经》才是他们的全部。伊斯兰教徒认为《古兰经》上写的东西是真实的，如果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事情与《古兰经》的教义不同，他们是不会服从那个决定的。由此一点就会明白，把美国式的民主强加给伊斯兰教徒，无异于对他们说：“放弃你们的伊斯兰教。”

“我们国家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才懂得自由主义的市场原理的本质，向世界普及这些原理，是我们的历史使命。”美国人对此深信不疑。也就是说，美国人具有“十字军精神”，相信上帝赋予美国以使命，这种精神与理性主义、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美国庞大的信念体系。

换句话说，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是特殊国家，肩负着历史使命”。这种不着边际的自我意识和使命感，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为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美国建国时代去看看。

宗教国家美国的创建者

日本人所知道的“美国建国故事”中讲的美国历史，开始于1620年。说的是为了逃避英国教会的宗教迫害，百余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从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登陆的那一年。也就是所谓的清教徒前辈们移民的故事。

读者也都知道，那时，他们在摇晃的船上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成为民主主义国家美国的精神原点。不受过去的旧习约束，通过平等地签订社会契约，建立新的共同体——“五月花号公约”的精神，奠定了之后美国的建国理念。

但是，中西辉政在《美国外交的灵魂》（集英社）中指出，那些清教徒移民前辈，与其说是抱着崇高理念来到新大陆的“移民”，毋宁说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的“难民”。实际情况是，在欧洲无处可去的清教徒，不得已迁居到了现在的美国。说他们抱着理想，

说他们有明确的清教徒理念并在契约基础上建立了共同体，不过是一种建国神话而已，是不符合史实的。

那么，美国这个国家，只不过是在本国难以谋生的难民凑在一起形成的国家吗？也并非如此。根据中西辉政的论述，实际上，在“五月花号公约”之后的第十年，即1630年，发生了奠定美国“精神基因”的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约翰·温斯罗普怀揣英国国王敕令，带领1000名富裕的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湾上岸。

这些清教徒，从一开始就抱着明确的目标，乘坐“阿贝拉号”来到了新世界。他们的理想是，“在美国大陆创建以真正的宗教为基础的‘新国家’，以此改造堕落的英国及教会，进而重新建造‘全世界’”（前引中西辉政，第106页）。这无疑就是试图在新大陆建立真正的基督教国家的宗教运动，他们有别于追求政治自由和富裕而移民过来的其他清教徒。

中西辉政在书中断言：“美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宗教国家’”（前引中西辉政，第107页）。可以说，温斯罗普这个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的到来，形成了美国的精神基因。总而言之，新英格兰地区早期开拓者的宗教理念，无疑成为整个美国的重要方针。托克维尔写道：“新英格兰的文明，象高地燃起的大火，除烤暖了周围的地区之外，还用它的光辉照亮了遥远的天边。”^①（前引托克维尔，岩波文库，第一卷上册，第53页）

所谓“美国的成功是上帝的约定”理论

约翰·加尔文与马丁·路德同为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以主张“预定论”而为世人所知。

对于非基督教的人来说，“预定论”的教义极其难懂。如果讲它的本质，那就是，上帝是超越了人的理解的、全能的存在。这是加

^① 中译本见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页。——译者注

尔文神学的大前提。

在全能的上帝面前，人的信仰具有的力量极其微小。人们热心的活动，不会改变上帝的决定，人是否被救赎，是由上帝预先决定的，没有改变的余地，所以才叫“预定论”（关于“预定论”，可参照小室直树《写给日本人的宪法原论》，集英社国际）。

在日本这种不习惯一神教的民族看来，“是否被救赎，是预先决定的，与人的努力没有关系，这难道不是连信仰本身也否定了吗？”但接受了加尔文信仰体系的人，却会因此加深他们信仰。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被上帝选择”，那么无论什么考验都能经受住。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最终会被救赎，所以他们从不恐惧，也没有任何担心的事。加尔文主义就具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使人一不留神就很容易成为狂热的信徒。

1630 年来到新大陆的温斯罗普等人，无疑就是加尔文主义者。

他们对于自己能够创建《圣经》中的理想国家（即山上的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深信不疑。如果能在马萨诸塞建设理想的国家，就证明他们是被上帝祝福和特选的人；如果失败，则他们无法被救赎。建设理想国家，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救赎。

在登陆美国之前，温斯罗普在“阿贝拉号”上做了如下坚定的宣誓：“如果上帝准许我们横渡大西洋，就证明我们开始了与上帝的契约，接受了上帝的嘱托；我们应该为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挺身而出。”（前引中西辉政，第 107 页）

如果仅仅顺利到达美国，就能证明自己是被上帝特选的，这样的逻辑，可以说只有加尔文主义者才能构建。

美国为什么时而陷入门罗主义？

温斯罗普那样的加尔文主义者，希望建立成为世界典范的“理想国家”，而在他们坚强的意志下最终也建成了之后的美国。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必须要把民主主义

和市场原理向全世界“传教”，强迫别人接受。

对他们来讲，创建理想国家，将理想之光遍布全世界，这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如果不能实现，那将证明美国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当然，美国之所以想要对外侵略性地推广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并不单纯缘于善意和信念。

美国这个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美国是不是“理想国家”，是不是《圣经》中所说的“山上的城”。如果不能实现上帝赋予的崇高理念，美国自身就会坠入无底深渊。正因为此，美国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也要实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向全世界推广市场原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现在仍是个不折不扣的“宗教国家”。

布什总统开始伊拉克战争时，脱口说出了“十字军”这个词，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这或许因为，“宗教国家”的性格已深深影响了美国人的心里。

站在这个观点上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即使遭到欧洲等国家的种种批判，美国仍旧不能中止在伊拉克的驻军。这对美国来说，当然关系到它的国家利益，但同时，或许也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恐惧心，害怕“如果退缩，就等于放弃上帝赋予美国的崇高使命”。如果我们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也曾经难以撤退，与那种十字军心理的巨大影响结合起来考虑，就会豁然开朗。

顺便说一句，根据中西辉政的说法，美国时而陷入孤立主义（所谓门罗主义），与这种“宗教国家”的性质并不矛盾。

这是因为，背负上帝赋予的使命的美国，在世界上是特殊国家。背负这样崇高使命的国家，如果为了眼前利益而与其他国家结盟，就会损坏美国的神圣地位——从美国的角度看，具有古老传统、实行“现实主义外交”的欧洲各国，是世俗化的、堕落的国家。

于是，美国人就做出这样的判断：他们不赞成只专心于本国或是美洲大陆的事务而不去染指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事情。

也就是说，作为“宗教国家”美国的特性，对内体现为门罗主义，对外则以民主“传教”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

杀戮原住民是《旧约全书》的再现吗？

那么，美国在建国后是如何维持这种作为“宗教国家”的 DNA 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无法展开谈（请参照前引中西辉政、托克维尔），我只讲一下概要。

温斯洛普登陆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美国决心与宗主国英国进行战争。1776 年，它宣布独立。其后，战争持续不断，是为了扩大边疆而对美洲原住民进行的歼灭战。

这时的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或许应该说是《旧约全书》的再现。

《旧约全书》中讲，脱离埃及的以色列人，想要回归“约定地”迦南。然而，在以色列人离开期间，已经有异教徒住到了那里。对此，上帝告诉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不必畏惧”，允许屠杀住在迦南地区的异教徒。遵照这个指示，约书亚等人一个接一个地攻击迦南的部落，屠杀了住在那里的人。而开拓西部的美国人，对原住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我们常常引用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的内容：“人人生而平等”，人们拥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其中所指的“人”，只是基督教的教徒，是白人，美洲原住民、黑人奴隶是不包括在内的。

为了建立“理想国家”而孜孜奋斗的美国人，当他们的国家已形成并逐渐得到各国的认同，产业也兴盛起来时，他们中间有些人松懈下来了。如果把这种松懈看做是人的本性，也是很自然的事；但不满足不贪恋那种安逸，是美国人的特质。

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继温斯洛普之后，入驻美洲的殖民者以及美国国民的深层意识中，都根深蒂固地印刻着一种观念，那就是“美国是上帝赋予使命的国家”。

原本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中就认为，美国是他们脱离了使其遭受

侮辱又充满陋习的欧洲独立出来，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的新生国家，所以，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特殊国家”。这种意识也极其自然。在这种意义上讲，这或许与曾经的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神之国”的想法有相同之处。

要维持加尔文主义式的“随时想着上帝、想着信仰生活”，实际上并不容易。当遇到危机的时候，当在贫困中痛苦的时候，信仰会加深；但生活富裕了，和平了，就会自然地远离信仰。这是人之常情。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也相同。

但是，美国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当他们对“正义美国”的信念产生动摇时，必定会出现把自身置于战争中去冲动。也就是说，放弃眼前的安宁，大胆奔赴战场，通过取得胜利，再次确认在世界历史上的使命。

作为圣战的南北战争

那么，美国人选择的“战争”是什么呢？——中西辉政指出，那就是1861年的南北战争。能正确认识南北战争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的日本人不多。如果说清教徒的迁移意味着第一次建国，《独立宣言》意味着第二次建国的话，那么，南北战争可称为“第三次建国”。

一般来讲，人们通常认为，南北战争使得因为奴隶问题而濒临分裂的美利坚合众国重新统一。

的确，这是正确的理解。但当时的美国人还存在一种恐惧心理，即“如果就这样沦为现实主义，接受奴隶制度的话，美国的建国理念将丧失，将不能受到上帝的保佑”。《旧约全书》中有上帝毁灭了沉浸于享乐中的城市所多玛与蛾摩拉的故事，上帝是否也会毁灭伦理上堕落的美国呢？正因为抱有这样的意识，林肯等北部各州的人们才采取了“不逃避内战”的立场。

这是一次危险的赌博，但无论对林肯还是对美国而言都取得了

成功。由此，美国废止了奴隶制度。这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在美国确立了联邦制度。它使“凑集”起来的美国，通过确立联邦制度而完成了统一，再次确认了其建国理念。

更重要的是，由于克服了南北战争的危机，美国人再次确认了自己的“天命”。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美国领导人和国民才在其后的世界大战中称“只有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义国家”，“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在其他国家的人民看来，这是近乎狂妄自大的自我意识，但美国人真心地这么相信，因为他们自以为经受住了上帝给予他们的考验，即“三次建国”的困境。

综上所述，美国无疑是一个“宗教国家”。由于它不断地确认其苦难的历史，所以才维持着其作为“人造国家”、“拼凑国家”的统一。

未开拓地创造出的个人主义

上面我讲述了美国的两个标志性特征，即“理念国家”和“宗教国家”。

此外还有一个认识美国的关键点，那就是美国人内在的“开拓者精神”。

建国以来，美国一边屠杀、消灭美洲原住民，一边向西扩展领土。这是历史事实，无可争议。在西进运动中，培养出了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说得好听些，是独立不羁；说得不好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实际上，说它是美国独有的也不为过。而这种个人主义精神，正是因为有未开拓的土地，才得以发展。

日本与美国截然不同。日本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作为“岛国”，人们的生活空间有限。

在这样的空间里，只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的生存方式是不受欢迎的。可以说日本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社会。一人得益，其他人就相应的受损。所以，日本社会内在地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协调。

有能力巧妙地调整彼此间利害关系的人，才会受到好评。

但是在美国特别是西部未开拓地区，这种协调精神反倒会毁灭自身。为了实现“美国梦”，需要不畏惧失败；与其把能量消耗在协调与周围人的麻烦关系上，不如精神饱满地向前，再向前。不具备进取精神的人，就无法生存，反倒会给周围人添麻烦。而那些率先发挥领导力量的人，带领人们往前走的人，则受到尊敬。

这就是美国人的特性。而创造出这种特性的基础，是广阔的未开拓地。

宗教信念的西进

然而，到19世纪末，那些成为美国人精神基础的未开拓地已经不存在了。一路向西、向西移动过来的美国人，终于到达了太平洋海岸，再没有土地供他们开拓了。

这就给美国人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危机。那不单纯是征服欲望的问题。

作为“理念国家”、“宗教国家”的美国，其国民具有一种把自己的信念向外推广且必须推广的心理倾向。扩张领土满足了他们的欲望。因此，未开拓土地的消失，就意味着“美国的崇高使命”也将遭到挫折。

于是，美国人选择了跨越太平洋，继续向西前进的道路。也就是向日本进而向中国发展。

19世纪中期，美国的贝利舰队来到日本浦贺港，通过炮舰外交，迫使幕府开放了港口。实际上，对美国及美国海军来说，迫使日本开放门户，几乎没有任何利益或好处。但是，其他的目的比获得实际利益更重要，那就是教化文明落后的日本人，让他们成为世界的一员。这个崇高的使命，其实不过是美国的自以为是和自我满足。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采用了以大炮强迫他人打开国门的粗暴行为。这才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原因

所在。

中西辉政在《美国外交的灵魂》中讲道：“或许可以说，从贝利的身上可以找出 20 世纪美国即将成为‘世界帝国’的萌芽，或者说‘国家 DNA’。”（前引中西辉政，第 177 页）他说得丝毫不错。

《日本的失败——“第二次开国”与“大东亚战争”》（岩波现代文库，2006 年）的作者松本健一认为，贝利航日反映了美国的使命感，即强迫观念。他引用贝利自己的记载做了介绍。

1853 年 7 月 8 日凌晨，贝利在刚刚抵达日本的军舰上得知观测到彗星的消息，写道：

古人将此罕见的天文现象，视作事业成功之祥瑞。而我们则将之看做不流血就能实现我们的目的，把隐蔽孤独的一国之民拉入文明国民的行列之前兆（《贝利提督日本远征记》，铃木周作译）。

不用说，这里的“隐蔽孤独的一国之民”是指日本人。松本健一讲道：“要把落后的日本拉入文明国家的行列”，这充分表现出美国的使命感即强迫观念。

之后，在不足 100 年的时间里，美国通过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胜，奠定了作为世界帝国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尽管它没能把中国揽入自己的未开拓地，但到此为止，美国已经称霸太平洋，成为睥睨世界的帝国。

美国西进运动终于碰壁

接下来，美国还是向西、再向西，继续“开拓”下去，它这种基本行为并没有改变。

为了向世界推广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建国以来的理念，

美国实现了日本的民主化，与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苏联、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持续斗争。美军打完朝鲜战争，又深度介入越南战争中去。

苏联解体后，为了普及民主主义和市场主义这些美国的崇高理念，它依然继续“向西布道”。

经过海湾战争，美国“征服”了创造出古代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文明的伊拉克。它在麦加的所在地沙特阿拉伯也建立了军事基地。向西、再向西发展，美国这种欲望，没有丝毫衰减的势头。

然而，发展至今，美国的西进运动渐渐接近极限。

因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持续不断的西进运动，使美国已经抵达中东地区。现在，发展到趁着格鲁吉亚问题把美国海军派遣到黑海的地步。再往前，将进入旧世界，即欧洲领域。没有特别的情况，这是难以打破的一堵墙。

或许是察觉到了美国的意图。欧洲近年来开始严厉批判美国的行动。比如，关于伊拉克战争，美国就遭到了法国等国家的坚决反对。

布什政权找借口攻打了伊拉克，但无论怀疑侯赛因政府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武器，还是怀疑伊拉克成为“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动者基地组织的温床，最终都没有被证实。于是，布什政府就开始使用“建立民主政权”这个“正义”的名义。但美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受到了以欧洲为首的世界各国的谴责。

如果美国想要更积极更深地介入中东事务，就必须有一个心理准备，准备着接受来自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强烈反对。

大转型时期——美国走向何方？

就格鲁吉亚问题来说，美国踩到了俄罗斯的老虎尾巴上。

据佐藤优分析：俄罗斯这个国家，在潜意识中，希望在本国周边设置一些缓冲地带。在东西方冷战时期就是这样。苏联并不直接支配东欧各国，只是将它们定义为卫星国。苏联人打的算盘是，当苏联遭到其他国家侵略时，可以先把东欧各国当做“弃子”，进行抵御。

的确，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总是受到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如塔塔尔、土耳其斯坦或是蒙古等。因此，为了自身的安全保障，不在周边设置缓冲地带就不能安心。正因为此，对俄罗斯来说，美国插手格鲁吉亚问题，是令其难以容忍的。

但是，美国也不能停止推广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的永久性运动。如果为了与俄罗斯和欧洲进行和平谈判而停止扩张它的影响力，那简直就是要美国放弃“建国的理念”。

恰在这时，美国试图努力向全世界普及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也即将迎来重大挫折。世界上的人们对于传播市场原理福音的美国传教士的做法，特别是美国金融机构的做法，投以不信任的眼光。目前，对美国一路倡导过来的“自由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人们逐渐开始产生怀疑。

对作为理念国家、宗教国家的美国而言，21世纪将是一个大转型时期。今后，美国到底要朝什么方向发展？或许连美国人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大国的“正义”开始褪色，这样下去，不能否认美帝国的地盘有下沉的可能。但是，要美国就此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也是不可能的。它拥有的能量依然极其巨大。只是美国在克服了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后，将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重新出发呢？

奥巴马总统治理下的美国

经历了伊拉克战争的失败、金融危机等挫败后，由于布什总统的种种失政陷入消沉的美国，现在出现了救世主！这应该是许多美

国人对 2008 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和以绝对优势当选的奥巴马总统抱有的最直接感想。

选举刚结束时，美国人的狂热程度着实让人吃惊。自林肯发布奴隶解放宣言以来 145 年，自民权运动以来约 50 年，终于在美国诞生了一位黑人总统。标榜自由与平等的美国独立宣言的理念，终于通过总统大选得以实现。这是“理念国家美国”的复活。

那么，奥巴马总统治理下的美国，今后将朝什么方向前进呢？我以为他当前的任务是进行“三个修复”。

第一，“修复经济大萧条”的美国经济。这次萧条非常严重，修复起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至少，奥巴马担任总统的头四年，要集中精力做这件事。特别是，如果发生通用公司破产这样的大事，就有可能需要以几年为单位进行调整。金融部门让失衡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需要几年的时间。

第二，“修复中产阶级”这个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中消失的人群。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在《美国历史的周期》^①（猿谷要监译，个人媒体）中说：美国的政治思想“30 年一个周期”。从里根新政以来，“个人自由”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几乎持续了 30 年，现在或许将要转向“公共利益”优先的福利政策。

第三，“修复道德领袖的作用”。由于伊拉克战争和次贷问题失信于世界的美国，将如何修复作为霸权国家、基础货币国家的道德领袖的作用呢？首先，奥巴马总统应该做的是体面地从伊拉克撤军。另一件事是，在反思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新型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

总之，几年过后，美国必定会像不死鸟一样重新站立起来。其力量的源泉，首先来自奥巴马总统的领导能力。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非白色人种的美国人如此充满能量的时代。如果利用这种力量，美国将会重新成为充满活力的国家。其次，美国移民的力量依然存

^① Archur M. Schlesinge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译者注

在。每年有上百万的移民进入美国。他们怀揣着美国梦，意气风发，想要干一番事业。尽管实际上能够成功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但至少他们强烈地认为：“只要努力，总会有结果。”这将成为美国今后巨大的能量。

那么，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呢？担忧的是，由于经济萧条长期化，使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世界将会由于美国的供给过剩，出现对美元的不信任。如果美元暴跌，它将失去基础货币的作用。随之，世界经济将受到无法重建的打击。这需要引起注意（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论述）。

第五章

“一神教思想”为什么破坏大自然

世界最初的“人造国家”——美国

为什么全球化资本主义和市场主义思想在美国拥有巨大的能量？为什么美国要向世界普及这些思想？上一章我们梳理了这些问题的背景。

众所周知，近代资本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其起源都在英国。但这些思想能够走出欧洲大陆，并开始拥有全球性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事件”，是不可能的。

就民主主义来讲，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根据“社会契约”建立的人造国家。此前的“国家”，比如英国，君臣间也订立过《大宪章》之类的条约，但英国本身不是根据《大宪章》建立起来的国家。英国这个“国家”，在那之前就已经作为社会和历史的集团存在了。

然而，在新大陆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却不是那样。

那里的人们，在移民过来之前，并没有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共同点，然而这些人宣誓遵从《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或者默认的“建国理念”，从而建立了美国这个国家。如此形成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个。

当然，在美洲大陆，也有原住民的文化和历史，但开拓者们大量屠杀了原住民，也没有想过要尊重他们的文化和传统。托克维尔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以“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口吻，阐述了美洲原住民的灭亡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他说：

这些部族的灭亡，始于欧洲人登上他们的海岸之日。……上帝把他们安置在新大陆的富饶土地上，似乎只给了他们暂时的使用受益权。他们住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别人到来。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象是为了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①（岩波书店，第1卷上，第45页）

对于那些与上帝约定，根据崇高的理念创建新文明国家的殖民者来说，美洲原住民是异教徒，是他们眼中的野蛮人，消灭这些人是理所应当的。又因为当时美国的创建者一致认为，合众国必须是脱离了一切旧习俗的自由的社会，因此，他们对于消灭原住民族，并没有罪恶意识。

美国经济控制世界的理由

这样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理念”，就是在地上实现上帝的意志和上帝的正义。美国文明的基础，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要素。这两个不同的要素，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前引托克维尔，第70页）。在欧洲，“宗教精神”（教会）与“自由精神”（资产阶级）是激烈对立的，但在美国，它们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独立宣言》响亮地讲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这里可以看出，“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是结合在一起的。这里使用的“平等”一词，几乎可以看做“自由”的同义词。前面我谈到过，托克维尔到美国以后，曾感叹美

^① 中译本见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译者注

国人的“身份平等”。“身份平等”就意味着没有身份的差别，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行动。

近代资本主义在如此形成的美国社会中绽放花朵，绝非偶然。因为在传统社会，地缘、血缘关系影响显著，教会和贵族等顽固势力强烈反对改革，不存在“身份平等”。因此，个人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在那样的传统社会中，被经济学视为前提的、能自由行动并最大限度满足自我的经济人，没有登场的余地。

如果说最优先追求个人利益是经济人的行动准则，那么，对他们来说，墨守社会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传统和秩序，在很多场合，就是极其不合理的。他们没有必要考虑是否需要同情他人以及维护社会价值。

但这样的人，在“旧世界”中绝不受欢迎，也不受尊敬。因此，如果近代资本主义只停留在欧洲大陆的话，它的发展将是有限的。

实际上，即使现在，扎根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体制，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就明显不同。跟美国相比，欧洲的资本主义限制的成分更多，还浓厚地残留着重视社会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除英国之外，欧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是地域性的，与全球化资本主义划有界限。

在欧洲的学术界，主张“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是多样化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只是其中之一”的观点也根深蒂固。

通过下面列举的书，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些学者主张的美国式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特殊思想。例如，布鲁诺·阿玛布尔《资本主义的多样化》^①（山田锐夫译，藤原书店）、罗伯特·博耶《资本主义 vs 资本主义——制度、变迁、多样性》^②（山田锐夫译，藤原书店）、罗伯特·博耶等编《脱离全球化宣言——超越美国主导》^③（山田锐

① Bruno Amable,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 ——译者注

② Robert Boyer, *Une théorie du capitalism est-elle possible*. ——译者注

③ Robert Boyer, *Mondialisation et régulations: Europe et Japon face à la singularité américaine*. ——译者注

夫、渡边纯子译，藤原书店)、青木昌彦《经济制度的进化与多样性——制度比较分析序说》(东洋经济报社)、青木昌彦《走向制度比较分析》(泷泽弘和、谷口和弘译，NTT出版)等。

的确，美国这个新国家，是经济人活跃的理想乐园。这个国家，既没有传统，也没有确立自古流传的秩序。既然是只有移民的社会，所以不存在长期积累的财富，别人都是竞争对手，如果磨磨蹭蹭，就会丢失饭碗。在这样的国家，只能拼命地开拓未开垦地，前进、再前进。国家要强盛，首先必须建立人人都能最大限度发挥能力的社会经济体制。

大约以“一战”结束为分界线，近代资本主义的生身父母大英帝国开始没落，美国开始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一是受宗教的驱动，这种宗教驱动力与美国人那种必须建设“理想国家”的强迫观念类似；二是美国人巨大能量高涨的结果，这种能量形成的前提是，人们不受传统和旧习俗的约束并保障个人能够自由活动。

新自由主义并非“普适原理”

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难得的“孵化器”中，资本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1991年，苏联这个资本主义的对抗势力解体了。从此，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迎来了全方位“布道”的时机。

毕竟，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这个曾经与资本主义对抗的体制“自我崩溃”了。许多人认为，这个事实证明了市场原理和自由竞争教义的正确性。换句话说就是，证明了美国式资本主义才是普遍真理。而里根政策的成功，和被认为患了“英国病”的英国经济在撒切尔主义指导下实现了复苏，更增强了它的说服力。

这样一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日本开始提倡“结构改革”，无疑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国际背景。当然，日本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社会，所以，它不可能顺利

地接受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

所谓日本传统，在于重视长期性的关系。因此，企业间依靠一系列内部的信赖关系结成的交易，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能扎下根来，也是因为长期性的雇佣关系更让人感觉踏实。长期性关系，在银行与企业之间以主银行制形式固定下来，政府和产业界之间也以审议会形式扎下根来。

同样具有历史传统的欧洲各国基本上对新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但它们孕育不出取代市场原理的有说服力的经济理论。尽管欧洲建立起欧盟来对抗美国，但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开始渗透到欧洲了。

但是，美国提倡的资本主义，果真是“人类的普适原理”吗？显然，以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契机，人们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前文已经讲过，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推广，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定因素，在日本、欧洲或者新兴国家，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和传统社会价值观的颠覆，使社会差距扩大，地球环境遭到破坏，有安心感、安全感的社会崩溃。

然而，这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结果。

美国式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极限

在美国式新自由主义中，文化和社会因素，通常被置于考虑范围之外。文化、传统、历史、人与社会的联系之类，被认为是保护主义和限制政策的温床。

不断地进行创新，实现前人所未及，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站在这个立场上思考，历史和传统之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是绊脚石。2008年秋季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麦凯恩两位候选人使用的关键词都是“变革”。这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国人不持续改变就不安心的DNA，现在仍旧很强。

当然，问题在于“变革”的内容。如果是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弊害而进行纠正的变革，那是可以进行的，但仅从他们的演讲

判断，似乎没有那样的打算。美国人从根本上重视个人自由，而试图通过限制自由来纠正社会观念和传统价值的想法，很难得到人们的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批判市场主义是“撒旦的磨坊”是正确的。美国式资本主义所说的“普适性”，说到底，只能在没有文化差异和社会传统、没有人类社会的不合理性和旧习俗的、假想的真空世界中存在。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的人们，不过是原子化的、孤独的存在，他们不与他人接触，也无缘体会由此产生的痛苦和感动。

这样的社会蓝图，对于那些为了把美国建设成理想国家，而“在不断前进中寻找人生价值”的人来说，或许不会感到过多的不自然。但是，我不得不说，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犯的大错就在于，把它误以为是普适的原理。

虽然美国坚信全球化资本主义是“真理”，但现在，它的扩张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由于市场机制造成的贫富差距，使美国社会自身的凝聚力濒临丧失的边缘。进一步讲，由于不断扩张的经济活动受到鼓励，所以环境遭破坏、资源争夺战以及粮食价格高涨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已经开始威胁贫困地区人们的生存。

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美国人必须不停地向外部寻找“未开垦地”，这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宿命。既然向那些“未开垦地”推广他们所说的普适理念是美国的国家使命，他们就必须不停地向外挺进。然而，现在已经没有“未开垦地”了，因此，要做到既不与欧洲和俄罗斯发生摩擦，又能够推进美国的理念，就变得十分困难。不仅如此，我还认为，随着世界目睹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失败，人们开始对美国的道德领袖作用产生巨大疑问。

为了从“灭亡的深渊”中拯救人类

如此分析起来，今后十几年中，作为世界领袖的美国的历史作用，将不得不减弱。至少，因为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美国金融

资本主义已告失败，所以，美国必须重定“金融立国”战略。起码，美国的证券公司不得不放弃以前投机色彩浓厚的“杠杆经营”。

然而，事实上，现在开始阻止市场的全球化已是不可行。到目前为止，世界已经实现了高度分工，如果想制止全球化资本主义，扭转潮流，在很多国家，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不便。更何况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其能源和粮食的大半都依靠外国，控制全球化，就等于作茧自缚。

但是，在这次教训中，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呢？如果有，那会是什么？那不是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单纯否定，而是在探讨是否作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不成文前提的美国式价值观和思想就是问题所在？从积极方面讲，就是要思考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真正应该共有的价值观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去思考：美国式资本主义，进一步讲即近代西方思想到底错在哪里？应该如何修正？

地球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或资源枯竭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短期的经济萧条和股市低迷无法相比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处理失当，将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存续。而这仅仅由发达国家或是新兴国家单独考虑是不行的。

要处理这些问题，不能靠一时的应对。如果不重新审视自产业革命以来近代资本主义走过的历史，以及支撑这段历史的哲学，找出新的价值观，而是听任现状发展，人类必将面临大范围的饥饿和大规模的资源争夺战。

“蛇与十字架”的秘密

如果这样，我们就首先应该明白支撑近代资本主义，进一步讲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基础性价值观是什么，然后再考虑相对的应该提倡什么样的新价值观。如果说价值观太夸张，那就说应该考虑什么样的生活能让人在真正意义上幸福。

当然，这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课题，它的答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找到的。但是，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似乎有必要探讨一下近代西方启蒙主义、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本身的是与非。当然，启蒙主义、人文主义背后，是支撑西方社会的基督教思想。所以，最终，我们还是必须要踏入宗教的世界。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在基督教等一神教中，不存在“与自然共存”的思想。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因此，感觉自然伟大或敬畏自然的思想，与基督教无缘。基督教思想认为，虽然上帝创造了人，也创造了自然，但从一开始就存在阶层。上帝之下是人，人被托付管理自然。与其说人与自然共存，不如说不断征服自然才是上帝的心愿。

安田喜宪（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在其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蛇与十字架》（人文书院）中，通过列举各种事例，阐明了一个观点：由于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在世界的普及，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远从太古时代开始，生活在森林中的人类的信仰，不论东方西方，都表现为万物有灵论。他们对自然持有敬畏之念，从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中感受神性。如安田著作标题显示的那样，万物有灵信仰的代表性例子之一，就是崇奉蛇。人们从蛇这种生殖能力旺盛的动物身上感受到富饶的恩惠，因此祭蛇。

据安田教授讲，日本神社的“注连绳”就是雄雌两条蛇纠缠在一起的形态。人们从蛇旺盛的繁殖能力和蜕皮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中，窥视出丰饶的秘密。当然，蛇信仰不限于日本。同样模仿蛇纠缠的造型，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或中东地区分布很广，多用于雕刻等创作。这在中国也是一样的。龙就是在蛇的形象基础上创造出的神兽。对古代的人来说，正因为蛇形象怪异才把它当做圣灵敬仰，或是认为它有超人的不可思议的能力而作为畏惧的对象。

然而，在公元前几百年的时候，叙利亚和西奈半岛等地中海南部地区气候开始变得干燥，不久，森林消失，变成了沙漠。随着森林消失，蛇就不能在此生息了。没有了森林，蛇信仰也就动摇了。

于是沙漠的居民就不再信仰蛇之类的在地上爬行的神，而开始寻求天上的神。因为，如果是天上的神，就能为沙漠住民指出绿洲所在的方向。于是产生的就是以耶和華為唯一神的一神教。从这个一神教，又产生出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已广为人知。

“杀死美杜莎”的意义

作为“沙漠宗教”的一神教在上述地区诞生后，渐渐扩大影响，开始压制作作为“森林宗教”的万物有灵信仰和多神教。

如在埃及等地区广泛存在的对丰饶之神巴阿鲁的信仰，就被强烈禁止偶像崇拜的一神教镇压。《旧约全书》中就有神严厉禁止亚伯拉罕进行偶像崇拜的场面。在这样的过程中，对自古以来的蛇信仰的镇压也加大了力度，这就是所谓的“杀蛇”。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旧约全书·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在伊甸园，蛊惑夏娃吃“智慧果”——苹果的正是蛇。因此，人被逐出伊甸园，犯了“原罪”。从此以后，在基督教的世界里，蛇被看做邪恶的象征、恶魔的使者。

此外，因为改变自然崇拜的习惯是推广一神教的捷径，所以杀蛇的例子数不胜数。

据安田教授讲，希腊神话中出现的那个著名的“美杜莎”，实际上也应该理解成“杀蛇”。

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出现的美丽女神。雅典娜嫉妒她的美貌，把美杜莎变成了怪物，把她的每根头发变成一条蛇。这个故事，在义务教育阶段学过希腊神话的欧美人，似乎都知道。到欧洲的美术馆参观，可以看到很多以美杜莎被杀为题材的绘画。

例如，维也纳国立历史博物馆中鲁本斯的“美杜莎的头像”（Haupt der Medusa）就是绝世艺术品。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地下宫殿，也看到了倒立的巨大的美杜莎石像。我还记得，当时有人吓唬道：“被她看到，就会变成石头，所以不要看她的眼睛。”

当然，希腊神话中是多神的，所以“杀死美杜莎”并非根据一神教的理论执行的。但是，据安田教授讲，希腊神话的整理、完成，与一神教的登场几乎是同一时期，因此希腊当时也面临着荒漠化。随着气候变干、森林消失、环境沙漠化，蛇就从神圣的神开始转化为恶魔的化身。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和希腊神话的背景是相同的。

在欧洲，希腊神话开始被选作绘画题材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脱离了基督教精神禁锢之后的西欧社会，画家们也喜欢选择这个题材。这个事实让我们再次认识到，“蛇是邪恶的”这种看法在西方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杀死美杜莎”可以说是相当有趣的一个事例。

为了打破一神教之前的自然信仰而被妖魔化的不只是蛇。例如古希腊神话的牧羊神潘、林神萨堤洛斯，或是北欧民间故事中的瑞西，原本都是有山羊身体的神。

有一种说法是，山羊是多产、充满生命力的动物，故而古代的人们把山羊视为富饶的象征而加以崇奉。但山羊的形象，也由于基督教而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在基督教的宗教画中，恶魔被画成长着山羊犄角、腿上有蹄子的形象。也就是说，山羊开始被用作恶魔的形象了。

就这样，曾经是神的蛇和山羊变成恶魔的形象，但这不是偶然的。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来说，把这些动物当做崇拜的对象本身就是罪恶，应该被消除。

因此才有必要把蛇和山羊转换成恶魔的象征。也就是说，随着“十字架”登场，“蛇被杀死了”。这是安田的观点，非常有趣。

一神教认为“自然是征服的对象”

一神教的成立和基督教的普及，对欧洲人的自然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西欧文明认为，自然的山谷或者野生的动植物，这些存在基本上都是“恶”。而又因为是“恶”，所以人类必须征服它。

我们看看欧洲的庭院，就可以了解这一点。欧洲人理想中的庭院，是像凡尔赛宫那样，把经过人类之手进行了品种改良的蔷薇等植物，人工地用几何图形布置出来的庭院。凡尔赛宫的庭院，呈左右完全对称的造型，彰显了人类对自然强烈的征服意志。实际上，西方人的审美意识与日本人完全不同，日本人认为把山和原野这些大自然的风情再现到庭院中才是美。

代表上帝管理、征服自然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使命，这是基督教的想法。也就是说，人是上帝的“管家（stewardship）”，而自然是管理对象。不过分地讲，正因为有这种自然观，近代西欧社会才能够成就世界霸权。因为不存在对自然的恐惧心理，所以才可能客观、科学地分析自然，而近代科学革命之所以发生，原因也在于此。如果人类始终沉浸于万物有灵信仰，不舍弃对自然的畏惧心理，那么，不仅不会砍伐大树、开垦森林，还会因为惧怕详尽地分析自然而至今没有作为。

实际上，如果不确信“人类能够解明自然中的真理，管理自然”，自然科学始终不能发达。西欧人能够跨越七个大洋，在各地建立殖民地，也正因为他们对自然不感到畏惧。假使有丝毫的自然崇拜心里，想到“开发自然可能会受到惩罚”，也就不可能有美国人的西部开拓历史。因为抱有“自然不足畏惧”的思想，西欧人才能够向全世界扩张。

无疑，正因为有这种“（上帝的）管家”的思维，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才发达起来。如果“自然是神圣的”想法还保留着，波兰尼批判的土地买卖就不会进行，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成立。

但基于这种自然观的西方文明以及它最顶端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显示出了僵化的迹象。资本主义社会给人类带来的，是让人惊讶的科学发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水准的上升等，但很明显，这些均已超出了地球能够承受的限度。环境破坏无止境地进行，发达国家人们的心灵开始荒芜，社会也开始呈疲惫状态。

把自然与人类对立的基督教式思维、近代理性主义思想、人类

中心主义等，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人们终于认为有必要从中脱离了。

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一神教之前的人类，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并从动物中寻找出灵性和神性。在当时，那种自然观是“普遍的”，而征服自然的想法是特殊的。

现在，我们难道不应该再重新找回古人对自然的情感和对自然朴素的崇拜之心吗？“自然崇拜”被认为是原始宗教，是人类未开化之前的信仰，但那不过是基督教等一神教的评价。实际上，不正是在崇拜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与自然共存共荣的价值观当中，蕴涵着我们理想的目标吗？

为什么日本人能与自然和谐共存？

从上述的观点看，日本的宗教观和自然观，在当今世界难道不具有重要意义吗？

在世界的各种文明中，很少有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孕育了对自然朴素的信仰和爱。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自明治维新以来，尽管这种信仰和爱在西化的潮流中不断受排挤，却几乎没有改变地继续留在人们心底。这种文明，至少在其他发达国家中找不到。

所谓人类文明，产生于不能独自生活的人为了对抗大自然的威胁而进行的集体生活中。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黄河文明……无论考察哪一种古代文明，它们都并非偶然地诞生于城市。城市不仅可以起到抵御外敌、保护自身的作用，还可以说是人类为了对抗自然的巨大威力而创造的“一大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高度发达的文明中，自然可以成为敬畏的对象，但人类不会发展对自然的亲近感，或者与自然和谐共存。

例如，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周围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为了获得作为生活燃料的木柴，森林被耗尽，结果，出现了许多秃山，沙漠化加剧。失去了森林的大地，因无法留住雨水而衰竭。贫

瘠的土壤随着雨水流走，生物或死或消失，逐渐成为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

地中海地区也一样。据说过去的黎巴嫩拥有广阔的杉树林，但为了造船舶，不断采伐杉树，于是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广阔的森林就消失了。地中海岛屿上的情形也相同。这样看来，城市文明破坏自然、耗尽森林资源是常有的事。

在欧洲的主要国家中，对于采伐森林进行了最后抵抗的，恐怕是德国。德国这片土地，从前被称做“德意志帝国”，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是连绵不断的茂密森林。住在这里的德鲁伊教士信仰森林中的神，把森林当做圣物。他们抵抗基督教传教士，但基督教终于还是取得了胜利，于是，德意志帝国的森林就一片一片地被砍伐。结果，到17世纪时，德国的森林有八成已经被采伐掉了。

然而，在日本，以这种形式破坏自然的情况，至少到明治维新时期为止都没有发生。这一方面因为日本列岛是一块天然资源丰富的土地，另一方面，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珍惜自然、培育自然的文化。

由于生活需要，日本人也砍树，但并不只管砍伐，不管善后。他们规定，必须认真植树，这些树木将作为地区共有的山林——“里山”^①加以维护。因为，种植水稻时，具有保水功能的“里山”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把种植水稻放在农业的中心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保留森林。另外，日本把古老的原始林称做“镇守之林”，是神圣的地区，禁止伐树。在日本，神社一定建造在镇守神庙的树林当中，这不外乎因为日本人认为神灵栖身于森林之中。日本人正是在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当中，孕育了独特的宗教观。

尽管时代在推移，但这种心理到了德川幕府时期也没有消失。德川时期的江户人口达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是，

^① 里山：对村落周围的山林及其环境的总称。——译者注

据说像欧洲其他城市那样的卫生或传染病问题，几乎没有在这里出现过。最大的原因是，江户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能将城市生活中的垃圾和排泄物等进行再生处理。进行不破坏自然环境的生活，这种观念已经理所当然地深入到了德川时期的日本人心中。

据前文出现过的安田喜宪讲：“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关于森林利用有严格的规定。‘一棵树一颗头，一条树枝一条胳膊’，偷盗山中树木者，即刻斩首”（前引安田，第223页）。日本人就是这样悉心保护树木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开始西化，自然环境也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即使这样，日本的森林覆盖率仍占到国土面积的70%以上。这是日本人的自然观为日本保存下来的财产，我认为必须珍惜下去。

来到日本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常感叹日本绿色之多。日本青翠欲滴的美丽风景，并不单纯是日本所属的温带气候造就的，还是日本人常年保护的结果。

融合了神道与佛教的日本人

那么，到底为什么日本人能够自古以来就珍惜森林，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呢？

答案不言自明。

葱郁的森林、参天的大树、深山里涌出的泉水，还有巨大的岩石——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这些自然之物当做圣灵崇拜，爱惜至今。在这些神圣的地方，几乎毫无例外地建有神社，而山和森林就被作为神体崇奉。

当然，这种万物有灵的自然信仰，并不限于日本，在古代的世界到处可见，所以并不特别稀奇。然而，日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朴素的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的神道，融合了外来宗教佛教，形成了可称为“日本式神学”的思想。

将神道与佛教相融合，并进行理论性的正当化，我们称做“本

地垂迹说”^①。

原本从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中没有自然崇拜的因素。因为佛教本是为了消除给人带来痛苦的“烦恼之火”，以达到悟彻的境地为目的，因此最终努力的主体是人本身，而不存在依靠自然的神圣和灵性的思维。当然，佛教的修行者中，也有隐居到森林中、大山中去的人，但那是为了把自己置于严酷的自然中修炼，以改变对事物的认识，而不是以从自然中“悟道”为目的。

因此，虽然佛教不像基督教那样命令人们积极地征服自然，但佛教中原本也没有自然崇拜思想进入的余地。

然而，当佛教进入日本时，日本人把古代流传下来的神道与佛教思想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所谓“本地垂迹说”思想，下文我还会详细说明，简单地讲就是，“不论眼前崇拜的神的体态如何，均是本地佛的化身，可以崇拜，没有任何问题。”

例如，伊势神宫祭祀太阳神天照大神，而天照的本地佛是大日如来。再如，熊野本宫祭祀“素盞鸣尊”，它的本地佛是阿弥陀佛。也就是说，拜神本身也等于在拜佛，这就是本地垂迹说思想。

常有人说，日本人新年首次参拜去神社，到了春分、秋分和盂兰盆节就去寺院供奉祖先，而到了冬天又庆祝圣诞。对此，很早就有人批评道：这样的日本人，难道不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吗？日本莫不是没有宗教的民族？但那只是表面现象，至少，对于佛教和神道两者并立，古代的日本人有系统的神学解释。

日本没有将天上的神尊为唯一神的宗教。但是，日本人有独特的宗教观。他们从路边生长的一草一木中感受神和佛的存在，认为人是依托自然而生的。日本人日常使用的语言中，表示感谢的心情、诚惶诚恐的心情的用语以及吃饭前的祈祷等，原本都来自佛教。如果从是否信奉特定的神这点来讲，日本是“无宗教”；但说到是否有

^① “本地垂迹”是佛教用语。“本地”指佛的法身，“垂迹”指佛为了化度众生而随时应机说法的化身。——译者注

整体的宗教心，还是应该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有宗教心的国民。

我无比尊敬的已故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常开玩笑道：“天主教是小时制宗教，日本的宗教是全日制宗教。”意思是说，“天主教徒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可以随心所欲，到了礼拜日只要去教堂忏悔就能得到宽恕。所以他们沉浸在虔诚心中的日子，只有礼拜日”，“但是，日本人整天都在说谢谢款待啦、感谢好意啦，看见路边的小神社和地藏菩萨，也要马上祈祷。日本人有的是那种日常化的宗教观”。

试着想想看，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成百上千上万的人到了正月就去进行新年的首次参拜，这件事本身在发达国家中就是异常现象。说日本人没有宗教心，那是大错特错。

本地垂迹说与“日本式自然哲学”的确立

据古代传承下来的建国神话讲，日本被认为是“神国”。

综合《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的记载，日本列岛原本是诸神创造的土地，为了直接统治这片土地，天上的高天原国的诸神命天孙瓊瓊杵尊降临。这样，高天原的神就被认为是延续至今的日本皇室的祖先。

并且，在日本这块地方，不单有皇室的祖神（皇祖皇宗），还有千千万万的神存在。无须多言，这千千万万的神，多数以大树、巨岩或者深山为神体。也就是说，日本各地的自然本身就是神，古时的人故而认为日本是神国。

日本信仰的神道，起源于这样的自然崇拜，当佛教传入时，日本人并没有在自然崇拜或佛教思想中作选择，而是让两者并立共存，于是就产生了“本地垂迹说”。

关于“本地垂迹说”，我已经讲过了，下面再从神学角度做一些说明。

神学的解释大意是这样的。由于佛教的教诲、释迦牟尼创造的缘起思想，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真理，所以，这个真理，不仅在古

代印度，在古代日本也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这样，普度众生的佛，从世界开始那天也就在日本存在了，不然就不合理了。这样想来，在创造日本列岛的时候，日本就有了诸神。于是，日本的诸神，实际上，就应该认为是佛为了拯救日本的众生而显现的化身。

历史小说中，常描写从前的武士，出征前去“南无八幡大菩萨”等处参拜的情景。据说，原本“八幡神”是从日本最古老的时候就信仰的一个神，从大分县的宇佐八幡宫开始，普及全日本。八幡神的起源，还有很多部分笼罩在迷雾中，但肯定是有史以来就被信奉的一尊神。至于八幡神为什么用佛教的“菩萨”来称呼，有解释说，是因为印度的菩萨在日本现身时，变成了八幡神的模样。于是就用“八幡大菩萨”来称呼了。

所谓本地，原意是“佛教的真理”，因为在日本垂迹（作为神的形式出现），于是出现了本地垂迹说。不只是八幡神如此。日本神话中的最高神天照大神，也被认为是密教的中心本尊大日如来。当这种思想推广之后，各地神社为了祭奠神也就是佛，开始建造有僧侣侍奉的“神宫寺”。所谓“神佛习合”即神佛合二为一的信仰，就这样开始了。

西行与芭蕉之所以被当做圣人景仰

那么，随着这种本地垂迹思想的形成，日本人自古传承下来的自然崇拜心理变得越发强烈。总之，从这种思想出发，日本列岛不仅是千千万万神灵所在的“神国”，同时也成了佛祖保佑的“佛国”。

在我们这些受近代思想影响的人看来，这种本地垂迹思想简直是奇特的学说。但是，由于这种神佛融合的独特思想，日本人自古持有的朴素的自然崇拜就被定位为日本文化的基础。

因为，日本是神国的同时还是佛国，故而日本人开始相信，就连生长在路旁的无名小草也有神性和佛性。这种情况用语言来表达，

就是“山川草木国土悉皆佛性”或“山川草木国土悉皆成佛”。因此，人们相信，一味根据人的需要采伐森林会受惩罚，森林中的鸟鸣、虫叫，都是祈祷人们成佛念的经。

这样，自然是神圣的，人在它的保佑下生活，这种思想就开始在日本社会扎根。因此，如果不能理解本地垂迹思想，也就不能理解日本文化。

然而，最近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却不再出现“本地垂迹说”。在演讲中提到这个话题，能有反应的，也只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或者更年长的人。

日本的学校为什么不再教授如此重要的历史事实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麦克阿瑟进驻日本时，命令停止了三个教学科目。这三个科目就是“历史”、“地理”、“道德”。麦克阿瑟的意图在于，通过不教授这些科目，来剥夺日本人的爱国心。这是麦克阿瑟削弱日本战略。日本的教育界完全上了这个圈套。日本的年轻人不再学习任何与本国历史、神话、宗教有关的知识了。我自身的经验也如此，在外国生活的日本人最困惑的是，对本国的事情所知甚少。

文章写到这里，有些离题了，言归正传。使这样的日本式自然观以文学的形式结晶的，是有歌圣之称的西行法师以及无比尊敬西行的俳圣松尾芭蕉。

西行和芭蕉都曾在日本列岛漂泊，所到之处用和歌或俳句形式咏出了自然的风貌。他们热爱自然，把自然作为题材，却并不单纯是因为喜爱自然。他们相信，把盛开的鲜花、潺潺流水或者青山和蝉鸣作为文学素材处理，本身就是修行，也算是对死者的供奉。在旅行中生，在自然中活。正因为有很多日本人感觉像他们那样的生活方式才是人生的理想，西行和芭蕉才分别被称做歌圣和俳圣。

这种感情，至今仍存在日本人心中。元旦的清晨，男女老幼都去登山，在山顶，面对日出合掌，祈祷一年的幸福；到了春季，全日本的人们一齐出动去赏樱花，这个习惯延续至今。这些活动并不单纯为了娱乐，无疑在这当中还包含着某些刺激日本人宗教感情的

因素。

新年去神社参拜，盂兰盆节去寺院祭祀，日本人对此不感觉矛盾。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而是因为“日本式神学”中，去神社和去寺院完全可能并立。正因为有这种日本式神学的存在，日本才能从古至今地保护美丽的自然。

世界史上例外的“独一无二国家”、“独一无二文明”

关于本地垂迹，我已经做了很长的说明。像日本这样，自古以来就维持着自然崇拜的国家，至少在所谓的先进国家中没有第二例。原本在G7（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中，非基督教的国家就只有日本。

虽然，现在在日本之外的非西方、非基督教文明圈中，出现了中国、印度、韩国等经济新兴国家，但是，如果问到这些国家的人们，是否也像日本人一样，认为一草一木中都有神灵栖身，从而一贯地保护自然？回答是否定的（当然，印度人普遍信仰的印度教是多神教，与日本相似，崇拜起源于自然的各种神，但印度教并没有与自然崇拜相结合）。

那么，为什么同在亚洲圈，受基督教影响都很少，却只有日本从古至今一直保持了自然崇拜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日本这个国家在世界史上有它的独特性。

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教授指出：在地球上的主要文明当中，有史以来一直维持着“独一无二国家”、“独一无二文明”的，只有日本。在《文明的冲突》（集英社）中，亨廷顿将地球上的主要文明分为七个，但无论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西欧文明，都有过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受到其他民族支配的经历。

最先统治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是继承了古希腊文明衣钵的古罗马帝国，但不久，这个罗马帝国又由于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而灭亡。

随之，欧洲进入中世纪。而支撑欧洲精神的，则是旧教的罗马教会。所谓西欧文明社会，一般性地解释认为，是依据希腊哲学（希腊精神）、罗马法、基督教（希伯来精神）三种因素形成的。再补充一点，现在生活在希腊的人们，不是古希腊人的后裔；而现代意大利人，也并非古罗马人的直系子孙。

至于中华文明，情形也相同。

当今历史学家的定论是，现在的中国人，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住民，从人种角度讲，已经完全不同了。从4世纪初开始，即从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中华大地上的主人公，就是以鲜卑族为首的周边游牧民族。据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后，汉族几乎被灭亡。而成为之后称霸中原的隋唐帝国中心的，正是鲜卑族。再之后，战乱反复不断，出现了蒙古的元帝国、女真族的清帝国。因此，虽说“中国有4000年的历史”，但当中已经没有人种的连续。

弥生人没有征服绳文人

这样，全世界的文明，基本上是在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异文化间的冲突中形成的，但日本是个例外。

日本自建国以来，除了20世纪美国占领的时期，从未有过被其他民族支配的经历。即使追溯到史前，在日本发生的大规模人种混合，也只有公元前3世纪左右弥生人大量迁徙到日本列岛的例子。之后，虽然也有人渡海而来，但那些都没有达到民族大迁徙的程度。

并且，即使这些弥生人的到来，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侵略和民族大迁徙不同。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个时期弥生人的确带来了稻作文化，但原住民族绳文人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此消失，也没有绳文人被弥生人屠杀或当做奴隶的证据。被认为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弥生人的集体移居，与其说是弥生人对绳文人的征服，不如说是两种人群的文化融合，而后者更符合实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日本是个岛国。鉴于当时的航

海技术，终归不可能发生能与民族大迁徙相匹敌的、大量的异民族一举涌入日本的情况。因此，渡海而来的弥生人一定像“五月雨”一样，少量分批陆续过来的。正因为此，渡来的弥生人也就不得不与原住的绳文人友好相处、和平融合。而弥生时代之后，在日本没有发生过其他国家或地区那种大规模的人种混合。

这样，日本自有史以来，就一直维持着“独一无二国家”、“独一无二文明”。而日本人得以从古至今保持了自然崇拜的传统，也应该是绳文文化和弥生文化融合的结果。

对于以采集生活为中心的绳文人来说，大自然无疑是值得畏惧的。这是一块拥有丰富物产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绳文人，对自然会产生一种朴素的信仰，是一件不难想象的事。

绳文人这些朴素的自然崇拜，对于当时具有先进的农耕文明、移居而来的弥生人来说，原本应该感到厌恶。按照“历史的常识”来讲，通常的情况是，弥生人赶走绳文人的神，然后强求他们信奉自己的信仰。

然而，实际上却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绳文人信奉的自然崇拜，原封不动地被弥生人继承下来。与后代的日本人一方面引进佛教，一方面又保留了自然崇拜为基础的神道一样，弥生人也没有否定绳文人的信仰。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原因之一是作为征服民族的弥生人的人数不足，这一点我已经指出过。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稻作农业不同于小麦和大麦等旱作农业，有必要巧妙灵活地运用大自然的力量。

通常，绳文文化与弥生文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靠自然的恩惠生活的采集、狩猎、捕鱼文化，后者则是需要智慧来征服、控制自然，以确保收获量的文化。于是，人们很容易认为，绳文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谋求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生活态度，而弥生文化则是征服自然的思维，但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

这是因为，就稻作而言，与征服自然的思维相比，采取与自然协调的思维更必不可少。水田耕作，必须要确保水源。为了确保水

资源，就必须修建“里山”，提高森林的保水能力。之所以稻作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农业，是因为稻作农业重视创造一片“里山”与自然协调；而如果彻底征服了自然，稻作便不能进行。

但是，以小麦和大麦为主要收获物的旱作农业的情况则略有不同。首先，旱作农业要尽量扩大田地的规模，建立起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如此，才能形成地下水为农业所用的结构。据说在公元前几千年一度繁荣的苏美尔文明之所以消失，就是因为过度使用地下水造成作物生产量不断下降，最终使人类不能生存下去。这种情况不限于苏美尔。一般认为，种植小麦和大麦的旱作农业，有使土地沙漠化的倾向。然而，稻作必须确保水源，因此，与自然的协调十分重要。

沾满鲜血的希腊神灵

弥生人与绳文人的生活和信仰进行了和平的融合，关于这个推论的根据，可以列举出各种各样例子，但最明确的根据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记载的神话。

我们这些习惯了恬静甚至田园牧歌式的日本神话的人，如果读希腊神话，将会被震惊——希腊的神灵们都十分具有战斗性，喜好血腥气。

比如，希腊神话的主神被认为是宙斯。而这个宙斯，实际上并非一开始就是天地的统治者。宙斯能够成为最高神，是因为他在与他父亲克洛诺斯率领的泰坦一族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获得了胜利。说起来，宙斯的手上沾满了他父亲的血。当然，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也是如此。因为被预言者告知，“你将被你儿子推翻”，他就一个接一个地把出生的孩子吞掉。这种事，想起来都觉得残忍。唯有宙斯，由于他母亲的机智，被藏在山洞里才免于被父亲吃掉。结果确实应验了预言。但不管怎样，为了夺取权力，确实需要进行激烈的斗争。

日本人从“天上的神祇”这句话联想到的，是富态、稳重的印象。但希腊的神灵绝不是那样的。

像宙斯和他父亲这样的神祇之间的斗争，在宙斯获得最高神的宝座后也没有结束。那场有名的特洛伊战争，根据希腊神话，原本是神祇们之间的内讧引起的，作为各自神祇的代表，希腊与特洛伊打了起来，实在是不太平。

日本神话与希腊神话的另一个大区别是女神的存在。日本的最高神天照大神是女性。这找遍全世界的神话，也几乎别无他例。并且日本神话中出现的女神，极其温和、贤惠。然而，希腊的女神们，虽然十分美丽，但很多都极其淫乱且嫉妒心强。比如男人们都会憧憬的维纳斯（阿佛罗狄忒），只要见到好男人，不管是男性的神也好，人间的英雄也好，马上就把他据为己有。这种故事，在希腊神话中处处皆是。

为什么日本神话与希腊神话，对女性的看法有如此大的不同呢？回答这个问题，已超出我的能力。但是，通过反映西欧社会根本的希腊神话，以及日本这个国家起点的日本神话（《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我们大体能了解西方人与日本人的世界观有何不同（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吉田敦彦《日本的神话》、《希腊罗马神话》等）。

总之，当时的希腊人一直传承着这些神话，无疑是因为他们从中感受到一种真实。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地中海地区，与神灵的战争相同，人类也曾反复进行过腥风血雨的战争。而在那些战争中，普遍的情况是胜利者统治、虐杀、奴役失败者。

日本以独特的“让国”方式实现统一

希腊神话讲的是多神的世界，而与犹太教、基督教等一神教世界的情形，也相差无几。

诺亚洪水、烧毁索多玛和蛾摩拉两个城市，正如这些故事所反

映的那样，《旧约全书》中出现的上帝耶和华是恐怖的存在，他对于那些不再信奉自己的人类，会立即将他们的整个城市、整个民族全部毁灭掉。再有，我也已经讲过，上帝还命令以色列人一个不留地歼灭异教徒。

因为是一神教，所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很自然。在犹太教、基督教的世界里，不要说与异教徒共存，就连文化融合也不可能。那里存在的，永远是吃掉还是被吃掉的斗争，是一种紧张关系。

然而，在日本的神话中，像希腊神话和《旧约全书》中那种血雨腥风的故事，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过。

比如，天照大神相当于希腊神话的最高神宙斯，但天照大神与宙斯不同，她不是通过斗争才成为最高神的。天照大神是世界的创造神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生下的其中一个孩子，是从一开始就受天界委托统治人间的。

也就是说，天照大神从一开始就被授予最高神的地位，但之后没有发生矛盾吗？也并非如此。天照大神的弟弟素戔鸣尊生性粗暴，在天界惹出了种种问题。

但是，天照大神并没有直接处罚他。而是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对素戔鸣尊的胡作非为感到愤怒的天照大神，干脆躲进岩洞里去了。这也说明，日本的诸神从一开始就与争斗无缘。

故事的下文是：最终，天界对素戔鸣尊采取了放逐的惩罚，但在被放逐的出云国，素戔鸣尊消灭了八歧大蛇，然后，与差一点儿成为八歧大蛇牺牲品的奇稻田姬结了婚，成为出云国的统治者。原本粗暴的素戔鸣尊，不仅没有被杀死，反倒抓住了幸福，这反映出日本神话喜好和平的特性。

到了素戔鸣尊第五代子孙大国主命的时代，天界的天照大神命令天孙瓊瓊杵尊统治人间。如果在希腊神话中，必定会爆发一场高天原国的诸神与出云的大国主命之间的大战。

然而，在日本神话中却不是高天原方面突然来攻袭地上，而是三次从高天原派遣使者到出云进行说服工作。于是，大国主命终于

决心让位，之后，瓊瓊杵尊才从高天原下来，即天孙降临。

无须多言，降临下来的瓊瓊杵尊的曾孙就是神武天皇，是日本皇室的起源。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天界的诸神取得日本的统治权，是完全通过和平交涉进行的。并且，大国主命这些地上的诸神，也没有被当做失败者遭到屈辱的对待，而是作为出云大社的主神，一直供奉至今。

当然，神话毕竟是神话，并非史实。但作为胜利者的大和朝廷编写的《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中，记载了这个让位的神话。至少不会有人反对这样一个事实：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并没有依据“力量就是一切”、“战争决定正义”的理论进行操作。

接下来的内容不过是我的推测：或许绳文人与弥生人之间，也以同样的形式进行了文化融合。

实际上，日本各地的神社和佛阁，有不少是史前就开始作为“圣地”崇拜的。并且，那些被作为圣地的场所，或是高山或是被称做磐座的巨岩，据推测，都是稻作农业进入之前，人们就开始信仰的。

当然，实际上，弥生人的文明程度比绳文人高许多，但弥生人并没有否定绳文人的信仰，相反，把它们吸收进了自己的文化中，实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绳文文化与弥生文化融合的原因

那么，稻作文化与采集文化的和平融合，为什么在日本列岛发生了呢？

当两个集团遭遇时，通常是胜利者消灭失败者，即使失败者不被消灭，他们的文化和信仰也会被完全否定。这应该是历史的一般法则。但为什么在日本，这样的事情却没有发生？并且，这种融合模式在之后也多次出现。例如，日本人既接受了佛教，也没有否定以往的神道；一面吸收中国文化，同时又形成了国风文化。

这种日本式文化变迁方式的根源，我认为正是绳文人与弥生人的相遇。弥生文化与绳文文化融合的一个原因，当然在于弥生人没有根绝绳文人。

另一个原因，是受到了日本国土的限制。在这样狭窄的土地上流血，祸根将会一直延续下去。弥生人应该进行了如下的判断：征服本身很简单，但与其那样，不如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和信仰谋求融合更加有利。

除了关注那些“合理的判断”之外，我更想关注的是，日本的绳文时代持续了近一万年这个事实。

原本从近代的进步史观看来，依靠渔猎生活，即所谓的采集、狩猎、捕鱼的生活，是“未开化”的生活；而能够提供稳定生活的农耕生活，更“高级”一些。而实际上，无论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埃及、中国的古代文明，都与农耕有着割不断的关系。

从这个观点看，当时日本的“文明程度”实在落后。关于弥生时代的开始，根据学者的研究有多种说法（本书暂时采用公元前3世纪说），但无论采用哪种说法，与隔海相望的中国相比，日本开始农耕的时间要晚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近几年的研究，中国的农耕文明发祥于长江流域。其中，最古的农耕遗迹被推断其出现时间为公元前15000年左右。顺便说一下，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最早的农耕遗迹是公元前9000年的。关于日本农耕开始的时期，即使采用最早的说法，也不过是公元前1000年。因此，与中国相比，落后得不值得一提。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日本列岛的确属于亚洲的落后地区。

绳文时代一万年历史的秘密

如果问为什么农耕文明进入日本很迟，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日本列岛的地理特性。也就是说，由于日本是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国，从而妨碍了农耕文明的传入。

但是，原因果真就这么一条吗？

之所以这样问，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列岛开始农耕文明的时间的确很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属于采集文明的绳文时代竟然延续了近一万年。也就是说，日本列岛食物来源十分丰富，以至于从公元前一万几千年开始，人们靠采集就能维持生活。并且日本列岛气候也很温暖。

顺便提一句，我们说到绳文时代，就会联想起那个具有有力形状的绳文陶器。绳文陶器的出现，在世界上也属于较早的。也就是说，虽然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们，的确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种稻子，但并不能因此就断言他们处于“未开化”状态。

现代的研究已经证明，一万几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结束进入绳文时代，那时的日本列岛，气候已经很温暖。绳文人能够制作陶器，换个角度看，也就说明他们的生活已有相当的富余。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必须引进农耕文明的必要性不那么大。

实际上，近年发现的青森县三内丸山遗址，据推断距今有4000~5500年历史。这个遗址的出土物表明，这个时期，绳文人已经开始了长期的定居生活。提起狩猎采集生活，人们的印象是，为了寻找食物而流浪的生活。但现在从青森县的遗址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能够获得定居生活所需的食物，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绳文人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

敬畏自然的日本人和征服自然的欧美人

绳文时代延续了一万年之久，我认为，这对于后来的日本文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已经讲过，日本列岛后来的居民弥生人，并没有抹杀绳文文化，原因之一，应该与绳文人的文化本身很丰富，并确立了坚强的精神地盘有关。正因为这样，弥生人及其后裔——古坟时代的人们，依旧把绳文人信奉的圣地当做圣地，并继承了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之

情和崇拜心。

再之后的时代，尽管佛教和中国文明这些先进文明传入，神道也没有被排除；不仅如此，还创造了“本地垂迹说”这样的日本式神学。这是因为延续了一万年的绳文时代的精神远远流淌，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我认为，只有这样分析，才能理解为什么只有日本人拥有“与自然和谐共存”这种独特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意识。

这种绳文式思想，并不单纯表现为崇拜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比如，日本人具有热爱“朴素美”的独特感情，这也可以说是绳文式的感受。

我讲过，西方一神教认为“自然是征服、管理的对象”，这是西方思想的根本所在。在这种思想中，没有人会认为“自然态”即朴素的造型，是高级的美。

在认为人是万物之灵的一神教思想中，即使艺术品和工艺品，也只有优秀的创作者凭借其审美观进行了细致的加工，凝聚了种种匠心的作品，才是上等品。巴洛克和洛可可之美，正是其象征。在伊斯兰文化圈或中华文明圈中，基本上也有相同的认识。

然而，就日本人的审美观而言，一方面的确也喜好纤细和壮丽之美；但另一方面，又能从不经过任何加工的、朴素的事物当中感觉到美。

比如，战国时代产生的茶道，就如实地反映了这种审美观。在千利休创立的茶道中，精雕细琢的茶具从来不受欢迎。人们好像只有在柬埔寨、越南等地老百姓使用过的、形状略有扭曲的陶器中，才能感受到“闲寂和幽雅”。于是战国的大名，为了弄到那种简陋的茶具，不惜重金。这与欧洲和中国的王公贵族大不相同，他们在获得权力和财富后，就倾向于喜好“金碧辉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有趣的书是吴善花著的《日本式精神的可能性》，PHP文库）。

这种审美观在宗教艺术方面也有相同的表现。本来，在印度和中国的佛教中，装饰华丽的释迦牟尼像和菩萨像被认为是尊贵的象征，因此，佛像常用贵重的金属制作或者在佛像外面包金。而且，

佛教寺院也通常用朱漆涂成红色，让人有奢华的感觉。

然而，佛教传入日本后，顿时变得喜好简朴了。的确，在初期，佛教中也有像东大寺那样炫耀富贵和气派的设施。但随着时代的推移，佛像制作也开始转变成只利用木料的本色。至于寺院，禅宗的寺院建筑简朴，出现了只利用石头和沙子建造的石庭。

这样，在日本，随着文化程度或经济水准的提高，人们反倒感觉放弃豪奢、追求简朴才是上流的。“能”^①和“茶道”的主导思想是，“彻底精简”才能产生最高级的美。西方产生这种审美观，还是最近的事情。

比如，在建筑方面出现德国的鲍豪斯（Bauhaus）那样简单的设计，不过是20世纪初的事情。而在日本，被评价为简朴建筑极致的桂离宫，其建筑时代是17世纪。从这点来看，可以说日本人的审美比西方人先行了几百年，而且还可以知道，西方人也就在最近才从“自然是征服的对象”这种教义中脱离出来。

日本文化对解决环境问题的贡献

如此说来，对日本人而言，“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绝非像西方人那样最近几十年才产生，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多年以前。

正因为此，可以说日本的传统文化，处处都渗入了绳文时代以来尊重自然的思想。茶道、花道、和歌、俳句、日本庭园等，每一样都以自然为题材。寄托于自然来表现喜怒哀乐，这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其形成绝非偶然。

当然，这种思想的产生，除了得益于日本列岛自古以来温暖、适宜的生活环境，还缘于为了在这片有限的土地上生存，人们必须

^① 能：日本最古老的戏剧。在独特的舞台上，主角戴着面具，伴随着曲子缓慢舞蹈。开始流行于14世纪以后。——译者注

为保护、维持自然付出不断的努力。因此，我们当然不能傲慢地以为，是“日本人的优秀品质孕育了保护自然的精神”。

但是，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文化能达到像日本这样境地的国家和地区，寻遍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别无他例。并且，这种精神，不是来自浅薄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活动，而渗透到了生活的所有层面。

众所周知，人类没有自然就不能生存下去。换句话讲，就是人类依靠自然而生存。这一点，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也没有变化。相反，正因为处在消费文化如此发达的时代，才更要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然而，全球化资本主义却把自然环境也商品化，使之能在市场上买卖。近年来，连 CO₂ 的排放权利也正逐渐成为买卖的对象。这到底是不是解决问题真正正确的“方法”？现在我们应该停下脚步，好好思考一番。关于地球变暖的问题，果真只要遵从市场原理就能解决一切吗？观察近来全球化资本主义横冲直撞的态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西方近代思想主张的一切都能够依靠经济原理来解决是否正确，进一步讲，就是思考构成这种思想基础的一神教教义，到底是否正确？

在这样一个环境遭破坏、资源不充足的时代，不正需要日本人自古培养起来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吗？我这样想，也绝不是夸大妄想吧。

前面谈到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中，大约只有日本例外地维持了“独一无二国家”、“独一无二文明”。今天，世界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惊涛骇浪中动荡，不正需要日本发挥它的独特性，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吗？

下一章，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第六章

把日本的“安心感和安全感” 输送给世界

日本人与古罗马人的共同点

前一章我讲到，日本文化中“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绳文时代。农耕文明之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能够在日本延续下来的原因之一，在于弥生人没有虐杀或驱逐绳文人，而是选择了与他们融合的道路。

作家盐野七生写道：古罗马共和国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是因为古罗马人没有否定被征服民族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反而采取了与他们积极融合的方式（《罗马人的故事》，新潮社）。虽然把罗马帝国和日本作直接比较有困难，但征服者虐待、杀戮被统治者的事情，在世界上不足为奇，而日本却选择了与之不同的道路，无疑是创造了一种有特色的文化。

尽管这么讲，但我并没有打算在此提出这样的主张：“日本人历来就是爱好和平的国民。”日本历史上有过源平之战、战国时代的群雄争霸，进而还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这些例子说明，日本也和欧洲一样有过战争的历史。说日本自古以来就是热爱和平的，这与事实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尽管这样，如果问：为什么绳文人和弥生人能够融合？我想下面的假设应该是成立的。

那就是，“在日本列岛这样封闭的空间，与其靠力量的大小强行

解决问题，不如选择协商和相互理解，谋求共存共荣路线，从长期看，这更是上策。”这种判断，在当时日本列岛的住民中间是共有的。

观察今天世界各地发生的民族纷争，我们能够明白，一个民族或一个团体征服他人时，歼灭对方或者使他们成为奴隶这种解决方法，乍看似乎很保险，但是结果只能招致另一方的报复。从一时看，依靠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可以控制住对方的行动，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很难不导致一场消耗战。在这个意义上，诉诸暴力的战略，从长期来看最终导致的损失也很大。

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罗马共和国的故事。在它的草创期，罗马人不过是意大利半岛的少数派。当时的意大利，已经有伊特鲁里亚人等拥有高度文明和军事力量的人群居住。罗马人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强大起来，就不能依靠暴力。对他们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采取与他人融合、协调的方法。

同样，古代的弥生人或是大和朝廷的祖先们，也并没有采取征服原住民的方法，而是认为融合路线、协调路线才是上策。历史上，大和朝廷就曾不断地笼络“非顺民”。他们选择的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外国人惊叹幕末和明治时期的“安心感和安全感”

可以准确地讲，不依靠暴力进行统治，而采取相互融合、相互协调的方式，在其后的日本也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基因”被继承下来。

我们不妨看看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的情况。那时访问日本的欧美人，多数都曾感叹道：不仅作为统治者的武士阶级，而且作为一般老百姓的日本人都与他人和谐相处，十分有礼貌。

渡边京二整理了幕末和明治时期访问日本的外国人的手迹，并对其内容作了充分介绍。他在《看日本：逝去的面影》（平凡社图书馆）一书中，多处引用了欧美人的感想。这里介绍其中极少的一部分。

1874年，为进行天体观测来到日本的墨西哥天文学家迪亚兹·克巴尔比阿斯曾说，建在野毛山的观测所从未遭到偷盗。晚上常常一个人不带武器，坐陌生人力车夫的车外出到偏僻的地方，也从未遭到暴力袭击或侮辱。他感叹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可以如此安全自由地行动且不受到任何伤害啊！”^①（前引渡边，第169页）

此外，第一任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写道：“所有店铺大门都敞开着，能一直看到里面。后面一般都有个院子，一家人坐在那里劳作、玩耍，手上都在忙活着什么。早饭、午休、冲凉、女人做家务、光着身子的孩子们嬉戏、男人们谈生意或做手工等一切尽收眼底。”^②（前引渡边，第156页）他感叹日本社会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处处洋溢着“安心感”和“安全感”。

缘于岛国的长期互惠战略

像上文这样的例子，在《看日本：逝去的面影》中有很多。那么，为什么日本社会能够如此的安全、有序呢？其理由，甚至不必说读者也能明白，因为在人员流动性很小、生活空间有限的岛国日本，如果选择乘人之危或钻空子追求眼前利益的方式，反倒会遭受损失。日本人看上去似乎没有心机，是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更重视彼此长期的交往，而不信任、更不佩服耍小聪明找机会小赚一把的家伙。他们更喜欢能给对方以安心感、比较周到细致的人。

而欧洲国家或中国，它们与其他国家陆地相连，而且有被异族征服的历史，在这样的社会中，出于生存的需要，要求人们有相机而动的灵活性，像日本人那样轻易地相信对方是不可以的。进入到这样的社会，日本人就会感到困惑。本以为交往的对方不会背叛自己，结果却轻而易举地就遭背叛。这样一来，就再也不敢相信人了。

① 中译本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译者注

② 中译本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译者注

所以，在国外，日本人活得十分劳神。

城市是一个总有身份不明的“外来者”流入的地方。即使做了背叛他人信任的行为，只要逃离这个城市，就不可能再被追究责任。在这种流动性大的社会中，不仅不能够放松对他人的警惕，甚至如果没有利用对方的厉害手腕，便无法生存下去。

但是，在日本，这样的态度反倒会不利于在社会中生存。因为，生活在岛国上的人流动性很小，生活中遇到的必定总是同一拨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只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最终就会失去周围人的信任，很难实现长期的目标。

正因为此，在日本生活的上策就是：首先相信别人，同时正直地行动，以此来获得他人的信任，即采取所谓的“共存共荣”的长期互惠战略。

在日本的神话中连“诸神的政权交接”也能和平过渡，而在从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转换中也被认为斗争性因素很少，我认为这些都与日本的特殊情况有关。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就能对日本“政权的和平交接”进行更合理的说明。

奠定战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 “谈合”、“系列”的秘密

日本人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重视协调和共存，重视“和的精神”，也因此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各种批判。

特别是在美国式资本主义看来，在平等条件下应该进行自由的价格竞争，但日本企业优先考虑长期的信任关系，因此美国人批评这种做法否定市场原理。“谈合”^①、“系列”^② 这些词语，被用作封

① 谈合：一个行业的主要企业在投标前，通过内部协商，商定好投标价格等。被认为是一种破坏招标制度的违法行为。——译者注

② 系列：企业间在资本、经营者、生产、销售等方面结成的一种紧密的联合关系，以确保持续、良好的交易关系。——译者注

闭的日本经济的象征。

的确，美国的这些批判并非全无道理。特别是在完全不存在市场竞争的公共部门，由于常规性地进行被称做“谈合”的会商，因此造成效率低、税金浪费等情况，这是我们不能否定的事实。

但是，如果听任美国式市场原理在日本发展，日本就能培养出“健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吗？也不能这么说。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由于实行优先遵从市场原理的“结构改革”，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受到了多么大的打击，就清楚了（关于这一点，第七章将详细讨论）。另外，我在前文已经讲过，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是因为执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政府实行了适当的社会福利政策、劳资协调路线以及对企业采取了统筹管制措施，未必只是采纳市场原理的成果。

同样，日本经济在战后取得如此大的飞跃性发展，无非就是因为超越了市场原理，采取了重视长期性关系的战略。具体讲就是：重视企业之间（“系列”）、企业与员工之间（以终身雇佣为轴心的劳资协调）、金融机构与实业公司之间（主银行制度）或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审议会制度）的关系。如果企业与各部门以及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结成长期的信任关系，质量就可以有保障；如果劳资之间采取协调路线，就不会发生因罢工而停业的情况。可以说，日本的企业是依靠相信对方，才以有形或无形的形式成功地降低了成本。按经济学的说法，就是节约了相应的交易成本。

这不只限于国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也同样如此。曾经是粗劣产品代名词的“日本制造”，能够变身成高品质的象征，在世界市场中战胜竞争对手，就是因为日本企业不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以获得顾客长期的信任为目的，始终坚持生产有良心的产品。

协商生产思想打造日本汽车王国

这样诞生的“日本品牌”中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日本汽车。

现在，丰田公司已经超过通用公司，拥有世界第一的生产量。并且，在收益方面它也成为出类拔萃的存在。日本汽车之所以能成功占领全球市场，最重要的在于日本汽车的高品质。

日本汽车制造商的质量管理水平之高，一个象征性的表现就是：新上市车的故障率非常低。曾经一个时期，人们也对日本的汽车说过：“刚发布的新车还是不买为好。”不限于汽车，任何产品，在上市初期都会出现设计阶段预想不到的意外。特别是汽车又是昂贵的商品，如果出现意外，还会关系到生命安全。因此，在生产稳定之前，采取观望态度，这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被视作常识。

但是，日本的汽车制造业颠覆了这种“常识”。即使现在，对美国车，人们仍旧认为新车发布之后一段时间不买为好。但唯独对日本车，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已经没有人这样讲了。

究其原因，在于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在新车设计的流程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

汽车这种产品，并不是所有的零部件都由汽车厂家生产后组装，而是从引擎零件到车身的钢板再到螺丝钉，分别委托各种零部件厂家生产，然后由汽车厂家组装。而一辆汽车，据说有2万~3万个零部件。

发售的新产品容易出毛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多达几万件的零部件的质量管理很困难。或者是零部件的精度和材料没有达到设计要求，或者是出现设计团队没有预想到的强度不足和不合适，这都会直接发展成故障。但是，由于零部件很多，所以上市前检查出这些毛病，非常困难。

因此，日本的汽车生产商为了提高零部件的可靠度，采用了“协商生产”^①方式。

之所以在零部件上出现毛病，根本原因在于，组装企业和零部

^① 协商生产即 design in。——译者注

件企业之间没有进行信息的共享，也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从设计阶段就开始和主要零部件生产企业，进行密切的信息和意见交换。企业不再是到了零部件的订货阶段才向零部件商提供信息，而是从新车开发的初期就向零部件商提供设计信息，同时也汲取零部件商最新的技术信息和建议，以生产出最尖端的汽车。协商生产就是通过相互共有信息，从而提高产品整体完成度的一种尝试。

从结果来说，因为这种协商生产方式，人们对日本车产生了极高的信任度。再有，由于在生产现场密切地进行信息交换，零部件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积极性也得到提高。它们不再是单纯的“承包”，还成为汽车制造企业的合作伙伴，因此，很自然现场的干劲就提高了。

这样，与美国的汽车相比，日本车“磨合”的精密度提高、产品的完成度提高，于是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当初，日本车的魅力单纯在于价格上的竞争力或是耗油量少等方面；而现在正如雷克萨斯的人气所象征的那样，在高级轿车领域日本汽车也获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美国汽车业为什么败给了日本？

即使我不重复读者也很清楚，这种协商生产方式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日本的汽车公司与零部件厂商之间，建立了长期的交易关系，彼此互相依赖。

从汽车制造商的立场来讲，协商生产方式就意味着把新车的的设计图这种绝密信息透露给外部；而从零部件商方面来说，长期配合协商生产方式的程序，就是泄露自身的技术信息，并需要极大的先行投资，所以能否得到股东们的支持也是个问题。

因此，从长远看，即使知道协商生产方式可能会给双方带来很多好处，但要将之付诸实践，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横在前面。之

所以能够清除掉那些障碍，就在于汽车制造商与零部件生产商在长期持续的交易中、在谋求共存共荣的思想下，成功地建立了长期性的信任关系。这与在短期性的市场中，应该随时与最低价格提供商进行交易的美式“正义”并不相容。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行业特别是提供的是像汽车这样复杂产品的行业中，日本体制的经济合理性更高。

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在美国的经营理念中是不可能成立的。我已经讲过，在美国式经营手法中，订购零部件应该根据市场原理来决定。

也就是说，当存在多种同样质量的零部件时，随时与其中能提供最便宜价格的零部件商进行交易，这才是合理的；而像日本这样，认为“应该与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零部件商进行交易”，是不合理的。如果被怀疑其中存在勾结、“谈合”等某些不透明因素，也无话可说。

实际上，在过去的日美交涉中，美国就主张，日本汽车产业中的“系列”关系是不公正的交易习惯，成为美国的零部件商参与时的非关税壁垒。

正如美国所说，长年结成的“系列”关系，不难造成企业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勾结，这是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实行看板方式、协商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方面劈头盖脸地认定“系列”关系就是坏东西，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

实际上，美国的汽车商订购零部件是在新车设计决定之后，通过公开竞标方式进行的。

但是，中标的零部件企业是否果真能够令人满意地提供所要求水平的零部件，只能揭盖见分晓。

再加上汽车生产企业方面也不完全熟知自己订购的零部件的材料、制作过程的技术信息，因此，即使零部件企业按设计制作出来产品，也有可能出现意外的故障。

这样，购买首批新车的顾客，就会被各种故障和缺陷所困扰。这表明，利用这种开放性市场的产品战略，对于企业来说，也不一定带来有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一概地断定，遵从市场原理就更加合理、公平。

长期信任关系才是力量

日本的汽车业之所以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仅仅从汽车企业与零部件生产企业的合作关系来究其原因，自然是不够的。消费者对日本车的信任度增高，是由于日本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企业坚持“追求质量”的一贯态度。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它们有这样执著的追求，才形成了协商生产方式。

下面是我从美国的某个零部件企业主管口中听说的事情。这家企业同时为通用公司和丰田公司提供零部件。他说：在交货时，同样的零部件，通用公司要求检验的项目是3处，而丰田公司则达到它的6倍以上。

从零部件企业角度讲，与通用公司相比，丰田公司提出了过度的质检要求，因此，讲话的主管也牢骚不断。但是，这种对质量的执著追求，正是丰田公司理念的表现：“绝不背叛顾客信任”、“不留意看不见的地方，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

的确，过度的质量管理，是造成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会给竞争带来不利影响。而成本管理也要极其严格地进行，因此，或许也会使无法忍受的零部件商拂袖而去。但是，明知困难重重，却10年、20年坚持下去，这种对质量的执著态度，终于成功地赢得了全世界消费者对日本汽车的支持。“只有日本车不会发生质量问题”，这种评价才是当今日本汽车业的真正财富。

仅仅在三四十年前，日本的汽车企业在技术上还落后于美国，但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无非取决于它们重视与零部件商之间的长期信任关系，再加上绝不背叛顾客的期待，

不破坏与顾客之间形成的长期信任关系。

当然，对细微部分的执著并不能直接传达给消费者，让他们明了质量是眼睛看不到的，但价格有目共睹，所以，从短期看，重视价格竞争更有利。

然而，即使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日本企业也没有放弃对质量的追求。它们在美国和欧洲市场进行了10年、20年的奋战，终于成功地获得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日本车不会坏。”而这种“评价”，才是把日本推到世界最大的汽车王国宝座上的最重要的原因。

“日本人没有战略”是谎言

日本汽车业的成功表明了美国式“市场原理万能主义”在经济活动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真理。

一直生活在岛国这个封闭社会中的日本人，在短期的竞争中，他们宁可放弃眼前的利益，而选择与交易对方和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以取得长期的胜利。因为在封闭的社会中，一旦失去信任，恶名将伴随终身。

但如果把日本人重视信任关系看做日本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强，那也是过于拔高自身的解释。认为一个文化圈的人在道德上优秀于其他文化圈的人，这种想法很容易发展成过去那种危险的纳粹思想。

那么，为什么日本人要重视信任关系呢？因为经验告诉他们：在日本这样的社会中，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关系，从总体上来讲，更有可能将利益最大化；相反，如果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以自我为中心行动，会降低在社会上的评价，从而蒙受更大的损失。也就是说，在日本社会，“正直、勤勉”是最佳战略。商业评论家之流常常批评日本人没有战略，其实并非这样。日本人有足够的战略。只是，把战略的重点放在了“确立长期的信任关系”上。因为日本人最鄙视那些一眼就能被人识破的藏头不藏尾的战略。

有人或许认为，这种“日本式战略”在美国不适用。但是，实

实际上并非如此。

的确，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开放的竞争才是善，才是正确的道德。事实上，由大量移民构成的美国社会，与日本社会相比较，流动性更大，因此，美国人的生存前提并不一定建立在与他人的长期性关系上。而在狭小的日本，一旦名声败坏，再想摆脱恶名就很困难。相反，在美国那样的社会，想要东山再起随时可以做到。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社会中，日本式的逻辑“信任才是成功的关键”并不成立。

正因为美国社会的情况如此，所以经济学假定的“经济人”才具有说服力。“所谓经济人，就是不放走眼前的机会，为使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人”。这种思想，在美国的确通用；但那种人，在日本绝不受欢迎。

然而，即使在美国，重视长期性信任关系的日本汽车企业也取得了成功。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美国人选择行动时，也并不是只单纯追求市场主义和短期利益。争取长期信任的战略，甚至在美国这种重视短期利益的国家中，也会取得成功。

柠檬市场是什么？

老实讲，作为学问的经济学，很早就认识到“相互信任”这个要素是决定市场交易效率的重要因素。

我的恩师肯尼斯·阿罗教授很早就指出“信息不对称”妨碍市场交易效率。实际上，信息不对称与商品交易中信任关系的重要性密切相关。

在说明信息不对称时，常用的一个例子是“柠檬市场”。“柠檬市场”并非指水果中的柠檬买卖，而是美国俚语中的习惯用语，美国人把配备不良的蹩脚二手车称做“柠檬”。所谓“柠檬市场”，就是指二手车市场中买卖缺陷车、事故车的状态。

有过买二手车经历的人都会知道，买二手车与买刚出厂的新车

不同，有很多要担心的事情。买主想买到尽量便宜、车况又好的汽车，但那种格外廉价的商品，常常要么是事故车要么是有问题的车，只是经销商隐瞒了实情。如果怀疑起来的话，担心就没有止境了。

而且即使买主追问销售商，也不见得能听到真话。“状态这么好的二手车，真的不多！”销售商这样夸赞着。但买主心里还是在犯嘀咕：或许还是事故车吧？但又在猜想：也可能是真正有良心的销售商，希望薄利多销？

这样，在二手车交易中，买方和卖方拥有的信息不同。卖方非常清楚那辆车子的来历和状态，而买方则不得不依赖销售商告知的信息来判断。这种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信息的状态，被称做“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实际上在任何市场中都可能发生。比如，摆在超市中的蔬菜真的安全吗？生产的农民是知道的，但买主并不知道。消费者不知情地买来吃了，身体麻痹了，这类不愉快的例子最近特别多。如果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买主甚至会疑心生暗鬼，如果不是产地特别放心的产品，他们就不会买了。这就会显著降低经济交易的效率。

前面也说明过，经济学设想的“完全竞争”中，信息的同质性、信息的完整性是大前提。也就是说，假定买方和卖方共同拥有相同的信息。但这样的市场，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点，只要举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例子就足以说明。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信任结构

二手车市场是信息不对称容易发生的地方。那么，如果买方的顾客陷入疑神疑鬼的状态，猜疑“这个销售商是不是在骗我是个外行，想要把事故车和缺陷车卖给我呀？”那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认为买到缺陷车的危险性不是零的顾客，必定尽量压低车子的价格。因为，支付的金额越少，发现是事故车时，也才能够更容易

说服自己自认倒霉。

但是，如果采取这种“自我防卫措施”的顾客不断增加，那么，二手车市场将会怎样？首先，不相信销售商评估价格的倾向加大，人人都要求打折扣；接下来，销售商一方也会出来谋求自我防卫。也就是说，即使原本的标价是适当的，顾客也不会相信，而会要求讲价。所以，销售商也只能把价格标注得比适当价格高几成。但是，那样将会提高整体的销售价格，因此，招揽顾客用的“招牌商品”、“特价商品”，不得不使用质量不好的车子，比如说事故车等。

这样一来，顾客一方就越发不信任销售商。

“二手车的销售商，就是钻买主无知的空子，把事故车卖给人家的家伙”，如果这样的印象普及开来，二手车的人气将越来越低，而销售商的收益将不断减少。如此一来，有良心的销售商将不断减少，只剩下不把顾客当顾客的商业道德败坏的销售商……肯尼斯·阿罗教授等人指出，如果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信任”扩大再生产，最后，市场本身也难以保全。

但是，假设二手车的买主与销售商是长期交易关系，又会怎样呢？那时，销售商就会想：不能背叛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卖给他事故车，之后发生矛盾，将会破坏买主与销售商之间的长期交易关系。因此，对这样的常客，销售商会把质量好的车子卖给他们。

也就是说，在存在长期信任关系的交易中，即使存在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的无效率也是可以克服的。

信用才是社会资本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市场要作为市场适当地运营，并不是单纯地减少限制、能自由参与或退出就可以了。要使市场真正成为市场，必须有“信用”这个因素存在。

指出这一点的不仅是肯尼斯·阿罗。经济学家邦菲尔德也指出：

“缺乏信用，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不信任感”蔓延，认为有机会就可以欺骗对方，或者如果疏忽大意就会被别人利用，那么，在这个社会中经济发展就很困难。运用这个概念对世界各国进行了比较研究的，是美国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

据福山研究，日本与德国、美国并列，是“高信用国家”；而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等，是“低信用国家”（弗朗西斯·福山：《信用：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加藤宽译，三笠书房）。

关于为什么经济发展与信用有关系，福山做了以下说明。

他说：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难以形成的低信用社会中，经营企业时，重要的工作不能委托给外部人，因此，不得不优先采用有血缘关系的人，于是亲属关系成为主流。

因为，人们一般认为，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太容易背叛血缘，卷款而逃，或是做些收取贿赂等利己的行动。

华侨以及南部意大利人（西西里人、那不勒斯人等）之所以执著地搞家族企业，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

的确，这样的家族经营、血缘经营的好处在于大家很团结，不容易发生背叛行为。特别是在贸易这种并非每天见面的工作中，远方的人不背叛自己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与其他民族相比，华侨在远距离贸易中才取得了巨大利益。

但是，这样的商业模式，也伴随着“发展的极限”。因为，只信任有血缘和亲属关系的人，必定会失去从外部选拔优秀人才的机会。

在必须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时，如果不能信任外部的人，就不能使用有能力的外来专家。如果不能从外部录用优秀人才，那公司就不能再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低信用社会中难以产生具有世界级品牌的公司。

①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Creation of Prosperity*. ——译者注

相对的，在社会中建立了广泛信任关系的“高信用社会”，即使没有亲属关系，只要证明本人有实力，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这样的社会容易产生活力，经济也就有活力，企业也容易得到发展的机会。

据福山分析，华侨的网络遍布全世界，但至今没有形成具有中国血统的世界级品牌，就是因为“信用问题”成为瓶颈。而日本虽然在国际贸易中是后发国，且人口和资源都很少，但世界公认的大企业辈出，就是因为整个日本社会都重视“信用”。

近些年，由于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也出现了与既有的华侨资本无关的大企业。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企业在初创时多数是由国家或外资参与成立的，或是由在欧美等地取得了MBA的海归创立的。

最近，以社会学为中心，正在普及一种看法，即把人与人之间建立的信用视为“社会资本”。经济学中的“社会资本”，多指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港湾等；而社会学家则指出：作为支撑人的经济活动的基础，“看不见的基础建设”即“信用”这个要素很重要。

把这个观点再扩大诠释一下。也就是说：中国、印度或者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国家，为了使经济能健全地发展，单纯地准备建设硬件还不够；建设作为软件的社会资本，即在社会中培养信用，这一点也很重要。

而在这些国家中是否真的能够与亲属之外的人建立起信用，我们拭目以待。

与武士道抗衡的江户的商人道

站在以上的观点上看，明治时期的日本之所以成功地完成了近代化，并不单纯是明治政府从外国借来巨额资金加强港湾和铁路建设，又高薪聘请了“外国人”的缘故。

即使基础建设完备又从发达国家引进了技术，也不一定能成功

完成近代化——中国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中国（清朝）沿袭日本的做法，试图实现近代化，但最终没有成功。

于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事实：在德川时代，日本已经有了信用这个“社会资本”的雏形。

本章开头部分我已经讲过，在幕府末期和明治时期访问日本的外国人，不约而同地感叹这个东方小国洋溢出的安心感和安全感，连百姓之间也建立了信任关系，并形成了网络。

无须我重复，“武士道”这种伦理体系广泛地渗透到德川时期的武士阶层当中。武士道严厉批判卑鄙行为，讲究严格遵守上下关系，要求对自己侍奉的主人绝对恪尽忠义。

进入江户时代不久，武士阶级在经济上越发困窘。江户时代的和平持续了长达260年。实际上，武士阶级是依靠战争供养的阶级。如果在战争中立功，就能分封领地或是增加俸禄，但如果没有战争，这些都很难实现。而且，和平年代中，因为人们不需要武士在敌人的袭击中保护自己，所以作为守护者的武士也就丧失了存在意义。因此，江户时代的武士，在经济上穷困潦倒。

但是，武士是统治阶级。既然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感觉穷困，那么，他们只要采取提高年租等做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日本的武士阶级极度地洁身自好。他们学习儒学，许下豪言壮语：“武士落魄也不失节。”他们普遍认为：武士要立大志，要专心致志地研究国家应如何治理、人应如何生活。可以说江户时代的武士阶级十分伟大，他们虽然身为统治阶级，却勇敢地承受了自己经济上的穷困。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武士阶级对农民和町人的剥削，要少得多。

那么，町人就没有武士道这样的道德体系吗？当然不是。我们讲日本社会的特殊性时，强调日本武士道的人很多。但当时的武士只占人口的几个百分点而已。也就是说，他们是日本社会中的少数，而占压倒性多数的则是町人。

让这些实质上支撑江户社会的町人懂得信用和正直的重要性的，是德川时代的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主张的“商人道”。

考察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安心感和安全感”时会发现，关键因素是商人道的存在，而不是武士道。指出这一点的，实际上是社会心理学家山岸俊男（《日本的“安心”为什么消失了》，集英社国际）。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武士重视的毕竟是武士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纪律，更准确地讲，是自己所属的“家中”的团结、纪律，而由此是不会产生尊重不相识的他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想法的。相反，为了保护藩和幕府，甚至允许武士对外部人撒谎。不，按武士道的伦理来讲，是应该撒谎。

石门心学中的商业与社会贡献

德川时期的商人道，归结起来，讲的就是建立与他人之间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在买卖中，得到他人的信任是走向成功最好的途径，这是德川时代的生意哲学。

比如，近江商人所讲的“三方得利”，就是一个例子。

说起买卖中的信用，我们容易想到的是只要交易双方得利就好，但在日本各地取得成功的近江商人还在“卖方得利、买方得利”的基础上追加了一条“社会受益”，强调通过买卖实现对社会的贡献。用现代的话语来讲，即他们成功的秘诀并非仅仅重视市场，还包括重视通过商业对区域社会作贡献。

德川时代的商人，通过实际经验懂得了“正直的重要性”。而把这种思想系统化并普及日本全国去的，则是石田梅岩的“石门心学”。

原本在武士这个德川时代的统治阶层看来，商人是比自己不只低一级、两级的存在。正如“武士落魄也不失节”这句话所体现的那样，对于武士来说，名誉最重要，有财欲和物欲是卑劣的、可耻的。因此，从武士的逻辑来看，逐利的商业是应该蔑视的对象。之后日本有“士农工商”这样的说法，也说明，在武士看来，他们甚

至认为商人是只想着赚钱、没有道德的一类人。

为了对抗这种来自武士方面的偏见，石田梅岩提出了商人的伦理体系，建立了石门心学。石门心学认为：商人通过经商为社会作贡献，而作为商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重视信义，因此，丝毫不需要为经商而感到羞耻。石田还通过实例，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向町人讲述了正直的重要性、勤勉的重要性。

江户时代，除了石田以外，还有多位思想家向百姓讲述正直的重要性。比如僧人铃木正三就提倡被称做“职责佛行说”的职业伦理。他在《商人日用》一书中写道：“生意人应一心走正路。只要坚持做到正直，就会得到神佛的保佑，万事顺利。”把这个理论展开来讲，意思是说：努力做一个好商人，与在佛门修行一样，可以获得通向极乐净土的通行证。因此，在江户时代，可以说正直和信用还成为宗教的教义。

顺便提一句，石田梅岩和铃木正三的思想，与美国的“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精神也有相通之处。

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对美国近代资本主义形成有着极大影响的人物而广为人知。他对开拓时代的美国人就讲述了勤勉、正直、节俭的重要性。富兰克林根据天主教的信仰，讲述了这样的美德，而日本商人道的价值观，正与他讲的“资本主义精神”（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之言）相通。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理解日本式雇佣制度？

江户时代在日本产生的商人道精神，经过明治维新，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也没有消失。而这一点，在日本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代的日本企业，特别是“二战”后的日本企业，形成了“系列”关系和企业集团，这就是后来遭到批判的“系列”和“谈合”。但是，那是因为日本企业并不想只追求短期的利益和眼前的赢利，

而想通过与交易方和顾客建立长期持续的关系，获得更大的利益，其中包括“信用”这个无形资产。资本主义的后发国日本能够成为世界顶级的经济大国，或许可以说就是得益于“商人道”。

率先批判日本“商人道”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针对日本经济的抬头，美国认为日本企业的商业习惯不公平，具有排他性，因此要求日本开放市场。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原本作为美国建国精神的清教主义中，也应该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强调的勤勉、正直。但是，重视正直和勤勉的美德，在美国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不知不觉地消失，开始尊崇“开放式”的市场交易。结果，与重视短期利益相比，更重信义的日本式经营战略被批判为不公平，我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个讽刺性的变化。

从世界角度来看，像日本这样为了长期利益而选择正直、勤勉战略的社会，仍旧是个例外。

我常常听说进入中国社会的日本企业最头疼的是，无论怎样对中国的劳动者解释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这些日本式价值观，也很难得到他们的理解。

“为什么为了企业的稳定，我们就要甘心忍受拿微薄的工资？”

这样想问题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用“为了将来的成功，现在大家一起忍耐忍耐吧！”这样的话来劝说他们，他们是不会听的。

但是，想一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历史上，中国的汉民族曾多次与周边民族抗争；即使今天是和平的，到了明天，可能就被袭来的骑马民族征服，或者被赶出故土。因此，现在能够弄到手的東西，要弄到手里才放心。他们这样想也不无道理，那就是中国人的“最佳战略”。

因此，中国人不能理解日本人的劳动态度，为什么日本人劳动时会在心里想“即使现在受点儿苦，但只要老实实在地劳动，将来总会有回报的”。而日本人也不能理解中国人内在的逻辑，因此容易判断说：“中国人贪婪”，或说：“中国人没有协调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日本人多么“诚心地劝说”，也不可能实现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如果不认真思考为什么日本人选择“长期战略”，而中国人又为什么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然后建立起使中国人能够选择长期性“信任关系”的公司制度，就不可能让“日本式经营”渗透进去。日本企业已经迎来了真正的国际化经营的时代，思考如何在历史与价值观皆不相同的国家推广以“信用”为基础的日本式经营，十分重要。其重要性，我认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美国式战略与日本式战略

经过以上的分析，读者一定明白了一个事实：迄今为止在日本常说的“日本人没有战略”、“日本领导人缺乏领导能力”这些批评是片面的。

在美国这样“雁过拔毛”般的竞争社会里，最佳战略是把短期利益、眼前利润最大化。因为，在流动性大的社会里，很难期待长期性关系带来的利益，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判断。也正因为此，美国企业经营者才把年度或季度的收益最大化当做自己的使命。

看到这种美国式的经营手法，日本人往往很容易下结论说：“老外都是些贪婪的家伙。”但是，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而且，假使他们贪婪，我们也必须知道，那也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同样，日本人不采取积极的、进攻型的行动，也并不是因为日本人缺乏战略，而是日本人长期生活的社会，要求人们首先要正直诚实地对待对方，以致最终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日本人才采取这样的行动。

一部分政治家和文化人夸耀说：“日本人比其他国民更正直。”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片面，实际上是不了解日本社会的本质，自我夸大的一种论调。

我们即使常识性地思考也能明白，人的本性不会因为种族和基

因的不同而有太大的差异。假设人的行动因所属集团不同呈现不同特征，那也是各个集团的历史和传统积淀的差异造成的。

不为日本人所知的“阶级社会”的真实

前面我们讲到，长期性的信任关系优先是日本人的行动原则。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日本人能发展这种行动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社会的均质性。

历史上，除了日本人所说的“元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外，日本没有受到过外国军队的侵袭；除了“二战”之后的几年日本被置于GHQ^①支配下以外，也没有像其他文化圈中的国家那样，受到异民族的支配、剥削和奴役。

如此一来，日本不仅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形成根深蒂固的阶级社会、身份社会，而且整个社会非常团结，这种团结像“磐石”般坚固。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事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原本，在西方和中国社会产生阶级制度的最大原因，是历史上连续不断发生的战乱。

比如，考察欧洲历史时，我们会知道：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致使罗马帝国灭亡；其后，由于中亚的匈奴人和蒙古人入侵，又造成这个地区多次发生民族大迁徙。而每一次迁徙都引起欧洲社会产生巨大的变动。

这样的民族大迁徙平静后，欧洲形成了许多国家，接下来那些国家之间又为了争夺霸权，开始进行激烈交战。最初，虽说是战争，但王侯之间还存在着制约。但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开始，终于发生了旧教和新教相互杀戮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

① GHQ即盟军占领军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远东军司令兼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以盟军总司令名义，在东京建立驻日盟军总部，通称“GHQ”。——译者注

1648年的西伐利亚和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不稳定局面。通常，这被看做欧洲社会进入近代的标志。当然，此后各地的战乱仍旧持续不断。

孔子讲述的“统治者理论”

由于战乱连续不断，欧洲形成了阶级社会。

每次战争都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胜利者成为统治者，而失败者则沦为被统治者，于是就产生了阶级。可以说，不间断的战争，一次次地形成阶级，产生新的差别。

这种现象在中欧尤为显著。比如原来的南斯拉夫，其组成就十分复杂，被说成是“由六个共和国、五个民族、四种语言、三种宗教、两种文字组成的一个国家”。巴尔干半岛复杂的种族问题，正是长期战乱的历史产物。

但是，这并不限于欧洲。

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通常说是四种等级制度，但细分起来，有说2000种的，也有说3000种的。这也是战乱的结果。因为，有史以来，从现在的阿富汗方面不断地有民族入侵印度地区，这些民族在无数次统治与被统治的斗争中形成了现在的种姓制度。

中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举一个例子看。比如，日本人把孔子在《论语》中使用的“君子”一词，简单地解释为“道德高尚的人”，实际上并非那样。

孔子讲的伦理，从他游说于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之间的事实也可以看出，都是“支配者的伦理”、“统治者的伦理”，而非别的。因此，“君子”这个词，与其解释为“道德上杰出的人物”，不如说成“支配者中的精英阶级”。

比如“君子不器”说的是“身为支配者，不应该只精通一门技术（不能成为专家）”，这当中明显的存在阶级意识。孔子在《论语》中对弟子们反复强调：“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然而，在几

乎没有被侵略、被统治历史的日本，因为没有这种“阶级观念”，所以把《论语》误解为讲述万人通用的道德、人生哲学的书。

以上的例子也说明日本人是如何地没有“阶级”体验。也有人模糊地认为，财富和收入的不同就是阶级。但日本人的“阶级意识”实在太淡薄。所谓阶级，是与民族、种族等密切联系的历史性、政治性的产物，正因为此，摆脱与生俱来的阶级身份，提高社会地位，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个典型；即使是现在，阶级仍旧作为一堵“看不见的墙”，遗留在全世界的社会中。

日本企业现在正以迅猛的势头推进经营的全球化。这是因为日本进入了人口减少的时代，市场趋于萎缩，于是不得不向世界寻找市场。并且，这个全球化不仅是制造业的全球化，也是占日本经济近六成的服务业（含金融）的全球化。因此，对外国企业的收购现在仍在进行。这当中最成问题的就是，日本企业的管理人员没有阶级意识。

很多日本企业的管理人员是从普通职员做起，经提拔进入管理层的，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是精英。然而，收购来的对方企业的管理人员多数认为自己是精英。平民意识的日本经营者与精英意识的外国企业的高层，这两者的沟通常常不顺畅。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平等社会，所以日本人不了解阶级社会的内涵。

江户时代的日本果真是等级社会吗？

然而，如果我说日本人阶级意识淡薄，肯定会有人提出反驳：“江户时代不是有过等级制度吗？”

的确，江户时代的法律制度规定，只有武士阶级才允许有姓氏，才允许带刀。同是农民，所谓的村长和佃户的生活也完全不同。其差别甚至扩展到房屋的建筑方式上，武士和村长阶级之外的人家，不允许修建大门。另外，事实上也有过所谓的贱民，他们被歧视性地称做“秽多”、“非人”等。

虽然有过这样的等级制度，但日本的这种等级制度，并不是由于异民族的武力征服造成的，因此，它与其他文化圈呈现不同的形态。

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被称做江户幕府“最后的幕臣”的胜海舟并非出生在一个正统的武士家庭。据说他的祖先是新潟县柏崎地区的一个农民，其曾祖父（米山检校）是个盲人，做高利贷生意。因为其曾祖父花钱买了旗本的地位，才有了幕臣胜海舟。也就是说，在德川时期，武士是可以用钱买到的身份，农民和商人变成武士是十分可能的。

德川时期，要想跻身武士阶层，除用钱买之外，还有其他的途径。即使是贫穷的町人和农民出身，通过勤奋学习，成为优秀的儒学家、医生或者数学家，就可以提升为大名和幕府的武士，也可以领取俸禄。

另外，在武士中也有等级差别，俸禄也根据等级而不同。但即使门第低的武士，只要本人有能力，就有可能出任高职位。也就是说，江户时代一方面虽然有等级制度，但另一方面也以能力取人。

然而，前面讲到的是町人和农民的阶级地位可以提升，也就是向上移动；同时也有相反的情况，即身为精英阶层却做现场的实际工作，也就是其地位向下滑坡。这也说明日本是个独特的社会。

正如刚才讲到的“君子不器”这句话所象征的那样，古代中国和李氏朝鲜等儒教社会中，精英层、统治阶层的人最重视的是教养和艺术才能；相反，武艺和工艺这些实际技能却被轻视。无论中国还是朝鲜，文官都要比武官地位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当照搬中国律令制度的王朝时代，日本也与中国、朝鲜一样。但镰仓时代由武士（他们多数原本出身农民阶层）直接执政以来，开始营造了一种掌握实用技术的人，比如工匠和习武者，受尊重的社会氛围。

举一个例子。在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生产上好的青瓷和白瓷器皿，但作者的名字没能流传到现在。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朝

鲜的儒教文化中，烧窑人都是地位卑贱的人，统治者认为没有必要留下这些人的名字。相反，在日本，柿右卫门、今右卫门这些著名工匠的名字却流传到了后代。因此，同在亚洲圈里面，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罕见的“均质性”正是日本近代化的关键

日本社会自古延续下来的“平等性”，令幕末和明治时期访问日本的外国人惊讶不已，这一点在前文出现过的渡边京二的《看日本：逝去的面影》中有很多介绍。我在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比如，因为发现了大森贝冢而知名的美国人莫尔斯就讲道，在日本逗留了几个月的外国人都会注意到，“善良的美德与品质，在自己的国家成了人道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负，可是对日本人来说竟是与生俱来似的”，并且，“不仅仅富裕阶层是这样，连最贫穷的人们也具有同样的特质”^①（前引渡边，第163页）。另外，明治初期在东京外国语学校教俄语的梅奇尼科夫惊叹明治新政府高官的住宅，“他们的家里，与普通的江户朴素的居民家毫无二致”，他继而写道，“日本社会中，平等的观念已经相当成熟”^②（前引渡边，第286页）。

据渡边讲，有梅奇尼科夫这种感受的，似乎并不只是他一个人。“日本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几乎住在相同的家里，是幕府末期到过日本的观察家们相同的看法。”^③

信用是支撑近代文明基本的“社会资本”。从这个观点看，在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即使最贫穷阶级“人心也没有荒芜”。这些外国人指出的这一事实极其重要。

① 中译本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译者注

② 中译本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译者注

③ 中译本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译者注

如果穷人感觉“自己被剥削”，从而不信任统治阶层，那么，社会整体的安心感将难以维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人们或是对统治阶级反感，或是灰心丧气，放弃做自己的主人。在这种“分裂的社会”中，下层的人们不仅变得没有上进心，而且随着剥削的加重，他们会变得越发以自己的利益为先，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而不顾及他人，最终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

但幸运的是，与其他文明圈和区域相比，在日本，认为“统治者就是冷酷的剥削者”这种阶级意识不发达。

曾经一个时期，历史学家中有人照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史观来分析日本历史，主张封建时代的日本也有剥削。但那种看法过于公式化，并没有反映日本历史的实际。

至少，在日本基本上没有发生统治阶级对农民进行彻底的掠夺，以至于让农民饿死的事件。江户时代的农民按“五公五民”^①缴租，乍看以为农作物的一半被剥夺了，但实际上征税的对象只是大米，对其他作物实行免税。另外，随着时代的推移，农业生产力提高，收成也不断增加，年租负担却没有大的变化。众所周知，中国历代王朝的官吏为了个人敛财，常肆意向人们征收税金；但类似的事情，至少在日本是没有的。

江户时代的日本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这是事实；但没有过西方那样的市民革命，这也是历史事实。但即使没有发生那样的革命，在江户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和平年代中，日本社会的均质化、同质化也在缓慢地发展。只要有机会，町人的孩子也都去上私塾。因此，江户末期日本人的识字率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应该看到，正因为此，日本人在其后的明治时代，才比较容易地实现了向近代社会的转变。

不仅如此，日本比西欧近代社会更广泛地实现了社会平等。这

^① 五公五民：指日本江户时代对农民征收租税的比率，将收获物的一半用于缴纳地租，剩余一半归农民所有。——译者注

是因为，由于商业的发展，在经济方面，町人比武士更加富裕；而江户时代发展起来的文化（歌舞伎、净琉璃、浮世绘等），其骨干也几乎都是庶民阶级。

这一点，也体现在当今的日本企业中。从工厂工人到经营者，都拥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即使是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也会抱着很强的主人翁意识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后文我还会谈到，这种共同的主人翁意识，在欧美等国家的企业中根本不可能想象。

劳动是“神事”的古代日本

日本人对“现场工作”没有偏见的原因之一，如我前面所讲的，在于日本社会中阶级意识淡薄。但如果追溯形成这种观念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这一点，很具有日本特色！

我已经指出过，作为日本文化的特征之一，日本神灵不同于希腊和一神教的神，他们不喜好争斗，具有平和的性格。实际上，除此之外，日本的神灵还具有其他独特之处。

那就是，在日本神话中“连神灵也要劳动”。

翻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书中频繁地出现各方神灵织布，或山神狩猎、海神捕鱼的故事。现在的皇室也沿袭了劳动的习惯。天皇陛下到了春天也要亲自插秧，秋天要收割麦子；而皇后陛下也要养蚕。如此看来，各方神灵以及被认为是其子孙的皇室之所以有亲自参加劳动的习惯，无非是因为自古以来日本就有“劳动是神事”的观念。

与此相反，无论是在一神教的世界还是在希腊神话的世界，劳动都被当做苦役。比如，《圣经》中讲，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最初生活在乐园中，没有必要劳动。但是因为受蛇唆使，吃了智慧的果实，犯下了罪过，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人类不得不开始劳动，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犯下了“原罪”。也就是说，所谓劳动，就是上帝给予的惩罚。这就是《圣经》的教诲。

希腊神话里也讲过，人类原本和上帝过着同样的生活，人人长寿，平安喜乐。然而，人渐渐有了智慧，于是对上帝失去了信仰，因此世界变坏，上帝和人变成了彼此独立的存在。这是希腊神话的大框架。

从中，我们知道，人曾经生活在富饶的乐园里，没有必要劳动，也不生病，因此，劳动对于希腊人来讲，并不是“神事”，而是与生病类似的“苦”事。

这种劳动观在中国等儒教文化圈中也是基本相同的。孔子所谓的“君子不器”，也是将劳动视为卑贱人的行为；而道教中的仙人更是在天地间云游，不劳动。

这样，“真正的精英不弄脏自己的手”，这种思想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唯独日本人拥有独特的劳动观，认为“劳动是神事”。

美国人经常透露他们的感想说，他们的梦想就是退休后在佛罗里达或其他什么地方建个别墅，悠闲地生活。这正是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劳动是苦役，希望早些从中逃脱出来。但是，很多日本人却不那么想。日本人认为，工作是人生的价值，从一切工作中解放出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为了拥有生存在社会中的真实感受，所以想要做点儿什么工作，这是普通日本人的想法，很少有人想隐居到某处的别墅终结余生。这充分体现出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劳动观的不同。

阶级思想在当今欧美社会的生命力

由于日本人认为劳动是神圣的，所以他们尊重在生产实践中发挥出色能力的人。这种社会观念，与日本企业的“现场主义”^①有密切关系。

日本的汽车产业或是家电产业能够凭借高质量而被世界认可，

^① 现场主义：日本企业或组织机构重视现场实际工作的思想。——译者注

是因为在企业里，不论阶级、地位的高低，大家都团结一致，为了提高质量而努力。

在欧美各国，通过宗教改革和市民革命，渐渐确立了民主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平等社会——教科书是这样教授的。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那只是冠冕堂皇的说法。现实的欧美社会中，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阶级意识，视劳动为苦役的思想仍生生不息。

比如，在制造商中，管理层与工厂的蓝领之间，俨然就存在着意识上的区别。

我举一个例子。在欧美各国，即使在生产线上发生重大事故，车间的工人也不会试图自主地去解决问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认为“解决问题是经理的工作，自己只做被吩咐的事”。

然而，那些经理却给自己定位为管理层，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所以，他们不了解车间的实情，纵使能够管理好人事，也不一定就具备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因此，即使在工厂的生产现场出现问题，也不能当场解决，多数情况是等待总公司派来的问题解决小组到达。

问题就发生在眼前，却没有人主动采取行动，这样的事情在日本人看来或许难以相信，但这在欧美国家是很自然的。

实际上，我在巴黎逗留时也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我要办事，正好中午去了邮局。一个窗口前排成了长队。一看旁边的窗口，没有一个人排在那里，职员看上去闲得无聊。

这种情况，如果在日本，手头空着的职员通常会跑到人多的窗口去帮助自己的伙伴。但是，在这家邮局却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无论那个窗口的办事员因为处理迟缓多么着急出汗，也无论有多少客人等待着，其他职员照样闲谈，根本不打算助同伴一臂之力。

仅这件事情，我就已经为日本与法国之大不同而感到惊讶。更令我吃惊的是，拥挤窗口的那个职员说了一句：“午休了。下午一点上班。”然后，就啪嚓一声，干脆把窗口关上进入了午休。

这种事情，如果在日本，肯定立即会引起客人的不满。但是，这里的客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做法，所以只是发出“哎呀呀”的声音，

耸耸肩膀而已。我又为他们的通情达理而感到震惊。

但从法国人的角度来看，办事员的态度非常理所应当。每个职员只要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其他职员忙，他们也没有义务去帮助。如果去帮助了，那么被帮助的职员或许会担心自己的饭碗被抢。再有，到了午休时间去休息，这俨然也是职员不可侵犯的权利。客人一方也拥有这样的“常识”，因此没有人提意见。

欧美企业为什么难以培养出“现场主义”

为什么日本的企业文化中管理层和现场工作人员同样具有“主人翁意识”，而在欧美企业中，至今两者之间都不能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呢？

长期的原因，在于延续已久的阶级社会；而作为直接原因，最重要的是收入差别和待遇差别。

苹果电脑的 CEO 斯蒂芬·乔布斯有一次宣称：因为苹果公司赤字的原因，他只领取 1 美元的董事年薪。

日本的媒体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美谈”进行了报道。但实际上，乔布斯另外领取了高达 500 万股的股票。顺便提一句，这件事最初曝光时苹果公司的股价是 131 美元，所以，乔布斯持有的股票期权的时价总额应该超过 6.5 亿美元。

当然，在他任职期间不能出售那些股票，这是附带的限制条件。但是，超过 600 亿日元的董事报酬，肯定是破格的。我没有打算否定乔布斯通过 ipod 和 iphone 的成功而重建苹果公司的功绩，但董事报酬可以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这在日本企业几乎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这种收入的悬殊在欧美企业中，绝不是稀罕事。原本，在这些社会中，精英与老百姓之间就划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因此，即使有这样巨大的收入差距，人们或许也会认为这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不感觉异样。但是，不得不说，无论这是多么普通的“常识”，待遇差别如此之大，从业人员培养不出主人翁意识也是情理之

中的事。

但是，反过来想一想，也正因为员工从一开始就不抱有主人翁意识，而抱着一种“被雇用的心态”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和待遇才提不上去，这也是事实。这样想来，这个主人翁意识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日本人的平等意识为什么发达？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日本与欧美、中国或是印度等文化圈相比，维持着高均质性、高信用的社会。

之所以形成这种社会，是由于人们必须在日本列岛这块狭窄的土地上生活，而且没有受到异民族的统治，正是这些外在条件造成了这样的社会。而日本社会的这种特质，在重振被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普适主义”荒废掉的现代世界时，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吗？

如我已经讲述过的，为了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正直行事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用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很难产生那种肯定正直的价值理论。而我认为，让现在的资本主义恢复健全，推广“吃小亏赚大便宜”的日本式商业哲学和重视现场主义的日本式劳动哲学很重要。

当然，我并不想说，日本社会各个方面都比欧美优秀。

日本社会具有平等主义的倾向，反过来说就是，那里没有领导者，不存在政治中心。

据传承，在日本，皇室从两千多年前连绵延续至今，而自古以来，除去极少数例外的情况，他们没有行使过自己的政治权力。

比如，在平安时代，实际的政治权力由藤原家族掌握，天皇发挥负责朝廷祭祀的最高神祇官的作用，也就是出现了权力与地位分离的状态。这样的“权力与地位分离”，进入武士执政时期也没有改变。在武士执政时期，源氏家族推翻了平氏家族，成为日本事实上

的统治者。而这个武士政权不仅没有否定皇室，还从朝廷得到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之后的日本，尽管又诞生了足利尊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乃至德川家康这些“权力者”，但皇室作为“权力的象征”，一直同时并存。

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日本没有发生权力集中在一处的情况。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日本社会，阶级差别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权力和地位的分离，致使没有诞生绝对的统治阶级。

思考“中空结构”的功与过

但是，日本人这种独特的平衡感，又屡屡造成“权力的中空状态”。

在西方社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率先进行重要决断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厌恶权力高度集中的日本社会，责任所在往往被模糊掉。名义上是领导，但领导人没有实权的例子也不少见。

比如，前面提到的镰仓幕府，将军把握实权也只有三代，之后尽管有形式上的将军，但实权变成由辅佐将军的执权官北条家族掌握。也就是说，不仅在皇室与幕府之间出现了权力和地位的分离，而且在幕府的内部，又进行了权力与地位的分离。

这种日本式权力结构，已逝荣格心理学家河合準雄为之命名为“中空结构”（河合準雄：《中空结构：日本的深层》，中公文库）。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在日本的组织中，总是存在架空“组织中心”的倾向。

把日本的价值观输送给世界

但是，从这些“历史教训”中，我们也并不能得出绝对的结论：日本的组织也需要欧美式的强有力的领导者。这也正是文明论的复

杂之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式组织的优势在于，从组织的上层到实际现场，全体人员都抱着主人翁的意识来对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正因为有这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现场力”，日本才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企业也成功地提高了竞争力。

进一步讲，西方式的强有力的领导方式，如果确实是有能力的个人成为领导者，则能够进行有效的组织运营；但同时也有可能造成领导人独断专行的状态。如果这样，组织将有可能因失去控制而崩溃。另外，前面也讲过，偏重于管理层，也就潜藏着造成“现场空洞化”的危险性。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中空结构”的益处，可以解释为：能够避免将组织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以保持管理的平衡，确保组织的长期发展。

这样看来，欧美的社会体制也好，日本的社会体制也好，都各有长短。这在中国和印度也应该是同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欧洲人曾经梦想的那种“完美的社会体制”不可能存在。

但是，迄今为止的近代社会，已经被西欧式理论尤其是美国式的理性主义所左右。今天，理性主义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时，由日本提出“另一种价值观”，难道不是很有必要吗？

这种价值观的内容，就是与自然和谐共存，是崇尚正直、重视建立人与人之间长期的信任关系，是珍惜现场主义。

实际上，这也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欧美式的或者一神教式的幸福观。

当然，今天日本所处的状况绝不容乐观。尽管说要把日本式价值观和其长处输送给世界，但如何才能让历史传统、文化、宗教观各异的外国人产生共鸣呢？特别是，日本又是一个不擅长“发出声音”的国家，不可能期待日本国民通过语言感动别国的人们。因此，尽管日本拥有很多欧美各国所不具备的优秀文明资产，但如何将它们“传导”给世界，还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大问题，写一本书也讨论不完。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人们：日本人的确不擅长“传导”，高声地向他人倾诉自己的长处也不是日本的社会传统，这缘于日本人的价值观，日本人的文化更注重“不自卖自夸”。

那么，现在的日本能做些什么呢？用一句话说，就是“积累实际成果”。日本汽车业是这样做的：通过彻底提高质量这种愚直的、长期的努力，在国际上成功地获得了高度评价。这就是例子。

这样做或许需要时间。但是，只要认清什么对世界真正有益，然后脚踏实地地坚持执行，那么，不久世界上的人们就会注意到日本的努力。

我认为，今后日本应该重视的方向性问题是，更多地在“环境领域”作贡献。要举国一致努力，做到“如果是环境问题，必须去问日本”这样的程度。或许不会立竿见影，但地球环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恶化下去。如果从现在开始，认真地对待环境问题，取得相应的成果，那么，十年后，世界对日本应该会有一个类似“救世”的评价。

前一章也讲过，日本人的自然观建立在“与自然共存的思想”上。这与西方“征服的思想”有明显的区别。

而这种自然观的转换，绝非不可能。原本，日本这个非基督教的国家、非白种人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难道不应该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成绩吗？我确信：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模式逐渐走向崩溃的今天，日本式价值观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大。

第七章

对日本振兴的提议

沦为“贫困大国”的日本

我在本书中解明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机制和思想背景，阐释了它为什么一方面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实现了中国等一些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必定造成世界经济的显著不稳定，在各个国家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造成环境污染。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怎么样了？卷入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浪潮中的日本也没有成为例外。以次贷危机为发端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自不必再说。此外，日本社会的优良传统也开始变质，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也开始丧失。这对日本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最近日本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也有学者说，日本的社会差距还没有扩大，但我请读者看一看下面的数据，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错误了。

的确，日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平等国家。因为阶级意识淡薄，日本企业得天独厚地拥有一批主人翁意识很强的员工。特别是“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平等程度很高，甚至被称做“一亿总中产社会”。日本企业有重视“现场力”的优秀传统，这在世界竞争中成为取胜的有利因素。因为日本企业的员工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他们没有“自己正被压榨”的意识。

在日本，公司老板下工作现场巡视，对员工们讲：“托你们的

福，公司才能够顺利运营。谢谢大家啦！今后还要拜托各位啊！”这对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生产力都有直接作用。

与此相反的是，十几年来日本社会却在认真地讨论：“日本社会的平等是一种坏平等。为了刺激员工和管理人员的干劲，有必要积极地采取美国那样的成果主义的方式，创造差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席卷全世界，日本人也开始认为“平等”是个坏东西。日本的企业也遵循美国式的“差距产生干劲”的思想，在公司内部制造员工之间的隔阂（如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等），推进分裂式的人事改革。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像中国这样一些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也加入到了全球化经济中，所以低收入工人出现了供给过剩。

令人震撼的 OECD 报告

2008年10月发表的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Growing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in OECD Countries*）明确显示，近20年间，日本的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贫困率”的国际比较最引人注目。

所谓贫困率，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劳动者中，收入不足中间值一半的贫困人口在全部劳动者中所占的比率。”

关于所得中间值，前面已经涉及，说的是将该国的人口按照收入多少的顺序排列起来，位于中间的人的收入数额（Median Income）就是所得中间值。比如，有一个拥有1亿劳动者的国家，从收入最多的人数起，第5000万个人的所得，就是所得中间值。

为什么不使用收入平均值（Average Income），而使用收入中间值呢？因为，如果把收入单纯地平均化，那么，哪怕出现少有的几个年收入达到几百亿日元的超富者，就会把整体的平均值推高。这种情况下，平均值会提高，但中间值不会变化。

克鲁格曼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巧妙地说明了这

种情况：

假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进到了酒吧，那么酒吧顾客的平均收入会急剧上升，但人们并不比比尔·盖茨进来之前变得有钱。（前引克鲁格曼，第91页）

因此，要了解国民生活水平的状况，仅通过平均值是搞不清楚的。所以，要考虑将收入的中间值作为一个标准。

这样，我们追踪一下1985~2005年间贫困率的变化。首先，我们看一下被征税或是领取社会保障金之前的收入情况（表1：“二次分配前”的项目）。

表1 主要先进国家贫困率比较

	1985年		2005年	
	二次分配前	二次分配后	二次分配前	二次分配后
日本	12.5	12.0	26.9	14.9
美国	25.6	17.9	26.3	17.1
法国	35.8	8.3	30.7	7.1
德国	26.9	6.3	33.6	11.0
英国	—	—	26.3	8.3
瑞典	26.1	3.3	26.7	5.3
挪威	18.7	6.4	24.0	6.8
丹麦	20.1	6.0	23.6	5.3

注：没有1985年的英国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OECD, “Growing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in OECD Countries”, 2008年10月21日。

国家进行征税和实行社会福利前的阶段，也就是二次分配前日本的贫困率，1985年为12.5%，即贫困家庭占整体的1/8，这在当时的OECD主要国家中是绝对低的数字。同年美国的贫困率是25.6%，法国是35.8%，德国是26.9%。由此可知，日本收入分配是极其平等的。

然而，20年后的2005年，日本的贫困率（二次分配前）从

1985 年的 12.5% 上升到 26.9%。仅仅 20 年时间，贫困人口的比例增长了一倍以上。

至于为什么短短 20 年的时间，贫困率会如此急剧地增长？我们之后再考虑。但日本以外的其他主要国家，二次分配前的数值，在 2005 年，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急剧上升。总而言之，仅仅 20 年的时间，日本的贫困率就能“自豪地”与这些欧美主要国家“平起平坐”了。

“二次分配后”的世界第二恶国：日本

然而，刚才看过的数据，政府征收所得税、进行调节（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和年金等）前即“二次分配前”的数字，不是“纯”收入。那我们下面再看看征税或进行收入调节后即“二次分配后”的收入。

不用说，与富裕阶层相比，贫困阶层多数的税务负担被减免，又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等补助，因此，“二次分配后”的贫困率自然比之前要降低。问题是降低程度的大小，到底降低了多少。

我们马上来比较一下二次分配后的贫困率（再看表 1）。

2005 年日本二次分配后的贫困率是 14.9%，二次分配前的贫困率是 26.9%。因此，经过二次分配，贫困率降低了 12 个百分点。

只看这些，似乎觉得日本政府对贫穷家庭很关心。但与欧洲各国比较一下，结果如何呢？从表 1 看，且不说高福利的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诸国的贫困率很低，连贫困率最高的德国，也只有 11.0%。其他欧洲各国相差无几，都在一位数以内，实现了大幅度降低贫困率的目标。

仅从表 1 看，二次分配后贫困率仍旧很高的，只有日本和美国。

美国的贫困率，二次分配前是 26.3%，即使二次分配后，仍是 17.1%。OECD 所属先进国家中，进行二次分配政策之后，贫困率的降低幅度比日本小的实际上只有美国。

部分欧洲国家通过二次分配政策，成功地实现了把贫困率减少 20 个百分点以上的目标，但美国仅减少了 9.2 个百分点。美国的国

家方针是实行“责任自负”，因此出现这种结果也不足为奇。但日本已经变成仅次于美国的“对贫困阶层冷漠的国家”，知道这个事实的日本人恐怕还不多。

或许读者还没有注意到，在日本这个国家里，4个家庭中就有1个被归类到贫困家庭中。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现实”！

让人震惊的单亲家庭的贫困率

我还想请大家看一组惊人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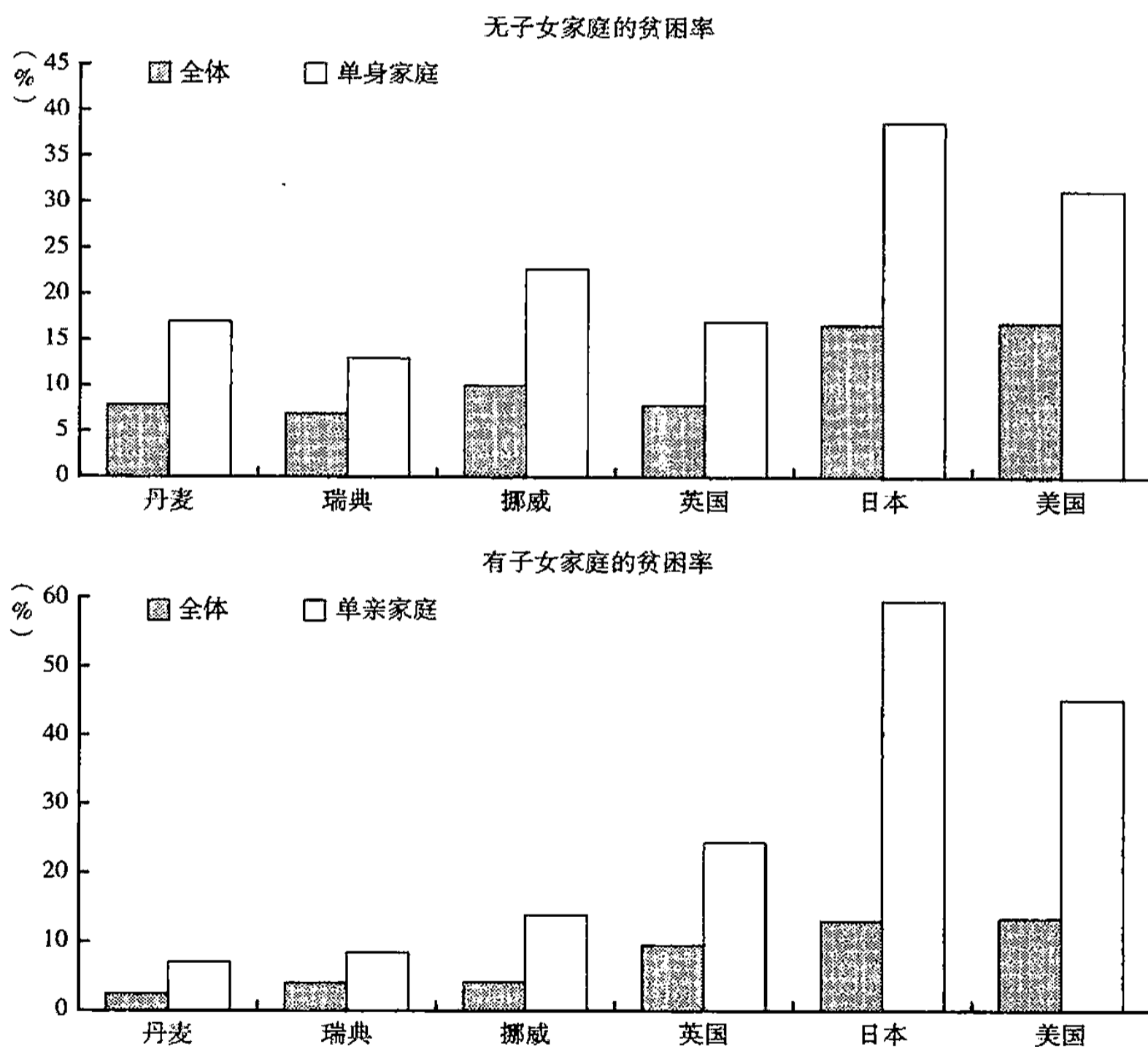


图4 日本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美国
[按家庭收支分类的贫困率 (2005年)]

资料来源：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2008。

这也是 OECD 发表的数据，是 2005 年按家庭收支分类的贫困率坐标图。图标先分成“无子女家庭”、“有子女家庭”，然后又单独提出“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的贫困率，用柱状图表示，用以表明贫困率在各国的差异。

从图 4 可以看出，日本的贫困率如果从“整体”看，无论是“无子女家庭”还是“有子女家庭”，仅仅略低于美国（这在世界上已经是最高水平）；而限定在“单身家庭”和“单亲家庭”时，则把美国也抛在后面，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日本无子女单身家庭的贫困率不到 40%，至于有子女的单亲家庭，即单身母亲和单身父亲家庭的贫困率，则几乎达到 60%。

当今日本对少子问题讨论得很热烈，但最需要的讨论难道不是日本单身母亲、单身父亲的贫困率是世界最高的这个事实吗？

如果不创造一个“能安心地生孩子”的社会，少子化便没有指望克服。尽管如此，目前却距离“能安心地生育孩子”的社会相差甚远，这就是今天日本的现实。在日本，对那些因离婚、亲人死亡等而单身抚养孩子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和救济，我这样断定，绝不为过。考虑到就连美国这个强调“责任自负的国家”，其有子女的单亲家庭的贫困率也只有 45%，是不是可以说，现在日本的福利政策已经到了崩溃、瘫痪的边缘了？

濒临险境的“全民保险制度”

对美国医疗制度表示忧虑的相关人员，一致称赞日本的“全民保险制度”。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像美国那样 5 个人中就有 1 个人不能参加健康保险，这样的社会是多么悲惨啊！所以他们齐声说：“我们羡慕日本的制度，全体国民都加入了保险，任何人有病都可以就医。”

但是，日本的全民保险制度，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现在正面临着失败。

因为，本应是“全民保险”，但由于付不起保险费，而不能享受保险制度好处的日本人在不断增加。据说，现阶段未支付国民健康保险费的人，竟然接近全体参加保险者的二成（2008年11月7日《朝日新闻》）。

原因无须多言，是由于贫困阶层人数的增多。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缴纳国民保险费，无论如何也不是优先考虑的事。这样一来，保险证就会被收回。现在，“无保险”的孩子，仅中学生以下的，就约有3.3万人，所以说事态严重。按说，收入在一定水准之下的贫困阶层的保险，不应该采用缴纳保险费的方式，而应该通过税收方式计算。或者，应该实行二次分配政策，使人人都能支付得起保险费。总之，确定无疑的是，日本引以为豪的全民保险制度，正逐渐走向解体。

另外，最近在日本人中声誉不佳的是开始实施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以75岁以上的高龄者为对象，每年从他们的年金中自动扣除6万~7万日元的保险费。

的确，老年人医疗费增加是一个严重问题，但被厚生劳动省指定为“后期高龄者”的群体，正是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过程中的奉献者。无论有多么大的财政困难，对那些有功之臣，突然就制定政策，从他们的年金中自动扣除保险费，这是一个国家的正确行为吗？

相反，执政者倒是应该开动脑筋，挖空心思想出对策，让自己能够对老人们说：“感谢你们对日本社会所作的贡献，今后你们的医疗费就全部减免了，请你们安度晚年吧！”这才是执政者该做的事，才应该是“敬老的精神”吧。

无论如何也要维持“小政府”，这种来自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强迫观念，推动着这种“改革”的进行。但这样下去真的可行吗？有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想法？无论有怎样的财政原因，我都不能赞成牺牲75岁以上高龄者利益的制度改革！

总之，在医疗这个关系到人的尊严的领域，日本最近接连实行

的种种“改革”，其动向是极其不健康的，它将使一直以来，以有安心感和安全感为自豪的日本的未来陷入危难。

从基尼系数看日本的不平等

谈到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时，如果仅从“贫困率”来考察，不免有些片面。也就是说，不能只看“下层”，还要看看包括中产阶层的社会整体的数据。而这时通常使用的，是被称做“基尼系数”的指标。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 C. 基尼为了将收入分布的实际情况数值化而创造的。如果所有人的收入完全平等的话，基尼指数为 0。如果只有一个人独占所有的收入，基尼系数为 1。因此，现实的数值应该在 0 和 1 之间。这个系数的优点在于，可以将社会整体收入的不均衡程度数值化。

下面，将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从 1985 年至 2005 年间的变化，分为“二次分配前”收入、“二次分配后”收入，列表如下（见表 2）。

表 2 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

	1985 年		2005 年	
	二次分配前	二次分配后	二次分配前	二次分配后
日本	0.345	0.304	0.443	0.321
美国	0.404	0.338	0.457	0.381
法国	0.524	0.313	0.482	0.281
德国	0.441	0.257	0.507	0.298
英国	0.440	0.325	0.460	0.335
瑞典	0.404	0.198	0.432	0.234
挪威	0.354	0.234	0.433	0.276
丹麦	0.373	0.221	0.417	0.232

注：关于基尼系数请参照本文。

资料来源：OECD。

正如表 2 显示的那样，日本的基尼系数在被调查的 20 年间，稳步上升了。二次分配前上升了 0.098，而二次分配后也上升了

0.017。日本社会的收入差距无疑有扩大的趋势。

另外，从表2也可以看出，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日本的收入差距之大，使它仅排在美国、英国之后（2005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以较低贫困率压倒别国的北欧各国，在基尼系数上，比日本及英、美、德、法都低，这也绝非偶然。

不过，在此我必须说明，关于日本的基尼系数增大这个问题，如何从统计学的角度作出解释，在经济学家当中，意见也并非一致。

例如，据《日本的不平等》（日本经济新闻社）的作者、大阪大学教授大竹文雄分析，现在日本社会的收入差距增大是事实，但其主要原因是：大量的被称做“团块世代”^①的群体到了退休年龄。

也就是说，退休人员的大量出现，造成了日本社会短时期的收入不平衡，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不过是“表面现象”。

京都大学教授橘木俊诏则一方面承认退休的高龄者造成了差距扩大这个事实，另一方面，他更认为“解决年轻人的收入差距扩大，刻不容缓”（2006年2月10日《日本经济新闻》）。他指出：在日本发生的收入差距扩大，作为一个现实问题，非常严重（参看橘木俊诏《差距社会——问题在哪里？》，岩波新书）。

实际上，重视退休人员增加这个因素的大竹文雄，在接受报纸的采访时也承认：“年轻人群的差距在扩大。……如果再把将来获得的收入也考虑在内，有可能差距正在扩大”（2006年2月10日《日本经济新闻》）。最终，橘木、大竹两人均预测将来收入差距还会逐步扩大下去。在这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悄然扩大的贫富差距

但是，尽管我列出这些数据，说明日本的收入差距有多么严重，但

^① 团块世代：专指日本在1947~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第一次婴儿潮人口。——译者注

恐怕还有很多读者会怀疑：“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有不少人仍旧感觉：“收入差距或许的确扩大了，但与欧美相比，日本不还是平等的吗？”

实际上，我周围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少。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主张：“有穷人存在，说明日本社会的改革还不够彻底。如果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并缓和所得税的累进课税，奖励有积极性的人，雇用就会增加，贫困也就会减少了。”

但是，尽管有人说原因在于“努力不够”，但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贫困大国”，这是难以动摇的事实。从基尼系数的综合性指标来看，日本也已经不再是平等的国家。但尽管如此，很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却没有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国家的“惨状”。这一点，实际上才是大问题！

然而，出现这种认识上的误差、理解上的分歧，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奈的。

差距社会的可怕之处在于，一旦社会由于差距而被割裂，那么社会分裂的现实本身也会成为“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就在最近（2008年10月），如果没有在大阪发生录像厅着火事件，很多日本人就连存在“录像厅”这个产业也不知道吧（实际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更别说知道有人长期住宿在原本为观赏录像制作的狭小的格子里。

我并非恭维各位日本读者，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应该是有宽裕的钱买这本书的，即使每天工作繁忙，也有轻松的心情和宽裕的时间，“希望思考今后的日本和世界”。或许大家没有这样的实感，但实际上他们在日本社会是属于受到优待的一类。

真正贫困的人，不仅没有宽裕的金钱去书店买书，连读书的闲情也会被剥夺。那些连住处也没有的网吧难民自不必说，对于明天有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在充满不安中生活着的派遣劳动者来说，读书之类，是次之再次之的事情。

所以，这本书的读者，在被告知“日本是世界先进国家中贫困率最高的国家”时没有真实的感受也是自然的。或许，你在新闻中

看到贫穷的年轻人也诧异过：他们“为什么不想劳动！”但现在日本的情况已非同一般。

想工作也无处工作，即使工作也只能得到勉强度日的工资——被逼迫到这种境地的日本人，在这20年中急剧地增加。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人超过了1000万。这绝不是由于他们懒惰，也不是努力不够。这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和以“责任自负”为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造成的贫困。

进一步讲，比这些差距扩大更严重的是，过着“平常生活”的日本人，对那些贫穷的人、困难的人，变得越来越没有同情心，越来越产生不出共鸣了。

因为没有工作、没有住处，所以住宿在录像厅里的人们，即使被烧死，其他人也置之不理，认为他们“落到那样的境遇，最终还是自己的责任吧”。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多。“发生这样悲惨的事件，原因在社会制度本身”，“以有安心感和安全感为自豪的日本社会，是不是有些不对头？”如果发出这种质疑的人在逐渐减少，那么，是否不得不说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危险地带？

日本国际竞争力为什么下降？

如果日本继续搁置贫富差距问题，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社会的团结必将从日本社会消失。这种变化，自然会使日本的治安恶化。如果差距长期持续，日本也可能出现“阶级社会”。但是，我在此更想强调的是，如果放任这样的差距继续扩大，日本的“国力”将不难出现致命的下降。

正如前面讲过的，从历史上看，日本社会是个平等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社会，由此形成了日本独特的风土人情，提高了国民的主人翁意识，直接导致日本在亚洲最早完成了近代化。而战后的日本，最大限度地灵活利用了平等主义社会这个优点，成为经济大国。日本不是依靠极少数精英统治、引导无知蒙昧的民众发展起来的国家，

相反，它是通过百姓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不断的努力而成就的国家。

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屡屡被认为是“现场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与许多以阶级社会为常态的国家相比，日本就是一个以百姓阶层为国家中心力量的“奇异的国家”。

然而，这个独特的国家，现在也被分割成富人和穷人两部分，作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则渐渐丧失了存在感。如果不尽快改善这种状况，日本经济将不难被波兰尼所说的“撒旦的磨坊”碾碎、消灭。

克服眼前的金融危机固然很重要，但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课题还应该是：通过提高贫困阶层的生活水平，矫正收入差距，重振日本这个国家。

这一点，通过日本国际竞争力下降的现实也能看得很清楚。

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导人聚集一堂的世界经济论坛，即“达沃斯论坛”，定期发表世界各国的国际竞争力。在2008年度的统计中，日本得到的评价是：在综合性的国际竞争力部分，日本排名第9位；至于IT部门的竞争力，则名列第19位（见表3）。曾经作为与美国并列的经济大国而受到世界瞩目的日本，其存在感正在急速地淡化。或许产生这种印象的也不止我一个人吧。

表3 逐渐下降中的日本竞争力

综合国际竞争力	位次	IT 竞争力	综合国际竞争力	位次	IT 竞争力
美 国	1	丹 麦	(中国)香港	11	(中国)香港
瑞 士	2	瑞 典	英 国	12	英 国
丹 麦	3	瑞 士	韩 国	13	加拿大
瑞 典	4	美 国	奥地利	14	澳大利亚
新加坡	5	新加坡	挪 威	15	奥地利
芬 兰	6	芬 兰	法 国	16	德 国
德 国	7	荷 兰	(中国)台湾	17	(中国)台湾
荷 兰	8	冰 岛	澳大利亚	18	以色列
日 本	9	韩 国	比利时	19	日 本
加拿大	10	挪 威	冰 岛	20	爱沙尼亚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Rankings and 2007-2008 Comparisons”。

到底为什么日本变成了现在这种状况？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教义”，积极推进“结构改革”，开放市场，日本经济不是应该取得飞跃性的发展，获得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竞争力才对吗？

然而，现实中，在综合国力排名方面日本得到的评价，比以“高福利、高负担”而著名的北欧各国（丹麦、瑞典、芬兰）或荷兰还要低。至于IT竞争力，可以说滞后于包括北欧各国在内的IT先进国家。另外，不能忽略的是：美国这个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国，在综合国力部分排名第1位，在IT部门竞争力的排名中也保持了第4位。

我虽然不是所谓的阴谋论的赞成者，但美国倡导的“结构改革”和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那样的个人主义国家的确有效。尽管它现在由于金融危机而痛苦，但之前的美国经济确实维持了好景气。

但对于依靠社会的平等性、一体性而保持增长的日本经济来说，新自由主义思想，难道不是一杯自杀的“毒酒”吗？屡屡被人揶揄成“日本股份公司”的日本社会的平等性、一体性，现在已销声匿迹。因为一旦丧失了社会的团结，日本经济的整体情况就会低落，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雇佣改革破坏了日本社会的“安心感和安全感”

我再略微重复一下前面讲过的内容。“二战”后日本的制造业能够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创造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其重要原因是：现场工作的员工与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且，原承包人与转包人之间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大家能够抱成一团进行工作；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下，雇用得到保障，因此员工自然能对公司产生忠诚心。

然而，对企业与员工之间这种共存共荣关系进行批评的，正是美国式经济学和经营学。

在美国式市场主义观点看来，这样的劳资协调路线，或者终身

雇佣、年功序列制之类的保障员工地位的制度，从经济合理性讲，是极无效率、不合理的习惯。于是欧美系列的咨询公司劝说日本的经营者们：如果废除这种“不透明的雇佣制度”，导入建立在能力主义、成果主义基础上的人事制度，同时，再积极灵活地利用随时可以解雇的非正式员工，日本企业的生产力会提高，国际竞争力也将进一步加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和印度等低工资的新兴国家获得了急速发展。于是，日本的许多生产厂家急忙接住“神谕”，接连改变、废除日本式人事制度。

雇佣制度的“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积极采取劳动成本低的雇佣形式，尽量削减正式员工，增加派遣工和临时工，日本企业的劳动成本的确降低了。结果，实现了企业的轻装化，赢利能力得到飞跃性的强化。

但通过这种雇佣改革，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

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从日本的制造业中消失，派遣的非熟练劳动者、连语言也不通的外国劳动者一味地增多。现在，日本全部劳动者的1/3变成了非正式雇佣员工。多么恐怖的变化！

即使是这样，如果日本企业的生产力或国际竞争力提高了的话，还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些“改革”的结果却是，日本企业失去了应是它“竞争力源泉”的劳资协调关系和现场主义。

实际上，据我认识的一家企业的干部讲，从前的日本企业里有一种气氛，那就是什么都可以掏心窝子地讲，团结一心朝着共同的目标奋进的气氛；但现在，这种事情连期待也不敢期待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通常，非正式员工没有奖金。因此，在非正式员工面前，谈奖金的话题是要犯忌讳的。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忌讳”，所以，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即使一起喝酒，心中也有些隔阂。过去那种大家团结一致、坚如磐石的感觉，正在从日本的企业文化中消失。这样下去，日本企业引以为豪的“现场力”，早晚要成

为过去。

顺便说一句，据说，那家公司现在开始尽全力把合同聘用工转换成正式员工。该公司判断，尽管短期看来这会提高成本，但从长期来考虑则是必要的。但是，要恢复由于雇佣改革而分裂的“公司”这个共同体，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并且，这样的“职场内差距”不仅使日本企业的整体状况变差，还降低了日本社会整体的“安心感和安全感”。

观察近年来大量发生的杀人事件，成为加害者的，不少是派遣劳动者和短期的季节性劳动者，或者是自由业者和无业人员。我并没有打算把他们的犯罪正当化。可是，这种类型的犯罪增加，与日本式雇佣制度的崩溃，是不是也存在某些关联呢？

幸好迄今为止，由于多数日本人对公司有归属感，而获得了心灵的安稳。

然而，由于进行了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企业改革，可以感受那种归属感、一体感的场所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将社会粉碎，让人原子化”——波兰尼的这段话完全正确。而资本主义的那些毒害，现在已经影响了日本经济。

日本失去了“信用第一”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在“二战”后日本成为世界上数得着的经济大国，而长期互惠战略与“现场力”一并成为日本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正如“吃小亏占大便宜”这句谚语直接道出的那样。

欧美式特别是美国式的行动准则中，把寻找交易对方的弱点、用心观察对方的失败和缺点、钻对方空子这样的方法获得利益，看做“战略”。

在日本企业看来，即使有利用对方的机会，也要让对方得利，这样反倒可以获得对方的信任，以确保长期的利益。也就是把甘愿采取非战略性的行动当做“最强的战略”，这是传统的日本人的行动

准则。

战后的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强，在汽车和家电领域取得了成功，正是因为它们采取了这种行动准则。

日本企业并不是根据“价廉物不美”的想法去获取短期利益，而是宁可受些损失，也要贯彻“信用第一、品质第一”的战略，因此才获得了消费者的好评：“日本制造的产品虽然有些贵，但买得放心。”

如果这种“信用第一”的经营战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消失了，那将是个严重的问题。

但，那样的风潮不是已经在日本的经济界出现了吗？近年来发生的伪造防震标准、伪造食品产地，或者以“活力门”为代表的做假账事件，不正说明这种事情已经在日本横行。如果说连续发生的这些有悖企业伦理的事件，是由于丧失了日本式行动准则造成的，那就不得不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为日本人“量身定做”的经营方式

然而，读者当中或许有人会对我的想法提出异议，说：“所谓全球化，总归是吃人或被吃的生存竞争的场所。无论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取胜，不是就可以吗？”

但毕竟，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一直在岛屿上生活的日本人，既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功利地行动，也没有将自己的能力积极地向外表彰的厚脸皮精神。另外，也不具备在欧洲的精英们中常见的那种冷酷的现实主义精神。长期在岛国生活的日本人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就是采取长期战略。那就是勤恳老实地制作东西，依靠诚实第一做买卖，然后取得他人的信任。

的确，那种日本式的生活方式，绝不华丽，也不潇洒。但是，能够认真地实行这种踏踏实实的做法，实际上，对日本人以外的国民还真是不太可能。

至少，在先进国家中，采取“吃小亏占大便宜”这种愚直战略的国家只有日本；在被称做“金砖四国”的后发达国家中也找不到。如果是这样，即使不体面、不灵巧，也要下定决心，今后继续朝着获得长期信任的方向努力。

和我交往密切的商界人士中，有一位是医疗器械生产厂泰尔茂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泰尔茂”）的会长，名叫和地孝。我想，有很多人知道这家公司。泰尔茂公司由于开发了世界上最细的注射针（Nanopass 33）、导尿管、人工心肺机等占据了世界屈指可数的市场而著名，是日本的优秀企业。其客户遍布世界，泰尔茂本身在全世界也设有很多营业据点和子公司。

泰尔茂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规定：无论证券公司如何推荐，绝不搞 IR（面向投资家的宣传）。按照近年来的“全球化标准”，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每年要到世界各地两次，召开见面会，向股东和投资家展示经营方针、公开财务状况并敦促投资家投资，这已经成为常识。

但和地会长讲：对泰尔茂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到处去向投资家搞宣传，而在于独立开发安全、优质的产品，开发让医疗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患者真正喜爱的高品质的产品，在真正意义上为医疗现场作贡献。只要能生产出用户信任并让他们从内心感到满意的产品，业绩自然就会上升；只要业绩上升，投资家就会产生兴趣，自己来打听情况。

我也认为和地会长所讲极是。需要进行宣传活动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理论，日本人并没有必须效仿的义务；也并非只要搞了宣传，企业就会发展。并且，多数的日本经营者，不擅长像欧美的经营者那样，自吹自擂、大张旗鼓地表现自己。照过去的说法，应该“量体裁衣”，不合适的事情就不要做。

确实，与其把精力过多地放在奔走于投资家中间进行公关，不如把力量放在踏实地、愚直地制造能让医疗现场满意的最好的产品上面，这更符合日本人的秉性。即使不做那些吸引一般大众眼球的

表演和表白，丰田公司成功的例子也足以证明：如果按照日本的方式诚实、认真地制造产品，不久，也会得到海外消费者的正面评价。

当然，为了保持良好的评价，必须踏踏实实地努力，并持之以恒才行。如果新兴国家，想得到与日本同样的“评价”，最少也需要10年到20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其他国家想要达到日本的“精心制作”、“诚实经营”的地步，也并不容易。日本人应该认识到自己拥有别人没有的领先优势，好好珍惜才是！

北欧的经济为什么呈现活力？

通过上文的阐述我们知道：现在的日本，因为被新自由主义牵着鼻子走，所以其传统的优点正在逐渐消失。那不只是单纯的社会差距扩大、治安恶化、社会福利降低这些个别的问题，已经到了需要担心日本这个国家未来的国力和经济力量的程度了。

那么，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应该从何入手呢？

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救济、援助急剧增加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贫困是由于自己努力不够产生的，国家和社会帮助他们，等于在娇惯他们”，那么，不仅社会将会崩溃，日本经济的发展潜力也会不断地丧失。这种状况必须尽早改变。

这时，需要参考的是，与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北欧各国的做法。

按照从前的市场主义的想法，对国民实行过于优厚的福利政策，会被说成剥夺人们的劳动欲望，阻碍革新，而且高税收会削弱自由竞争力。

然而，本章也屡屡提到，现在，在世界各国中，“高福利、高负担”的丹麦、瑞典、芬兰这些北欧国家，表现出了很强的经济竞争力。即使从单个企业看，也是如此。现在，像诺基亚（芬兰）、

宜家（瑞典）、伊莱克斯（瑞典）等受世界瞩目的北欧企业有很多。丹麦在家具、造船等行业，也有很多具有世界级竞争能力的企业。

对于这些用历来的市场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北欧经济的发展状况，或许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解释和说明。但我认为，北欧各国的经济呈现现在这样的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能在有“安心感”的环境中劳动。如果不这样分析，将无法解释，像丹麦和瑞典这样，从人口来看也属小国的国家，为什么能具有与西欧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国际竞争力。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民负担率”（纳税负担和社会保险负担占国民所得的比率），竟然轻易地就超过了70%。也就是说，收入的七成要被政府拿走。如果以美国式的思维来看，这是整体主义的国家，是掠夺的国家。

但是，即便国民负担如此之高，北欧人也不认为在被政府虐待、压榨。因为他们认识到：那些负担，是为保护自己现在和未来的生活而付出的。也就是说，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比日本要高得多。

就在最近，我有机会访问了丹麦。让我最吃惊的是它的年金制度。

丹麦规定：在丹麦居住40年，到了一定年龄，可全额领取基础年金。有一点需要说明，关于支付条件，与是否有丹麦国籍无关。只要在丹麦居住上40年，老实地纳税，就可以全额领取年金。也就是说，丹麦的年金制度，并不是日本那种收取保险费的做法，而是通过税收方式。

顺便说一个标准例子。在丹麦，夫妇两人的基础年金，据说可达每月30万日元（当然，年金也要交所得税，所以到手的纯收入约为18万日元）。因为丹麦的年金制度采取税收方式，财源稳定，所以丹麦人没有必要像日本人那样担心将来的生活，因此，人们几乎都不为养老而储蓄。他们认为，社会和国家会保证自己年老后的生活，没有必要采取自我防护措施。

真正的“改革”是什么？

知道了丹麦这种福利制度，你怎么想？你会认为日本应该即刻转变成北欧式的福利制度吗？

恐怕很多人会想：“劳动，再劳动，收入的七成以上却都被税收拿走，我不愿意！”特别是日本发生了社会保险厅的丑闻后，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肯定会说：“把我们收入的七成都预存给国家？想都别想！”

“与其自己去投资、承担风险，不如把资金预存在政府那里，让政府为我们将来的生活负责，这样更轻松。”在丹麦，持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所以这种制度才能够运行下来。但今天的日本，像这样信任政府的人几乎没有。至少，不改变目前的状态，使被征收的税金的用途比现在更透明、更有说服力，恐怕不能立即引进与北欧同样的社会福利制度。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知道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并不只有新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才是“正确答案”，在地球上，还有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使国民过着幸福生活的国家。

从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讲，优厚的福利会让人们堕落。

但事实上，在战后的日本，企业内由于有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劳动者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并且，作为社会整体也通过累进课税进行了所得二次分配，因此，贫困率也被控制得很低。

实际上，日本在被说成“日本社会是坏平等”、“日本企业没有效率”的年代，不是更有活力吗？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这个事实！

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再空喊“改革！改革！”，而不讨论改革的内容。我反复讲了许多遍，我认为改革是必要的，问题是改革的内容。我想说的是：能让日本社会在真正意义上振兴的“改革”，无论如何是必要的；但越来越慷慨激昂地叫嚣新自由主义、市场原

教旨主义，也不好好地揣摩它的内容，就贯彻“民营化”、“撤废规制”的改革，是非常危险的。

税制改革应该怎么做？

那么，到底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有可能矫正日本当下的社会差距呢？

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税制改革吧。

的确，现在日本的税收制度，模仿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政策，大幅度降低了对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

日本的所得税率，最高时也曾经达到过75%。例如，按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税制规定，收入达到8000万日元以上的高薪收入者，所得税和地方税加起来，有近九成的收入被作为税金拿走。但到了现在，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37%，与地方税合起来也只有50%左右（美国虽然各州不同，但最高约为40%）。

支持这种税制改革的根本思想是什么，已经不说自明了。这种思想认为自身的努力才是作为人的正确活法，从赚钱的人手里卷走税金、二次分配给穷人，这是破坏市场经济道德。说得好听些，是“建立成功者得到回报的社会”；说得难听些，是“穷人就是失败者”的理论。

然而，通过这样的税制改革而受益的，最终只是一小部分成功者，对穷人的二次分配没有得到重视。无须多言，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日本现在的贫富差距社会。

而与美国、英国、日本等有着完全相反思想的北欧诸国，虽然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但所得税基本上作为直接税进行征收的；最高被征收近50%的所得税，另外还要课以25%的VAT（增值税）。并且，在瑞典等国家，对雇主（企业）征收雇员年薪总额三成以上的社会保障税。

从国家整体来看，国民支付的税金与社会保险费在国民所得中

所占比率（国民负担率），日本为 43.5%，相比之下，比如瑞典就超过了 70%。

刚才我也讲到了，试图套用国情、历史以及国家经济规模都不同的北欧的税制，当然是一种简单、鲁莽的做法。但如果考虑到今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改变税收体制，进行适当的所得二次分配，尽量减少贫困阶层的人数。

将基础年金改为税收方式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改变日本的税收制度呢？

考虑到这个问题很大，我个人在这里展开全面讨论，毕竟是不可能的。但首先应该明确，最优先的目标是，找回开始消失的社会一体感。为此，要降低仅次于美国的位居世界第二的“贫困率”，拂去蔓延在日本人中间的对未来的不安感。

这样，日本应该进行的改革是：把基础年金的财政来源改为税收方式，也就是提高现行的消费税，用于社会福利。

在现在这样的年金制度下，网吧难民就不用说了，就是处在不稳定的雇佣环境中的合同聘用制劳工，也很难按规定交纳保险费。所以，即使假定今后年金制度能够维持下来，他们也可能没有资格领取年金。现在，即便是网吧，还有个地方可以居住；等到了不能劳动的时候，连养老金也没有的话，这些人对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现在正在读这本书的日本读者，应该是在支付保险费的，所以大概不会有那样的担心。但想一想，再过几十年，如果日本社会出现许多领不到养老金也无住处的人，将会怎样？对那些在露天过着贫困生活的人们，你能够对他们说：“责任自负嘛，所以你就是成了路倒，也没有办法。”那种对他人没有同情心的社会，还称得上社会吗？

如果将基础年金的财源转换为消费税方式，就是无论是否支付

了保险费，政府都将向所有人发放基础年金，所有高龄者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当然，相应地，消费税就要提高。但是，国民不用支付保险费，所以，国民整体上是不会受损失的。

再追加说一点——实际上，这一点才重要——大家可以想一想，要维持现在的保险费征收制度需要花多少经费？如果采用消费税方式，社会保险厅至今进行的（效率低得可怕）对未缴纳者的督促、账本管理、支付标准定额审查等一切徒劳的工作，都变成不需要的了。另外，如果采用消费税方式，消费多的富裕阶层将负担更多的消费税，所以，这也等于进行了所得二次分配。

消除消费税“缺点”的策略

如果有人提议“用消费税来解决年金财源”，肯定会出现一种反对意见。

那就是，“消费税存在逆向性”。

消费税有很多优点。因为无论多么有钱，只要消费，就要纳税，所以不能偷税漏税减税。而如果是所得税，就有各种各样的减税技巧。如果甘愿承担风险的话，偷税漏税也是可能的。但是，那些手腕对消费税就不适用。但另一方面，消费税对穷人也一律征税。

假如将消费税提升到与欧洲各国并驾齐驱的20%，那么，年薪为200万日元的人，他的消费税负担（假设将全部收入用来消费）就要达到40万日元。也就是说，他的纯收入只有160万日元。而年薪10亿日元的人，他或许要支付2亿日元的消费税，但还能剩余8亿日元。这样一来，穷人会有重税感。

的确，这种逆向性的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日本现在年薪不足200万日元的国民超过1000万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提高消费税，对他们可说是事关生死的问题。

那么，对那些低收入者，采取事后申报返还消费税的做法如何呢？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穷人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向税务

局提交返还消费税的申报资料。况且，如果要审查申请是否属实，那又需要巨额的人工费。那么，干脆就限定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免税，如何呢？这又会出现很难界定免税对象标准的问题，行政手续也烦琐，征税成本会提高。

于是我想提议的是：“附带返还金式消费税”。

比如，当消费税率达到 20% 时，年薪为 200 万日元的人的消费税负担将会达 40 万日元，因此，在增税的同时，导入“对全体国民平均每年返还 40 万日元”这种制度。

这样一来，就如图 5 所示，年收入 200 万日元的人，实质上消费税的负担就成为零。并且，如果收入更少，比如年消费 100 万日元的人，他需要支付 20 万日元的消费税，但因为能接受 40 万日元的返还金，因此，实质上是接受了 20 万日元的所得补贴。

当然，接受返还福利的人，并不只限于年薪 200 万日元以下的人。比如，年消费 400 万日元的人，他的消费税是 80 万日元，因为能得到 40 万日元的返还，所以实质上的消费税率则为一半，只有 10%。对年消费额为 1000 万日元、消费税为 200 万日元的人，扣除返还的 40 万日元，缴纳 160 万日元的消费税，其税率就为 16%。如果这样做，对消费额度越大的人，征收的消费税率就越高，所以，逆向性这个消费税最大的缺点也就解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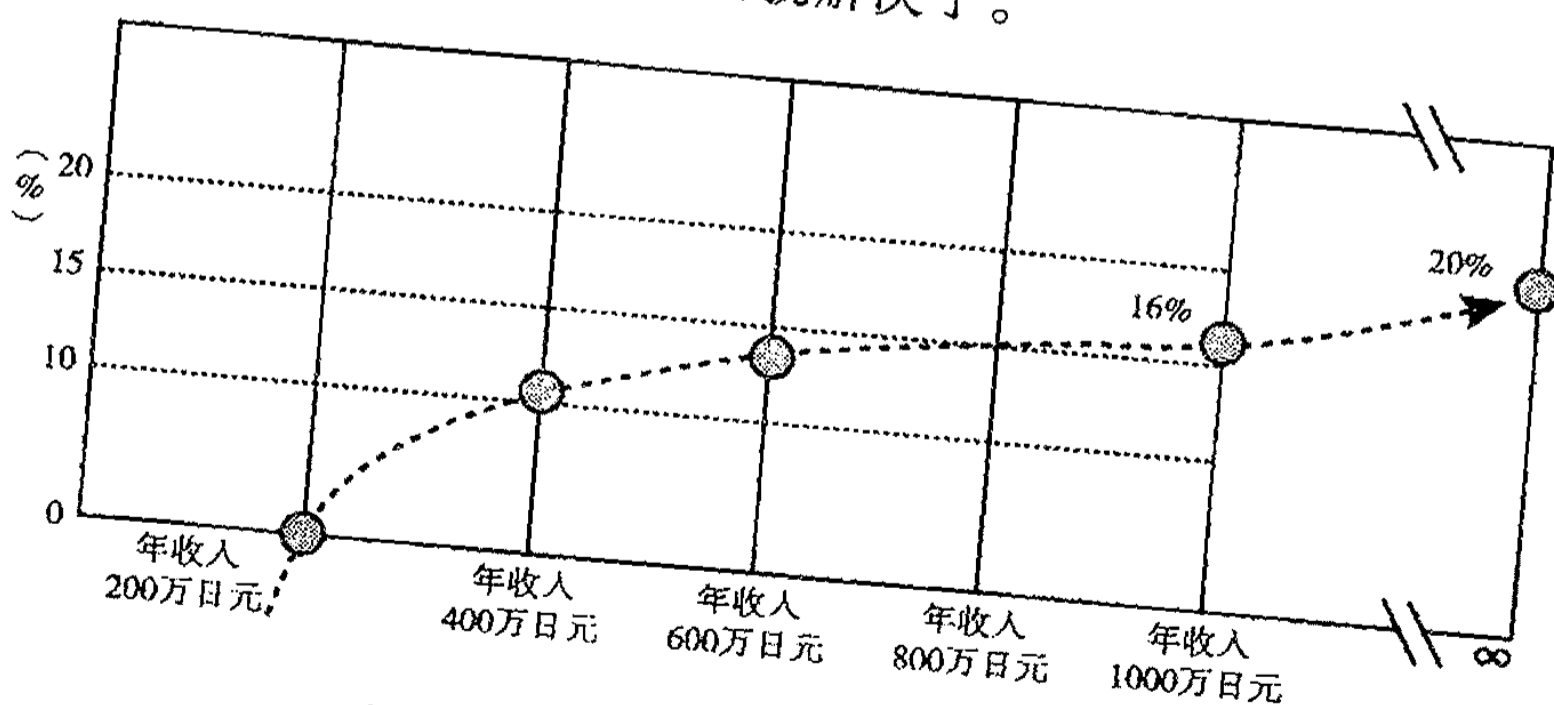


图 5 关于附带返还金式消费税的提案
(以消费税率 20%，返还金 40 万日元为例)

为什么提出“基本收入”的设想

“附带返还金式消费税”设想的原型出自“基本收入”这种思想。

所谓基本收入的想法的依据是：“为保护国民生活，国家有义务无条件向国民发放基本收入”这种理念。也就是说，不论该人处于什么状况，都应获得最低限度的收入，这是作为国民的基本人权；而保障国民最低限度的收入，是国家的责任。实际上，在日本国家宪法中第二十五条也规定：“全体国民，有权利在健康、文化方面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因此，基本收入也可以说是体现了宪法的精神。

只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只要是国民，对任何人都无条件发放”这个问题。

我提出的“附带返还金式消费税”设想，也完全不考虑这个人是否在劳动、收入多少、年龄大小、性别是男是女、有无子女等这些个人问题。只要满足“是国民”这个条件，政府都要平等地保障这个人有一定的最低收入。

听到这样的建议，恐怕多数人会认为：“那种事是痴人说梦。”或许还有人担心：“如果搞那种撒钱的福利，会出现不劳动的福利蹭车人，引发道德风险。”况且，还有如何筹措返还金的财源这个难题存在。这样的担心是自然的，我也能够理解人们对于发钱给那些毫不付出努力的人产生的心理上的抵触。

但是，前面也提到了，在丹麦，基础年金是通过税收方式征收，然后向所有居住者无条件发放，而一概不论个人的业绩大小，比如做过什么工作、纳过多少税等。养老金是退休后平等地发放的供给。我们可以把基本收入制度理解为：不限定在退休后，而是“现在”就扩大到对所有年龄段的人发放的供给。如果说向全体国民平等地发放养老金，保障年老后生活的制度能够成立，那么，向所有国民平等地进行收入补助的做法，也绝不荒唐无稽吧？

当然，我并不认为只依靠这一个制度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这样的大包大揽，或许也会产生许多副作用。我也并没有乐观到认为只要国家保障了最低收入，确立了养老金制度，一切社会问题就能解决了。

但是，我相信：让日本走出“无希望的贫困大国”状态，是优先于其他问题的政策性课题；为此而竭尽智慧，排除万难，使这样的制度变成现实，这才是“政治”的使命。因为我认为，日本社会的安定，是发挥这个国家“实力”的前提条件。

当然，所得税也不是因此就不必要了。如果不从收入在一定水平以上的人们那里征收所得税，国家财政将无法维持。至少，加上住民税在内的最高税率只有50%这种现象，怎么也不能把它当做正常。

当然，我们也不能再回到从前那个对1亿日元的年薪征8000万日元税的时代。但对于有高额薪水的人，比如赚10亿日元以上的人，把“最高税率”设定得高一些不也可以吗？举个例子。对不足10亿日元的收入，征收五成的税；如果所得达到11亿日元，则对超出的1亿日元征收七至八成的税。有人说最高税率会损害劳动欲望，但我很难想象，仅仅2000万日元左右的追加纳税，就会影响赚10亿日元的人的干劲。另外，作为社会整体，还可以考虑向那些纳税多的人授予勋章，作为对他们的尊敬和感谢。

总之，“附带返还金式消费税”制度的好处就是，贫困阶层的生活会变得远比现在稳定。

这样，就可以洗清“贫困大国日本”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污名。如果因此日本社会的“分裂”状态还可以得到改善，温暖和谐的“有安心感和安全感的日本社会”还可以得到恢复，我认为那就绝不是莽撞的改革。（关于基本收入更详细的讨论，可参照橘木俊诏、浦川邦夫《日本的贫困研究》第8章，东京大学出版社）

“用现金进行收入二次分配”的局限

文章到此，一直讲的是，日本社会中贫富差距扩大的现状以及

如何消除的问题。但是，并不是只要适当地进行收入二次分配，确保社会福利制度的财源，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因为，如果实行这些政策，或许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由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而弱化的日本政府的机能，复苏日本这个国家。但是，我根本不认为，仅靠这些政策就可以使由于市场经济而被分裂的、原子化的、失去了横向联系的“日本社会”重新振兴。我要指出的是：如果以为中央政府“用现金进行收入二次分配”，提高了贫困阶层的生活水平，日本社会就会因此真正地恢复元气，这种想法就过于乐观了。

社会要在真正意义上稳定，除了在金钱层面上让人有安心感之外，还要让人们能够切实感受到类似精神依靠的“人与社会的一体感”。换句话说，就是“自己被社会需要”的感觉。

最近，在日本，屡屡有关于“贫穷的劳动者”犯罪的报道。我并不打算将这些人的犯罪正当化。但是，比如，在秋叶原嘈杂的人群中，无特定对象杀人案的犯人供述犯罪原因道：“因为谁也不搭理我……”我认为这道出了一定的真相。作为聘用制合同工，尽管也有一定的收入，但如果在派遣去的公司被当做“客人”对待，与工作伙伴没有接触，人们是会被孤独感压垮的。

这种孤独感是国家无法直接填补的，这个道理不用多说。假设要求国家发挥这样的功能，那也只能产生纳粹式的全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罢了。

那么，市场能够治愈孤独吗？当然不能！新自由主义理论说，个人通过参与市场而接触社会；但是，市场不过是匿名的某种调整供给的场所，不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相反，由于市场会加速“劳动的商品化”，因此，它只具有增大劳动者之间的疏远感的作用。

这样分析起来，我们可以再次确认一点：国家和经济原理，在使因全球化资本主义而分裂的日本社会的复苏这个问题上，无法发挥作用。

的确，政治很重要，社会福祉也很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是在

国家与个人之间，创造各种形式的中间共同体、中介组织，然后让人们能够参与进去。

“大政府”也能搞活经济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个人不能够孤立地存活。如果没有被人需要的感觉，人们常会认为没有活着的价值。人，因为属于某个共同体，所以才能在那里感受到活着的证据。

中间共同体和组织的形态多种多样。

当然，最基础的是家庭。此外，能联想到的还有社区、兴趣小组、NPO（非营利组织）、各种协会等。正如我讲过的那样，战后日本的情况是，“公司”一直是日本人心灵最重要的支柱。

虽说这种支撑也只是到退休为止，但日本公司曾经是保障员工“终身”雇佣的场所。作为共同体的“公司”，成为支撑人们心灵、支撑社会整体的、稳定的、最重要的中间组织。日本经济的表现，也是这种公司形式带来的稳定性的结果。

但是，不管结果好坏，曾经成为战后日本人心灵支撑的日本“公司”，现在，却由于轻易地走上了美国式企业改革道路，对多数员工来说，已经不再是心灵的支撑了。不，不仅如此，它甚至已经无法再发挥作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微型社会的功能了。

尽管这样，那么，再退回到从前那种以正式员工为中心的雇佣体系，保障终身雇佣就好吗？事实上，如果那样，又会在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竞争中产生不利的影响。

并且，从经济整体来看，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如果复活终身雇佣制度，则会削弱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故而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会招致日本经济的停滞。因此，找到劳动体制的“最优解”相当困难。

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那就是丹麦。

在丹麦，企业可以随时解雇多余的人员，而被解雇的劳动者对

此却没有意见。

之所以这样，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者即使被解雇，也可以领到优厚的失业保险，所以没有生活的不安定。

与此同时，在丹麦，工资采用彻底的同一劳动、同一工资制度，因此，只要是做同样的工作，那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多少年，工资待遇都不会提高。于是，提高技术能力就变得重要起来，而失业正是一个提高技术能力的好机会。丹麦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很好的职业培训所，劳动者一旦被解雇，就可以立即免费去上职业培训学校。如果换个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时常地被解雇一次，倒是接受技能培训的好机会，为未来另辟蹊径。

这种制度的好处不限于劳动者一方。从宏观上看，还有确保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优势。

这对企业来说也是相当值得庆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不会出现因雇佣过剩而烦恼的情况。如果人员过剩，只要立即解雇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将劳动成本看做“可变成本”，因为能够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对它进行调整。

从国家层面上看，如果有这样的制度存在，产业结构转换也变得容易进行。

因为，对于那些丧失了竞争力的产业，只需进行雇佣调整，让被解雇的劳动者在职业培训学校接受培训，掌握有前景的产业所需的技能。当企业重新开始新的产业时，因为能够立即招募到有技术的劳动者，所以产业结构的转换也可以顺利进行。

从前的日本式雇佣体制的缺点在于，即使出现雇佣过剩，也很难进行雇佣调整。正因为此，近年来的日本企业才一直增加容易解雇的非正式员工试图以这种方式进行应对。但我在前文也讲过，这破坏了员工的团队意识，造成了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不融洽。

为使劳动者流动性增强，易于产业结构转换，必须准备丹麦式的劳动力市场。为此，有必要采取扩充失业保险、增设职业培训所等措施。但如果拘泥于“小政府”，这些政策将难以实现。而这又会

延迟企业的雇佣调整，妨碍产业结构升级和转换，招致经济停滞。

考虑到这些情况，就不能说“小政府”更加有效率了。实际上，在“大政府”下，也有可能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

“国家”救不了社会

以上所说的这种社会分裂，如今在日本已经到处可见，并不局限于公司层面。即使在居民关系曾经十分牢固的农村地区，随着少子化、高龄化的进展，区域社会的存在感也正在快速消失。众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到都市去，留下的只有高龄者。因此，在日本各地都出现了“极限村落”^①，这种村落已经很难作为一个共同体继续存在。

不，那不只是地方上的现象。根据不久前的报道，位于东京都中心区的新宿区大规模集体住宅内的居民，65岁以上的高龄者已占半数以上，出现极限村落化（2008年9月6日，共同社）。

对于这种地方的人口过疏化、社区的空心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不用说，对于这种状况，国家能够做的事情太少了。我已经讲过，国家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替代品。

原本从历史上看，像现在这样的国家的形式，是近代以后产生的。它与人类这个物种诞生以来自然建立起来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对于“国家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有许多种，但我想，最终，所谓近代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是进行外交和防卫的主体，在国内不过是维持治安和征税的主体。

国家的职责，就是进行这些宏观的事情。而其他微观部分的工作，比如与人们的生活直接相关的部分，国家就不应该干涉。从性

^① 极限村落：指由于人口减少等原因，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一半，难以维持社会共同生活的村落。——译者注

质上讲，也不具备干涉的能力。由于国家和政府“过大”，所以就不可能对每个国民进行个别的恰当的应对。

在社会福利问题上也同样如此。

如果思考一下，为什么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原因在于，需要接受护理的人的需求千差万别，而厚生劳动省却试图进行统一规定。

判断每个高龄者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护理，只有现场人员才能做到，但政府没有给他们自由裁量的余地，而让他们从全国统一的“菜单”中选择，这样是不可能提供体贴周到的服务的。在这种状况下，还期待护理者和被护理者之间能够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个期待本身就是愚蠢可笑的。

“被社会支撑着”的真实感受之必要

2007年，从事护理服务的大公司 COMSN（Community Medical Systems and Network）在护理报酬上进行非法索取的行为被发觉，之后，该公司决定退出护理服务行业。对这一事件，人们还记忆犹新。

发生这类丑闻，也有政府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把公共服务委托给民间企业即可”的缘故。更重要的是，政府忘记了一个根本思想：护理和医疗原本就不应该由国家直接监督，或用全国统一的标准进行规范，而应该由“区域社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

比如，在丹麦等北欧各国，为了支持福利制度，人们被迫承担着高额负担。但是，即使那样他们也没有产生不满。因为这些国家的福利服务进行得非常细致，人们有一种“自己由社会支撑着、保护着”的切实感受。

我在这里没有篇幅详细讲述，简单地举一个例子。比如，在丹麦，人们妊娠、分娩的个人负担近乎为零。但比这些金钱上的资助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由整个区域社会而不是国家，来代替父母承担关于培养教育孩子的各种工作的制度。

在丹麦，一旦孩子顺利出生，首先就有保健员作为育儿辅助人定期到家访问；出生后6个月左右到3岁以前，由托儿所和保育员提供白天的照料服务；3岁以后就进入幼儿园接受集体保育。

这些服务的费用，当然是由政府负担。但是，仅简单地由国家制定制度，如此细致的育儿援助服务还是实现不了的。如果社会整体没有“孩子由区域社会培养”的意识，这样的援助是不可能成功的。从父母方面来看，如果他们不认为育儿援助服务不仅是“政府的工作”，也是充满爱心的行为，那么他们是不会放心地将宝贝孩子托付出去的。

在这一点上，丹麦等国家有一种共同的认识，认为“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不只是家庭的事，还要由全社会来进行”，所以这样的育儿援助政策才能够很好地实行。

我想，只要有过养育子女或是照顾病人和老人经历的人都会有切实的感受，这些工作的辛苦，不单纯体现在肉体方面，更多的是，“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人可以依靠”的孤立感和无法期待社会提供细致的支援的绝望感。

既然人是社会性动物，就不能在孤独中生活。即使有形式上的育儿、护理服务，但如果其中没有心灵的接触，不能让人们发泄日积月累的牢骚和不满，分担他们的烦恼，那还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让他们感觉自己还“活着”。

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要向丹麦等北欧国家学习，仅单纯模仿表面上的形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学习它们如何维持社会关系，如何在区域社会中消除个人的孤独感和不安感。

地方分权才是日本经济振兴的关键

回想起来，日本也曾经有过“对门三家，左右两家”的说法，意思是说，大家都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所以左邻右舍要彼此照应，在区域社会中，相互帮助是自然的。

但是，这种社会关系，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彻底消失了。甚至连应该说是“最后的城堡”的“公司”，现在也变得不能发挥作为微型社会的作用了。如今，日本社会被全球化资本主义分解得支离破碎，日本人也变得原子化。

如何消除这种状况？虽然我不具备周密设计具体处方的能力，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讲，也是我反复说的：期待国家挽回日本社会的团结和安心感是错误的。

如果说国家有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过是对所有国民，在物质和金钱上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这一点，在北欧各国也一样，国家无法满足每个人的心灵需求，也无法提供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撑而产生的密切感、安心感。

如果说有国家或领导人能提供那种凝聚力和安心感的话，应该认为，那就是纳粹德国的再现。社会的密切关系这种东西，不可以“由上层创造”。

如我刚才讲过的那样，国家本来应该做的，最多也就是在外交和国防等方面，关系到国民福利的事情，只限于“发钱”就足够了，而实务性工作则应尽量下放给地方，这才是“维持有安心感的、平等的社会”最重要的选择。日本中央省厅试图包揽近1亿国民的生活，这原本就是勉为其难。

目前，在福利方面取得成功的都是小国，例如，丹麦、瑞典、挪威这些北欧国家以及古巴等，这一点很富有启发意义。古巴和瑞典有1000万人，而挪威和丹麦更是只有前者一半左右的人口。

如果要建设全体国民都能够感觉到幸福的社会，那么，越是缩小行政单位，越能灵活机动地采取措施，也就越能够制定出反映各个地方特色的行政措施。当然，在移交权限时，也必须移交财源。

到底多大规模的行政单位为好，这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讨论。在现今的日本，“道州制”屡屡成为讨论的对象。但如果考虑到社会福利这个问题，那么，以道、州为单位或许还过于大。进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时，以道和州为单位考虑；而护理和医疗服务则以更

小的行政单位进行，或许更加现实。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日本不同于作为移民国家诞生的美国，日本是通过互相建立信赖关系而构筑起的有安心感、安全感的社会。依靠这些，日本又创造出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产品的信任”。因此，我认为，为了恢复日本的国力，重新构建区域社区必不可少。

当然，这种重建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必要大幅度缩小中央省厅，让地方拥有自主权。此外，应该做的事情还堆积如山。但是，即使有困难，如果要想使日本振兴，除了恢复人与社会的密切联系、重建人与人的信赖关系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日本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优秀品质

前面，我阐述了现在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有关建议。但是，日本的未来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吗？我并不那么认为。

我已经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讲述过，日本在世界上是一个具有相当独特文化传统的社会。

比如，在闭锁的岛国生活而形成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信用第一的思想，由于社会阶级意识淡薄而培养起来的“重视现场力”的思想等。日本人拥有其他国家国民所没有的思想和思维。这样的文化传统不是其他国家一朝一夕可以模仿得了的。不断重新认识这样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有助于提高日本国际竞争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日本的未来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日本人从绳文时代就开始持有对自然的尊敬之念和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往大了说，那就是日本独有的哲学观和自然观。

不用说，对人类而言，21世纪最大的课题是地球环境问题。

如何使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维护保持协调，如何使扩大消费与节约能源并行——这将成为今后世界生存与否的问题。不，已经成为问题了。如果现今地球上正在发生的环境污染、资源乱开发继

续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到人类这个物种的存续。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无止境地破坏自然的行为呢？

前面我已经讲过，原因在于把自然看做被征服对象的基督教思想，以及由此展开的近代资本主义思想。

在以上帝救赎人类为主题的基督教中，没有余地让保护自然、敬畏自然的感觉产生。在那里，重要的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上下关系。在一神教中，自然只应该是被征服、被统治的对象。

而在那种精神土壤中诞生的资本主义看来，大自然最终也不过是“商品”，土地、森林、生活在那里的生物，全部都是人类的所有物，因此，如何使用、处置都是自由的。而日本人拥有的“自然是上天的赐予”的思想和“人在自然的恩惠中生存”的想法，在资本主义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全球化资本主义争相寻找环境限制宽松的地方去投资，或者，依靠资本的巨大力量，通过对各国政治施加影响来抵制对环境规制的强化。

结果，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世界范围的环境污染的扩大和资源的浪费，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只要推进技术革新，环境问题就能解决”，这是各国的官方见解。但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市场原理，恐怕会以超过技术革新的气势，把环境彻底地破坏掉。如果那样，人类将被置于无法挽回的境地。

于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存在不就变得重要起来了吗？

如我在本书第五章所讲，日本自绳文时代以来，就对自然抱有神圣感。在先进国家中拥有这样的历史的，唯有日本。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认为，即使是生长在路边的杂草，也可以从中感受到神和佛的存在，而且他们把这种精神作用提炼到了文化的层面。另外，他们不只喜爱自然，还积极地保护森林资源和水资源。

众所周知，在现阶段日本已经拥有世界顶级的节能技术和太阳能电池等替代能源技术。我认为，能够进行这些技术积累，是延续了绳文时代以来的文化DNA的缘故。我这样分析这种文化背景，也绝不算过分吧？

环境立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当我思考这些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的时候，想到的是：今后的日本难道不应该成为“环境保护方面的超先进国家”吗？

正如我们深刻地体验过的那样，日本人没有美国人和英国人所具有的那种金融才能。如制作次贷的金融机构那样，为了赚钱而不惜牺牲穷人的利益，把明知会成为废纸的“证券”卖给别人却没有任何罪恶感，这样的“理性主义”，即使再过1000年，日本人也学不会。

符合日本国情的还是“重视现场”，勤恳并诚实地制作产品，像工匠似的磨炼自己，提高技术。如果说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也有日本人对世界作出的贡献，那么“最自然的事情”就是本着崇敬自然、珍惜自然这种日本自古以来的精神开发生态技术。

与此同时，为了“复兴”由于全球化资本主义而人心荒芜的日本社会，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更加积极地推进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比如，像不丹那样，在宪法中规定由政府积极保护森林资源、净化环境，将保护自然作为国策。这也是一种做法。

或者，作为一种具体尝试，可以考虑如下做法：为了消除都市的热岛效应，将街道的电线杆一扫而空，作为替代方法，沿街种上樱花树等植物，进一步贯彻大都市的绿化。

这里，值得参考的是法国斯特拉斯堡的例子。

这个城市，以从市区“驱逐”汽车为目的，于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地进行了市中心地区的再开发。该市规定，不允许开车进入市中心；在公共交通工具方面，积极引进了电车和公共汽车，与此同时，修整了步行道路等设施，将街道改造得很美。据说，改造完工后吸引了大量的观光客聚集到斯特拉斯堡，城市整体呈现活力。

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可以使用，其中我最想建议的是：将大力推

进环保技术的开发作为最优先的国家工程。

比如，近年来在国会讨论过的一个构思，就是改变现在将 27000 亿日元道路特定财源的暂定税编入一般财源的做法，将之全部投入到环境技术开发工程中去。仅此一点，就会吸引世界上环境领域的优秀研究者和企业聚集到日本来。如果再把这些企业和研究机构引进绿色丰富的地方城市而不是大都市，那么，又将会刺激地方城市的发展。并且，如果将在那里研发出来的技术无偿地提供给世界，或许日本就能够成为环境问题领域的领袖。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以欧美社会为目标，始终推进现代化，并成为非基督教国家中最先引进西方文明的国家。成果诚然很大，但，欧美的价值观和社会体制有很大的局限。

面临这个巨大的危机，日本到底能为世界做些什么？

这是现在就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而它的答案已经在日本人自身当中了。对此，我坚信不疑。

政策范式的大转换不可或缺

以上是我自身关于如何重建日本社会的一些暂定的——因此是不充分的——建议。但是，要将这些暂定的建议付诸实施，在日本目前所处的现实中，即财政赤字的累计额超过 GDP 18% 这样严峻的财政状况下，实行起来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事实。

以次贷问题为发端的金融危机，已经给实体经济造成了各种不良的影响。我们应该做好心理准备，这次的不景气或将持续数年。如果那样，原本已经困窘的日本的财政将有崩溃的危险。

但是，据我看，如果依据至今执行的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小政府”政策——政府尽量不介入市场，尽可能地实行民营化——来闯过难关，是根本不可能的。采取拖延战术一点点地提高消费税，打补丁似的东拼西凑，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相反，不实施我所建议的那种大胆的政策，将无法拯救日本的

窘状。但是，为了那样做，就有必要把消费税率一下子提高到不低于20%或者25%的程度。如果能实行这种大胆的税制改革，再采取附带返还金的消费税、税收方式的基础年金、对贫困者的医疗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等措施，健全的日本社会不久就会回到我们身边。

恰好现在，美国又诞生了民主党的奥巴马政权。美国将会大力调整新自由主义路线。日本也应该调整“小政府”、民营化、撤废规制这些政策，从小泉式改革路线大力掉转方向，以重新构筑让人有安心感和安全感的日本社会；通过增设职业培训所、增加失业补助等劳动力市场改革进行产业结构转换，提高国际竞争力。

当然，为此，政策哲学需要进行极其巨大的转变。但是，如果继续在新自由主义路线上随波逐流，日本真的会变成一个扭曲的社会。这一点基本上不会有误。既然是这样，日本难道不应该果断地进行彻底的范式转换吗？

按理说，民主党作为在野党，应该提出这样的政策转换。但可悲的是，日本还没有出现依据政策中心来区分政党的状态。民主党也和自民党一样，还没有明确提出大的政策核心。现在，世界经济濒临危机，日本社会也面对许多大问题，为了克服日本的窘境，需彻底进行一次政策转换，能够这样做的政治家难道真的不会出现吗？

末 章

给“怪兽”套上锁链

怪兽造成的“三个创伤”

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追求贪婪利益的意识形态。由于前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而开放的巨大市场，以及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资本主义变成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怪兽”。

毫无疑问，由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经济变得活跃起来。它不仅对先进国家，而且对中国等新兴工业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给予了巨大的刺激。这头怪兽将沉睡在世界各地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拉入市场交易所，经过有效的利用，促进了经济增长。

但是，由于这头怪兽跨越国境大肆活动，使得人类社会被分裂、自然遭破坏。其后不久，怪兽本身也开始受到侵害。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怪兽造成的“伤痕”实在太深，涉及面实在太多。

这头怪兽给人类造成的第一个创伤是“使世界经济不稳定”。

发端于次贷问题的金融危机，不只停留在美国国内，而且给全世界也造成了巨大影响。这种危机并非现在才出现。回顾二三十年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历程，会发现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地曾多次表现出来。甚至可以说，危机早已常态化。

以住宅用不动产作抵押贷款的美国 S&L（储蓄信贷协会）经营危机、涉及日本的不良债权处理的金融危机、亚洲货币危机，这些

自不必说，而且还发生了美国对冲基金的大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经营倒闭事件。发达国家每次都在 G7 等场合就稳定世界经济问题进行磋商，但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效果。

第二个创伤是“扩大收入差距”。

我已经详细论述了美国和日本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每个卷入全球化经济的国家，基本上贫富差距都扩大了。正如我已经论述过的，在经济封闭状况下，纠正差距容易见效，但在全球化经济下，由于“生产”和“消费”被分割，因此会助长不平等。即使各国政府想要纠正差距，但因为企业和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过于强烈，因此政治性行动也全部被削弱了。

第三个创伤是“破坏地球环境”。

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怪兽把手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结果是，地球环境大大恶化了。在没有任何国际性的强制力限制的情况下，怪兽将会找准那些规制弱的地方，蜂拥而至。因为资本主义这头野兽，尽管具有擅长嗅到利润这个美味饵食的能力，但没有考虑地球环境的 DNA。不仅如此，世界最大的 CO₂ 排放国美国，一直都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了破坏环境保护机制，这头怪物甚至具有通过院外活动操纵政治的力量。

这样，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怪兽，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但是，世界各国却找不出有效的办法来把那些危害控制到最低程度。

金融危机为什么频繁发生？

那么，到底为什么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呢？一句话就可以解释，那是因为不存在世界中央银行。

各个国家都有中央银行。日本有日本银行，美国有联邦储备银行（FRB），英国有英格兰银行，欧盟有欧洲中央银行（ECB），但却不存在管理整个世界货币供给的“世界中央银行”。

各国中央银行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作为“货币价值监督人”的作用。

货币供给过剩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从而使货币失去价值。对通货膨胀的担心高涨，人们就越发想脱手货币，把它交换成实物。这种情况严重起来，就会变成所谓的超级通货膨胀，人们不再将货币作为交换的手段使用。这时，经济活动变成物品交换，经济效益就会显著下降。相反，货币供给过少就会出现通货紧缩，与实物相比，人们更愿意拥有货币。这时，物品卖不出去，于是出现了萧条。为避免这样的状态，各国中央银行作为“货币价值监督人”，控制着货币的供给量。

如果世界上的中央银行能够时刻警惕着通货膨胀和紧缩，并通过国际协调恰当地进行货币管理，就不会有问题。

但这里有一个不安定因素，那就是世界货币是美元这个事实。

所谓世界货币，就是在世界贸易中使用的货币。在与美国全然无关的第三国之间的贸易中，使用的结算货币也是美元。但是，为什么在与美国毫无干系的第三国之间的交易中，也使用美元结算呢？那是因为，贸易双方相信，即使用美元收取货款，之后同样也能用美元再去购买其他物品。只要世界上的人们相信美元能够维持稳定并能够作为货币来使用，美元就可以发挥它作为世界货币的作用。

然而，管理着这个世界货币的并不是“世界中央银行”。操纵着美元的，是担负着美国国家利益的FRB（联邦储备银行）。

铸币税的诱惑

美国经济强大的“源泉”之一，在于它通过发行世界货币美元赚取所谓的铸币税。

假设货币的发行者印刷100美元的货币需花去1美元的印刷费，之后，货币发行者发行100美元的货币并且世界上的人们承认它具有100美元的价值，那么货币发行者就可以有99美元的差价收益。

这个收益部分被称做铸币税。

尽管这么说，但能够产生铸币税的只有世界货币。比如日元，它不是国际贸易中使用的货币。因此，无论把1万日元的货币印刷出多少来，也不可能赚到铸币税。

现在，欧盟的欧元也开始走强，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只有世界货币拥有国美国，在世界上唯一拥有赚取巨额铸币税的特权。如果FRB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美元，然后把它散布到全世界，而世界上的人们认可美元价值的稳定性，那么，仅此一项就可以赚取巨额的铸币税。

如何把美元散布到全世界呢？比如，白宫采取扩张的经济政策，只要扩大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就可以。那样，相当于赤字额的美元就会流到海外，美国就可以赚取那份铸币税。这样流出的美元，将在海外贸易时作为世界货币使用，因此，不仅刺激了经济，而且世界上的人们还会受其恩惠。

但是，如果美国拜倒在铸币税的诱惑下，连续采取过度供给美元的政策，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那样的话，美元将会充斥世界。于是会有人预测：“过剩的美元不久将会贬值。”这样，有些人或许就开始认为把美元脱手比较安全。

如果人们预测将来对美元的需求（等于美元的价值）会降低，人们就会越发采取抛售美元的行为。这样，美元开始暴跌，人们不再相信美元。因此，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发挥作用。于是，世界经济就会失去世界货币，国际贸易不能顺利进行，世界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如果FRB和白宫能时刻保持贤明，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这样的危机也就可以避免。但是，无论FRB还是白宫，对它们来说，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最优先的，并且也不能保证它们总能战胜赚取铸币税的诱惑。因此，由于没有世界中央银行，现在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就内含着危险性。

这次以次贷危机为发端的金融危机，是美国景气过热，造成美元撒向世界的结果。起因是不在 FRB 监督下的美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试图把微小的自有资本扩充成数十倍的资产，所以采取了“杠杆经营”，从而引发房地产泡沫，当泡沫破裂就导致了次贷危机。

如果 FRB 拥有作为“世界中央银行”的自觉意识，进行恰当的货币供给管理，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实情况是，长期处于 FRB 总裁位置的格林斯潘，把带动美国的景气放在最优先位置，纵容房地产泡沫，结果美元持续供给过剩。这就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总之，问题的性质现在已经清楚了。问题的根源在于，缺少一个以维持世界货币的价值为公共目的的“世界中央银行”（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且明快的解说，请参见岩井克人《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论》，筑摩学术文库）。

但遗憾的是，在民族主义仍旧活跃的现代社会，设立有强制力的世界机构的条件尚不具备。有人提出“世界三大货币区”，建议将欧元和日元也作为世界货币与美元并存，但那只会将事态搞得更复杂。几乎可以断定，如果多种货币并存，世界经济将会增加更多不稳定因素。

贫富差距与环境破坏问题的本质

读到这里，读者应该注意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现在商品和货币都跨越国境自由翱翔了，而控制它们的主体却仍然是分散存在的国家。

即使收入差距扩大，只要它限于国内问题，接受了选民意愿的政治家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地方经济已经呈现疲惫状态，地方选出的议员也将会为扩充公共事业而积极行动。如果说福利政策不充分，那么，自由党将会增加选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但是，全球化资本的力量甚至可以影响到国内政治，让这样的

行动无法进行。

正如罗伯特·赖希在《超级资本主义》中所说的：现代社会中，巨大的全球化资本通过各种各样的院外活动，弱化劳动者和市民的力量，阉割纠正差距的政策。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来说，试图纠正差距的政治，就是减少利润的“坏政治”。假设某个国家实行自由政治，全球化资本会从那个国家撤走。这样一来，那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将会更加恶化，所以，缩小差距的政策就失去了动力和支撑。

与先进国家相比，这个问题在后进国家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作为应对国际收入差距的政策手段，使用最多是依靠政府开发援助（ODA）实现收入二次分配。这不过是将不足先进国家 GDP 1% 的捐资分配给发展中国家，在平衡国际收入分配的意义上，它的力量微乎其微。

环境破坏问题也是如此。因为欧洲的部分国家（德国和北欧诸国）有着严格的环境限制，所以全球化资本就把投资集中到环境管制宽松的新兴国家。因此，从地球整体来看，环境规划是一件有头无尾的事。

比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 IPCC），是由国际上的专家组成的政府间机构，它的职责是收集、整理有关地球变暖的科学数据，但没有政治强制力。联合国也有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但这种国际会议也没有强制力。如果美国等世界上的 CO₂ 排放大国对它根本不理睬，它就无能为力。

无论收入分配，还是地球环境问题，只要各国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采取行动，就不可能指望问题的根本解决。与货币问题一样，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个有强制力的“世界中央银行”。

禁 果

总而言之，人类给予了全球化资本主义这头怪兽跨越国境移动

的“自由”。由于被给予了这样的自由，全球化资本主义获得了把各国的劳动力、货币、土地商品化，追求利润的机会。

但是，“自由”必须有“规则”。没有规则的自由会造成无秩序。

然而，在民族主义驱动下的当今世界，不存在国际规模上的十分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因此，无法对跨越国境享受自由的全球化资本加以必要的限制。而只要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世界就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警告过：将劳动力、货币、土地“商品化”会使人类遭受灾害。这个警告，在这里也完全适用。

我们必须开始认真地接受教训，要记住一个事实：完全遵从资本主义原理的要求，把全球化市场交易的一切的一切都自由化，最终会受到巨大的“惩罚”。我们必须学会懂得一个道理，即不能要求无止境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时代正要求人类进行精神革命，进行价值观的转换。

虽说不是伊甸园的故事吧，但“自由”就是禁果，一旦尝到了它的美味，人类是否还能保持清醒、控制住自己，很值得怀疑。

如果是这样，日本要把在全球化资本主义那里受到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首先应该以本国为单位做力所能及的事。

比如，消除国内收入差距，降低贫困率，支持成为人们心灵支柱的中间组织，彻底进行环境规制，发布“森林国家宣言”，实践与自然和谐共存。这些事，我们必须一件一件地去做。

资本主义将因“自由”而自我崩溃

近代人类的历史，就是从国家、教会、村落共同体等的制约中，为争取个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结果，通过近代化，我们到手了“自由”这个禁果。但是，人们也必须认识到“越是自由越会变得不幸”这个现实。脱离一切制约的自由的人，会失去社区温暖的人

际关系，会在社会中被孤立。

由于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在一定的制约中成长，并从中感受幸福。孩子在父亲没有道理的拳头、在社会和学校的规则束缚下，才能确立自我。没有受到约束，没有遭到任何挫折，从小时候就自由任性地行动的孩子，果真能成长为一个健全的人吗？

全球化资本主义也与之有相似之处。越是追求没有摩擦和规制的“自由”的市场，在短期内全球化经济越是看似活跃，实际上，全球化资本主义就越发不稳定，它的副作用也就越是增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通过无止境的放松管制和国际制度的调节，可以创造出不存在摩擦的畅通的世界市场，那才是全球化资本主义自我崩溃的时候。

虽然本书的题目“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书名直译为“资本主义为什么自我崩溃了”——译者注）用的是“过去时”的表达方式，但资本主义当然并没有全面地自我崩溃。但是，饱尝了自由的全球化资本，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使收入差距扩大并造成了大量不幸的人们，又使地球环境污染到几近不能修复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自我崩溃了。

套用丘吉尔关于民主主义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最坏的经济体制，但除了以前尝试过的其他经济体制”。虽说资本主义正在给我们施加各种惩罚，但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可能再放下自由，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锁国状态中去。吃了“自由”这个禁果的我们，只能忍受因此给予的惩罚。但要趁着惩罚还没有造成致命伤害的时候，觉悟到：应该将“自由”的一部分委托给统筹和管制。

不丹和古巴的人们，或者幕府末期的日本百姓，他们生活的社会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和市场原理，而他们看上去是何等的安稳、愉快。这些内容我在第三章已经详细讲述过了。他们还没有吃到“自由”这个禁果，因此，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很低，接受“自由”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等“惩罚”也很少。但是，因此就让

吃了禁果的我们回到从前去，却是不可能的。

如此想来，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改革派”的愚蠢。他们认为“改革”就是给全球化资本更多的行动自由，而给“改革”让开道路就是“正义”。实际上他们应该认识到：要求更多“自由”的行为，恐怕会加快资本主义的灭亡，乃至造成人类的毁灭。因此，对膨胀的欲望采取克制的态度，才是恰当的行动准则。

“相互承认”的思想

实际上，在欧洲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看法：一味地要求撤废规制、一切遵从市场的美国式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因此，欧洲各国一直试图维持自己独特的资本主义体制，与美国式资本主义划清界限。

例如，欧盟各国在讨论制度的标准化时屡屡使用的一个词是：“相互承认”（mutual recognition）。这是主张保留各国固有的制度，承认彼此的差异，而不是一味地推进制度的统一，使之符合全球化标准。

与制度的完全同一化相比，全球化资本的运作恐怕在自由度这一点上不够充分。但大胆地留下这种制度的多样性，可以给全球化资本的运作以一定的制约，由此可以或多或少地减少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另外，由于保留了各国固有的制度，所以可以保存各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这一点，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重要。日本完全没有必要必须接受历史和文化传统迥异的美国式资本主义。

为防止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自我崩溃，日本应该在“相互承认”思想的基础上，与欧洲共同协商对全球化资本的运作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然后将协商的成果在 G7 上发表。对于美国的金融财政政策，也有必要与欧洲各国采取一致的步调，要求美元的妥当供给。

如果有适当的管理，资本主义还可以勉强存续。但如果建立了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那种完全没有摩擦的全球自由贸易市场，那必定会加快人类的灭亡。

人的欲望唤醒怪兽

在 21 世纪，全球化资本主义这头怪兽还将处于脱缰状态，但怪兽会由于自己过度的行动而受伤。这就是现在的金融危机。

不过，它受的那些伤绝对算不上致命伤。不错，到伤口愈合为止，在一段时间内，怪兽会减少它的活动。但若置之不理，怪兽又会开始施展威风。趁现在这头怪兽正在疗伤，或许正是个好机会来制作控制它行动的笼子（制度）。

岩井克人讲：“以前，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得以运作，是因为使市场经济‘不纯’的各种‘外部’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市场经济本来应该显露的不稳定性。”（岩井克人：《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论》，第 84 页）

所谓外部性的存在，就是指中央银行和具有强制力的政府。从市场来看，在国内经济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些“不纯”的行为，如中央银行管理货币，政府实行二次分配政策和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等。

但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就不存在具有强制力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全球化资本主义这头怪兽，目前没有天敌。

但是，如果世界上的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或许我们就可以找到方法给这只怪兽套上一个笼子。或许还能制造出一些束缚怪兽行动的有效锁链。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学会“控制欲望”。

如果只是束手不为，不久，全球化资本主义这头怪兽将再次开始胡作非为，施展甚至能毁灭自身的凶猛威力，而那灾难也必定落到我们身上。

但到了那时再醒悟则为时已晚。放任怪兽胡作非为，把人类追赶到灭亡边缘的，不是别人，正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欲望的我们。

译 后 记

本书是一本反思欧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著作。作者中谷岩是日本三菱 UFJ 研究咨询股份公司董事长、多摩大学前校长、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曾在哈佛大学留学，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过日本细川内阁“经济改革研究会”委员、小渊内阁“经济战略会议”的代理议长，还担任过索尼公司董事会议长，可以说是一位游走在政、商、学三界的人物。

作者原本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坚定信奉者，曾经在日本积极倡导和推动相应的激进“改革”。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大波动到来之前，作者就已经开始反思，“全球化资本主义”这头“脱缰的怪兽”对世界来说到底是祸还是福。本书就是作者反思的成果。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以“欲望”为动力，无限扩张，固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但也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把多面向的人完全变成经济动物；它不仅抹杀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人性的扭曲和乖戾，让人变成“非人”，让社会冷漠无情，还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从而走向了反社会反人类的死胡同。

作者提出，全球化资本主义具有本质性的缺陷，它不但造成了世界金融的巨大波动，而且本身就具有扩大贫富差距、撕裂社会和谐关系的内在机制。由这种机制出发，全球化资本主义必然加速地球环境的污染，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天然敌人。

因此，作者认为必须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加以控制，必须打破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用全新的眼光重新检视现代经济学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

作者开出的“解毒药方”是，要继续利用市场机制和全球化资本主义来推进改革，但在改革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从经济维度出发，而是要兼顾人性、人情、文化、情操、价值以及相应的社会要素，避免社会差距扩大。政府要积极而适当地介入经济生活，不应把什么都交给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要重视公共利益，不能无限制地扩展个人自由。应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不能强求一律。健全的社会不仅应该是富裕的，还必须让人感到安心、安全和温暖。为此，国家就不仅要追求经济发展指数，还应该追求人的幸福指数。总之，作者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人类发展必须兼顾金钱以外的更宽领域和更多要素。

作者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经济霸权的实质和社会病象，对日本社会也作了比较深刻的剖析，对于中国读者了解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的真实状况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作者试图通过历史的视角，深挖所谓“美国精神”历史基因的努力，可以说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作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揭露，也不免让人联想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异化理论。由于全书带有忏悔录的特点，所以书中时常联系作者的个人经历与感受，这就加强了本书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全书文笔流畅，文风清新自然，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一部将学术性、思想性与通俗性及作者个人经历结合得比较好的著作，相信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

当然，作者的见解读者不一定赞同或完全赞同。事实上，本书在日本就有相当的争议，不赞同书中观点的读者为数并不少。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读到书中涉及中国的内容，虽然着墨不多，却很可能让人哑然失笑。因为，书中对中国的描述，表明作者对中国的了解与中国的真实状况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读者肯定难以接受。此外，作者对日本传统的赞美，似乎亦不乏自伐之嫌。诸如此

类，难以缕举，相信读者自能判断。

本书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首先应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研究员。2009年5月，李慎明研究员看到本书前言和目录的中文，当即决定将全书译为中文，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而较早向我国学者介绍该书的，是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凌星光先生。2009年4月，凌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中特别提及该书，并欣然留下他从日本带回的一本原著，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除上述两位长者外，译者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中心的王立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研究员，以及刘淑春研究员。他们给予译者许多鼓励和实际的帮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很多帮助，其中责任编辑王晓卿女士为全书做了十分细致的编订工作。

翻译过程中，凌星光教授、经济杂志社王建钢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伟研究员与王佳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京华研究员、旅美友人黄峥女士，为译者解答了许多疑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李红岩研究员校阅了全书，对译文进行了修订。

在另有中文译者和出版方的情况下，中谷岩先生选择了与我们合作。与中谷先生联系过程中，三菱UFJ研究咨询股份公司山本美津子女士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在版权转让过程中，曾得到 Tatoru Mori agency 营业部曾田哲史先生的关照。还有许多朋友、同事以及工作人员也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出现讹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10年春节

相关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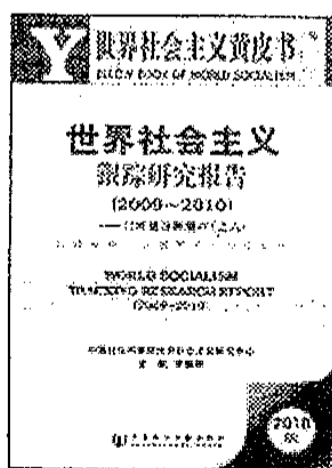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相关链接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一套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为宗旨的学术著作，分“皮书系列”、“研究系列”和“参考系列”。“研究系列”以国内的优秀研究成果为主，作者均为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家学者；“参考系列”以译著为主，收录国外著名学者的代表性作品。“皮书系列”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2006年我们出版了首部《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此后每年“两会”期间出版。这套丛书于2000年开始出版，目前已出版数十种。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会同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央对外联络部、新华社共同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宣部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与制度做了大量的、多视角、深层次的研究探讨，撰写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皮书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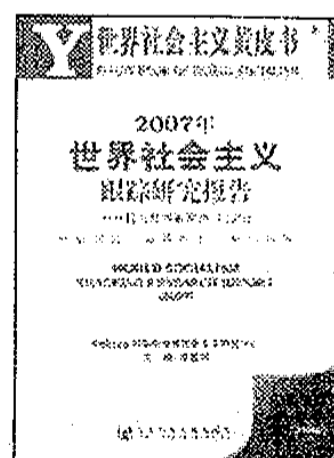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2月出版
89.00元

ISBN 978-7-5097-1296-2
9 787509 712962 >



李慎明 主编
2009年3月出版
79.00元(含光盘)

ISBN 978-7-5097-0657-2
9 787509 706572 >



李慎明 主编
2008年3月出版
98.00元(含光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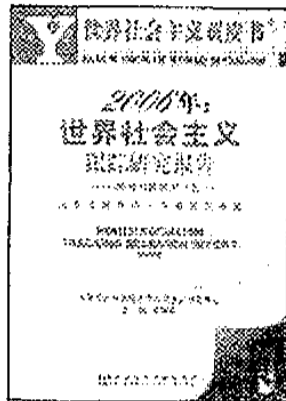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97-0073-0
9 787509 700730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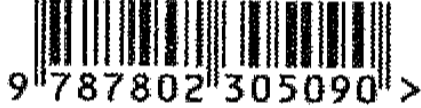


皮书系列 (续)



李慎明 主编
2007年3月出版
80.00元(含光盘)

ISBN 978-7-80230-509-0



9 787802 305090 >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5月出版
80.00元(含光盘)

ISBN 7-80190-429-X



9 787801 90429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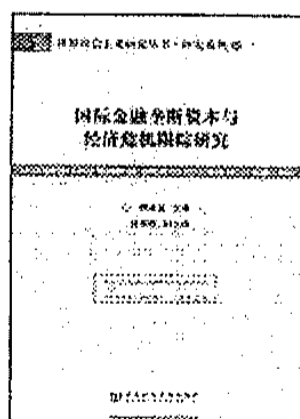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3月出版
68.00(含光盘)

ISBN 7-80190-971-2



9 787801 909718 >

研究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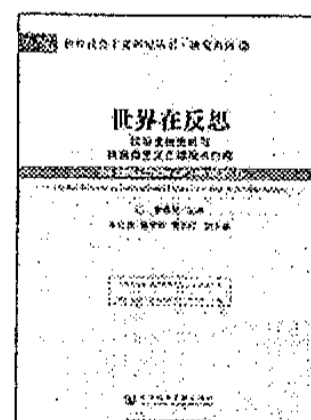


何秉孟 主编 博军胜 副主编
2010年7月出版
59.00元

ISBN 978-7-5097-1529-1



9 787509 715291 >



李慎明 主编
王立强 博军胜 曹苏红 副主编
2010年7月出版
59.00元

ISBN 978-7-5097-15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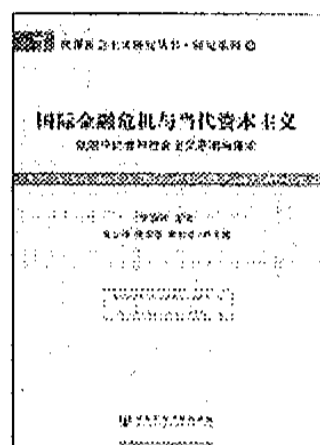
9 787509 715659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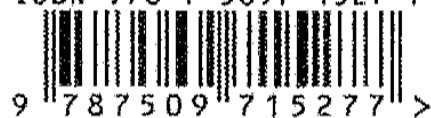


研究系列 (续)



李慎明 主编
王立强 傅军胜 曹苏红 副主编
2010年7月出版
59.00元

ISBN 978-7-5097-15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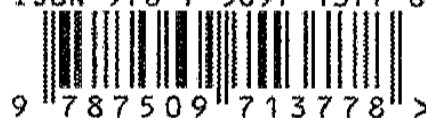


9 787509 715277 >



何秉孟 姜辉 张顺洪 编著
2010年5月出版
59.00元

ISBN 978-7-5097-1377-8



9 787509 713778 >



刘书林 蔡文鹏 张小川 著
2009年10月出版
35.00元

ISBN 978-7-5097-1086-9



9 787509 710869 >



李慎明 主编
王立强 傅军胜 曹苏红 副主编
2009年7月出版 88.00元
(上、下册)

ISBN 978-7-5097-0784-5



9 787509 707845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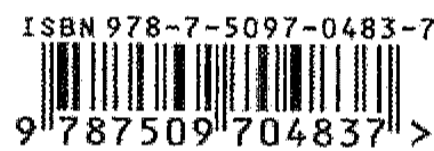
研究系列 (续)



谭索 著
2009年6月出版
69.00元



李慎明 主编
吴恩远 王立强 曹苏红 副主编
2008年11月出版 8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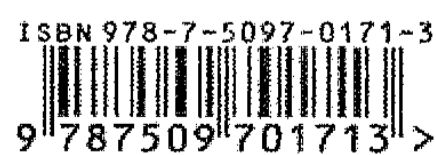
王金存 著
2008年6月出版
49.00元



聂运麟 著
2008年5月出版
85.00元



李慎明 主编
姜述贤 王立强 副主编
2008年5月出版 59.00元



周新城 著
2008年4月出版
39.00元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研究系列 (续)



姜琳 著
2008年3月出版
39.00元

ISBN 978-7-80230-984-5



9 787802 309845 >



周新城 张旭 著
2008年2月出版
48.00元

ISBN 978-7-5097-0049-5



9 787509 700495 >



聂运麟 等著
2007年11月出版
38.00元

ISBN 978-7-80230-875-6



9 787802 308756 >



谭索 著
2006年9月出版
79.00元

ISBN 7-80230-2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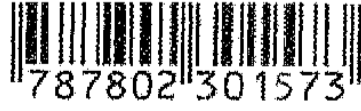


9 787802 302594 >



刘国平 著
2006年8月出版
45.00元

ISBN 7-80230-157-2



9 787802 301573 >



毛相麟 著
2005年10月出版
28.00元

ISBN 7-80190-740-X



9 787801 907400 >

相关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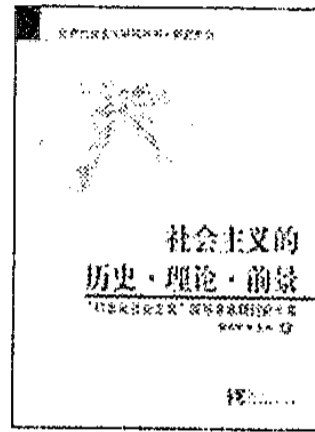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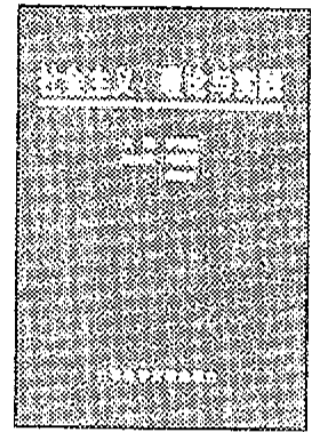
研究系列 (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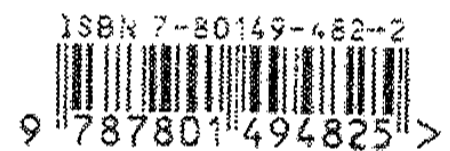
李慎明 主编
2005年2月出版 80.00元
(上、下册)



新辉明 主编
2004年5月出版 58.00元
(上、下册)



李慎明 主编
2001年4月出版
58.00元 (精)



参考系列



[古巴] 萨洛蒙·苏希·萨尔法蒂
宋晓平 徐世澄 张颖 译
2010年6月出版
39.00元



[法]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 著
陆象淦 王淑英 译
2010年3月出版
49.00元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译
2009年6月出版
39.00元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参考系列 (续)



[英] 张夏准 / 著
2009年1月出版
29.00元 (修订本)

ISBN 978-7-5097-0593-3



9 787509 705933 >



[英] 张夏准 / 著
2009年1月出版
39.00元

ISBN 978-7-5097-0592-6



9 787509 7059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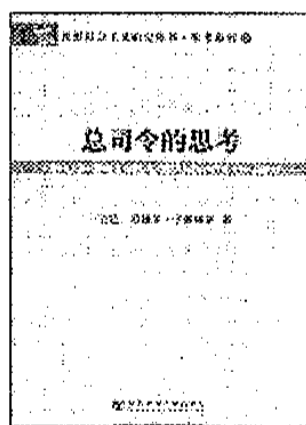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杨明柱 杨光 李宝源 译
李宝源 杨光 校
2008年11月出版 79.00元

ISBN 978-7-5097-0426-4



9 787509 704264 >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2008年10月出版
49.00元

ISBN 978-7-5097-0386-1



9 787509 703861 >



[日] 伊藤 诚 著
孙仲涛 宋颖 韩玲 译
2008年5月出版 29.00元

ISBN 978-7-5097-0193-5



9 787509 701935 >



[英] 唐纳德·萨松 著
姜辉 于海青 庞晓明 译
2008年1月出版 138.00元
(上、下册)

ISBN 978-7-80230-881-7



9 787802 308817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

参考系列 (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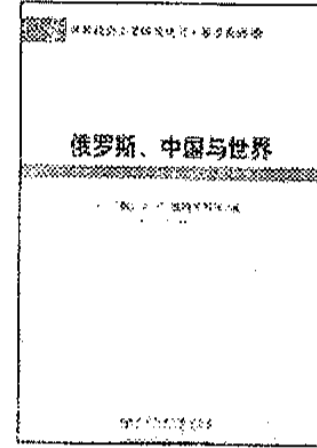


[保] 亚历山大·利洛夫 著
马细谱 葛志强 余志和 赵雪林 选译
2007年9月出版 48.00元

ISBN 978-7-80230-752-0



9 787802 3075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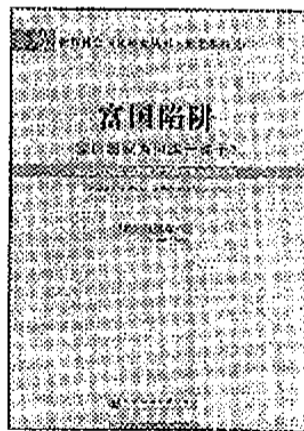


[俄] A. T. 雅科夫列夫 著
孟秀云 孙黎明 译
2007年5月出版 58.00元

ISBN 978-7-80230-636-3



9 787802 306363 >



[英] 张夏准 著
肖炼 倪延硕 等译
2007年1月出版 35.00元

ISBN 978-7-80230-362-1



9 787802 303621 >



[俄]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著
何宏江 等译
2005年9月出版 85.00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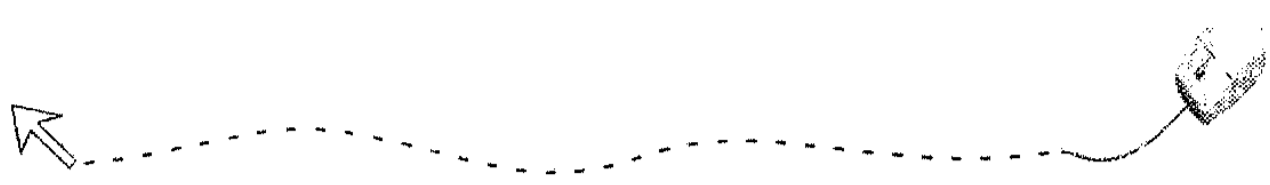
ISBN 7-80190-701-9



9 787801 907011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



参考系列 (续)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译
2005年1月出版
25.00元

ISBN 7-80190-263-7



9 787801 902634 >



[俄] 谢·卡拉-穆尔扎 著
徐昌翰 等译
2004年2月出版 66.00元
(上、下册)

ISBN 7-80190-085-5



9 787801 900852 >



[俄] B. A. 利西奇金
Jl. A. 谢列平 著
徐昌翰 等译
2003年9月出版 28.00元

ISBN 7-80149-874-7



9 787801 498748 >



[澳] 科伊乔·佩特罗夫 著
葛志强 马细谱 等译
2001年6月出版
28.00元

ISBN 7-80149-528-4



9 787801 495280 >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王玫 等译
2000年11月出版
27.00元

ISBN 7-80149-336-2



9 787801 493361 >



D.施诺卡尔 P.A.塔维奥 编
宋晓平 杨仲林 译
2000年11月出版
10.00元

ISBN 7-80149-419-9



9 787801 494191 >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本书是反思欧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全球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扩大、地球环境遭破坏、传统价值观丧失、社会扭曲、人情淡漠……面对日本社会与全球范围的种种乖戾现象，中谷岩——这位游走于政、商、学三界的人物、曾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坚定信奉者、激进的改革派，开始反思：全球化资本主义这头“脱缰的怪兽”给世界带来的是福还是祸？

作者通过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和市场原理实质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日本社会深刻的剖析，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无限扩张，在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的同时，也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必须用全新的眼光来检视现代经济学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兼顾传统价值、文化习俗、生态环境等的保护和维持，唯有如此，才能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

資本主義はなぜ自壊したのか — 「日本」再生への提言

上架建议：国际政治

ISBN 978-7-5097-1443-0



9 787509 714430 >

ISBN 978-7-5097-1443-0

定价：35.00元